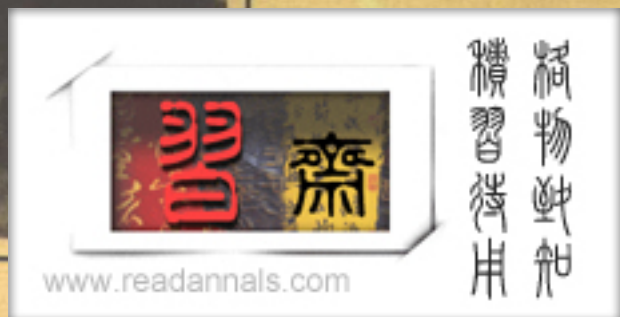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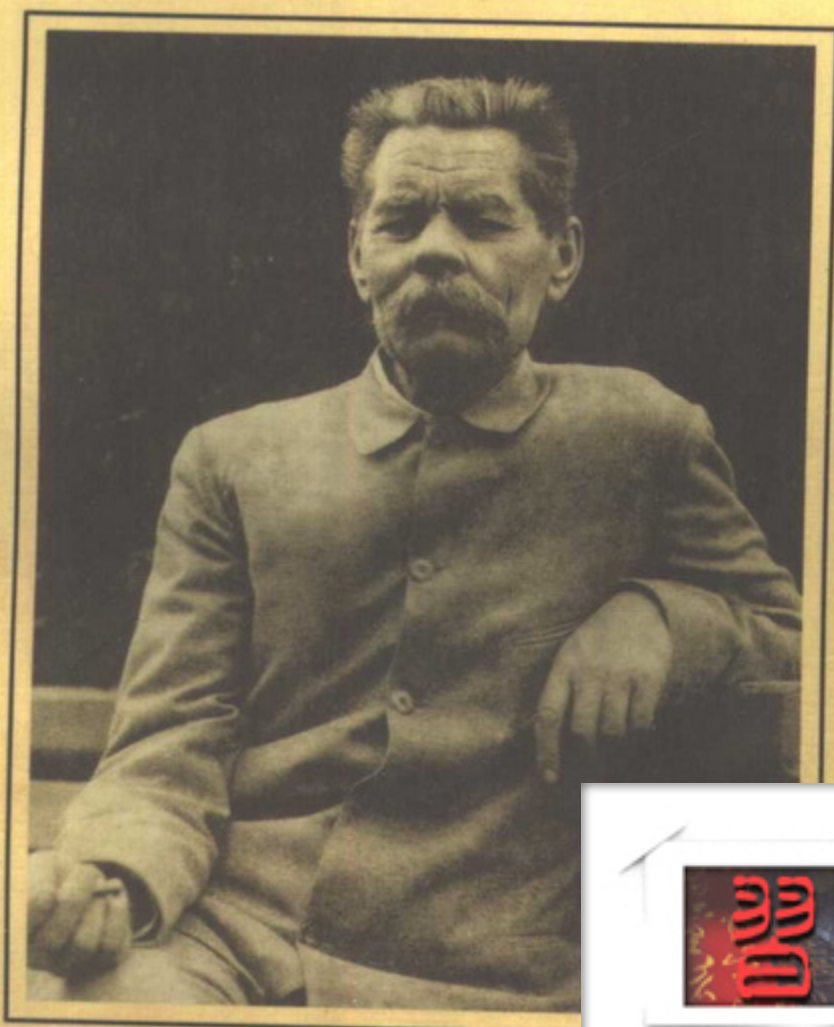


# НЕСВОЕВРЕМЕННАЯ 不合时宜的思想

## 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 著  
朱希渝 译



这是一部俄文版三十卷本《高尔基全集》未收录的作品  
这是一部七十年后才重见天日的作品  
这是一部展示未经化妆的高尔基真实思想、情感的作品  
这是一部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辉的作品  
这是一部俄国革命独特的编年史

江苏人民出版社



书 名 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  
著 者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  
译 者 朱希渝  
责任编辑 余江涛 蒋卫国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照 排 南京展望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扬州印刷总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75  
插 页 2  
印 数 1—8140 册  
字 数 245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093—9/G·636  
定 价 15.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编辑的话

《不合时宜的思想》是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前后编辑《新生活报》期间发表于该报的一系列论文的总题。《新生活报》于1917年5月1日创办，1918年7月16日停办。在14个半月当中，高尔基在该报发表了约80篇文章，其中58篇刊登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专栏里。这些论文后由高尔基编成两本互为补充的文集：第一本名为《革命与文化——1917年论文集》，共收33篇论文，按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于1918年由柏林的伊·巴·拉迪日尼科夫出版社出版；第二本名为《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收入48篇论文，不按发表的时间先后顺序，而按内容编排，于1918年秋在彼得格勒由“文化与自由”启蒙协会出版。两个集子所收的论文略有交叉重复。

1922年至1923年间，高尔基曾准备再版《不合时宜的思想》，还打算将柏林版中收入的十几篇文章并入其中，但一直未能如愿。直到1988年，此书才从严密的封存中重见天日。

本书除收录《不合时宜的思想》1918年彼得格勒版

中的 48 篇论文外,还收录了 1922 至 1923 年间高尔基拟补入《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的 13 篇文章,以及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发表的其他文章,这些文章为读者了解俄国 1917—1918 年的社会状况和高尔基当时的真实思想提供了新的材料。

本书所收录的全部文章均未被俄文版 30 卷本《高尔基文集》和我国出版的 20 卷本《高尔基文集》收录。

本书编辑  
一九九八年一月

## 目 录

|                            |     |
|----------------------------|-----|
| 编辑的话·····                  | I   |
| 不合时宜的思想·····               | 1   |
| 附录一 拟补入《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的文章····· | 178 |
| 附录二 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发表的其他文章···  | 219 |

## 不合时宜的思想

### 1

《新生活报》<sup>①</sup>, 1917 年俄历 4 月 21 日  
(公历 5 月 4 日)<sup>②</sup>, 第 3 期

我们争取言论自由,是为了能够说出和写出真情。

然而说出真实情况是一切艺术中最困难的一门艺术,因为它是最“纯粹的”,同一切个人、团体、阶级和民族的利益都没有联系的,几乎完全不宜于庸人利用,而且也是不能被他所接受的。这就是“纯粹的”真实情况该死的特征,但对我们来说这种真实情况又是最好的,最必需的。

让我们来谈一谈德国人的兽行的真实情况吧。我希望德国士兵野蛮对待俄国、法国、英国士兵以及比利时、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波兰和平居民的事实是确凿的。我有权希望这些事实是不容置

疑、无法辩驳的，就像俄国人在斯莫尔贡尼<sup>③</sup>、在加里奇亚<sup>④</sup>各城市所犯下的兽行一样。我不能否认德国人所采用的可恶的杀戮手段在杀人事业中是前所未有的。我不能否认，德国人对待俄国战俘的态度是非常卑鄙的，因为我知道，当年旧俄政权对待德国战俘的态度也同样是卑鄙的。

这一切就是真实情况，都是战争制造的真实情况。在战争中必须尽可能多地杀人，这就是战争的无耻逻辑。在打架斗殴中暴行是无法避免的，你们看见过孩子们在大街上怎样残酷地殴斗吗？

“纯粹”的真实情况告诉我们，兽行是人们所固有的一种特性，一种即使在和平时期（如果地球上还有和平时期的话）人们也不陌生的特性。让我们回忆一下，心地善良的俄国人是怎样把钉子钉进基辅、基希尼奥夫和其他城市的犹太人的脑袋里去的<sup>⑤</sup>；1906年伊凡诺夫-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们是怎样把自己的同事活活地投进锅炉用开水煮他们的；狱卒们是怎样丧心病狂地折磨犯人的；黑帮分子们<sup>⑥</sup>是怎样撕裂青年女革命者们的身体，把一根根木棍塞进她们的生殖器里的。再让我们回忆一下1906、1907、1908年间所有血腥的无耻行径吧。

我并不是在把德国人的兽行和全人类的，包括俄国人的兽行相提并论。我不过是想利用言论自由来谈谈今天的真相，谈谈战争制造的真实情况，谈谈那对于一切时代都非常重要，真正“比太阳还要美丽的”“纯粹的”真相，尽管它对于我们来说常常是可悲的和令人感到屈辱的。

当我们谴责一个人——无论是德国人还是俄国人，这都无所谓——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纯粹的”真相，因为它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我们意识的最明亮的火花；这种真相的存在，是人对自己提出崇高的道德要求的证明。



### 注释：

① 《新生活报》——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和《年鉴》杂志作家创办的日报，1917年5月1日（俄历4月18日）至1918年6月12日在彼得格勒出版，1918年6月1日至6月22日同时在莫斯科出版，高尔基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② 俄国在公历1918年2月14日前使用俄历即儒略历，后改用公历即格列历，亦称新历。本书中在1918年2月14日前发表的每篇文章的序号或标题后先标出该文发表的俄历时间，然后在括号里标出公历时间。如公历时间中标的年、月与俄历相同，则不再重复。对1918年2月14日后发表的文章则先标出公历时间，后标出俄历时间。

③ 斯莫尔贡尼——白俄罗斯西部城市名。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该地曾发生过大规模战斗。

④ 加里奇亚——历史地名，包括今乌克兰西部和波兰东部的一些地区。1914年8—9月奥匈帝国的军队和俄军在这一地区交战。奥匈军队被击败，损失兵力32.6万人，其中约有10万人被俘；俄军损失23万人。

⑤ 指1905年10月在基辅、1908年4月在基希尼奥夫发生的蹂躏犹太人的暴行。

⑥ 黑帮分子——1905—1917年间镇压工人运动、迫害犹太人的保皇组织“俄罗斯人民联盟”、“米哈伊尔·阿尔汉格尔同盟”等成员以及镇压1905—1907年革命运动的“黑色百人团”武装匪帮的参加者。

## 2

### 《新生活报》，1917年俄历4月22日 (公历5月5日)，第4期

成千上万健康的、劳动能力最强的人们，被强制离开了生活的伟大事业——发展我们人间的生产力，被派去互相残杀。

他们整天躲在泥坑里，冒着雨雪，在肮脏和拥挤中生活，被疾病折磨得非常虚弱，被寄生虫叮咬啮噬，他们像野兽似的生活着，恶狠狠地相互提防着，伺机要杀死对方。

在陆地上，在海洋里，到处都在杀人，每天都要杀戮数以千计的我们地球上最文明的人，正是这些人创造了人间最宝贵的东西——欧洲文明。

几千个村庄、几十座城市被摧毁了；许多代人上百年的劳动成果被消灭了；森林被烧光、砍光；道路被破坏；桥梁被炸掉；人们用顽强艰苦的劳动创造出的人间珍宝化成了灰烬。肥沃的土地被各种地雷和炮弹所毁坏，一条条战壕又把一片片沃土弄得坎坷不平，满目疮痍，而最后裸露在地表的已是贫瘠的土层了。整个大地被一堆堆无辜受害者的腐烂尸体糟踏得面目全非，丑陋不堪。强奸妇女，残害儿童——没有什么卑鄙勾当是战争所不允许的，没有什么罪行不曾得到战争的保护。

我们在血腥的恶梦中生活了两年多，我们变得野蛮了，疯狂了。艺术在鼓动人们对鲜血、对屠杀、对破坏的渴望；科学受到军国主义的强奸，在驯顺地为大规模杀人服务。

这场战争是欧洲的自杀！

想一想吧，在这场战争期间，有多少健康的、能够出色思考的头脑被抛掷在肮脏的土地上，有多少颗敏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这场毫无意义的人杀人，这场对人类伟大劳动成果的毁灭，并不仅仅局限于物质上的损失，绝不是这样！

成千上万肢体残缺的士兵们将久久地，至死也不会忘记自己的敌人。他们在讲述战争故事时将把自己的仇恨传给他们的孩子。三年中，这些孩子每日每时都受着恐怖印象的教育。在这几年中，我们的大地上已经播下了许多仇恨的种子，它们将会迅速地发芽成长！

但是很早以前人们就曾雄辩地对我们讲人们的兄弟情义、人类的共同利益。那么到底谁是阴险的骗子？谁是这场血腥混战的罪魁祸首呢？

我们不会只从自己的立场上出发去寻找罪人的。我们要说出这样一个沉痛的真理：在这次罪行中我们都有罪，大家都有，每一个人都有。

请暂且想象一下：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一些有理智的、真诚追求美好生活并相信自己的创造力的人。例如，如果我们俄国人为了发展自己的工业，需要开掘里加-赫尔松运河，把波罗的海和黑海联结起来，这还是当年彼得大帝憧憬过的大业，那么我们就不会把几百万人送去屠杀，而会把其中的一部分人派去完成这项国家和全体人民都需要的工程。我相信，那些在三年的战争中死去的人们，一定能在这一时间里排干我国数千平方公里的沼地；一定能灌溉荒芜的草原和荒漠；一定能把乌拉尔以东的河流和卡玛河连成一体；一定能修筑一条穿越高加索山脉的道路，并能为我们祖国的利益成就许多劳动的丰功伟绩。

但是我们却在杀戮几百万人的生命，把巨大的劳动力资源耗于屠杀和破坏。人们制造出大量异常昂贵的炸药，这些炸药在消灭几十万人的同时，自己也在空气中消灭得无影无踪。爆炸了的

炮弹毕竟给我们留下了一堆堆废铜烂铁，将来我们还可以慢慢地用它们制造钉子，而所有这些炸药，确实会在顷刻间将国家的财富化成一阵烟云。我在这里要讲的不是浪费几十亿卢布的问题，而是那被贪婪愚蠢的怪兽所无谓残害的千百万人的生命。

当你想到这一切时，一股冰冷的绝望之情就会压抑着你的心灵，而你真想对人们怒吼一声：

“不幸的人们，怜悯一下自己吧！”

**《新生活报》，1917年5月俄历6日  
(公历19日)，第16期**

不久前，一位小说家哀叹俄国革命中没有浪漫主义<sup>①</sup>，俄国革命没有造就出特鲁安·德·梅利库尔<sup>②</sup>，没有推出一批英雄，一批杰出的人。

我们可以说，之所以没有出现特鲁安，大概是因为我们没有攻打巴士底狱<sup>③</sup>，但假如我们也攻打巴士底狱，我想，单在5万名彼得格勒<sup>④</sup>的“卖笑女”中也许就能找出一些女英雄。不过，总的说来，我们的英雄始终不多，如果不算我们自己不成功地杜撰出来的英雄苏萨宁<sup>⑤</sup>、商人伊戈尔金<sup>⑥</sup>、彼得大帝的救星士兵<sup>⑦</sup>、库茨玛·克留奇科夫<sup>⑧</sup>和其他那些所谓只有匹夫之勇的英雄的话。

自然，人们在争论时，可能会忘记那些精神勇士，那些以毕生精力创造丰功伟绩并以此最终把俄国从无权与暴力的妖魔王国中解放出来的英雄们。

不过我却认为，浪漫主义毕竟没有枯竭，而浪漫主义者们也并没有消失，如果我们能用浪漫主义者这一称呼对那种炽烈地热爱自己的思想与理想的人表示尊敬——或表示污辱——的话。

前几天，正是这样一位浪漫主义者——一位彼尔姆省<sup>⑨</sup>的农民给我寄来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些文字使我非常感动：

“真实情况确实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承受的，有时真实情况极为沉重，使人直面它时会感到可怕。当你看到社会主义的伟大神圣的旗帜正被肮脏的手和满脑私利的人抢夺过去时，难道不会感到

害怕吗？……对财产极端贪婪的农民一获得土地，就转过身去，把热利亚鲍夫<sup>①</sup>和勃列什科夫斯卡娅<sup>②</sup>的旗帜撕破当裹脚布用。

“一位社会民主主义党党员、党的工作者、大学生直言不讳地宣称，他现在已不能再为党工作了，因为担任公职的话，他可以领到350卢布，而党连250卢布都不付给他。为了那‘原来的’理想主义，他可以少拿100卢布，但是……”

“士兵们自愿地站到‘世界和平’的旗帜之下，但是他们不是因国际民主的思想而向往和平的，他们是为了自身可怜的利益：为了保全性命，为了期待的个人幸福。

“我至少还清楚地记得我当年的情绪：一个17岁的少年，顶着火辣辣的烈日，用木犁耕地，如果这时我看见一位文书、一位牧师或者一位教师从身边走过，那我一定会问自己：‘为什么我在干活，而这些人却在享福呢？’因为那时我只承认体力劳动是劳动，而我的一切努力就是要把自己从这种劳动中解放出来。我如今在许多自愿投靠社会主义政党的人们身上所看到的恰恰正是这种情况。当我看到这些‘社会主义者’时，我就不由得想哭上一场，因为我想当的不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而是事实上的社会主义者。

“我们需要有不怕对人们当面说出真实情况的领袖们。如果社会主义报刊不仅揭露资产阶级，而且还揭露它自己所引导的人们的话，那么将来这报刊一定能因此获益。不但要对敌人，而且要对朋友严格无情。《圣经》里说：‘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sup>③</sup>”

这就是一位不可怀疑的浪漫主义者的话，是一个感受到真理的巨大凝聚力并热爱真理那净化心灵之火的人的声音。

我在此要向这个人表示我的敬意。像他这样的人们的生活是很艰难的，但他们的生命却能留下美好的痕迹。

## 注释：

① 指小说家维·伊列茨基(1882—1936,原名维克多·雅科夫列维奇·格利克曼)在《话语报》上发表的文章。伊列茨基在文章中抱怨二月革命缺乏浪漫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而充满了平庸的利益考虑和贪婪的发财欲望。

② 特鲁安·德·梅利库尔,即马尔库尔村的安娜·特鲁安(1762—1817)——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女活动家。维·伊列茨基在《话语报》的文章中曾提到她。

③ 巴士底狱——巴黎的中世纪要塞。建于1370—1392年,15世纪起为法国监狱。1789年7月14日,起义的巴黎市民冲进巴士底狱,夺取军火,释放囚犯,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爆发。1790年被毁。

④ 彼得格勒——俄国城市,1703年彼得大帝创建,初称彼得堡。1914—1924年改称彼得格勒,1924年后改称列宁格勒,1992年后恢复旧称圣彼得堡,俗称为彼得堡。

⑤ 伊凡·苏萨宁(?—1613)——俄罗斯民族英雄,科斯特罗马省农民,因将波兰入侵者领入林中沼地而被波军杀害。

⑥ 指尼·波列沃依(1796—1846)的剧作《诺夫哥罗德市的商人伊戈尔金》(1839)中的主人公伊戈尔金。

⑦ 指五戈比一本的民间通俗小书《一个士兵怎样拯救彼得大帝的故事》(莫斯科,1873年版)。高尔基在1897年写的自传中曾说,该书是“第一本使他喜欢得发狂的书”。

⑧ 库茨玛·费尔索维奇·克留奇科夫——哥萨克军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为沙皇俄国屡立战功。官方出版社曾出版过多种宣传他的战功的书。

⑨ 彼尔姆省——俄国的省,在乌拉尔山脉西侧。

⑩ 安德烈·伊凡诺维奇·热利亚鲍夫(1851—1881)——民意党的创始人之一,曾组织刺杀亚历山大二世。

⑪ 卡捷琳娜·康斯坦丁诺夫娜·勃列什科夫斯卡娅(1844—1934)——俄国革命家,19世纪70年代参加民粹运动,1874—1896年间曾被监禁、流放,服过苦役。后为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参加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临时政府,一度被称作“俄国革命的祖母”。1919年流亡国外。

⑫ 见《圣经·箴言》第9章。

## 4

### 《新生活报》，1917年5月俄历12日 (公历25日)，第21期

日前我收到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

“昨天，我读了您的作品《噩梦》。<sup>①</sup>您的作品使我这个也曾在侦探部门工作的人因意识到自己毫无希望的处境而从心里感到悲伤。在此我并不想向您讲述我是怎样堕入这一陷阱的——这没什么意思。我只想对您说，是饥饿和一位当时与我亲近的人的劝告促使我迈出了这可怕的一步。<sup>②</sup>当时他正在受审判，他以为我能够减轻他的厄运。

“我要告诉您，从我在那儿供职时起，我就一直看不起自己，现在我也仍然看不起自己。可是您知道我非常痛苦吗？即使像您这样敏感的人显然也并不理解，我们这些暗探中的每一个人大概都必须把自己心灵中的许多东西烧掉。我们并不是在干这勾当时才开始感到痛苦的，而是在比这更早的时候，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现在社会在向我们抛脏物，而当时却没有扶持我们，没有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坚强到能够奉献一切而不要任何回报的！假如我对社会主义、对党没有信念也就算了，可是您知道，当时我那卑鄙的脑袋里却这样想：我可能给运动带来的危害是很小的；我太相信这样一种想法，即我能够不干好我的工作，而使益处大于害处。我不是在自我辩解，我只是希望您也能充分了解奸细这样的可怜人的心理。要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是很多的！而且都是优秀的党的工作者。这不是个别的丑恶现象，相反，很显



然,是某种更深刻的共同的原因把我们赶进了这条死胡同。我请求您:请克服您的厌恶感,朝叛徒的心灵再走近一些,请告诉我们大家,是什么动机使我们在全心全意信仰党、信仰社会主义、信仰一切神圣而纯洁的东西的同时,又能‘忠实’地在侦探局供职;在看不起自己的同时,又仍然能认为可以生活下去?”<sup>③</sup>

生活在神圣的罗斯<sup>④</sup>是多么地痛苦!

太痛苦了。

在这个国度里,犯罪是可恶的。忏悔自己的罪孽则更糟。上面那些用黑体字标出的有关社会主义信念的言辞,其逻辑实在令人惊讶。难道这样一个以如此荒唐而可怕的方法思考问题的人会基于这样一种想法,即整个儿地爱自己心爱的女人,爱她整个身体、整个灵魂;而手指、耳朵同她整个人相比就太小了,咬掉他心爱的女人的耳朵或者手指也就无所谓了?肯定不会。但是在坚信社会主义事业、爱党的同时,他却把党的活生生的器官一个接一个地切割下来,并且还以为,这对于事业来说是利大于弊。我再问一遍:他是真诚地这样认为吗?恐怕确实是真诚的,恐怕他的这种想法不是在变节后才出现的,而是与变节同时产生的。俄国人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在每一个具体的时刻他都是真诚的。据我看,正是这种独特性才是我们早已习惯在其中生活的俄国道德混乱的源泉。你们看一看吧,任何地方也没有人花如此多的精力,如此顽强地研究问题,进行争论,热衷于个人的“自我完善”,而我们的人却乐此不疲,顽强地在做这种显然不会有结果的事。

我总是觉得,正是这一类事制造出特别浓重而令人窒息的虚假的、谎言的、伪善的氛围。在那些极度沉溺于“自我责难”的人们,即“托尔斯泰主义者”的小圈子里,这种氛围格外沉重和压抑人。

作为一种与身俱在的对一切肮脏和不好的东西的厌恶感,一种对纯洁心灵及美好行为的本能追求的道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中是不存在的。道德的位置早就被冷漠的、出自“理智的”关于行为规则的议论所占据，这些议论——我们不谈它们那令人厌恶的经院性——制造出一种冷冰冰的气氛，这是一种无休止的和无耻而无聊的相互指责、相互暗里中伤的气氛，一种用敌人的否定的尖利眼光窥视人们心灵的气氛。而且这里说的是一种可恶的敌人，他并不迫使你们鼓起你们的全部力量，调动你们的全部智慧与意志同它作斗争。

这敌人是一个空谈家。他唯一追求的是向你们证明，他比你们更聪明，更诚实，更真挚。总之，什么都比你们好。如果让他证明了这一点，那他就会高兴，但也只是高兴上片刻，过后他又变得空虚，精疲力竭，软弱无力，他就会觉得无聊。但是人们令人遗憾地不让他感到无聊，而要同他争论，于是人们自己也就受到腐蚀，将自己的激情耗费在无谓的琐事上面。就这样，一个空谈家生出了一批空谈家，结果我们并不丰富的情感被兑换成了零星的动听的空话。

请看一看吧，你们中的每一个人自身和周围的同情，从数量上讲是多么可怜，友情是多么淡薄，我们的言辞是多么炽烈，而我们对人的态度又是多么冷漠。只有当一个人已经破坏了我们所制定的行为准则，给我们以对他进行“不秉公义的审判”<sup>⑤</sup>的可能时，我们才会激烈地对待他。在冬天的晚上，当农民的孩子寂寞无聊而又睡不着觉时，他们就捕捉蟑螂，把它们的腿一条一条地扯掉。这种可爱的游戏很容易使人想到我们对别人的态度的普遍含义，想到我们对别人的那些议论的性质。

那封信的作者，一位“奸细同志”说的是正在驱赶许多人和当初驱赶他走入“死胡同”的神秘的“共同的原因”。

我想，这种“共同的原因”是存在的，而且这是非常复杂的原因。这种原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概就是这一事实：当我们情绪好的时候，我们也是以完全冷漠的态度相互对待的……我们不

善于爱，也不互相尊敬，我们没有培养起对人的关心。早就有人这样完全正确地评价我们了：

**“我们对善与恶都可耻地漠不关心。”<sup>①</sup>**

“奸细同志”非常真诚地写了这封信，但是我认为，他不幸的原因正是这种对善与恶的漠不关心。

### 注释：

① 指高尔基发表在《新生活报》1917年5月16日第13期上的特写，见附录二中的《噩梦》。

② 写这封信的人是第二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的一位代表之妻，其姓名缩写为尤·奥·斯，她曾为沙皇侦探部门工作。此信写于1917年5月17日，署有写信人的姓名全称，今收藏于高尔基档案中。高尔基出于人道的考虑，在引用此信时将写信人姓名隐去，性别易为男性。因为当时写信人已被捕，且临时政府的司法部已根据接收的沙俄警察档案公布了1913—1916年间安插在各党派中的奸细名单。

③ 后来高尔基根据写信人的请求写了短篇小说《长脚蚊》（1923年著，1924年发表），探讨了叛卖行为的社会心理原因。

④ 罗斯——俄罗斯的古称。

⑤ 典出《圣经·诗篇》第82篇第2节：“你们审判不秉公义，徇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

⑥ 引自莱蒙托夫1838年的诗作《咏怀》。

## 5

### 《新生活报》，1917年7月俄历14日 (公历27日)，第74期

由席卷7月4日的彼得格勒的疯狂<sup>①</sup>生发出的一幕幕令人厌恶的场景将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

看，一辆挤满了“革命军队”的形形色色代表的大卡车支着一杆杆步枪和一挺挺机关枪，像一头野猪似的在街上狂驰，车上站着一位头发蓬乱的青年，歇斯底里地喊叫着：

“社会革命，同志们！”

一些还没有丧失理智的、手无寸铁，但平和镇定的人拦住了隆隆奔驰的魔怪，缴了它的械，拔掉了它那步枪组成的鬃毛。被缴械的士兵和水兵们混杂在人群里，后来就消失在人群中了。那辆怪模怪样的车子空了，笨重地在破损而肮脏的马路上颠簸着，像噩梦般地也慢慢消逝了。

很显然，这一次向“社会革命”的可怕的进发是某些人匆忙而未经深思熟虑策划的，那股把武装到牙齿的人们推上街头的力量的名字就是愚蠢。

突然，不知在哪里发出了一声枪响，数百人痉挛着惊慌不已，犹如疾风扫枯叶一样四散逃开，人们互相挤绊着，摔倒在地上，又是尖叫，又是呼喊：

“资本家开枪了！”

开枪的当然不是“资本家”，导致开枪的不是对革命的恐惧，而是因担心革命失败而生的恐惧。我们的这种恐惧太多了。这种恐

惧到处都可以感觉到：在士兵们紧扣着机关枪扳机的手里；在工人们握着子弹上了膛的步枪和张起机头的手枪的颤抖的手里；在一双双瞪大了的眼睛的紧张目光里。很明显，这些人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而且未必明白，他们为什么拿着武器走上了街头。

傍晚4点钟左右，涅瓦大街和铸造大街拐角处那一幕惊恐的场面尤其典型。两个连的士兵和数百名老百姓起先温和地站在帕尔金饭店的附近和通向旗帜广场的稍远处的街上。突然，所有这些武装的士兵和手无寸铁的人们仿佛被一个凶恶、狠毒的巫师的魔力一下子变成了一群狂暴纷乱的羊群。

我无法断定，到底是什么东西使他们惊慌失措，并迫使士兵们朝从铸造大街的拐角处正数第五幢位于涅瓦大街上的楼房射击——他们怀着那种担心马上就要被缴械的疯狂和焦躁的心情开始漫无目的地朝着房子的窗户、圆柱乱射。射击的大约有十个人，不会更多了，其余的人则把步枪和旗帜朝马路上一扔，开始跟群众一起，砸坏门窗玻璃，往所有的门窗里挤，在人行道上组成了一堆堆因为惊恐而丧失理智的活肉。

一位少女在马路上那一支支被丢弃的步枪中边跑边喊：

“自己人向自己人开枪啦！”

我强迫她在有轨电车的电线杆后停下来，她气愤地说：“你们快喊啊，自己人……”

但人们都已经消失，跑到铸造大街、弗拉基米尔大街那边去了，钻进了他们捣出的缝隙中，马路上尽是丢弃的步枪、礼帽、制帽，肮脏的木板路面上盖满了旗帜的红布。

我不是头一回看到人群的这种惊恐状态，这总是令人反感的，但我从未体验过如此令人抑郁的糟糕的感受。

这就是在惧怕自己之前一个小时刚刚“摒弃旧世界”，并把“它的骨灰”从自己的脚上抖落的“自由”的俄国人民。这些革命军队的士兵们躲避自己人的枪弹，四散逃跑，丢下武器，贴挤在人行道

列宁全集  
第41卷

上。

俄国人民要想获得自己的个性意识、自己的人的尊严的意识，还必须付出许多劳动；俄国人民应该经过文化的慢火的锻炼和净化，清除掉在他们身上培养起来的奴性。

又是文化？是的，还是文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够拯救我们的国家使之免于死亡。而且我坚信，假如那一部分害怕承担责任、逃避危险的知识分子躲藏到某个地方，无所事事，津津乐道地批评时事的话；假如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最初自由的日子里就曾想过把另一些原则引进激动的本能的混乱中，就曾尝试过唤起另一种秩序的感情的话，那么我们大家就不会经历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如此之多的丑恶现象。如果革命不能立即在国家里发展紧张的文化建设，那么，照我看，革命就是没有结果的，就是无意义的，而我们也就是不善于生活的人民。

读了以上这些话，形形色色的无耻之徒一定会不失时机地欣喜地叫起来：

“有关列宁主义者在7月4日事件中的作用居然只字未提，哈哈！还要到什么地方去找虚伪呢？”

我不是侦探，我不知道什么人在这场卑鄙的戏中罪责最大。我不想为那些冒险主义者辩护，我仇恨和讨厌那些煽动群众的阴暗本能的人们，无论他们叫什么名字，无论他们过去对俄国有如何显赫的功绩。我想，7月4日事件中的外国挑拨是可能的事，但我应该指出，7月4日事件发生后，某些人流露出来的那种恶意的快感同样是极为可疑的。有些人是那样大谈自由、革命和他们对自由与革命的热爱，以至于他们那滔滔不绝的言辞不禁让人联想到那些想把自己的商品卖出尽量好的价钱的商贩们的甜言蜜语。

但是那场悲剧的最主要的煽动者我认为不是“列宁主义者”，不是德国人，不是奸细和反革命分子，而是更加凶恶、更加强大的敌人——俄国的极端的愚蠢。

在7月4日的悲剧中,正是我们的愚蠢比造成这一悲剧的所有其他力量负有更大的罪责,你们就把这愚蠢叫作不文明,缺乏历史感吧,随你们的便。

#### 注释:

① 1917年7月初,二月革命后的俄国又出现了一场危机。7月3日,士兵、农民与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在彼得格勒自发地举行反对临时政府的游行,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7月4日,临时政府的军队射杀并逮捕继续自发游行的群众,将其中的武装者缴械。俄国结束了临时政府与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布尔什维克在事件前不赞同群众过早地自发行动,但在事件发生后领导了这次行动,试图使之保持和平的性质,高尔基始终认为这次自发行动是仓促的和毫无意义的。

## 6

### 《新生活报》，1917年12月俄历7日 (公历20日)，第195期

“无产阶级是新文化的创造者。”在这句话中包含着对正义、理智和美取得胜利的美好理想，包含着人战胜野兽和牲畜的理想，在为实现这些理想的斗争中死掉了成千上万的各阶级的人。

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现在它获得了自由创造的可能。应当适时地问一句：这种创造表现在哪里？“人民委员政府”<sup>①</sup>的法令只是报纸上的小品文，仅此而已。这些法令是一些“用叉子在水面上书写的”很不可靠的文字，虽然其中也有一些有价值的思想，然而当今的现实却没有提供实现这些思想的条件。

革命将会带来什么新的东西？它在怎样改变俄罗斯野蛮的风俗？它将给俄国黑暗的生活带来许多光明吗？

在革命的期间已经有一万次“私刑”了。民主派就是这样审判自己的罪犯的：在亚历山大市场附近抓住了一个小偷，人们立刻把他痛打了一顿，然后进行表决——该用什么样的死法来惩罚这个小偷：是淹死他还是枪毙他？后来人们决定淹死他。于是这个小偷被扔进了冰河里。但是他却不知怎么竟挣扎着游上了岸。于是人群中的一个人走到他跟前，把他枪毙了。

我们历史上的中世纪是卑鄙残忍的时代，可即便是在那时，如果被判处死刑的犯人意外地从绞刑架上跌落下来，那人们就让他活下去了。

私刑对正在成长的一代会有什么影响呢？



士兵们拖着一个被打得半死的小偷要把他扔进莫伊卡河里淹死。小偷浑身是血，脸被打得一塌糊涂，一只眼睛被打得流了出来。一群孩子一路围观着；后来，其中的几个孩子从莫伊卡河边回来时，一边单脚跳着，一边兴高采烈地叫喊：

“淹死了，淹死了！”

这是我们的孩子，是未来的生活建设者。人的生命在他们的观念里将变得十分廉价，然而人——不应该忘记这一点——是大自然最美好、最有价值的作品，是宇宙中最好的东西。战争对人的评价是比一小粒铅弹还低廉的，人们曾因这一评价而义愤填膺，因为战争而谴责“帝国主义者”，而现在，面对每天都发生的残杀人们的兽行，我们又该谴责谁呢？

由于一系列条件的缘故，我们现在几乎完全停止了书籍印刷和出版工作，同时，极珍贵的图书馆一个接一个地被毁坏了。就在不久前农夫们洗劫了胡捷科夫、奥鲍连斯基的庄园和一系列别的庄园。农夫们把所有在他们看来是有价值的东西都分运到各自的家里去，而将藏书烧毁了，把钢琴用斧头劈掉了，把藏画撕碎了。科学仪器、艺术品、文化用具在乡下人的眼里是无价值的，就是在城市老百姓的眼里它们是否具有价值也值得怀疑。

书是文化的最重要的向导，为了使人民能够得到有思想的、真诚的、对他们自己有帮助的书籍，书籍工作者们可以做出某些牺牲，因为他们比大家都更早地特别关注这一事情，以便在他们周围建立一个有助于发展和实现他们理想的意识形态环境。

我们的导师拉季谢夫<sup>②</sup>们、车尔尼雪夫斯基<sup>③</sup>们和马克思们都是书籍的精神制造者，他们为自己的书牺牲了自由与生命。现在，书籍的物质制造者们又该如何去加快图书事业的发展呢？

已经将近两个星期了，每天夜里，人们成群结队地洗劫酒窖<sup>④</sup>，酗酒狂饮，互相用酒瓶砸打脑袋，用碎玻璃片割划手掌，还像猪一样躺倒在烂泥和血污中。<sup>⑤</sup>在这些天里被挥霍掉了价值数千

万卢布的酒，当然，不久还将挥霍掉上亿卢布的酒。

如果把这种宝贵的商品卖给瑞典，那么我们就用它换回黄金或国家所必需的商品——布匹、药品和机器。

当斯莫尔尼宫的人们<sup>⑥</sup>想起来时已经有点晚了，他们威胁要严惩酗酒行为，可酒鬼们并不怕威胁，而是继续消耗这种商品，其实这种商品早就该由国家征集，作为我们这个穷困民族的财产，赢利地出售，为大家谋利益了。

在抢劫酒窖期间，当场就开始了像射杀野狼一样的杀人行动，这样也就在慢慢地教会人们冷漠地杀戮别人。

《真理报》把酒徒们的暴行称作“资产者们的挑拨离间”，这当然是谎言，是“妙语”，这只会加剧流血。

偷窃在发展，抢劫在加剧，无耻之徒们干起行贿受贿勾当来，其狡诈程度与当年沙皇政权的官员们一样；愚昧的人们聚集在斯莫尔尼宫周围，企图讹诈被吓坏了的庸人。“人民委员政府”的代表们的粗野行为引起了普遍的责难，而且这些责难是公正的。形形色色的小家伙过着掌权的瘾，像对待战败者一样对待公民，就像先前沙皇的警察对待老百姓一样。他们对所有的人都大吼大叫，那样子就像过去科诺托普<sup>⑦</sup>或科赫洛玛<sup>⑧</sup>的岗警。所有这些行径都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为了“社会革命”而进行的，而这一切是兽性风习的胜利，是腐蚀着我们的那种亚细亚习气的发展。<sup>⑨</sup>

那么，卡尔·考茨基怀着赞扬所描写的“俄国工人的理想主义”<sup>⑩</sup>到底表现在哪里，表现在什么上呢？

社会主义的道德，即“新的”道德又是在哪里和怎样体现在生活中的呢？

我想，“现实的政治家”中一定会有人怀着对我指出的这一切极为蔑视的神情喊叫道：

“您想干什么？这是社会革命啊！”

不，在这场动物性本能的爆发中，我没有看见强烈表现出来的

社会革命的因素。这是一场没有精神上的社会主义者、没有社会主义的心理参与的俄国式暴动<sup>①</sup>。

### 注释：

① 人民委员政府——十月革命后组成的俄国苏维埃政府叫人民委员会，政府的各部称作人民委员部，各部的负责人为人民委员（如卢纳察尔斯基是教育人民委员，主管教育人民委员部）。故十月革命后的政府被俗称为人民委员政府。1946年起政府改称为部长会议，各人民委员部改称部，各部负责人改称部长。

②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拉季谢夫（1749—1802）——俄国思想家、作家、革命家，著有长诗《自由颂》（1783）、游记《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1790）等。

③ 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国思想家、革命民主主义者、作家、文学评论家，俄国19世纪60年代革命运动的领袖。著有哲学、社会学、美学、教育学等方面的论文及长篇小说《怎么办？》（1863）、《序幕》（约1867—1869）等。

④ 十月革命前彼得格勒有许多酒窖。十月革命后出现了自发抢劫酒窖的狂潮。列宁曾指出：“资产阶级在进行邪恶的犯罪，他们收买社会渣滓和堕落分子，把他们灌醉，让他们去抢劫。”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安乐诺夫-奥夫谢延科后来在其《内战笔记》中回忆：“抢掠冬宫的问题格外严重。天一黑，人们就发疯地狂饮起来，人群欢快地呼喊这样的口号：‘把罗曼诺夫家族留下的酒喝光。’我们堵上了所有的入口，人群就钻进窗户，砸开铁栅，抢劫藏品……”为制止和消灭彼得格勒的酗酒和抢劫暴行，彼得格勒苏维埃于1917年12月4日成立了由邦奇·勃鲁耶维奇为主席的专门委员会。在苏维埃政府采取了果断措施之后，酗酒、抢劫狂潮才平息下去。

⑤ 当时高尔基并不知道，酗酒抢劫是有组织的反革命阴谋。在高尔基发表这篇短文后的1917年12月21日，邦奇·勃鲁耶维奇在向彼得格勒市苏维埃的报告中说，“这一行动有许多特别的教唆者，有大量的金钱支持，其目的是扼杀……革命。”

⑥ 斯莫尔尼宫的人们——指领导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斯莫尔尼宫原为贵族女子学校，十月革命期间是起义指挥部，自十月革命起至1918年3月止，是俄国苏维埃政府（即人民委员会）的所在地。

⑦ 科诺托普——现乌克兰苏梅州的城市。

⑧ 科赫洛玛——俄国科斯特罗马省的城市。

⑨ 高尔基在此抨击的苏维埃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狂妄自大等弊端不久就引起了列宁的注意，但1917年12月22日《真理报》却发表匿名文章，指责高尔基的观点是“呻吟着的庸人”对“粗暴的风习”发出的“酸腐的抱怨”，还讽刺说“本该教育人民”的高尔基应当“接受人民的教育”。

⑩ 指卡尔·考茨基在其1917年的著作《社会革命的道路》和《社会革命》中，在批评英国工人阶级上层精神与道德衰落的同时，对俄国无产者表示的赞扬态度。他说：“无产阶级的伦理来自它的革命热情，无产阶级从这一热情中吸取巨大的力量，这一热情使它变得崇高……我们首先应当保护的就是这种革命的理想主义，那样……我们才能经受住最严峻的考验，完成最困难的工作，处于等待我们解决的伟大历史任务的高度。”

⑪ 克尼日尼克·维特罗夫在1918年1月20日的《真理报》上发表的《社会革命与高尔基》一文中，引用了高尔基的这句话，接着写道：“既然高尔基认为，在那场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觉悟了的人民的大多数目前正在进行的‘真正伟大的斗争中’只有‘暴动的小市民的动物性无政府主义’，那么很显然，高尔基已经不是革命的‘海燕’，而是革命的直接叛徒了。”克尼日尼克·维特罗夫认为，高尔基因为工农的“愚昧”、“没有文化”而不相信他们的革命性，并说，“我国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准备程度问题不应当取决于占人口十分之九的农民和工人的道德和智力完善程度。”如果等待人民自己发展到可以成熟地进行社会革命，“那么这一时刻是永远等不到的。”《真理报》的这位撰稿人呼吁高尔基“抛开胡作非为者制造的梦魇，抢劫商店等并不必然与苏维埃政府相联，而是在任何政权下都可能有的可悲现象”，在看待十月革命时，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并希望“过去一直是社会革命喉舌的作家”不要永远背叛革命，而要重新成为革命的斗士。

**《新生活报》，俄历 1917 年 12 月 19 日  
(公历 1918 年 1 月 1 日)，第 205 期**

革命正在深入……

那些正在“深化革命”的人的无所顾忌的蛊惑言论已经结出了果实，很显然，这些果实对于那些最有觉悟和最有文化的工人阶级社会利益的代表来说，是致命的。在工厂里，干粗活的工人对技术专业工人充满恶意的斗争正在逐渐地展开；干粗活的工人们开始说什么，钳工、车工、铸工等等都是“资产者”。

革命仍然在深入，为那些用工人阶级活的身体做试验的人们增添着荣耀。<sup>①</sup>

而那些意识到时局的悲剧性的工人们却对革命的命运怀着巨大的忧虑。

“我担心，”这些工人中的一位写信告诉我，“有朝一日群众将对布尔什维主义不满，对最美好的未来永远失望，将永远失去社会主义信念，将重新把目光全都转向过去，转向黑暗的君主制，到那时，各民族的解放事业就会死亡，就会再销声匿迹数百年，这一天已经不远了。

“我想，会这样的，因为布尔什维主义不可能实现蒙昧群众的一切愿望，而且我也不知道，我们这些生活在这样的群众中的人为了使地球上对社会主义和美好生活的信念不至于破灭，应当怎么办。”

“文明程度稍高一点的工人在愚昧的群众中的处境变得非常

糟糕,好像他成了自己人中的异己分子。”另一位工人这样对我说。

这类抱怨愈来愈频繁,这预示着在工人阶级的内部有大分裂的可能。可是另外一些工人在交谈和来信中却这样对我说:

“同志,您应当高兴才对,无产阶级战胜了呀!”

我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无产阶级没有战胜任何东西,没有战胜任何人。正像过去,当警察统治牢牢地卡住无产阶级的脖子时,它没有被战胜一样;现在,当无产阶级卡住资产阶级的脖子时,资产阶级也还没有被战胜。思想是无法用肉体上的暴力手段战胜的。胜利者通常是宽宏大量的,也许,这是由于疲劳的缘故;无产阶级却不是宽宏大量的,这从索·弗·帕尼娜<sup>②</sup>、鲍尔蒂列夫<sup>③</sup>、科诺瓦洛夫<sup>④</sup>、贝尔纳茨基<sup>⑤</sup>、卡尔塔舍夫<sup>⑥</sup>、多尔戈鲁基<sup>⑦</sup>和其他一些不知何故被投入监狱的人的案件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除了上述几位以外,在监狱里还有数以万计的人在挨饿,是的,数以万计,而且是工人和士兵!

是的,无产阶级并不宽宏大量,而且也不公正,然而革命是本应在国内建立起可能的公正的。

无产阶级并没有取得胜利,全国到处都在进行内讧性的屠杀,成千上万的人在互相残杀。一些丧失了理智的人在《真理报》上疯狂地教唆着:打击资产者,打击卡列金匪徒!<sup>⑧</sup>但是所谓资产者和卡列金匪徒都是当兵的农夫们、当兵的工人们,杀死的正是他们,枪杀赤卫队的也还是他们。

如果内讧性的战争仅仅归结于列宁抓住了米留科夫<sup>⑨</sup>的小资产阶级的头发,而米留科夫则揪住了列宁那蓬松的假发,那么“请吧,老爷们,请打斗吧”!

但是互相打斗的并不是老爷们,而是奴才们。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殴斗会很快结束。当你眼看着国家的健康力量怎样互相在残杀中灭亡时,你是高兴不起来的。但是,成千上万的人却在大街上走着,好像自我嘲弄似的呼喊“和平万岁”。

银行被占领了？如果在银行里有可以喂饱孩子们的面包的话，那倒好了。但是银行里没有面包，而孩子们依然在日复一日地挨饿，他们中虚弱的人数在增加，死亡率在上升。

内讧性的大屠杀彻底地破坏了铁路运输，即使农夫们交出了粮食，那也无法很快地把它运出来。

但是最令我震惊，最使我害怕的，是革命本身并没有带来人的精神复活的征兆，没有使人们变得更加诚实，更加正直，没有提高人们的自我评价和对他们劳动的道德评价。

当然，有那么一些昂首阔步、趾高气扬的人，他们颇像顺利地把自己的对手打得“双肩着地”<sup>⑩</sup>的马戏团的大力士。这些人不值得一提。但是总的说来，在群众中看不到革命激活了人身上这种社会感情的迹象。现在，对人的价值估量依然同过去一样低廉。旧的生活习惯并没有消失。“新的开端”依然像过去一样粗俗，只是外表上显得更少教养。在现在的派出所里，又是大喊大叫，又是跺脚，就像以前喊叫的一样。捞起贿赂来还像以前的官吏们一样，还把人们像牲口一样成群地往监狱里赶。一切旧的东西、丑恶的东西暂时都没有消失。

这是一个很坏的征兆，这说明在俄国只实现了物质力量的转移，但是这种转移并没有加速精神力量的增长。

而生活的意义和对生活中一切卑鄙的东西的纠正就在于发展我们的一切精神力量和能力。

“现在谈论这些还为时过早，我们首先应该把政权夺到自己的手里。”

再没有比统治人的权力更卑劣的毒素了，我们应该牢记这一点，使得权力不至于毒害我们，把我们变成比那些我们终生反对并与之斗争的人更卑鄙的食人魔王。

## 注释：

① 这一句话与本篇中的另外一些话被第6篇注①中所提及的《真理报》的那篇文章引为高尔基背叛社会革命的实证。

② 索菲娅·弗拉基米罗夫娜·帕尼娜(1871—1956)——伯爵夫人、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曾任临时政府的国家救济部副部长、国民教育部副部长等职。1917年12月11日因拒绝将国民教育部的9.3万卢布移交给苏维埃政府而被捕。同年12月23日，刚刚成立的彼得堡革命法庭对她进行了审判，这是革命法庭成立后的第一次庭审。1918年1月1日，在上述款项移并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后，帕尼娜被释放。后流亡国外。高尔基与帕尼娜相识并是她出资建立的、用于民主派知识分子和彼得堡工人政治集会的“人民之家”的董事。

③ 瓦西里·格奥尔基耶维奇·鲍尔蒂列夫(1875—1932)——俄军中将，1917年9月起任北方方面军第五军司令。1917年11月因不服从苏维埃政权任命的总司令的指挥被捕。后因怠工罪被革命法庭判处三年监禁。1918年5月因大赦获释。内战时期参加白军，反对苏维埃政权。内战结束后被捕。1926年获赦。著有回忆录《执政内阁·高尔察克·干涉军》(尼古拉耶夫斯克，1925年)。

④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科诺瓦洛夫(1875—1948)——大纺织厂主，1912年被选入第四届国家杜马，曾任国家杜马副主席，支持进步力量，曾发起组织有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及政论家参加的，并得到高尔基高度赞扬的“经济恳谈会”。二月革命后曾任临时政府工商部长、政府副主席等职。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高尔基认为，他与布格罗夫、莫罗佐夫、马蒙托夫等人一样是“农奴制的农村生出的天才人物”。

⑤ 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贝尔纳茨基(1876—1944)——政治经济学教授。曾参加高尔基筹办的激进民主派报纸《光辉报》的工作。“二月革命”后，贝尔纳茨基曾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十月革命后与科诺瓦洛夫等一起被捕，囚于彼得保罗要塞。获释后担任过邓尼金和弗兰格尔政府的财务长官。

⑥ 安东·弗拉基米罗维奇·卡尔塔舍夫(1875—1960)——立宪民主党人、神学教授。曾在临时政府中任宗教部长，在尤登尼奇的白卫政府中任职。后侨居国外，著有教会史著作多种。



⑦ 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多尔戈鲁基(1866—1927)——俄国公爵、大地主、地方自治会活动家、“解放联盟”和立宪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1905—1911年任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17年12月11日人民代表委员会宣布立宪民主党人为“人民之敌”后被捕。十月革命后积极参加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1920年侨居国外。1926年潜回苏联,被捕。次年因曾参与凶杀、恐怖活动而被判处死刑。遗作《大毁灭》(马德里,1964)讲述了他在十月革命前后的经历。

⑧ 卡列金匪徒——卡列金的追随者。阿·马·卡列金(1861—1918)是沙皇将军,顿河哥萨克反革命武装领导人。十月革命后曾领导反革命暴乱。后自杀身亡。

⑨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科夫(1859—1943)——历史学家兼政论家、立宪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曾任该党中央主席,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十月革命后积极参加组织外国对苏俄的军事干涉。侨居国外后任巴黎《新闻报》(1920—1940)编辑。

⑩ 西方摔跤比赛中以迫使对手两肩胛骨触及地面者为胜。

8

《新生活报》，俄历 1917 年 12 月 21 日  
(公历 1918 年 1 月 3 日)，第 207 期

一小群市民聚集在方丹卡河的岸边，眺望着远处被人们挤得水泄不通的桥面，心平气和地、冷漠地议论说：

“人们在淹死小偷呢。”

“抓到了很多小偷吗？”

“听说是三个。”

“有一个年轻的被打得不轻。”

“往死里打的？”

“那还用说吗？”

“对他们就该往死里打，要不，叫他们闹得日子都没法过了。”

一个很有派头的、花白头发、红光满面、有点像屠夫的人自信地说：

“如今法庭没有了，这就是说，我们要自己来审判自己……”

一位目光锐利而又萎靡不振的人问道：

“如果自己审判自己，那是不是太简单了？”

花白头发连看都没看他一眼，懒懒地答道：

“越简单越好。最要紧的就是要快一点。”

“听，那边在嚎叫呢！”

人群静了下来，倾听着，从远处河面上传来一阵野兽般凄惨的叫喊声。

人民委员们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消灭了旧的法庭<sup>①</sup>，也用这一

行动在“市井居民”的意识中强化了他们“私刑”的权利——一种野兽的权利。过去，在革命前，人们就喜欢在大街上打人，饶有兴致地从事这种卑鄙下流的“体育运动”。任何地方也不像我们俄罗斯这样，如此经常地、如此热心、如此兴致盎然地打人。“打耳光”、“掏心窝”、“打肋下”、“敲第九根肋骨”、“打拐脖”、“捶后脑勺”、“来个鼻口流血”——所有这些都是俄罗斯人心爱的游戏。人们还以此炫耀。俄罗斯人太习惯于挨打了，因为他们“从小就经常挨打”——父母打，主人打，警察也打。

现在可好，这些在残酷折磨中泡大的人们，似乎被赋予了一种自由地互相折磨的权利。他们带着一种明显的快意和不可思议的残酷在运用自己的“权利”。大街上的“私刑”已成了每天都发生的“日常现象”，而且应该记住，每一次私刑都在越来越扩大和加深人群中那种愚钝的、病态的残忍。

工人科斯金想要保护挨打的人，结果他也被打死了。毫无疑问，任何敢于抗议街头“私刑”的人必然遭到毒打。

难道还需要指出，“私刑”并未把任何人吓住，大街上的抢劫和偷窃正在变得愈来愈无耻吗？

但是最可怕和最卑鄙的是，大街上的残酷行为仍在不断地发展，而其罪责却将安在工人阶级头上，因为有人肯定会说：“工人阶级的政府把街头愚昧群众的野兽的本能全部释放出来了。”谁也不会提及，真诚的、有觉悟的工人面对所有这些“私刑”，面对这混乱涣散的生活，是怎样地忧虑，怎样地痛心疾首。

我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同街头血腥暴行这一丑恶现象作斗争，但是人民委员们应该毫不迟疑地采取某种果断措施。要知道他们不可能没有意识到，对兽性大发的街头人群所放的血的责任，将落在他们身上，落在他们为之谋利益的那个阶级的身上。街头流淌的血正在弄脏无产阶级的旗帜，玷污无产阶级的荣誉，消灭无产阶级的社会理想主义。

工人们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地懂得，偷窃抢劫、出自私利的凶杀——这一切都是社会制度的顽症；工人们懂得，人并不生来就是凶手、窃贼，而是后来变成凶手、窃贼的。因此，很自然，有觉悟的工人应该特别努力地反对街上的人群对那些被穷困所迫违反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法则的人的“私刑”，同“私刑”作斗争。

### 注释：

① 十月革命后，原有的法庭只存在了很短时间。苏维埃最初同反革命及刑事犯罪作斗争的机构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所设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苏维埃的法庭成立前，审判和侦察职能由苏维埃行使。后来，在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属下设立了第一个苏维埃侦察委员会，成员有克拉希科夫、斯图奇卡、乌里茨基等。1917年12月5日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被撤消，其职能转归“全俄肃清反革命怠工及取缔投机非常委员会”（即“契卡”），该委员会主席是费·捷尔任斯基。

**《新生活报》，1918年3月公历31日  
(俄历18日)，第56期(总第271期)**

有一个人从外省来找我，这是一位异常倔强的乐观主义者。他属于那种棒打脑袋也决不灰心、决不叹息的一类人。遗憾的是，这种人在我们罗斯实在太少了。

我问他：

“怎么样，你们那儿有什么有趣的新鲜事吗？”

“可不少啊，我的先生，确实不少啊；最有趣和最重要的就是资本家又出现了！您觉得奇怪，感到可笑吗？起先我也觉得奇怪，但并不觉得可笑，而是非常忧虑，因为我弄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好好的社会主义祖国，突然长出了资本家！您知道，现在冒出来的资本家可多了，就像湿润的夏天里的白蘑菇一片一片的。现在资本家还很小，但我看出，他们很结实、强健。再仔细一看，我就想，毫无办法！这是命运在开玩笑，命运无法改变；这是历史的陷阱，闯也闯不过去。”

“不过，请等一等！资本家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从哪儿冒出来的都有：有的原来是庄稼汉，战争期间发了点小财，钱不多，也就3000、5000的，可也有人捞了2万卢布！有的人抄了地主的家——这也是不光彩的收入，不过倒挺实惠的。这一切在你们这里大概都有人在说，有人在写，你们以为庄稼汉似乎都成了酒鬼，成了赌棍，其实整天喝酒的是那些日子快过不下去的坏家伙，是那些农村里的渣滓，成天游手好闲的人，是那些早就中

了伏特加的毒的人。这种人无论在何种制度下都是注定要堕落，要死亡的！这种人实在是什么烂酒都喝，所以死得特别快，这样，他们就使农村免除了流氓行为和其他一切肮脏事的骚扰。这里有这样一条严格的规律在起作用：就像霍乱是对人的肠胃健康的考验一样，酒瘾是对人的机体总的坚固性的考验。不，劣等的人们正在死亡；当然，这令人遗憾，但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令人欣慰的！至于说人们打起牌来是残酷的，那倒是真的！大家手头上都有很多钱，于是就赌了起来。不过，请您注意，赢家总是最冷静而精明的赌徒，这也没什么不好的。这是合理的淘汰：强者战胜弱者。

“有一个当过兵的，也带来了不少钱，而且还成功地把它们投入周转，变得越来越多。那些当过兵的组成了自己的组织，这对他们非常有利：我们乡委员会的开支总共是 1500 卢布，而那些当过兵的人却能征收到 5.2 万卢布。总之，简单地说，乡村的掠夺行径简直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但是正如您所看到的一样，这并不很可怕……即使一个村妇她也会变成一位难以置信的聪明而狡猾的勒索者。

“有一个水兵也是有钱人，还有两个人曾经公开地对我说，他们每人已‘攒’了大约有 3 万卢布。是怎么攒的呢？您可知道，当军队撤走以后，他们把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装上驱逐舰运到俄国港口，为此从每个亚美尼亚人身上收取大约 1000 卢布。”

“现在的钱还值钱吗？”

“您别担心，这是意料中的事！他们并不看重钱，也不把钱藏起来：面值小的，兑换开了纸币自己带在身边，而大额的就变换成财产，购买一切或多或少有固定价值的东西。您再看看，新庄稼汉是怎样一心想着要购进和繁殖牲畜的！尤其是娘儿们！就积累钱财的贪心而言，这真是些让人惊奇的人！不仅如此，还有一些相当有远见的人已经在开始盘算将来人们会需要些什么了。例如，在我们邻乡有九个当过兵的农民同一个水兵一起策划着要办一座砖

厂。我们省的森林不太多,可也不算少,他们为什么要在离铁路很远的地方建这砖厂呢?‘同志,您看见了吗,我们就是这样盘算的:当一切都安定下来后,老百姓就会开始造砖瓦房了,因为现在许多人都攒足了贵重家产,所以木房子就不行了!’在我们城里,一位原先的骑兵司务长建了一个马匹交配站,养了三匹种马,还打算把它扩建成一个真正的养马场。像这种创业的事还真不少,到处都可以听到这种事。

“当然,现在离社会主义还远着呢,再说,在我们俄国要指望农村的社会主义那就太天真了。指望过?那就错了,不过,常言道,‘错误不能被当作虚伪’。事实上,农村在产生资本家,非常顽强的、懂得自我价值的资本家。我的先生,这是很显然的,他们是自己土地真正的主人,是有‘祖国’的人。您就试试看去剥夺他认为属于自己的东西吧!他准会给你点颜色看,因为他现在已经是武装起来的人了。这种人开头也许会迫不及待地想要德国的廉价商品,可这不会长久;过上十年工夫,他就会懂得自己的廉价商品的真正的文化价值,并且会毫不犹豫地同德国人斗的。

“是啊,结果就是这样:社会主义生出了资本家!当然,许多东西遭到破坏和洗劫,但是被抢劫的东西暂时还没有从俄国流失,而是被分到了俄国的更多的居民手中。‘资本家’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变得比以前更多了,而且我告诉您,虽然目前只是些小资本家,但却是很顽强的,他们一定要表现自己的!”

“那工人阶级呢?”

“他们也会向工人阶级表现自己的,如果工人们不按农民政策的道路走,不愿理解农村利益的全部重要意义的话。”

……所有这些话听起来都带点讽刺意味,有点滑稽可笑,但是我觉得,在上面所讲的情况中包含着相当部分的真实情况,而一切真实情况都应当大声地说出来,使我们得到教益。

**《新生活报》，1918年5月公历18日  
(俄历5日)，第93期(总第308期)**

我们不太了解当前的农村是怎样生活的，只是很少和偶尔能听到从“俄国深处”传来的农村的活生生的人们的心声。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公开下面这封日前我收到的信的原因。

“尊敬的朋友和同志！”接下去的几行是真诚友好的表白，而信的实质内容是这样的：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村里的新鲜事很多，特别是在上个礼拜。4月3日和4日我们所有的巴斯卡村的人经历了我们生活中最痛苦的日子。确切讲是这样的：4月3日，大约300名赤卫队员开进了我们巴斯卡村。他们洗劫了所有富裕的房主，也就是说向村民们勒索钱财，向有的人要了1000卢布，向有的人要了2000卢布，最高达到6000卢布，从我们整个村里一共搜刮了85350卢布，拿走了；除此之外，他们还从我们村的公民家里抢走了各种财物——面包、面粉、衣服等等东西，这些就没法计算了，他们还拉走了谢尔盖·季莫菲耶维奇的种马，不过他们没能使唤它，因为刚刚走到托尔斯托夫卡村那马便一头栽倒在教堂旁边。那匹马挨了人们多少皮鞭的抽打，简直难以描述。人们抽打得那么凶狠，一回想起来就让人毛骨悚然。这太可怕了！这两天我们巴斯卡村人所感受的那种恐惧是难以描述的。大家都觉得，这些强盗对我们的折磨要比地狱里的苦难更难忍受。

“我们村里再没什么更大的新闻了，但是在巴拉诺夫卡村、鲍



尔达西耶夫村和斯拉夫金村，在赤卫队走了之后，村里最贫穷的阶级学着那些强盗的榜样，开始抢劫起自己村子的富裕公民了，甚至还在夜晚袭击别的村庄。一句话，这儿的日子已经越来越难以忍受了。好了，再见吧，欢迎您来做客，祝您健康。”

上面这封信中的庄重、平静、朴实的叙述，最令人信服地表明了作者的真诚，显示出作者是一位真正的俄罗斯人，他这类人早就对一切都忍受惯了，如果他这类人说出“地狱里的苦难”这种话，那主要是为了俏皮，而不是出于对抢劫和殴打行径的愤怒感情。信的作者曾经看见过“最穷的农民”当了一阵兵后如何回到农村成了一名“最富的”农民；现在他又亲眼看到，人们是怎样把这位“最富的”农民重新又变成了“最穷的”，他明白，当赤卫队员们洗劫了“最富的人们”，占据了“最富的人们”的位置以后，人们也将可以劫掠赤卫队员们的。

他认为，这种反复更迭是“难以忍受的”，但他还没有发展到把自己的老朋友拒之门外的地步。这种变化更迭激怒了他的思想，不过看来还没有深刻地触及正义感，很可能他正满怀信心地等待时机，由他来把最富的人变成最穷的人。所有这一切就像是一张漫画，一场闹剧。不过，很遗憾，这是“生活的真实”，是“去抢那些抢来的东西”<sup>①</sup>这一口号从乡村的兽性中呼唤出来的“生活的真实”。

于是，人们就起劲地抢劫“这些贫穷的村庄”，从其中的每一个都可搜刮到 8.5 万卢布。人们之所以要去抢劫村庄，是因为他们牢牢记着这样一条厚颜无耻的强盗和愚钝绝望的失败者编造出的并不愚蠢的说法：“靠正派的劳动建不起大瓦房。”农夫们苦役般的劳动完全依赖于大自然的恩赐，遵循着古老的习惯，而不是靠最新知识成就，所以无法培养起对“正派的”、不懈的、诚实的劳动的向往，而俄国经济发展史的进程却使人、甚至使傻瓜确信：“私有财产就是窃来之物。”<sup>②</sup>这是千真万确的。

于是，人们受到来自上面的极为英明的政权的鼓励在抢掠、盗窃，而那政权向城市、向全世界提出了所谓社会完美建设的最新口号：

“全到船头上去！”<sup>①</sup>

这句话按现在的说法就是：

“去抢那些抢来的东西！”

这不禁使人想起了舒马赫尔<sup>②</sup>闹剧中的诗句：

难道应当责备农夫仅仅因为他是农夫？

从孩提时代起他就习惯了做这样的人。

应该指责的不是农夫，他们只是在驯顺地走着一条英明的人们、理智的人们为他们愚昧的意志指定的道路。

### 注释：

① 这一当时颇为流行的口号是对列宁 1918 年 2 月 5 日《对派往外省的宣传员们的讲话》的曲解。列宁说：“对外的战争已经结束，或者说正在结束。这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资产阶级把抢来的钱财装进箱子，镇定自若地想道：‘没什么，能躲过去。’人民应当把这种‘吸血鬼’揪出来，强迫他交还抢去的东西。……你们到了地方上就应该这样办……而且不是要警察去强迫他们（警察已经被消灭，被埋葬了），而是要人民自己动手干，此外没有别的办法同他们斗争。”

“有一个布尔什维克老头向一个哥萨克解释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解释得很正确。”

“哥萨克问：‘你们布尔什维克真的要抢东西吗？’那个老头回答说：‘对，我们要抢那些抢来的东西。’”

“如果我们不把他们多年丧尽天良地罪恶地剥削来的钱财从他们隐藏的钱罐中全部掏出来，我们就会淹死在这一片汪洋大海中。”

② 最早表达这一思想的是 4 世纪著名的希腊教会活动家瓦西里大帝。法国大革命时的著名活动家让·彼尔·勃里索重复过这一说法。皮尔·约瑟夫·蒲鲁东在其《什么是私有财产》中再一次阐述了这一思想后,这一说法才得以广泛流传。

③ 据传是伏尔加河上强盗劫船时对全体船员下的命令。

④ 彼得·瓦西耶维奇·舒马赫尔(1817—1891)——俄国讽刺诗人。

## 11

### 《新生活报》，1918年5月公历21日 (俄历8日)，第95期(总第310期)

在我们罗斯，关于文化应当无休止地讲，永远无休止地讲。

有一位自学出身的诗人曾来找过我。这是一位长得很健康的、细皮嫩肉的小伙子，大约20岁，长着一双和善而不无狡黠的眼睛。他给我念了半天相当拙劣的诗，突然我的耳朵听到了这样两行诗句：

狡猾的日耳曼人，戴着精巧的假面，  
想要把文化引入俄国的天地之间！

我问这位诗人：

“你能否给我解释一下，在您看来文化是什么？”

他让自己那张并不标致的脸上露出礼贤下士的表情，然后解释道：

“我理解文化是一切压抑人的东西，例如组织、政党和所有反对个性自由的东西。”

“您是无政府主义者吗？”

“不，我和他们争论过，他们也是一个党，也强迫人们去读书。”

“那您不喜欢读书啰？”

“小说和诗我还是读的，不过读得不太多，它们妨碍我写自己的诗，因为读得太多了，自己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诗人应该珍惜

自己，不屈从任何人，而从自己的心灵里汲取灵感。”

“您都读过哪些诗？”

“读过谢维里亚宁<sup>①</sup>的诗，另外还有一些诗人的……多着呢！不过我只赞同一位诗人——他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他写过这样的诗：

摆在你面前的这堆书  
本来就没什么好学的，  
群氓捧起来的伪君子  
胡乱写下了这些东西……

“这说得太对了，您同意吗？”

“书有各种各样的……”

他迅速打断了我的话：

“不，对于诗人来说，一切别人的东西都是有害的，他应当靠自己的东西生活。甚至所有的俄国人都应该靠自己的东西生活，我们是一个特别的民族，这不——谁也不能拒绝打仗，可我们拒绝了！”

“你说，怎么拒绝了？我们还在互相打，而且极端残忍！”

“这是我们内部的事。可是德国的或者法国的文化我们无论怎么也不会接受——你看，它们互相争斗，像野兽一样，都是一路货色！真可耻！”

“您是农民吗？”

“是的。不过我不把自己看作是任何一种人，我不喜欢农村，也不喜欢庄稼汉，对我来说，他们是陌生人，他们不能理解我。”

他那张半孩子气的圆脸上突然堆满了愁容，明亮的眼睛仿佛受了委屈似的眯了起来，他用一只洗得干干净净的手抚了抚那发梢卷曲成环儿的头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简直是一个地地道道

的受难者，有着一颗不为人理解的心灵。

当我告诉他，照我看来，他并不会写诗，他还需要学习时，他不相信我的话，不过看上去，他并不很生气。

“学习”，他紧锁眉头，沉思着说，“就意味着和大家一样，对吗？这点我无法适应，我只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中学生们、大学生们全都是一样的。不，我还是想办法自己来实现……”

他忧愁地走了，我知道，他将毫无益处地耗掉二三年，甚至五年时间，会去“实现”对他来说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即做一名不像别人的人。

但是五年之后，他就会设法找到一种有利可图的事，他会干得不错，不过并不很情愿；他将带着对所有的人的极大怨愤生活，同时还将带着对所有以各种形式依赖他的人的蔑视。

齐·吉太太<sup>②</sup>写信告诉我：

“我能够设想出数十个，甚至数百个能够接受文明的农夫，可是当我想到，所有的农夫和农妇都将要学会剪指甲或用手帕擦鼻涕时，我觉得这简直是可笑的乌托邦式的幻想。”

兽医阿·恩是这样谈论文化的：

“从文化这个词本身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它的意义——崇拜与宗教。<sup>③</sup>文化只有在宗教的土壤上才能发展，才能是真正的文化，而一切其他的東西都是物质的、表面的、骗人的文化。如今，当人变得兽性十足时，能够拯救他的唯有回到上帝那里，回到教堂里，回到纯真的信仰上：‘像孩子一样吧！’这就是应该告诉人们的東西，这就是应该教给人们的東西，而你们却在教导人们：‘像野兽一样吧！’这是德国人的影响，是尼采、马克思、康德和其他伪君子们的恶毒书籍的影响，他们的所有这些思想就是专门为我们俄国人想出来的，因为德国人知道，我们俄国人向来贪求思想，就像赤梢

鱼贪求粪蛆一样。”

“当农夫们吃得很饱，而知识分子却挨饿时，谈论文化是令人厌恶的，是卑劣的。”一位女教师这样写道。而“一群青年”则坚信：

“人们身上一切外在的，由他们按照义务，按照文学、哲学和科学的神圣先辈们的学说加在自己身上的东西，正在脱落，这很好。因为所有这些东西最后将完全淡化、脱落，人也将真正是自由的了。也许，人将来还会重新接受他所摒弃了的东西，但暂时他必须没有思想，没有原则，没有任何传统地生活上一段时间——够了，不要文学、文化、社会主义等等东西了。”

还可以列举出十种关于文化的同样如此独特的见解，这些见解都证明了我们诸多亲爱的唐波夫-卡卢茨哲学流派中的思想发展，但是上面所摘引的观点就足以雄辩地证明我们对生活的感受正在变得更加强烈，而对生活的意义和目的的理解却正在变得更加愚钝。不过，那些只能建立在对生活的极端强烈的动物性感受的基础之上的社会行为的规则以及相互关系的习惯并没有向我们预示什么高兴的事情，它们更进一步加深了人的普遍野蛮化。不仅农村，就连城市，不仅老百姓，就连所谓的“半知识分子们”，也在不加抵抗地听命于这种普遍野蛮化了。

这再一次极其清楚地表明，文化启蒙工作，迫切的、有计划的、全面而顽强的文化启蒙工作是必需的。

#### 注释：

① 伊戈尔·谢维里亚宁(真名：伊戈尔·瓦丁里耶维奇·洛塔列夫，1887—1941)——俄国象征派诗人，著有诗集《香槟酒中的凤梨》(1915)等。1917年后侨居国外。

② 即齐·吉皮乌斯(1869—1945),俄国象征派女诗人,著有诗集《最后的诗篇》等。1920年后侨居国外。

③ 俄语中“文化”一词(культура)的词根(культ)意为“崇拜”、“迷信”。



**《新生活报》，1918年公历6月6日  
(俄历5月24日)，第109期(总第324期)**

在观察当今的革命者们的工作时，我们会清楚地分辨出两种类型的革命者：一类可称作永远的革命者，另一类则是暂时的、今日的革命者。

在第一类革命者身上体现着革命的普罗米修斯原则，他们是推动人类走向完善的全部丰富思想的继承者，这些思想不仅表现在他们的理智中，而且表现在他们的感情中，甚至还表现在他们的潜意识中。这类革命者是无穷尽的活生生思想的链条上最活跃、最敏感的一个环节，在任何社会制度下，他们受自己全部的感情与观点的限定，一辈子都是不满足的人，因为他们知道并且相信，人类有永远不断用好的事物创造更好的事物的力量。

这类革命者热爱永葆青春的真理，但是这种爱不只是感情上和形式上的，他们绝不会用拳头把真理强行填入那些被过去僵死的现实所奴役或不可救药地钟情于腐朽事物的人的心里和头脑里。对于这类革命者来说，人是一种永远在创造新的感受、思想、观念、事物和新的生活形式的、生动而活泼的永不枯竭的精神力量。这类革命者想使存在于地球上所有人头脑中的全世界的智慧都活跃起来，充满灵感，但是，在追求他们这唯一的、真正革命的目标时，他们并不善于运用这样或那样的强迫人的方法，他们只在迫不得已的必要情况下才怀着本能的厌恶感采取强制措施。

这类革命者深深懂得，正如一位著名的俄国思想家所言，“历

史的可怕性和历史的巨大不幸,在于人总是受到残忍的欺凌。”的确,人受着大自然的欺凌,大自然在创造了人之后,就把人像野兽一样扔进了荒凉的世界里,使其置身于各种野兽之中,为他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和其他一切野兽相同的条件;人还受到各种神祇的欺凌,而这些神祇本是出于对自然力的恐惧或欣喜,过于匆忙地、不高明地、过于“按自己的面貌”制造出来的;人还受到那些狡诈的或者强大的同类无休止的欺凌,最可悲的是,人还受着他自己的欺凌,受着他自己在古老的野兽和新人之间的摇摆的欺凌。

但是永远的革命者从不对别人记私仇,他总是善于站得高于自我,善于克服自身那种因所受的磨难与痛苦而报复别人的卑微、恶毒的愿望。

这类革命者的理想是让人成为身强力壮的、美丽的兽,但是这种形体的美同精神的巨大力量及精神的美处于完全的和谐之中。所谓人性的,就是精神的,就是理智创造的东西,由理智又产生了科学和艺术,产生了被越来越多的人朦胧感觉到的人们的目的与利益是统一的这一意识。永远的革命者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加深和扩大这种意识,使这一意识能够把握全人类,摧毁把人们分割成种族、民族和阶级的种种障碍,并在世界上创造一个由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统一的大家庭,在这个家庭里,成了主人的劳动者在为自己创造着一切生活的瑰宝和欢乐。

对于永远的革命者来说,社会生存条件的改善仅仅是人类通向理想境界的无尽的阶梯上的一级台阶,他们不会忘记,历史进程的意义就在于此,而他们个人只是历史进程中的无数必然之一。

永远的革命者是不断地刺激人类的头脑与神经增长的酵母;这些永远的革命者或者是破除在他们以前创造的真理并创造新的真理的英才,或者是安详地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的,燃烧着悄无声息的、有时甚至是无形的火,照亮通往未来之路的谦虚的人。

而暂时的、今天的革命者则是带着病态的极端敏感,感受到人

们带给他的社会委屈、耻辱和苦难的人。他们的头脑接受了时代所灌输的革命思想，但是就其整个感受体系而言，他们依旧是保守主义者，同时他们也是可悲的、往往带有悲喜剧性的一种特别的人，他们来到人世间仿佛就是为了歪曲、诬蔑、贬低革命思想的文化的、人文的和全人类的内涵，把它弄到可笑、庸俗和荒唐的地步。

这类革命者感到委屈首先是因为自己，因为自己无才、无力，因为自己曾受过欺辱，甚至因为自己过去曾坐过牢、被流放过、过过侨民的悲惨生活。他们犹如吸足了水的海绵一样，充满了复仇的感情，想要百倍地回敬那些曾经欺侮过他们的人。被他们的头脑所接受的革命思想并没有在他们的心灵中扎下根，所以这些思想同他们的行为处于直接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他们同敌人斗争的手段正是以前敌人用来对待他们的手段，他们无法掌握别的斗争手段。

这类革命者是惩罚和复仇的上帝的暂时暴乱的奴仆，他们感觉不到仁慈、宽容、快乐的上帝的美。他们感觉不到自己和过去的世界的有机联系，以为自己是完全解放了，然而他们的内心却被动物本能的沉重的保守主义所禁锢，被那些他们无力超越的琐碎而委屈的印象的罗网所束缚。他们的思想习惯迫使他们在生活中和人身上首先寻找不好的现象和特点。这类革命者充满了对人的轻蔑，尽管他们曾为了人而一次或成百次地遭受苦难，为了发现和珍重他人的痛苦自己也经受了許多苦难。暂时的革命者力求改变社会存在的外部形式，但他们没有能力使新的形式充满新的内容，反而把他们曾反对过的旧的情感带到新的形式之中。如果他们能——靠奇迹或用暴力——创造出新的生活方式，那么他们就会最早地感到自己在新的生活的氛围中是外人，是孤独的，因为他们本质上不是社会主义者，甚至连前社会主义者都不是，而是个人主义者。

他们对待人就像平庸的动物学家对待那些用来做残忍的科学

试验的狗和青蛙一样，不过有一点不同，即平庸的学者虽然毫无益处地折磨动物，但他却是在为人的利益做事情，而那些暂时的革命者在用人们做试验时却远不是一贯真诚的。

对于暂时的革命者来说，人们只不过是一种材料，他们越没有灵性，使用起来就越方便。一旦人的个性的和自我的自我意识的发展水平上升到反抗纯粹表面的、形式上的革命性的高度，那些暂时的革命者们就会毫不客气地用惩罚来威胁他们的反抗者，就像许多这类革命的代表们已经和正在做的那样。

这是一群冷酷的狂热分子、禁欲主义者，他们阉割革命思想的创造力，所以他们当然不能称作新的历史的创造者，成为新的历史上的理想英雄的也不会是他们。

也许，他们的功绩在于他们唤起了人民群众中古老而残忍的兽性，从而加速了兽性原则的灭亡？

残酷会令人厌倦，最终也会使人对它产生本能的憎恶，而这种憎恶就是残酷的死亡。

我们似乎已经开始在自己身上培养对一切血腥、残暴、肮脏的事物的生理性的憎恶，因为必须使这种憎恶感继续增强，使它成为大多数人所拥有的特异反应性能力。

**《新生活报》，1917年俄历4月20日  
(公历5月3日)，第2期**

政治生活的新制度要求我们有一种心灵新制度。

当然，我们不可能在两个月内脱胎换骨，但我们越是及早想到清除自己身上的过去的尘土和污垢，我们的精神就越健康，我们创建社会存在的新形式的工作也就越有成效。

我们生活在政治情感的暴风雨之中，生活在争夺政权的混乱之中，这种斗争在唤起人们的美好感情的同时，也唤起了非常阴暗的本能。这是很自然的，但是这就不能不产生人的心理扭曲及人的心理不自然的片面发展等危险。政治是能培植毒辣的敌意、邪恶的怀疑、无耻的谎言、诽谤、病态的虚荣和对个性的不尊重(所有人身上的坏东西都可往上加)的杂草迅速、大量疯长的温床，人身上的一切坏东西正是在政治斗争的土壤上才特别明显和大量地疯长的。

为了不被一种体系的感情所窒息，我们不应该忘记另一种体系的感情。

人们之间的敌意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因为我们最优秀的感情、我们最伟大的思想的目的就是要清除世界上的社会敌视。我把这种最美好的感情与思想叫做“社会理想主义”，因为正是它的力量使我们能够战胜生活中卑鄙肮脏的东西，并且永不疲倦地、顽强地追求生活的正义和美，追求自由。正是在这一执著的追求中我们造就了英雄，造就了为了自由而受难的伟大的殉道者，造就了

地球上最美好的人,我们身上的一切美好的东西也都是这一追求培养起来的。艺术的力量更加成功地、更有力地唤醒着我们心田中善良的本质。就像科学是世界的头脑一样,艺术是世界的心。政治和宗教把人们分裂成一个个单独的集团,而艺术则揭示出人身上的全人类的特性,把我们联合在一起。任何东西都不能像艺术与科学的影响一样,如此柔和而迅速地使人的灵魂变得正直。

无产阶级有权敌视其他阶级,这从各方面来说都有深刻的理由。但同时正是无产阶级把新文化那伟大而令人神往的思想,世界大同的思想带进到生活之中。因此正是无产阶级应该最先把那些旧的对待人的习惯当作不适合自己的东西抛弃掉;正是无产阶级应该特别坚定地努力扩展和深化人的灵魂这一储纳生活印象的容器。对无产者来说,艺术与科学的天才应该具有最高的价值。对无产者来说,这种天才不是无聊的娱乐,而是通向生活深处的奥秘之路。但是我非常疑惑不解地看到,由自己的思考与行动机关“工兵代表苏维埃”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竟如此冷淡、如此麻木地对待把当兵的音乐家、画家、戏剧演员和其他无产阶级的心灵所需要的人们派往前线送死这件事。要知道,我们的天才被派去送死,就意味着国家在摧残自己的心,人民在剜割自己身上最好的筋肉。而这又是为了什么呢?也许只是为了让俄国的天才的人们去杀死德国的天才艺术家?

请好好想想吧,这是多么的荒唐,这是对人民的多么巨大的讥笑!再好好想想吧,人民为了创造自己的感情与自己心灵的思想的天才表达者付出了何等巨大的精力。

难道这场该死的屠杀要把对我们非常宝贵的从事艺术的人们也变成杀人凶手和尸体吗?

**《新生活报》，1917年俄历4月27日  
(公历5月10日)，第8期**

在革命的最初日子里，一些无耻之徒把一堆堆肮脏的小册子，即令人厌恶的“宫廷生活”题材的小说抛到了大街上。这些小册子里写的是“专权的阿丽莎”<sup>①</sup>、“淫荡的格利什卡”<sup>②</sup>、维鲁鲍娃<sup>③</sup>和黑暗的过去的其他一些人物。

我不想叙述这些小册子里的内容，那些内容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肮脏、愚昧、下流。<sup>④</sup>但是青少年在吸收这些肮脏的毒素，无论是在繁华的涅瓦大街，还是在城市的边缘，这些小册子都很容易销售。我们应该同这些毒品作斗争。尽管我并不知道究竟该怎样斗争，但是应当斗争，更何况在书市上，除了这些充斥着病态的、虐待狂式的虚构的“文学作品”外，符合时代要求的出版物实在太少了。

正是在现在，当人们身上所有阴暗的本能都被鼓动起来，而愤怒、屈辱等引发复仇的感情尚未清除的时候，这些肮脏的“文学作品”就特别有害，特别容易使人受到污染。我们应该记住，我们不仅在经历着经济崩溃，而且在经历着社会瓦解，而社会瓦解又总是不可避免地发生在经济崩溃的基础之上。

我们没有力量，缺乏才干，我们有权把造成这种状况的罪过部分地归于那些总是力图使我们远离社会建设这一蓬勃事业的势力，这是不容争辩的。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些政治上比我们普通百姓更加平庸的教育家在教育罗斯，这也是不容争辩的。无可辩驳

的是，我们追求独立自主的种种努力都遇到了政权的怪诞的抵制，因为这政权具有病态的自尊，所关注的仅限于在国内保住自己的地位。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应该不害怕真实情况，应该指出，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在最近的充满对整个俄国社会——对它的理智、意志与良心——疯狂侮辱的年代里，社会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方向，怎样表现过对生活中一切邪恶、愚昧的势力的抵抗？被大家流氓般地否定的社会的公民意识起过什么样的作用呢，是谁被赋予了进行这种流氓般否定的权力？除了俏皮话和讽刺短诗外，我们的受了侮辱的个人尊严感又能怎样表现出来呢？

不，应当知道真实情况：我们自己在道德上的动摇性并不比我们的敌对势力差。

我们生活在可怕的事件的日子里，很显然，这些事件的深刻意义还不可能被我们正确地理解，这些日子的悲剧性还感觉不到；在这种时候，最不应该去关注那些刑事犯罪性的冒险行动，不管这些冒险行动表面上如何有趣。很可能，我们应该准备着不止一次地迎接这些冒险行动，但是不能忘记，犯罪事实本身并不像培养它的社会教育力量那样重要。

历史能培养精神健康的人并且消灭精神患病的人；胡闹会腐蚀精神健康的人并且使精神患病的人的世界观进一步扭曲。精神不健康的人在我们当中太多了，而目前的事件有继续扩大这种人的数量的危险。匕首、手枪和其他这一类的玩意儿只不过是演戏的道具，正常的生活不是用这些东西创造的。现在应该明白了：历史和胡闹——不管闹得多么轰轰烈烈——毫无共同之处。

最可怕的人是那些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的人，因此必须把我们的全部意志用在培养完全明确的愿望的事业上。现在，我们面临着一项必须成就的历史功勋，而成就任何一项功勋都要求集中意志。



当在我们周围的整个世界正发生着可怕的悲剧时，难道我们还能沉醉在肮脏的低级趣味的小说里吗？世界历史的所有强大的力量现在都动作起来了，所有的兽人都已挣脱了文化的锁链，撕碎了披在身上的那一层薄薄的文化的圣衣，无耻地赤裸着身体。这种毁灭般的现象从根本上撼动着社会关系的基础。为了纠正由于我们可悲地、漫不经心地——这种漫不经心会铸成可怕的错误——对待自己而造成的可悲的后果，我们必须把优秀的智慧和意志全都呼唤到现实生活中来。

千百年来，人类致力于创建还算不错的生存条件，并不是为了在 20 世纪来摧毁他们创造出来的东西。

我们应该从那些不理智的事件中吸取理智的教训，并牢牢记住，所谓厄运，所谓命，无非就是我们的轻率，我们对自身的不信任的恶果；我们应该知道，地球上一切创造出来的事物都是地球的唯一的主人和地球的劳动者——大写的人所创造的。

### 注释：

① 即亚历山德拉·费奥德罗夫娜皇后(1872—1918)，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之后，1894 年嫁给尼古拉二世前的姓名为阿丽莎·赫森·达姆什塔德斯卡娅。受格·叶·拉斯普京等人影响颇深。1918 年根据乌拉尔苏维埃的决议在叶卡捷琳娜堡被枪杀。

② 即格·叶·拉斯普京(1872—1916)，原为唐波夫省农民，后以“先知”、“神医”身份成为沙皇尼古拉二世夫妇的宠臣，后为保皇党人所杀。“拉斯普京风气”是俄国上层当权人物极端腐化的表现。

③ 安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维鲁鲍娃(1884—?)——尼古拉二世之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德罗夫娜的女官，皇室和拉斯普京的密友。对皇后起过重要影响。

④ 专制制度垮台后，这类庸俗图书以当时最大的印数出版，充斥了俄国的图书市场。在高尔基写这篇文章时，仅在彼得格勒一地就有如下书在流

行：《拉斯普京真相》（印数：2.5 万册）、《处死格里沙·拉斯普京》（附插图）、《皇后与拉斯普京》（印数 5 万册）、《末代罗曼诺夫的统治》（印数：30 万册）、《格里沙·拉斯普京》（附照片）、《皇室的秘密》、《圣鬼——拉斯普京和亚历山德拉皇后》等等。

**《新生活报》，1917年5月俄历2日  
(公历15日)，第12期**

还没有等到士兵代表苏维埃就往前线派遣演员、画家和音乐家一事作出决定，伊兹迈洛夫团的一个营委员会就要往战壕里派遣43名演员，其中包括非常有天才的、宝贵的文化人。

这些人都不懂军人的工作，也未受过战斗事务的训练。他们不会射击。只是今天他们才第一次被带到射击场上去过，而星期三他们就将开赴前线了。就这样，这些宝贵的连自己都不会保卫的人即将去参加屠杀了。

我不知道伊兹迈洛夫团的那个营委员会是由哪些人组成的，但我确信，那些人“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

因为把天才的艺术家们派去打仗，就像给拉车的马挂上金马掌一样，是一种浪费和愚蠢。而不对他们进行军事业务的训练就把他们送上前线，这无异于将无辜的人判处死刑。我们正是因为这种对待人的态度才诅咒沙皇政权的，也正是因此我们才将它推翻了的。

人群中的蛊惑家和奴才们也许会对我叫嚷：

“那平等呢？”

当然，平等我是不会忘记的。我也曾耗费不少力气去证明：对人来说，政治和经济的平等是必需的；我知道，人们只有在这些方面平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变得更真诚，更善良，更有人性。成就这次革命就是为了使人生活得更好，为了使人本身变得更好。

但是我应该指出,对我来说,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或者音乐家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sup>①</sup>,乃至每一位天才的人,同伊兹迈洛夫团的营委员会是不平等的。

假如托尔斯泰自己感到有把子弹射入别人的脑袋或把刺刀插进别人的肚子的愿望,那么魔鬼自然将哈哈大笑,白痴们也将与魔鬼一同欣喜若狂,而那些把天才看作大自然的神奇礼物、文化的基础、国家的骄傲的人们却会再度泣血痛哭。

不,我从心底里反对把有天才的人变成可憎的士兵。

我要问一问士兵代表苏维埃:它是否认为伊兹迈洛夫团那个营委员会的决定是正确的?它是否同意俄国把自己心头最好的肉——自己的艺术家们、自己的具有天才的人们投进战争的无法填满的血盆大口中去?

还有,在把我们最优秀的头脑消耗殆尽之后,我们将靠什么生活呢?

#### 注释:

<sup>①</sup> 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拉赫玛尼诺夫(1873—1943)——俄国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乐队指挥家,著有歌剧《阿列果》(1892)、《吝啬的骑士》(1904)等,十月革命后离开俄国,1918年起侨居美国。

《新生活报》，1917年5月俄历9日  
(公历22日)，第18期

我们确实正在经历一个令人忧虑的、危险的时代。发生在萨马拉、明斯克、尤里耶夫的暴行<sup>①</sup>，士兵们在许多火车站上的狂妄行径和一系列放荡、愚蠢、下流的行为都悲伤而令人信服地证实了这一点。

当然，我们不应忘记，“祖国处于危难之中”的呐喊不仅可能出于真诚的忧虑感，而且还可能出于党派策略的要求。

但是如果以为无政府现象是政治自由产生的，那就错了。不，在我看来，自由只是把人的内心的病症，即精神上的病症变成为表面的病症。无政府现象是君主制传给我们的，这种传染病是我们从君主制那里继承来的。

同时不应该忘记，发生在尤里耶夫、明斯克、萨马拉的暴行，尽管极其丑恶，但却并不伴有凶杀行为，然而沙皇时代的暴行，一直到发生在莫斯科的“针对德国人”的暴行<sup>②</sup>，都是充满了野蛮的血腥味的。请回顾一下发生在基希尼奥夫、敖德萨、基辅、贝洛斯托克<sup>③</sup>、巴库、第比利斯和数十座小城市里的无数次可恶的凶杀<sup>④</sup>吧。

我并不想安慰任何人，尤其不想安慰我自己，但是我仍然不能不提醒读者们注意那虽然是在很小的程度上减弱人们的下流肮脏的罪行的东西。

我们也不会忘记，那些把“祖国处于危难之中”这一口号喊得比谁都更响亮的人们，早在三年前的1914年7月就有理由喊出这

句令人不安的话了。

出于党派的和阶级的利己主义的策略，他们没有这样做，在三年的时间里俄国人民亲眼目睹了由上层发展起来的卑鄙的无政府主义。

进一步追溯过去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当年掌握俄国国家舵轮的斯托雷平<sup>⑤</sup>就是一个确定无疑的无政府主义者，当时以热烈的掌声支持他的正是那些如今在高声惊呼无政府主义泛滥，叫喊要与它进行斗争的头脑最健全的共和主义者。

当然，“谁什么事都不做，谁就不会犯错误”，可是在我国那些无论做什么事都会犯错误的人实在多得可怕。

确实应该永远同无政府主义现象作斗争，但有时也应该善于战胜自己对人民的恐惧感。

如果祖国的文化多一些，那么祖国的危急感就会少一些。

遗憾的是，在有关文化的必要性和我们需要哪一种文化的问题上，我们好像还没有达成明确统一的意见，至少在战争初期，当莫斯科的哲学家们俏皮而真诚地把康德同克虏伯<sup>⑥</sup>相比较时，我们还没有明确的意见。

可以认为，关于“独特”文化的宣扬之所以恰恰产生在我国最严酷的反动时代，是因为我们是一些自古以来就被训练成“按照最少抵抗的方法”而思维和行动的人。

不管怎么说，我们对欧洲文化的发展，即对精密科学、自由艺术和技术性的大工业的发展关心得最少，因此，我们的民众不理解文化的这三个基本方面的重要意义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当前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已经唤起人民的政治情感之后，应该唤起他们伦理的与审美的情感。我们的艺术家们应该立即以自己的才智全力投入到情绪混乱的街头民众中去，我坚信，美胜利地进入变得有些麻木的俄国人的心灵之后，必定会消除他的忧虑，平息那些不太值得夸耀的感情——例如贪婪之类——的狂

涛,并从根本上帮助俄国人变得更具有人性。

但是人们给了俄国人很多——对不起——价格很贵的坏报纸,除此之外,暂时再也没有什么了。

科学——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精密科学——都会在使人的本能高尚化的事业中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眼下科学工作者们对生活的参与却比以前少了。

在通俗读物中,我还没有看到一本写得清楚明了、令人信服的讲述工业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巨大而积极的作用的小书。而这种书对俄国人民来说早就是不可或缺的了。

在我国,必须迅速地、顽强地开展文化工作,关于这一话题还可以讲很多。

我觉得,“祖国处于危难之中”这句呼喊并没有下面这一声呐喊那样可怕:

“公民们!文化处于危难之中!”

### 注释:

① 二月革命后不久,反动分子与黑帮分子开始鼓动居民抢掠、蹂躏犹太人。起初这种暴行只是零星地发生在俄国南方,后转化为有组织的行动。在波克洛夫斯克、明斯克、尤里耶夫(今塔尔图)等地都发生了蹂躏犹太人的暴行,事态最严重的地区是萨拉托夫和姆岑斯克。侦讯的结果表明,化装的前警察分子和极右派分子参与了这些事件。这些暴行引起了临时政府、工人代表苏维埃及广大人民群众抗议。

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俄国社会上纷传德国与奥地利间谍在俄国活动的消息。1914年10月,莫斯科数家有德国姓氏的店主的商店被捣毁;1915年5月27—28日,发生了大规模袭击有德国姓氏的居民的事件。莫斯科市杜马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议,要求立即“清查凶杀、纵火、抢劫、强奸等罪行”,并追究护法机关人员容忍与放纵这类暴行的行为。后查明,仅5月份在莫斯科就有475家工商企业和217个家庭受到损害,造成经济损失3850万

卢布,受到迫害的有 113 名德国与奥国国籍人、489 名有德国姓氏的俄国人及 90 名有纯俄国姓氏的人。

③ 指 1905—1906 年间在敖德萨、基辅、贝洛斯托克等地发生的蹂躏犹太人暴行。这些暴行是在沙皇政府和警察唆使下发生的,并得到了军人的支持,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仅敖德萨一地就有 500 人死亡,在贝洛斯托克死了 70 多人。蹂躏犹太人的暴行引起了社会舆论的不满。国家杜马中成立了专案组。后根据杜马议员乌鲁索夫公爵及参议员库兹明斯基和图拉乌等人的调查,对上述城市的市长和警察局长提出起诉。在贝洛斯托克市的审判中有 40 余人被判有罪。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著名律师参加了基希尼奥夫市案件的审判。高尔基著文《基希尼奥夫市蹂躏犹太人的暴行》,称这类暴行是“唤起恐惧、羞耻、愤怒的,最可耻的事”。他认为,造成这一“卑劣罪行”的不仅有“愚昧群众和专制当局的意志,而且还有反动文学和黑帮政论的腐蚀性影响”。

④ 沙皇的专制制度曾长期挑动高加索地区各民族间的不和与冲突。1905 年 2 月 6—9 日的亚美尼亚人与鞑靼人之间的互相屠杀最为残酷并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高尔基因此著文《论高加索事件》,此文在日内瓦发表,但在俄国却被报刊审查机关禁发。高尔基写道:“在高加索时,我到处都看到格鲁吉亚人和鞑靼人、亚美尼亚人是怎样一起友好和睦地工作的,他们是怎样孩子般快乐而纯朴地歌唱、欢笑的,很难相信,这些纯朴、可爱的人们现在服从唆使他们的那股邪恶的愚昧势力,愚蠢而毫无意义地互相殴斗。”

⑤ 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1862—1911)——俄国国务活动家,曾任内务大臣,1906 年起任首相,领导土地改革。后遇刺身亡。

⑥ 即阿尔弗雷德·克虏伯(1812—1887)——德国企业家,埃森钢铁公司的创始人,自 1847 年起开始生产军火,是德国克虏伯军火世家的始祖。



《新生活报》，1917年5月俄历18日  
(公历31日)，第26期

现在，当多少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全都必须动手去干新生活建设中的日常粗活的时候，当每一个人都必须挺身保卫古老文化的伟大价值的时候，一些“头脑健全”的人却在加剧和散布恐慌情绪，大声喊着：“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sup>①</sup>

“无政府状态”就像1905年以后一样，愤怒的文字和怯懦的恼恨之潮流与奔涌的肮脏指责之喷泉重又向俄国民主派和全体俄国人民袭来。

我不好意思，也不想谈论自己，不过一年半以前我曾发表了一篇题为《两种灵魂》的文章<sup>②</sup>，我在文章中说，俄国人民从本性上讲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俄国人民历来是消极的，但是在政权落到他们的手中时，却又是非常残酷的；俄国人民那博得众人赞扬的心地善良实际上是卡拉玛佐夫式的感伤主义<sup>③</sup>，俄国人民对人道主义与文化的劝导是极端地缺乏悟性的。这些想法并不新颖，而且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只不过是尖锐地表达出来的而已，然而正因为这些观点，人们指责我犯下了各种反人民的罪行。

甚至不久前，就在前几天，有人在《话语报》——这首先是一张文理通顺的报纸——上撰文宣称，我的“失败主义”可以再好不过地用我对人民的态度加以说明。

顺便说一下，我根本不曾犯过“失败主义”，而且也从未赞同过“失败主义”<sup>④</sup>。谴责用拳头惩罚、决斗、战争这些对所有的人来说

都是最可耻的卑鄙行径，谴责这些无法解决争端却会加深敌对情绪的行为，并不意味着是“失败主义者”和“不抵抗主义者”。“失败主义”和“不抵抗主义”同我这样一个宣扬积极对待生活的人尤其无缘。也许，在某些情况下我不会起来保卫自己，但我还是有足够的力量来保卫我所爱的人的。

我现在回忆起别人对我在《两种灵魂》一文中阐述的思想的看法，也决不是为了自卫，为了自我辩解。我知道，在这场被我们出于体面称作“论战”的凶恶的笔墨殴斗中，斗殴者们都顾不上真理，他们相互寻找对方言辞上的失误、错话和漏洞并互相攻击，与其说是为了表明他们各自信念的真理性，倒不如说是为了向公众显示自己的灵活性。

不，我之所以忆起《两种灵魂》这篇文章，是为了问一下我的论敌：他们到底什么时候是比较真诚的——是过去因为我那并不好听的关于俄国人民的看法而咒骂我的时候呢？还是现在他们用我的那些话谩骂俄国人民的时候呢？

我从来不是蛊惑家，以后也不会是。在我因我们的人民倾向无政府主义、不爱劳动和他们的各种野蛮无知的表现而批评他们时，我总是记着这一点：他们不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的。他们以前生活的条件不可能在他们身上培养起对个性的尊重、对公民权利的意识 and 正义感，这是一个完全无权的压迫人的、充满着最无耻的谎言和兽性的残忍的环境。但应该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即使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人民也还是保留了不少人性的感情和一定的健康的理智。

你们会抱怨：人民在破坏工业！

可是又有谁在什么时候开导过他们，告诉过他们，工业是文化的基础，是社会和国家幸福的基础呢？

在他们眼里，工业是狡猾的机器，它只适用于从它的使用者身上往下抽筋剥皮。难道他们的看法不对吗？

要知道,就在三五个月前,你们自己还日复一日地在所有报刊上向人民揭露俄国工业收入的无耻而神奇的增长呢。所以人民的观点也就是你们的观点。

当然,那时你们应当“揭露”,这是每一个真理的传播者和勇敢的正义捍卫者的责任。但是论战会导致片面地看问题,所以当你们在谈论工业的掠夺性时,忘记了它的文化和创造作用,忘记了它对国家的意义。

工业对一部分人是发财致富的源泉,而对另一部分人却只是肉体与精神上受压迫的根源,这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甚至绝大多数有文化的人所毫无保留地接受的观点。这一观点早就牢固地形成了。请回忆一下,当年俄罗斯人是怎样接受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分歧》一书<sup>①</sup>的;而“我们大家的复活的施礼者约翰”司徒卢威<sup>②</sup>的《批评札记》一书又掀起了怎样一场风暴。

空喊无政府主义状态是毫无益处的,这就像看着大火在吞噬房屋,却只是无益而可耻地空喊“失火了”,而根本不去同火灾搏斗一样。

论战是经院式文字游戏的爱好者们和那些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永远在一切方面证明自己的正义性、自己思维的准确性及他们虚弱无力地拥有的其他高尚品德的人们格外喜爱的活动。

但是如果我们把评判我们的事交给历史,毫不迟疑地开始做最广义的文化工作,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天才、智慧和心灵奉献给俄罗斯人民,鼓舞他们去理智地创造新的生活形式,那将要有益得多。<sup>③</sup>

### 注释:

① 此处影射《话语报》的《无政府现象》专栏,该专栏中刊登有关胡作非为、抢劫、凶杀之类的消息。当时的其他报纸也经常刊登类似的材料。

② 高尔基在《两种灵魂》(1915)一文及这一时期他写的其他一些文章中认为,俄国人身上有两个灵魂并存:一个是亚细亚式的、消极的幻想家和宿命论者的灵魂,它对环境极为驯服;另一个是斯拉夫人的、积极的、英勇的灵魂,它能够明亮而美丽地燃烧,但时间不长,只是在决定性的时刻。

③ 卡拉玛佐夫式的感伤主义——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书中卡拉玛佐夫家的大多数成员贪婪自私,专横暴戾,具有施虐狂的特征,但有时又会感到良心的责备和对真善美的向往(如德米特里对弟弟阿辽沙的表白),及对人间苦难的同情(如伊万对弟弟阿辽沙的谈话)。高尔基的意思是,俄国人民是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品质的杂交体。对俄国人民的“心地善良”不应估价过高。高尔基的这一观点受到了反动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的攻击。

④ 高尔基对战争的态度可从他 1917 年 3 月 23 日给儿子的信中的一段话看出:“现在,俄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而德国人的入侵正威胁着它的自由。因为威廉皇帝的胜利就将是罗曼诺夫王朝的复辟。”

⑤ 普列汉诺夫在《我们的分歧》(1885)一书中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批判了民粹派的观点,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俄国正在沿着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俄国社会主义的未来是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相联系的。

⑥ 彼得·贝里加尔多维奇·司徒卢威(1870—1944)——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政论作家。是 19 世纪 90 年代“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他的第一部著作《俄国经济发展问题批评》(1894)批判了民粹主义理论及其“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体系”,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在俄国正得到越来越迅速有力的发展并将导致“财产不平等”。同时,他对马克思的经济学与哲学理论也作了“补充”和“批判”。1905 年立宪民主党成立后,司徒卢威任该党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曾任弗兰格尔反革命政府的成员,后流亡国外。

⑦ 高尔基在不久后受“发展和传播精密科学自由协会”(该协会是根据高尔基的倡议成立的)的委托撰写的刊于《新生活报》(1917 年 6 月 12 日)的呼吁书中发展了这些思想。详见附录二中《精密科学自由协会》一文。

《新生活报》，1917年俄历5月31日  
(公历6月13日)，第36期

很可能，我的思想是“天真的”，我已经说过，我自认是一个蹩脚的政论家，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要顽强地——也许这种顽强正配得到很好的运用——“继续自己的路线”，而并不在意我的“声音”将成为“在荒原上喊叫的人的声音”，哦！——并非无人的荒原。<sup>①</sup>

好书，诚实的书——启蒙的最好武器——几乎完全从书市上消失了。为什么消失了？这问题到下一次再说。没有有见地的、客观地给人以教益的书，但是却冒出了许多日复一日地教育人们互相敌对和仇恨的报纸，这些报纸从事污蔑诋毁，纠缠于最卑鄙的污垢，大喊大叫，咬牙切齿，仿佛在致力于解决“俄国的毁灭是谁之罪”这一问题。

当然，每一个争论者都极真诚地相信，有罪的是他的论敌，而正确的只有他，那只被叫作真理的神奇的鸟被他捕住了，正在他的手中挣扎。

各种报纸互相纠缠着，像一团毒蛇似的在大街上滚动，用它们嘶哑的恶狠狠的叫声毒害着，恐吓着庸人。教给他“言论自由”，准确地说，是教给他歪曲真相的自由，污蔑中伤的自由。

“自由的言论”慢慢地成了不体面的言论。当然，“在斗争中，每个人都有随使用什么打和随便往哪儿打的自由”；当然，“政治是无耻的事”，而“最好的政治家是最没有良心的人”，但是在承认这

一苏鲁人的道德和卑鄙真理的同时，你毕竟会感到极度的忧愁，会感到为刚刚接受自由的圣餐的年轻的罗斯担忧的痛苦！

从那些印成报纸的可憎的纸张上流淌着、喷溅着剧毒的汁液！

俄国人长久地向自己的上帝祈求：“求你使我嘴唇张开！”<sup>②</sup>现在嘴张开了，仇恨、谎言、虚伪的话语，忌妒、贪婪的话语无节制地涌了出来。其中如果有沸腾的激情——激情和爱心就好了，但是既感觉不到爱心，也感觉不到激情，而只能感觉到一点——有资格的阶级顽强和（应该说）成功地力图孤立民主派<sup>③</sup>，把过去的所有错误、所有罪孽推到他头上，把民主派置于一种必然被迫地扩大错误和罪孽的条件之中。

这一切预谋得非常巧妙，实行得也不坏。已经完全清楚了，当人们说“布尔什维克”时，那就是在指民主派；同样清楚的是，如果说今天人们在攻击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上的最高纲领主义，那么明天将会攻击孟什维克，因为他们是社会主义者，而后天就将不断地责备《团结报》<sup>④</sup>，说它终究不够“忠实地”对待“思维健全的人们”的神圣的利益。民主派不是不可侵犯的圣人，对于他们应当也能使用批评的权利、否定的权利，这是不用争论的。但是，尽管批评和污蔑两词的开头字母相同<sup>⑤</sup>，这两个概念却有着本质的区别，然而非常奇怪的是，这种区别对许多有文化的人来说竟是完全不可捕捉的！噢，当然，是有某些民主派的领袖“不看教历乱敲钟”，但是我们不应忘记，特权阶级的领袖们针对这些错误在采取对国家来说极为有害的、无所事事的“意大利式”罢工<sup>⑥</sup>和恐吓庸人的做法，这种恐吓已经产生了类似下面这封我收到的《致临时政府的信》的结果：

“革命毁灭了俄国，因为大家都获得了自由；我国到处是无政府状态。获得了平等权利的犹太人很高兴；他们一直在毁灭俄罗斯人民。为了救国，需要专制。”

这不是我收到的这类腔调的第一封信，应该预见到，由于害怕

而失去理智的人数将越来越快地增长,报刊正热切地关注着这一现象。

但是正是在现在这些悲惨的混乱日子里,报刊应该记住,俄国人民中的个人责任感发展得多么弱,我们已非常习惯于因为自己的罪孽而惩罚我们的邻居。

自由的言论!以前人们曾觉得,自由的言论将有助于在我们罗斯发展尊敬别人的人格和他的人权的感情。但是在经历着政治印象主义的瘟疫,服从于“大众关切的问题”的印象的同时,我们只在有关俄国的毁灭是谁之罪的疯狂争论中使用“自由的言论”。然而却并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因为大家都有罪。

因此,所有的人多多少少都虚伪地互相指责,谁也不去为用理智的力量、善良意志的力量对抗情感的暴风雨做一点事情。

#### 注释:

①《圣经》里的话与明斯基《麻风病患者》(1885)一诗中的诗句“他痛哭着,因为在世上生活是那样痛苦/在——唉,并非无人的荒原上……”的糅合。

②典出《圣经·诗篇》第51章,上下文为:“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

③民主派——本世纪初俄国流行的社会政治术语,泛指工人、农民、士兵及反对专制的社会阶层、集团与个人。

④《团结报》——普列汉诺夫编辑的右翼孟什维克报纸,1917—1918年1月在彼得堡出版,支持临时政府的政策。

⑤俄语中“批评”一词为 критика,“污蔑”一词为 клевета。

⑥意大利式罢工——即怠工。

《新生活报》，1917年6月俄历9日  
(公历22日)，第44期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sup>①</sup>，这是自然的，这是合理的；但是在今天有两件需要关心的事——党派争夺政权的斗争和文化建设。我知道，政治斗争是必需的事，不过我把它看作是不可避免的邪恶。因为我不能不看到，在目前的条件下，由于俄国人的某些心理特点，政治斗争把文化建设变得几乎根本不可能了。

文化的任务是发展和巩固人的社会良心、社会道德，培养和组织人的一切本领、一切才能，在全面兽性化的日子里，这一任务是能够完成的吗？

请想一想，我们周围在做些什么：每一家报纸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每一家报纸每天都在往读者的心灵中灌输可耻的感情——凶狠、谎言、虚假、恬不知耻及所有这一类玩艺儿。

在一些人心中激起对人的恐惧和仇恨，在另一些人心中激起轻蔑和报复，用无聊的污蔑使第三种人疲惫不堪，把绝望的冷漠传染给他们。这种患有阴暗本能的炎症的人们的活动同文化宣传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却与文化的目的针锋相对。

然而，革命本来就是为了文化的利益而进行的，也正是文化的力量、文化的需求的增长才把革命召唤到生活之中来了。

俄国人看到自己的旧生活被战争和革命彻底震撼了，就放声呼吁给他们以文化的帮助，大喊大叫，“找到报纸”，要报纸给他们提供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法。



例如，一伙“高加索军”的士兵写道：

“士兵们像野兽一样惩罚背叛他们的妻子的现象越来越频繁。请想想办法，让有觉悟的人和社会报刊起来同瘟疫般的现象作斗争并讲清楚，婆娘们是无辜的。我们这些写信的人知道是谁之罪，所以也不怪婆娘们，因为每一个人都要服从于自己的天性，并且想要得到天性所给予的东西。”

这里还有一条消息是讲这一问题的：

“我听了一位士兵的讲述后，现在正坐在列车上给您写信，那士兵含着恼恨的眼泪告诉我，他是一名前线的逃兵，他是为了安顿两个被可恶的老婆抛弃的孩子而开小差的。他发誓要惩罚她。因为老婆而当逃兵的有成千上万人，这可怎么办呢？”

“在顿河罗斯托夫，士兵们押着一位全身赤裸、披头散发的荡妇在街上走，大声喊叫着诉说她的不要脸的行为，跟在她身后打她那已被打烂的大腿。这种丑恶场面的组织者是她的丈夫和她的姘头，一个司务长。我想指出的是，对耻辱的恐惧并不能制服本能，还有，连孩子们都看到了这种肮脏的事情。报刊为什么不说话呢？”

这里还有一封从另一方面表现“妇女问题”的信：

“我求您用挂号信或在报纸上详细地告诉我，应当怎样理解已宣布的妇女和我们权利平等这件事，现在妇女该做些什么？”

“我们这些农民对那可能使人更加无法无天的法律深感不安，而现在农村就靠女人们支撑着。这样下去家就不会有了，家业也要毁掉。”

接下去是：“我告诉您，人们的朋友，乡下在胡闹哩，因为人们在给士兵的妻子们分地，这可更糟糕，而且行不通，所以他们在嚎啕大哭。等他们的丈夫打完仗回来，会因这事打架的，劳驾您。应当对农民们说清楚，让他们按真理去做。”

还有这样一句话：“请寄一本讲妇女权利的书来。”

我还没有引用所有有关这一问题的信，但是在来信中有一个较经常反复出现的话题，那就是索要有关各种问题的书。

人们在信中谈到对神父的态度，询问“移民法是不是将改变”，还请我介绍“美国的情况”，讲解应当怎样医治梅毒，打听有没有“关于把残废人送到一个地方去”的法律，人们还寄来了要求给战壕里的士兵们寄葱头的“请求书”，里面写着，葱“防治坏血病是非常好的”。

所有这些“请求书”、“消息”、“要求”在充斥着火气和凶狠的、内讧的报纸版面上根本得不到表现。报纸的领导人们似乎都忘记了，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外还有数以千万计的人，他们为权力斗争的本能还处于沉睡状态，但他们建设生活的新形式的愿望却已经苏醒了。

而且当这数以千万计的人看到“自由的言论”是在为什么样的目的服务时，他们就会很容易地感到一种对“自由的言论”的极为有害的蔑视，而这将是致命的、在很长时间内不可改正的错误。

难道不能少给空谈一点版面而多给民主派的迫切利益一点版面吗？难道我们对使人们感到文化的客观价值和它的迷人魅力这件事都不感兴趣吗？

#### 注释：

- ① 见《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

**《新生活报》，1917年俄历6月27日  
(公历7月10日)，第59期**

一位可敬的公民写信给我说：

“当你在街头群众集会上看到，士兵们在狂热地捍卫列宁主义者们的极端口号的同时，又是怎样听从那些向他们小声讲述犹太人把持‘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人的反犹太人暴行宣传，那你的心就会充满惊恐。有一次，我问一名士兵，在他的头脑里，‘社会革命’是怎样同对其他民族的敌对态度共存的？他回答说：

“‘我们是些没受过教育的人，分析这么深奥的问题不是我们当兵的事。’”

另一位女通信者告诉我：

“当我告诉一位电车售票员说社会主义者们是在为各族人民的平等而斗争时，他反驳说：

“‘我们可看不上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是老爷们的胡思乱想，而我们工人是布尔什维克。’”

在“现代”马戏院附近，一群士兵和学生在同一位很年轻的神经质的大学生交谈。

“如果我们只是像你们那样争吵，不共戴天地争吵下去，那我们就别学习了。”大学生声音沙哑地喊叫。

“学习什么？”一个士兵厉声问道：“你能教我些什么呢？我们知道你们，大学生以前总是造反。现在可是我们的时代，该是打倒你们这些所有的资产阶级的时候了！”

一部分听众笑了起来，但一个很像理发师的、穿着考究的人热烈地说：

“这话很对，同志们！知识分子指挥我们够久的了，如今在权利自由的时候，我们没有知识分子也能行。”

在这高昂的无知中包藏着巨大而可怕的危险！

在彼得堡地区的夜间群众集会上，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把布尔什维主义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说法，听到对知识分子的攻击，还听到许多其他的极为荒唐和有害的意见。这发生在革命的中心，各种思想在这里发展到最尖锐的程度并从这里流传到整个愚昧的、文化程度不高的俄国。

国内理智的革命力量的团结过程是否在发展，国内文化建设所必需的力量是否在增长？

一些征兆似乎在做出否定的回答。

征兆之一是，知识分子越来越明显地偏离开群众工作，知识分子中陆续出现了建立独立的、纯粹知识分子的组织的尝试。

显然，有一些原因把知识分子从群众身旁推开，而且有一条原因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愚昧的人对知识分子的怀疑并常常是敌视的态度，被形形色色的蛊惑人心者日复一日地灌输给群众。

这种分裂可能会非常有利于劳动知识分子，他们将团结成一个相当有威力并有能力完成许多文化工作的组织。

但是劳动知识分子在渐渐脱离群众，热衷于自己的兴趣、任务和情绪的同时，更加扩大和加深了本能和理智之间的分裂，而这一分裂是我们的不幸，这一不幸就是我们不善于劳动的根源和我们在创造新的生活条件中遭受失败的根源。

群众在失去领导人之后，处于猖狂的蛊惑宣传的氛围之中，于是就开始更为荒唐地寻找工人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及“资产阶级”和劳动知识分子之间的共同点。

不过，在劳动知识分子中却传出了无疑是出于善意的想法和

激情的号召,但是这些号召却把理智的力量引得脱离开群众的利益,脱离开今天的需求。

在哈尔科夫市和省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两级委员会的机关报《南方消息报》上,一位叫伊凡·斯坦科夫的人写道:

“整个社会主义运动有一个极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提高文化水平、重视个性、发展个性和提高全民的知识分子性。有一个口号:立即向全体人民大敞开光明、美和知识的大门,以便不再有非知识分子型的人,以便把人分成知识分子型和非知识分子型的做法尽快地成为旧制度、旧流派、旧体系的野蛮的残余。

“按照我的信念,宣传和尽快实现‘全民知识分子化’的思想就是社会主义的那些不可分割的、不可拖延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诚实的团结一心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这是他们自己对人民的义务,一定要把这一任务当作他们自己追求的起点并把他们自己的追求和所有政党的社会主义要求的共同纲领一起贯彻到新的建设事业之中。只有清除掉资产阶级制度痼疾的知识分子性才能成为人民太阳般的真理,成为理智和美的太阳。”

这话说得很好。但哈尔科夫劳动知识分子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呼吁书写得更好。

“我们向你们,哈尔科夫省的知识分子劳动者们发出号召。

“俄国知识分子用自己的殉难者的尸骨铺满了人民解放的艰难道路,在自己存在的整个历史上一直做着伟大的启蒙和组织工作。此刻,当一切都已组织起来时,俄国知识分子自己却没有组织起来。在组织别人的时候,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却忘记了或没有来得及组织自己。在他们的直接参与下,工人、士兵和农民组织起来了,在知识分子的右边,资产阶级也在加紧组织起来,唯独劳动知识分子,具有丰富的知识、经验和社会技能的劳动知识分子仍未团结起来,仍然像一盘散沙。

“在为进行社会工作和斗争武装得最好的阶段,拥有积极的传

统和光明的社会主义理想的阶级被迫跟在形势的尾巴后面蹒跚而行,却无力引导形势。

“这里不是弄清原因的地方,不过这一事实却是确凿无疑的:知识劳动阶级作为一个统一的阶级,在当前没有加入,也不能加入任何一个目前存在的社会集团。

“因此必须独立地建设知识劳动阶级。

“不过,进行这一建设的所有条件都是现成的。伟大的经济特征、雇佣劳动的特征、有偿地向各种形式的资本付出自己的知识性劳动的特征,这就是为数众多的大多数劳动知识分子的阶级存在的基础,这就是以把劳动知识分子阶级联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为使命的那根链条。在这一意义上,劳动知识分子是伟大的当代无产阶级的一支队伍,是伟大的工人大家庭中的成员。

“我们在明确了劳动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支队伍时,也就明确了他们的社会本质。

“意识到自我的劳动知识分子阶级只能是社会主义的。

“俄国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它还在继续。结束战争、建设国家、解决土地问题和组织经历着严重危机的国民经济等巨大的社会任务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庄严地要求得到解决。

“同志们,哈尔科夫市和哈尔科夫省的知识劳动者们,按照俄国的核心莫斯科——那里的知识无产阶级成立了强大的劳动知识分子代表苏维埃<sup>①</sup>——的榜样,按照其他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的民主苏维埃的模式,团结到自己的哈尔科夫劳动知识分子代表苏维埃中来吧。

“只有团结才有力量,只有联合才能强大。”

劳动知识分子建立独立组织的愿望不仅产生于莫斯科和哈尔科夫。也许,这一愿望是必要的并被竭力证明的,但是人民群众不应失去头脑。

然而最后还是会出现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这是各种力

量团结的过程呢,还是它们瓦解的过程?

**注释:**

① 1917年5月初,莫斯科成立了劳动知识分子代表苏维埃,这一组织联合了115个协会,其中有一些是全俄性的协会,如全俄工程师协会、全俄教师协会、俄国戏剧协会等。参加者有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人民社会党人、无党派劳动者等。该组织宣称是团结一切脑力劳动者的“无党派”组织,它致力于扩大知识分子在行政机构、社会组织中的代表权,呼吁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提高生产力和文化水平,保护知识分子利益,支持临时政府。它特别重视文化教育工作。

**《新生活报》，1918年3月公历28日  
(俄历15日)，第53期(总第268期)**

各种各样的人越来越经常地给我写信说：“现在我们不相信人民。”“我对人民失去了信心。”“我不能相信人民，也不相信那些党派和领袖们。”

这一切都是那些被幻象般的和阴暗的俄国生活的沉重打击弄得惊慌失措的人们的真诚的哭嚎，这是那些想要爱和相信的人们心灵的呼声。

但是——愿那些尊敬的通信人能原谅我！——他们的声音在我看来并不是希望了解和工作的人们的声音。我这话就是俄国人民的叹息，而给我写信的人们却拒绝相信俄国人民精神复兴的能力、创造性工作的能力。我尊敬的通信人们应当承认，他们和人民是血肉相联的，而人民一向总是(现在更是令人相信)表现出并继续表现出他们完全缺乏对自己的相信。俄国人民的全部生活都建筑在“碰运气”和幻想从外部什么地方，从旁边，从上帝和圣人尼古拉<sup>①</sup>那里，从“外国国王和皇帝们那里”<sup>②</sup>，从某个将从某地“赶来”并“评论我们”的“老爷”<sup>③</sup>那里得到帮助之上。即使现在，当人民已经是形式上的“生活的主人”时，他们依然继续寄希望于“老爷”；对人民中的一部分人来说，这老爷是“欧洲无产阶级”；对另一部分人来说是德国人，即铁的秩序的组织者；而在某些人看来，拯救他们的将会是日本；但是谁也没有对自身力量的信仰。

信仰对于心灵的舒适、对于心灵的安宁来说永远是很好的，它



在某种程度上使人变得盲目，使他发现不了生活的痛苦的矛盾；自然，我们大家都力求尽快相信某种东西，相信某一位能够“评论”和能够在我们的国家内外组织良好秩序的“老爷”。我们很轻易地相信：民粹主义分子们为我们仔细工笔描绘了乡下的农夫，描绘得像蜜糖饼干一样，而我们也就心甘情愿地相信了我们的农夫好极了，简直是真正的中国人，欧洲的农夫哪里比得上他们呢。

相信我们的卡拉塔耶夫<sup>④</sup>们特殊的心灵品质是非常舒适的，这些卡拉塔耶夫们不仅仅是农夫，而且是完人！格列布·乌斯宾斯基<sup>⑤</sup>用《土地的权力》给这种信仰以有力的打击，而信仰者们却没有看到这种打击。我们非常热爱的契诃夫用更阴郁的笔调为我们描写了《农夫们》，于是人们就骂他不信任人民。伊凡·蒲宁<sup>⑥</sup>勇敢地加重了对农民描写的阴暗色彩，于是人们就对他说，他是地主，对农夫的阶级敌意蒙住了他的眼睛。还有，人们当然没有发现，伊·沃尔内依<sup>⑦</sup>、谢苗·波德亚切夫<sup>⑧</sup>等农民作家描写农民时用的笔调比契诃夫、蒲宁更阴暗，甚至比《我们的罪行》<sup>⑨</sup>这本名噪一时的书的作者罗季昂诺夫之类人民的明显和实际的敌人更阴暗。

在我们这里，人们之所以信仰并不是因为了解和爱，而恰恰是为了心灵的安宁，这是旁观者的信仰，是无成果的、软弱无力的，这“是死的”<sup>⑩</sup>信仰。我们不具备那种唯一的能够移山填海的信仰。现在，当我们的人民在全世界面前自由地展开了自己那由千百年的野蛮愚昧、可恶的奴役、兽性的残酷培养起来的心理的所有财富时，我们开始喊叫了：

“我们不相信人民！”

正该问问这些不相信人民的人们：

“但是为什么以前你们相信呢？要知道，现在把你们从人民身旁推开的东西，以前，在斯捷潘·拉辛<sup>⑪</sup>时代，在叶美利扬·布加乔夫<sup>⑫</sup>时代，在马铃薯暴动和霍乱暴动<sup>⑬</sup>的年代，在蹂躏犹太人暴行的年代和在1907—1908年间的反动时期一直存在于人民身上。

当年你们信仰的是什么呢？”

一个诚实的好工匠在做某一样东西前，首先要研究和了解他想要用来工作的材料。

我们的社会事业的工匠们想要建造一座新生活的殿堂，也许，他们有关于人民生活的物质条件的相当精确的概念，但却根本不具备对于物质的精神环境、精神特性的了解。

我们必须学习，而且特别应当学会爱劳动，学会理解劳动的拯救性。

信仰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但是必须要有知识。政治就像坏天气一样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为要使政治变得高尚，就必须有文化工作，早就应当往凶恶的政治情感方面投入仁慈善良的情感了。需要信仰自己，信仰自己的创造性工作的能力，那样其余的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们到世界上来就是为了不妥协”<sup>①</sup>，为了同生活中的卑鄙现象作斗争并克服它们。

信仰是很舒适的事，但是比这好得多的是具有良好发展的个人尊严感和不因为我们大家都同样有过错而呻吟抱怨。

#### 注释：

① 圣人尼古拉(公元4世纪)——小亚细亚人，生前为米拉城主教，后被基督教尊为圣徒。

② 指布尔什维克对联合欧洲无产阶级所寄的希望及资产阶级对外国军事干涉的指望。

③ 引用涅克拉索夫《被遗忘的田野》一诗中的词语。

④ 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他是勤劳善良、驯良恭顺的俄国农民形象。

⑤ 格列布·伊凡诺维奇·乌斯宾斯基(1843—1902)——俄国作家，所著《土地的权力》(1882)一书及其他作品描绘了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及由此

引起的农村经济贫穷、道德堕落的悲惨情景。高尔基认为,格·乌斯宾斯基、契诃夫、蒲宁、波德亚切夫等作家描写农村悲惨黑暗的现实生活的作品比列夫·托尔斯泰和许多民粹派作家对农民的理想化描写更为真实可信。

⑥ 伊凡·阿历克赛耶维奇·蒲宁(1870—1953)——俄国作家、诗人,1920年起侨居国外,193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其小说《乡村》(1910)、《苏霍多尔》(1911)等描写了俄国农村阴郁悲惨的生活。

⑦ 伊凡·叶戈罗维奇·沃尔内依(1885—1931)——俄国作家,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1903年起参加革命运动,倾向社会革命党人,曾因刺杀沙皇警官而遭流放。1911年与高尔基相识,在高尔基鼓励下从事文学创作,所著自传体小说《我的生平故事》(1912—1914)描写一农村青年精神成长的过程,反映了农村中的社会不公、农民愚昧、贫穷等现象。十月革命后曾被逮捕,经高尔基的营救获释。

⑧ 谢苗·帕甫洛维奇·波德亚切夫(1866—1934)——俄国作家,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其中篇小说《押解回乡》(1903)、《守旧的人们》(1907)等描写农民的极度贫困和苦难,以及农村资产者们的贪婪、腐化。

⑨ 即当时颇为流行的伊·阿·罗季昂诺夫的小说《我们的罪行(不是呓语,而是真事)——当代人民生活图景》(1909)。作者是退伍军官。小说描写一个农民被一群酗酒的同村人杀死的故事。书中的农民是只有动物本能的愚昧、狭隘的群氓。全书充满了凶杀兽行。作者认为,这一切是1905年革命中人民获得为所欲为的“自由”的结果。高尔基在1911年曾指出,该书无真实性可言,必须戳穿罗季昂诺夫在书中散布的谎言和污蔑。

⑩ 见《圣经·雅各书》第2章第20节。

⑪ 斯捷潘·季莫非耶维奇·拉辛(约1630—1671)——顿河哥萨克,1670—1671年俄国农民战争的领袖。

⑫ 叶美利扬·伊凡诺维奇·布加乔夫(1740或1742—1775)——顿河哥萨克,1773—1775年俄国农民战争的领袖。

⑬ 指1840—1843年间因在维亚特卡、弗拉基米尔、唐波夫等省强迫种植俄国以前不种的马铃薯而引起的群众自发暴动和1830—1831年在唐波夫、塞瓦斯托波尔等地因霍乱流行引起的人民起义。在这些暴动中,暴动者表现得特别残忍,军队镇压这些暴动时也表现出同样的残忍。18、19世纪,俄国经常因瘟疫流行而发生暴动。

⑭ 高尔基引自他自己的长诗《老橡树之歌》，该诗作于 1899 年，受到柯罗连科的尖锐批评，高尔基销毁了诗稿，但记住了其中的这一诗句。

**《新生活报》，1918年公历5月1日  
(俄历4月18日)，第81期(总第296期)**

工人阶级中最有文化的集团开始意识到科技知识对工人的必要性。知识化的工人们感到，工业是他们的事业，工业是文化的基础，国家繁荣昌盛的保证，为了恢复和发展工业，工人就必须有坚实的科学实验的功底。有些事实，如工人们、工会会员们写的许多报告记录，就说明了对我们来说是崭新的对于知识和劳动的评价，工会会员们的报告记录中强调了必须在全国筹建各个生产部门——如玻璃生产、陶器生产、瓷器生产——的博物馆和研究所的事。

很有代表性的是，工人们首先指出，必须尽快发展艺术工业。可以想到，这表现了人民的情感天才和人民天生的“智慧”。人们似乎懂得，现在想用廉价的破烂货充斥俄国的德国人，将来会无力同有艺术工业为基础的俄国竞争。

“德国人具有像仪表机械一样完善的纪律性，德国人是这种机械操纵的力量手中的听话的工具，德国人能够奇妙地仿制从哲学到橡胶的一切，但是他不懂劳动的诗意。”这是说德国人的话，其中有不少真理。

我们罗斯人从本性上说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是残酷的野兽，在我们的血管里至今仍流淌着愚昧而凶狠的奴隶的血，这是鞑靼人和农奴制度桎梏的有毒的遗产，这也是真理。没有什么话不能用来骂俄国人。你泣血嚎啕，却还要谩骂，因为不幸的俄国人过去

和现在都给人以用忧郁的狗的叫聲，用其不被也是野兽的野蛮主人所理解、所明白的狗的叫聲对着他吠叫的权利。

这是地球上罪孽最为深重的和最肮脏的人民，他们分不清善恶，被伏特加灌得昏头昏脑，被无耻的暴力变得非常丑陋，既残酷得不像话，同时又令人不可思议地善良宽厚，说到底，这还是天才的人民。

现在，当警察官吏制度的腐烂的外皮被揭开之后，积累了千百年的腐脓在全国流淌开来后，我们大家都应当经受痛苦而严峻的报复。为了过去的罪孽，为了我们的亚细亚式的僵化，为了那当初我们用以忍受施于我们头上的暴力的消极态度。

但这种精神卑鄙的爆发，这种腐脓的暴风雨是不会持久的，因为这是使有病的机体净化和康复的过程，“疾病显露出来了”，这表现在疾病的所有的丑恶症状之中。

但是不要相信这是致死的疾病，不要相信，我们将死于此症。不，我们不会死的，如果我们开始齐心协力和顽强的治疗的话。俄国知识分子应当重新担负起从精神上医治人民的伟大劳动。现在俄国知识分子可以在更加自由的条件下工作了，因此毫无疑问，和他们一起分担精神上复兴国家的劳动的还有工人的、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及这种知识分子的最有文化的、现在正淹没在愚昧的群众之中艰难喘息的那一部分。

民主的和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任务是在文化工作的基础上团结起全国所有的理智力量。但是为了取得这项工作的成功，应当放弃党的宗派主义，应当明白，只用政治是培养不出“新人”的，用把方法变成教条的办法，我们就不能为真理服务，而只是在扩大极为有害的、涣散我们力量的迷误。

我们的力量不多，需要珍惜这些力量，需要节省精力的消耗，协调个别人、个别团体、个别组织的零散的主意和努力，建立一个能够在以国家的精神康复和复兴为目的的全部文化启蒙工作中带

头的统一的组织。

看来,较少沾染宗派主义习气,还没受到党的和派别的“政治”致命毁坏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已开始感觉到进行由现实的悲剧性条件强有力地决定的广泛的文化工作的必要性。

这一点的明证是,一批不同政治观点的代表人物试图在“文化与自由”的箴言下组织一个党外协会<sup>①</sup>,而且毫无疑问,如果这一协会能够相当深刻地理解眼下的任务,它就能够起到把一切最有能力的、真诚希望为国家的幸福工作的个人和团体联合起来的组织者的艰巨作用。<sup>②</sup>

不过,在这方面,作为顺利工作的首要条件,应当做到出版一家信息性杂志,以提供有关文化教育创举的全部进程的多少准确一些的画面。必须进行力量统计,必须知道,谁在什么地方做些什么或打算做些什么,因为在我国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在同一领域劳动的人互相之间一无所知。

如果一个国家有两家专门刊物,其中一家刊物的任务是详细地通报纯科学和应用科学领域正在发生的一切,另一家刊物的责任则是讲述文化启蒙工作的情况,那么这两家刊物将给培养思想和感情的事业带来巨大的益处。应当工作,尊敬的公民们,应当工作,我们的拯救正在于此,而不在于别的什么东西。

我们在死亡的边缘上,互相咬住对方咽喉时的那种虐待狂式的快意是卑鄙的快意,尽管它在我们无限的痛苦中也给我们以安慰。

但是,说实在的,不值得特别热心地沉溺于相互折磨和杀戮的事业,应当记住,想要并且能够消灭我们的人是相当多的。

我们将为拯救我们自己而工作,我们不会灭亡,不会“像阿瓦尔人一样,部族消失,种族消失”<sup>③</sup>。

## 注释：

① 为纪念二月革命，1918年3月底成立了“文化与自由”启蒙协会，高尔基被选为该协会的组织委员会主席，参加这一协会的有费格涅尔·札苏里奇、普列汉诺夫等人。协会的基本目的是发展“全俄的文化和启蒙工作”。高尔基认为，协会的首要任务是把新老知识分子联合起来，从事“精神净化和国家复兴的工作”。协会成立后组织了为脑力劳动者提供物质帮助的工作，建立了伙食供应点，创办了许多公共图书馆（高尔基本人为图书馆捐出了五百多本书），成立了“文化与自由”出版社，出版了《文化与自由》杂志。

② 格列鲍夫因不同意高尔基对知识分子在国家文化发展与精神复兴中的作用的看法，而与高尔基展开了争论。详见第25篇注①。

③ 据古罗斯编年史《往年故事》载，阿瓦尔人在征服斯拉夫人的杜列勃部落后（约7世纪），对他们进行残酷的迫害，结果受到上帝的惩罚，全部死光。



**《新生活报》，1918年5月公历17日  
(俄历4日)，第92期(总第307期)**

反面的现象总是比那些人们用来体现自己的美好感情、自己的崇高理想的事实多得多——这是一条既明显，又可悲的真理。我们愈是觉得我们对自由、正义、美的胜利的追求是可能实现的，挡在通向人道美的胜利道路上的一切牲畜性卑劣的东西在我们面前就显得愈加可恶。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污物和破烂总是更加显眼，不过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过分紧张地把自己的注意力停留在与对更好的事物的渴望不可调和地敌对的事物上，以至看不到阳光，而且好像也感觉不到太阳那使人生气勃勃的力量。

关于罗斯处于死亡的边缘一事，还在三年前我们就已经开始怀着忧郁、恐惧和愤怒呼喊了，但是还在这以前很久的时候，我们就耳语地、小声地、用被君主制的检查制度的酷刑歪曲了的语言谈论过祖国的不可避免的死亡。三年来，我们不停地经受着大毁灭，关于俄国死亡的呼声越来越响亮，俄国国家生存的外部条件对它来说变得越来越严峻，它的内部的垮台似乎也越来越显而易见，看起来，俄国早就该陷入政治死亡的深渊之中了。但是，今天它仍然没有坍塌，即使明天它也不会死亡，如果我们不想它死亡的话。只是应当记住，一切可恶的东西也像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应当在我们自己的心间点燃起我们仍然还不熟悉的个人为国家命运负责的意识。

我们现在生活得糟糕而耻辱，说这些已是多余的了，这是大家

都知道的事，我们早就这样生活了，不过在君主制时期我们生活得要更加糟糕，更加耻辱！那时，我们心里感觉不到自由的活跃的创造力，但却憧憬着自由，现在全体人民终于感觉到这种力量了。人民在利己地、牲畜般地、愚蠢而丑陋地享受着自由，情况就是如此，但是应当理解和珍视这一意义重大的事实了：在残酷的奴役中培养的人民从沉重的、毁坏人的锁链中解放出来了。我们从内心里还没有消除奴隶制的遗产，还不相信我们自由了，还不善于适当地享受自由的礼物，因为这一切，主要是因为缺乏自信，我们才如此可恶地粗野，病态地残酷，才如此可笑和愚蠢地互相害怕和互相恫吓。

但是毕竟整个罗斯，直至它的最底层，直至它的野蛮人中最坏的一个，不仅从外部来说已经自由了，而且从内里来说也已经动摇了，从它的根基上及根基的根基（亚细亚的僵化、东方的消极主义）上动摇了。

俄国人民因痛苦和磨难而野兽般地嗥叫、奔突，这些痛苦和磨难不能不改变他们的心理习惯、偏见、成见和精神本质。他们很快应当明白，不管外部的敌人多么强大、贪婪，对于俄国人民来说最可怕的内部敌人是他自己，他对自己和他人、对祖国、对理智和知识持轻视的态度，因为他没有学过珍惜和尊重人，他感觉不到他有祖国，他不了解也不重视理智和知识的力量，反倒认为那是老爷们的对农夫有害的古怪想法。

以前他们依靠古老的亚细亚式的狡黠生活，从不考虑明天，信奉的是一句愚蠢的谚语：“得过且过，上帝保佑！”现在外部的敌人告诉他们，困兽的狡猾在有组织的理智而冷静的铁的力量面前是微不足道的。现在他们应当把六个月的冬天用于思索和劳动，而不是用于朦胧的、半饥半饱的游荡。他们不得不懂得，他们的家乡并不仅仅局限于省、县的界线之内，而是充满了取之不竭的财富的国家，国家的财富能够用神话般的礼物来褒奖他们诚实而聪明的

劳动。他们将懂得：

懒惰是身体的愚蠢，  
愚蠢是头脑的懒惰。

为了使头脑和身体变得健康，他们将想到学习。

革命是一种痉挛，在这种痉挛之后接下去应是朝着革命行动提出的目标的缓慢的、有步骤的运动。法国大革命震动和折磨了法国人民达十年之久，在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感觉到整个法兰西是自己的祖国之后，他们十分英勇地捍卫了它的自由，抗击了欧洲的一切反动力量。意大利人民在40年间完成了十次革命，才建立了统一的意大利。

哪里的人们没有自觉地参与创造自己的历史，哪里的人们就不会感觉到有祖国，也就不会意识到自己对祖国灾难所负的责任。现在俄国人民全都参加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极为重要的事件，所以应当由此出发去评价今天使我们痛苦和使我们喜悦的一切坏事和好事。

人民确实半饥半饱，受尽折磨；人民确实在犯着许多罪行，而且不仅在艺术方面可以把他们叫作“瓷器店里的河马”<sup>①</sup>。这是一支笨拙的、未经理智组织的力量，是一支巨大的、具有潜在天才的、真正能够进行全面发展的力量。那些极端疯狂和毫无顾忌地否定、中伤革命的民主派的人竭力想从他们手中夺回政权，哪怕暂时地也好，奴役他们，使之成为特权阶级的狭隘利己主义服务，他们忘记了一条普通的、对他们最不利的真理：“自由而理智地劳动的人们数量越多，劳动的质量就越高，创造社会存在的新的更高形式的过程完成得就越快。如果我们能够迫使所说的一个国家的所有头脑起劲地工作，那我们就将创造一个奇迹的国家！”<sup>②</sup>

我们还不习惯于用心灵和头脑的全部力量生活，就已经因革

命而疲惫了，这种疲倦来得太早，对我们大家都是可怕的。我个人不相信这种致命的疲惫，而且我认为，这种疲惫将会消失，如果国内将响起激昂的、具有起死回生的力量的声音的话——这声音应当响起来的。

在西线的一次战斗中，一名法国上尉带领一连人进攻敌人的阵地。他绝望地看到，他的士兵一个接一个地倒了下去，他们是被铅弹打倒的，但更准确地说是被恐惧、被对自己力量的不信任、被他们认为任务不可能完成的绝望心情打倒的。于是，上尉作为一位法国人，一位用英勇的历史培养起来的人，高呼道：

“死人们，站起来吧！”

被恐惧打倒的人们又复活了，而敌人也就被战胜了。

我强烈地相信，在不远的未来的一天，有一个非常爱我们、善于理解一切、宽恕一切的人，将会高呼：

“死人们，站起来吧！”

于是我们将一跃而起，而我们的敌人也就将被战胜。

我相信。

#### 注释：

① 瓷器店里的河马——比喻平拙、无知、粗野，不懂得珍惜物品的人。

② 这些思想高尔基在写本篇一年前在庆祝成立“发展和传播精密科学自由协会”的题为《科学与民主》的发言中曾详尽地阐述过。他说：“公民们，我们应当把我国最优秀的头脑、我国的创造的精神力量组织起来，我们必须为俄国的科学创造使之可能自由与无限发展的条件，我们必须一致关心，使我们的学者为国家作出最大可能的创造。”“自由研究的科学水平提得愈高，这科学的视野就愈广阔，把知识实际运用于生活的机会就愈多。我们知道，自然界再没有比思维过程更令人赞赏的事了，再没有比科学研究的成果更珍贵的了。”

**《新生活报》，1918年公历4月30日  
(俄历17日)，第80期(总第295期)**

自然，思考的人们的注意力紧紧地集中在政治这一暴力与专制、凶恶和谎言的领域，形形色色的党派、团体和个人汇集到这一领域，扬言要进行“最后的斗争”<sup>①</sup>，他们恬不知耻地蹂躏自由的思想，在争取从肉体上统治人民的权力的斗争中渐渐地失去了人的面目。这种关注是自然的，但又是片面的，所以又是丑陋和有害的。社会成长过程的内容不只局限于阶级的、政治的斗争这一种现象，政治斗争的基础包含有本能的粗暴的利己主义，与阶级的、政治的斗争并列的是发展得愈益强大的、生存斗争的另一种高级形式——人同自然的斗争，而只有在这一斗争中，人才能发展自己精神的力量，使之变得完善；只有在这里，人才能找到自身的意义和使人变得高尚的意识；只有在这里，人才会赢得那样一种自由：它将消灭人身上的动物成分，使他成为聪明、善良、诚意的人——真正自由的人。

我想对所有被现实的残酷刑罚所折磨而精神也受到压抑的人说话，我想告诉他们，即使在今天，在俄国受到死亡威胁的日子里，国家的理智生活也并没有枯竭，甚至都没有停止过，恰巧相反，而是在有力地、广阔地发展着。

国家的最高学术机构——科学院在紧张地工作，由它领导的对俄国生产力的研究正在不间断地进行，一系列极宝贵的报告和著作正在准备出版和正在出版。一本综述俄国科学成就的、使我

们有可能将俄国天才们的伟大著作和成就引为自豪的书很快就要问世。<sup>②</sup>

大学计划开办索尔蓬纳<sup>③</sup>式的自由的科学讲习班,数量很多的学术协会不顾政治无知和愚昧者的政策为他们设置的粗俗的障碍,仍然在工作。

谦虚的献身于纯知识的人们不放过任何对一贫如洗、极端疲惫的祖国可能有益的东西,正在制订组织恢复和发展俄国工业所必需的各种研究所的计划。在莫斯科,用马尔克先生的资金建立起来、由拉扎列夫教授<sup>④</sup>领导的“科学研究所”正在着手工作;在彼得格勒,“发展和传播精密科学自由协会”<sup>⑤</sup>正在组织化学、生物等研究所。

限于报纸文章的篇幅,在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革命时期在我们的科学家中产生的所有的科学创举,但却可以满怀信心地说,俄国的科学力量正在开展积极的活动,而国家最优秀的头脑的这种纯洁、伟大的工作就是我们精神复兴的保证和开端。

如果那些自认为是俄国政治领袖的人们正确地理解人民的需要、国家的利益,那就好了;如果他们有足够的灵活性,不去妨碍科学创造的伟大事业,分一点心去帮助科学家们的劳动,那就好了!

然而,很遗憾,民主知识分子的广大阶层几乎仍然不知道纯科学和应用科学方面的创造过程,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关注这一过程的发展是必须的,知识完全能够使重病的心灵康复,安慰备受折磨的人们并提高他们的工作干劲。

科学院应当做一件出色而有益的事——出版一种篇幅不大的杂志,向有文化的人们通报在俄国科学领域中发生的一切。这种信息杂志无疑会具有深远的、社会和民族的教育意义。我说“民族的”意义,这并不是一时信口言之,因为我认为,我们人民(我们的“朋友们”相当灵活和广泛地利用我们人民的力量来同他们的敌人作斗争)应该懂得,我们除了我们自己以外没有别的朋友。

最后,我们这些很不文明的人还应当懂得,我们早就生活在科学创造的环境之中,没有科学的参与,你连一块好砖、一粒纽扣也做不好,你做不好任何一件能减轻我们的生活压力、装点我们的生活、力求保持我们的精力使之免于无益的消耗并战胜毁坏生活的因素的事。我们应该懂得,科学知识就是力量,没有这种力量就不可能有国家的复兴。

“我们懒惰,也不好奇”<sup>⑥</sup>,但是应当指望历史给我们的残酷的、鲜血的教训将掸落我们的懒惰,并迫使人们认真地思考,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俄国人比别人更不幸?我再重复一遍,科学院真的应当出版一种杂志,用简短的特写和报道的形式为人们提供关于在科学的神秘的、外行不了解的领域里发生的一切信息,科学院真的应当出版这种杂志,做好这一民族性的重要而必需的事业,使对自己的力量失去信心的、由于人们最可怕的敌人——愚蠢的无耻折磨而兽性化了的国家变得理智、变得人道的这一事业成为可能。

### 注释:

① 借用《国际歌》里的词语。

② 十月革命并没有中断科学院的活动。这一时期科学院工作主要是研究国家的自然资源及对这些资源的需求情况。1916年在科学院内成立的“俄国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继续积极活动。1918年在维尔纳茨基院士主持下召开该委员会会议,讨论了成立新的研究所问题。此后不久即成立了理化分析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贵金属研究所、耐火与粘土材料研究所等,并新建了生物学会、古生物学会,新出版了历史学、地质学、地质物理学、动物学、解剖学、生物学等学科的杂志。

③ 索尔蓬纳——巴黎大学的别称。

④ 高尔基关于科研所的任务的论述参见附录二中《精密科学自由协会》一文。彼得·彼得罗维奇·拉扎列夫(1878—1942)——物理学家兼病理学家、科学院院士。高尔基在本文中阐述的关于科研所的论述在拉扎列夫的工作

中得到了发展。

⑤ “发展和传播精密科学自由协会”成立于 1917 年 3 月。高尔基是发起者之一。协会的组委会成员有高尔基、伊凡·巴甫洛夫、柯罗连科等学者与社会活动家。稍后成立了协会理事会，主席为斯捷克洛夫院士，高尔基与扎鲍洛特内教授被选为副主席。十月革命后协会停止活动。

⑥ 引自普希金的作品《阿尔兹鲁姆旅行记》。



**《新生活报》，1918年5月公历16日  
(俄历3日)，第91期(总第306期)**

我知道，现在罗斯已经有不少人在激烈地挣扎以避免成为肮脏的、令人屈辱的现实的俘虏，“投到文化之下”，投向真正的自由、光明。<sup>①</sup>

但是我觉得，类似的痛切向往美好生活的人们所理解的“文化”、“文化性”的概念的内容不完全是清楚的，是不够广义的。

他们忽视了这些概念的人文的、深刻的理想主义的内容，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他们在想象新文化的同时到底考虑到感情和思想的哪些形式？

这不，我们看到，在我们周围有不少所谓的“文化人”，这些人政治上非常内行，各种各样的知识相当丰富，但是他们的生活经验、他们的知识并不妨碍他们充当反犹太主义者、反民主主义者，甚至充当基于压迫人民群众、压迫个性自由的国家制度的真诚的捍卫者。这些人就个人而言是正派人，甚至有时在个人关系上是非常敏感的人，但是在争取自己的思想胜利的斗争中，在社会活动中却会毫不迟疑地、不择手段地采取不正当的方法，采用撒谎和污蔑敌人的方法，采用卑鄙的伪善者的狡诈，甚至采用残酷的方法——维护死刑，为枪毙人辩解等等。而所有这一切又不妨碍他们认为自己是“文化”人。或者，我们就拿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吧，它被认为是非常有文化的，确实，它的组织为德国外在文化的发展事业做了许多事情。

但是已经四年了，用可憎的屠杀工具武装起来的几十万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陆地上、在水上、在空中、在水下杀害自己的同类，杀害和平居民、妇女和儿童，消灭城市、葡萄园、果园、菜园、耕地、庙宇、轮船、工厂，消灭比利时、法兰西和其他国家的千百年积累起来的伟大而神圣的劳动成果。

我之所以说到德国人，是因为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可恶的活动都是在别人的土地上进行的，但是，不用说，在这场卑鄙的战争中没有无罪的。在这场战争中，人人都有罪，我们的罪也不比别人轻，只不过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摊上的苦难要比别人更多，因为我们在内在的和外在的文化方面原来就比所有的人都弱。

这是怎么一回事？应当怎样理解文化这一概念的真正内涵，才能使上面所说的可耻的矛盾成为不可能的呢？

显然，只有当我们善于培养我们自己的感情和意志时，才有可能消灭这些可耻的矛盾。

应该记住，一切都在于我们，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是我们在创造一切事实、一切现象。我们能否在自己身上培养起对我们本质的兽性的一半，对我们心理中那些使我们互相粗野和残酷相待的动物成分的由衷厌恶？我们能否自己和互相培养起对痛苦、罪行，对谎言、残酷和那厚厚地积在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有多高的文化——心灵上的全部卑鄙的尘垢的厌恶？

文化的真正的本质和意义在于从心里厌恶一切肮脏的、卑鄙的、虚伪的、粗俗的东西，一切贬低人和迫使人痛苦的东西。应该学会仇恨痛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消灭痛苦。应该教会人哪怕稍微爱人现在的样子，也应该热爱人将来的样子。

现在，人们精疲力竭，极度疲惫，他们因为忧愁、恼恨、失望、绝望而心碎，人在极度疲惫后，自己也会觉得自己可怜而不可爱，令人生厌。有些人出于虚假的羞耻心，掩盖着自己的痛苦，仍然在装模作样，大喊大叫，大吵大闹，装作强大的人，但他们是非常不幸

的，他们疲倦得要命。

什么将治愈我们，什么将使我们的力量复苏，什么能从内部使我们更新？

除了对自己的相信，别无他物。我们必须记住某些东西，我们在为政权和口粮的争斗中忘掉的太多了。

应该记住，社会主义是科学的真理，人类发展的全部历史正在把我们引向社会主义，它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进化的一个完全自然的阶段，应该对它的实现抱有信心，信心能使我们平静下来。

工人不应该忘掉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成分，他只有在认识到社会主义不仅对劳动者们是必需的、有拯救力的，而且还将把所有的阶级、把全人类从患病的、撒谎成性的、自我否定的旧文化锈迹斑斑的锁链中解放出来时，才能信心十足地感到自己既是新真理的使徒，又是争取新真理胜利的强大的战士。

特权阶级不接受社会主义，不觉得社会主义中有自由、有美，他们想象不到，社会主义能把个性及其创造活动提高到何等高度。

但是懂得这些道理的工人多吗？对于工人的大多数，社会主义只是建筑在工人阶级的利己主义之上的经济理论，就像其他社会学说建立在私有者的利己主义之上一样。

在争取阶级利益的斗争中，不应当抛弃对美好事物的全人类追求。

只有在对我们自身的和我们以外的一切残酷的、粗俗的、卑鄙的东西怀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感的情况下，才可能有对文化的真正的敏感，对文化的真正的理解。

你们在尝试培养自己的这种厌恶吗？

格列鲍夫针对我关于出版科学和文化信息杂志的计划喊叫道：

“难道只是因为国家没有这两种刊物，我们这儿的一切才不好的吗？”

这种叫喊与他的一篇文章的聪明成分不相协调，在那篇文章中，

他因可笑的对书籍的态度的无政府造反倾向表现出极度的痛心。

我们不懂得知识的力量,或者未充分评价知识的力量,这是我们“在投到文化之下”的道路上最巨大的障碍。没有知识和自我意识,我们走不出当代腐败的沼泽。正是现在必需有一些能给我们以较为准确的、关于我们这里也有好事——正是好事——的印象的刊物,现在每天都有人在愉快地做着统计反面品质和事实的工作。所以,是时候了,应该看看清楚,我们周围有没有正面的现象和事实?

#### 注释:

① 本篇在《新生活报》上刊出时,开头部分与《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中的不同,而是这样的:“格列鲍夫的文章是一颗被黑暗混乱的生活深深激怒的心的真诚呼喊,我知道,现在俄国已经有不少人像格列鲍夫一样在急切地摆脱肮脏而污辱人的现实的俘虏,投到‘文化之下’,投向真正的自由、光明。

“但我觉得,格列鲍夫和与他相类似的人们……”

接下去文章就和本篇相同。

本篇是针对格列鲍夫(普梯洛夫斯基)《到文化之下去》一文(《新生活报》,1918年5月15日)的。格文不同意高尔基关于老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在“文化工作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的号召,他认为,高尔基发展文化的想法缺乏“阶级的考虑”,“踏上广阔道路的工人阶级应当摆脱”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干扰它的“陈旧的、祖先遗传下来的包袱”。“迫切的口号”是按阶级性原则组织无产阶级。他认为,“许多工人,笔者也在其中,已经找到了这种方法:他们在组织‘统一工人党’。他们在投到文化之下。”

《新生活报》编辑部在为格文写的按语中说,他们并不同意格文的观点,并且指出,西方与俄国的工运史证明,在缺乏任何明确政治色彩的情况下,“统一”、“工人”等特征决不能保证工人不服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能保证其组织的阶级性质不发生蜕变。重要的是“应该按照西欧无产阶级的榜样建立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和阶级的职工会。应该关心工人的文化教育”。

**《新生活报》，1918年5月公历23日  
(俄历10日)，第97期(总第312期)**

一个不久前从国外回来的人讲述说：“在斯德哥尔摩，开了近60家贩卖图画、瓷器、铜器、银器、地毯及各种从俄国运出的艺术品的古玩店。在克里斯丁亚那<sup>①</sup>，我发现有12家这类商店，在哥德堡和瑞典、挪威、丹麦有很多这类商店。有些商店挂着这样的招牌：‘俄国古玩和艺术品商店’、‘俄国古物店’。在报纸上经常能遇到这样的启事：‘出售地毯和别的来自俄国皇宫的东西。’”

毫无疑问，这里讲的是可悲的真实情况，对我们来说，是既非常可耻又非常可悲的真实情况。为了验证这一真实情况，只需要花上两三天时间，巡视一下亚历山德罗夫市场的店堂、彼得格勒的小古玩店和市里所有街道上开设的多得数不清的寄卖商店就行了。到处都有一些脸刮得干干净净但俄语却说得不好的美国派头的人在不知疲倦地走动，没完没了地购买，购买一切哪怕稍微有一点艺术意义的东西。他们特别热心，也特别成功地在猎取东方的物品——中国和日本的瓷器、铜器、古老的漆器、丝绣、图画、珐琅制品，等等。外国人非常清楚，俄国有许多东方的艺术品，特别是在远征北京<sup>②</sup>之后，在那里我们的军人对中国人的财产表现得肆无忌惮。我们的将领从那儿运回成车厢的珍贵物品。在满洲的冒险行动更是明显地加强了东方物品的流入，在对日战争<sup>③</sup>期间也有不少东方物品被运到了俄国。但是很自然的是，我们同中国的近邻关系更加促进了俄国对东方艺术品的聚敛。

研究过东方艺术史的行家们和收藏家们说，在我国，能从大量奇妙的物品中找出一些现在在中国和日本已经绝迹的东方古物珍品。许多外国人感到惊奇：尽管有这么丰富的东方艺术珍宝，尽管俄国艺术同东方艺术有着精神上的联系，在我国却没有一所东方古物和东方艺术的博物馆。

当然，惊奇的只是那些天真幼稚的人，他们的理智根本无法理解我们俄国人的独特性，我们的独一无二性。看来，这些人不知道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芭蕾舞，同时图画出版事业却是办得最糟的，尽管俄国是世界上最广阔的图书市场。他们不知道，在有着一望无际的森林的西伯利亚，报纸是用从芬兰运来的纸张印刷的；他们不知道，我们把棉花从土库曼斯坦运到莫斯科，将它加工后再运回土库曼斯坦。

总之，外国人是一些天真而无知的人，对于他们，俄国是一个谜。对于某些俄国人来说，它也是一个谜，而且是一个愚蠢的谜，不过，这些俄国人简直是丧失了对祖国之爱及其他的感情的人，他们是一些异教徒，而据那些具有豺狼般的爱国主义的人说，这是一些厚颜无耻的人，他们甚至不怜惜生身父亲的裸体，似乎因为裸体丑陋、肮脏时是令人厌恶的。

不过，笑话不要说了。问题在于，掠夺俄国的不只是俄国人自己，还有外国人，这就更加糟糕了，因为俄国的掠夺者带着他们掠夺来的东西最后还是留在俄国，而外国人却跑回自己国家去，靠了俄国人的马虎劲儿，在那儿用这些掠夺来的东西，充实自己的博物馆的和私人的收藏，也就是说，扩大自己国家文化珍宝的数量，这些珍宝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正如它们的审美和实践意义是不可估量的一样。它们不仅培养优美的情趣和爱美之心，不仅唤起对人的创造力的尊敬，而且还能激励人们创造新的东西、创造美的新形式的愿望并因此影响艺术工业的发展。随着社会条件不可避免的改变和民主派加入文化事业，艺术工业的教育作用将是巨大的，

它的发展也将是迅速的。

在这一方面,我们还将落在别人的后面慢慢地爬行,而我们的聪明人将会唉声叹气地表达为时已晚的、毫无意义的惋惜:

“当年我们俄国有多少好东西啊,那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都相当巨大呀!而现在可好,全都没有了!真遗憾,当年没有及时想到把它们收集起来,办个博物馆,不然的话,该有多么好呀!”

他们生上一会儿气,就又心平气和了。

但是,现在还来得及,还能够为俄国文化保留许多珍贵的和必需的东西。<sup>④</sup>

#### 注释:

① 克里斯丁亚那——奥斯陆的旧称(1624—1924年丹麦国王克里斯丁亚那四世命名)。

② 指1900年沙俄军队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屠杀北京平民的侵略行动。

③ 指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19世纪末,俄国积极扩大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在中国争得了中东铁路的修建权、旅顺和大连两块租界地及辽东半岛的铁路修建权。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扩大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满,遂爆发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战争以俄国失败告终。

④ 高尔基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文物,使之不流向国外。自二月革命后起,高尔基就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他曾领导工农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艺术问题委员会。十月革命后文物保护工作转由教育人民委员部负责。该部成立了文物管理专门委员会。1919年2月根据工商人民委员克拉辛的建议,高尔基在彼得格勒组织了鉴定艺术品的专家组。经专家确认的最珍贵的文物被送到艾尔米塔日(即冬宫)收藏,其他的则用于出口以换取国家急需的硬通货。

**《新生活报》，1917年11月俄历12日  
(公历25日)，第179期**

已经有人责备我，说我“在为民主派服务了25年之后”，“摘下了面具”并背叛了自己的人民。<sup>①</sup>

布尔什维克先生们有合法的权利随他们的心意评论我的行为，但是我应当提醒这些先生们，俄国人民的优秀的心灵品质从未使我陷入过盲目状态，我也不曾在民主派面前屈膝膜拜，对我来说民主派并不是根本不能批评和谴责的圣人。

1911年，我曾在《论自学成功的作家们》一文中说过：“应当揭露卑鄙肮脏的事情，如果我们的农夫是野兽，那就应当说出来，而如果工人说‘我是无产者’时用的是特权阶层的人的那种讨厌的腔调，也就是贵族用来说‘我是贵族’的腔调，如果这样，那就应当无情地嘲笑这位工人。”<sup>②</sup>

现在，相当一部分工人群众被他们的意志的毫无理智的统治者所鼓动，表现出特权阶层的精神和做法，并运用暴力和恐怖，而工人群众的优秀领袖、他们的有觉悟的同志很长时间极其英勇地进行斗争，反对的正是这种暴力和恐怖。如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自然不能再同工人阶级的这一部分为伍了。

我发现，《话语报》和其他资产阶级报纸被用拳头堵住嘴<sup>③</sup>，只是因为他们同民主派是敌对的。这种做法是民主派的耻辱。

难道民主派觉得自己的作为是不对的，所以惧怕敌人的批评？难道立宪民主党人在思想上就如此强大，只有用对身体施加暴力



的做法才能战胜他们？

剥夺出版自由——这就是对身体施加暴力，而这是与民主派不相称的。

把老革命家布尔采夫<sup>④</sup>这样一个曾经给君主制以不少有力打击的人关进了监狱，而把他关进监狱仅仅是因为他醉心于他的政党的清道夫的角色，这是民主派的耻辱。把卡尔塔舍夫<sup>⑤</sup>这样诚实的人，把贝尔纳茨基这样天才的工作者，把科诺瓦洛夫这样为自己的工人们做过不少好事的文化人士关在监狱里，这是民主派的耻辱。

用恐怖和蹂躏暴行吓唬那些不想参加托洛茨基在俄国的废墟上组织的舞会的人，是可耻的事，也是犯罪的事。

所有这一切都是不需要的，都只能加强对工人阶级的仇恨。工人阶级将因自己领袖的错误和罪行付出成千上万条生命和河流般的鲜血。

### 注释：

① 指两天前(1917年11月23日)刊登在《真理报》上的“路易·诺贝尔”工厂工人特卡琴科反驳高尔基《致民主派》一文(刊于1917年11月20日《新生活报》，见附录一中第9篇文章)的信。特卡琴科表示，在读完高尔基的文章后，他感到惊诧：“为人民生活了二十五年的”“人民作家”竟“突然脱离了我們”，“为科诺瓦洛夫们、贝尔纳茨基们、捷列宪科们感到痛苦”，“为浸透了撒旦毒汁的资产阶级新闻的黄金时代哭泣”，“炮制针对人民大老粗政府的可怕的文章”，而把人民描写成“毫无个性自由概念和人权概念”的愚昧的群众。特卡琴科还写道：“马克西姆·高尔基和形形色色的‘人民斗士’，谢谢你们及时抛掉了假面具，人民会给你们作出评价的。”

在这一段时间，《真理报》还发表过许多内容与特卡琴科的信相似的、指责高尔基的文章。

② 《论自学成功的作家们》写于1910年，发表于《当今世界》杂志1911

年第2期上,1914年经报刊审查机关删改后曾出单行本。

③《话语报》是1917年11月8日与其他资产阶级报纸一起被查封的。保皇派与反动派报纸在二月革命后就被查封了。11月8日公布了由列宁签署的《出版法令》,其中指出,“应当查封的只是有下列行为的报刊:1.号召抵抗和不服从工农政府;2.用明显歪曲事实的诋毁性手段制造混乱;3.号召从事明显犯罪性,即应受刑事处罚的活动……”

“此项规定是临时性的,俟社会生活之正常条件出现,将发特令废止。”

不久,《话语报》恢复出版,但后来又多次被查封并屡易其名(《我们的话语报》、《世纪报》、《我们的世纪报》)恢复出版。断断续续存在到1918年8月。

④弗拉基米尔·里沃维奇·布尔采夫(1862—1942)——《往事》杂志的编辑兼出版人,初倾向社会革命党人,后支持立宪民主党,他因成功地揭露沙俄警察的奸细而获得“诸政党的清洁工”之绰号。1917年7月因反对高尔基的“失败主义的”反战立场得到资产阶级报刊的支持。高尔基随即在《新生活报》上著文要求布氏澄清对他的诬蔑之词。1917年9月,布氏又在《俄罗斯意志报》上攻击高尔基,指责他倾向布尔什维主义。

在十月革命爆发的当天,布氏在《我们的共同事业报》上发表文章,呼吁支持临时政府,反对布尔什维克。当天夜间被捕,后流亡国外,继续编辑包括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人民社会主义者”在内的反布尔什维克统一战线的机关报《我们的共同事业报》。

⑤见本书第7篇注⑥。

**《新生活报》，俄历 1917 年 12 月 23 日  
(公历 1918 年 1 月 5 日)，第 209 期**

有人想逮捕伊拉克利·采列捷利这位天才的政治活动家，这位极为诚实的人。<sup>①</sup>

旧政府曾因采列捷利反对君主制、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而用苦役和肺结核来奖赏他。

现在，据说是以工人阶级名义并按全体无产阶级的意志行动的政府想用监禁来奖赏采列捷利，因为什么呢？我不知道。

我知道，采列捷利病得很危险，但是，自然，我不想以呼吁人们同情他的做法来污辱这位勇敢的人。而且我能向谁呼吁呢？尚未失去头脑的严肃而理智的人们现在感到自己置身于“荒原里，哦！并非无人的荒漠里”<sup>②</sup>。他们在煽起的激情的暴风雨中是无力的。操纵着生活的是处在不间断的“急躁和愤怒”状态中的人们。这种状态被法律认为是给罪犯以求得宽大处理的权利的理由之一，但是这毕竟还是“责任能力”状态。

“国内战争”，也就是民主派的互相残杀，是他们的敌人引以为快的事，这战争正是这些处于“急躁和愤怒”状态的人们策划和煽动的。如今，在被这些人的蛊惑人心的雄辩所迷惑的无产阶级看来，已经很清楚了：他们所企求的不是工人阶级的实际利益，而是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的胜利。

宗派主义者和狂热主义者们渐渐地煽动着在现实条件下不可能实现的愚昧群众的希望和本能，正在孤立着无产阶级的、真正社

会主义的、自觉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是在拧下工人阶级的头脑。

既然他们决心以全体工人阶级的命运为儿戏，他们怎么还能顾得上他们的一个优秀的老同志的命运，顾得上一个最诚实的社会主义的骑士的生命呢？

如同对于癫狂的阿瓦库姆<sup>③</sup>一样，对于他们，教条要高于人。

对于俄国民主派来说，这一切将如何结束呢，现在还有人正极顽强地努力使俄国的民主派失去自己的特性。

### 注释：

① 伊拉克利·格奥尔基耶维奇·采列捷利(1881—1959)——孟什维克，曾任临时政府邮电部长、内务部长，立宪会议中反苏维埃派的领袖之一。1917年12月31日被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下令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捍卫立宪会议联盟”的另外11名成员。人民委员会中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这一措施，他们的代表(其中有司法部长施泰因伯格)释放了被捕人员。稍后，采列捷利为高加索孟什维克政府的领袖人物之一。格鲁吉亚建立苏维埃政权后，采列捷利侨居国外。

高尔基关于采列捷利是“极为诚实的人”的评价引起了许多《真理报》撰稿人的激烈反对。他们称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是“不断扩展的对布尔什维克的起诉书”，说高尔基讲了“很多关于‘工人和士兵’没有文化、充满亚细亚习气的空话”，却“对当前俄国资产者们在希望什么、留恋什么、靠什么苟延残喘很不感兴趣”。

② 见《圣经·诗篇》第51章。

③ 阿瓦库姆·彼得罗维奇(1620或1621—1682)——俄国分裂教派的领袖、政论家、作家。因反对官方教会长期被流放与监禁，但终生不改变信仰，著有《行传》，后被沙皇下令烧死。

**《新生活报》，1918年1月俄历17日  
(公历30日)，第11期(总第225期)**

一切具有残酷性或冒失性的东西总是能找到影响无知者和野蛮人的感情的途径。

不久前，水兵热列兹尼亚科夫<sup>①</sup>将他的领袖们的丧失理性的讲话转换成一个普通群众中的憨直语言，他说：为了俄国人民的幸福可以杀死一百万人。

我并不认为这一声明是吹牛自夸，而且尽管我坚决不承认那些可以为大规模屠杀作的辩护，但是我想，在我国是会杀掉一百万“自由的公民”的。甚至还可能更多。为什么不杀呢？

罗斯的人很多，杀人凶手也相当多，但是当事情涉及到他们的审判时，人民委员会的政权就遇上了某些神秘的障碍，显然，他们在调查卑鄙地杀害申加辽夫和科科什金<sup>②</sup>的案件时就遇到了这种障碍。逐一杀害不同思想的人，这是历届俄国政府国内政策中已经验证的老方法。从伊凡雷帝<sup>③</sup>到尼古拉二世<sup>④</sup>，我们所有的政治领袖都随意而广泛地运用这种同叛逆作斗争的简单而方便的手段，弗拉基米尔·列宁又为什么应当放弃这种简单的手段呢？

他确实也没有放弃并公开声明，他会不择手段地将敌人消灭干净。<sup>⑤</sup>

但是我想，由于这一类声明，我们将得到一场全体民主派和工人阶级的优秀部分反对那种由斯莫尔尼宫的领袖们极为起劲培养的动物性无政府状态的、残酷而持久的斗争。

这就是将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口号简单化地转换成通俗语言给俄国带来的危险。

一位不知是准尉还是教授<sup>①</sup>的罗曼·佩特克维奇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您同布尔什维克的争论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您在反对向往复兴的民族精神。布尔什维主义表现出俄国精神的特点及这一精神的独一无二性。请注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东西！每个民族都在创造它特别的、个性化的、只为它自己所特有的社会斗争的手段和方法。法国人、意大利人、意大利人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英国人最倾向于工联主义，而德国人的军营式社会民主主义则最好不过地与他们的平庸相适应。

“我们，按照我们的伟大导师，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预言，是救世的民族，这一民族可望比所有其他民族走得更远并走在他们的最前面。正是我们的精神将把世界从历史的锁链中解放出来。”

如此等等，一派世界大战开始时曾甚嚣尘上的莫斯科新斯拉夫主义<sup>②</sup>的腔调。

俄国人无依无靠到了何等地步！

### 注释：

① 阿纳托里·格利高里耶维奇·热列兹尼亚科夫(1895—1919)——原为波罗的海舰队水兵，1917年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无政府主义者。十月革命武装起义前夕为海军革命委员会成员，曾率领水兵参加进攻冬宫，后为塔夫里切斯基宫卫队长。1918年1月19日奉苏维埃政府的命令封闭了拒绝承认苏维埃政府法令与和平政策的立宪会议。后来指挥过多瑙河船队，参加过反对乌克兰中央拉达和德奥干涉军的斗争，在战斗中受重伤而死。

② 安德烈·伊凡诺维奇·申加辽夫(1869—1918)原为医生，地方自治会活动家，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第二、三、四届国家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曾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财政部长，立宪会议代表。1917年12月11日在帕尼娜

伯爵夫人寓所参加立宪民主党中央会议时被捕。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科科什金(1871—1918)是莫斯科大学国家法副教授、政论家、立宪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兼中央委员、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临时政府中的国家检查员、立宪会议代表,与申加辽夫同时被捕,依据的是人民委员会关于将“反革命内战的领袖们”逮捕并送交法庭的法令。后两人因病被从彼得保罗要塞转移到乌林医院治疗。1918年1月19日夜被闯入医院的水兵杀死。

列宁获悉此事后下令“立刻”“开始最严格的侦讯”,“逮捕犯凶杀罪的水兵”。彼得格勒通过了“最严厉的谴责野蛮行径”的决议。《真理报》发表题为《对革命的犯罪》的文章,指出“这种行动败坏、瓦解、腐化群众,把整齐的革命队伍变成了乌合之众。”经过近五个月的侦讯,五名凶犯受到了革命法庭的惩罚。

③ 即伊凡四世(1530—1584),瓦西里三世之子,1553年继任莫斯科大公,1547年起自称俄国的沙皇,进行国务改革,加强了专制和中央集权制度,以酷政治国,被人们称作雷帝。

④ 尼古拉二世(1868—1918)——俄国末代皇帝,亚历山大三世之子,1894年即位,1917年二月革命中逊位。后根据乌拉尔州苏维埃的决定在叶卡捷琳堡被枪杀。

⑤ 自1918年1月起,列宁曾多次表示必须加强对付反革命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强盗、流氓、奸商的惩罚措施。

⑥ 俄文中准尉与教授两词在署名前缩写时都只保留前两个字母(np)。

⑦ 新斯拉夫主义——19世纪末俄国出现的一股民族主义思潮。

**《新生活报》，1918年3月公历17日  
(俄历4日)，第44期(总第259期)**

今天是“宽恕星期日”<sup>①</sup>。

以前，在这一天，人们按照古老的习俗，互相请求对方原谅相互间与人的荣誉和尊严相悖的罪孽。这已是在罗斯还存在良心时的事了；那时甚至不开化的、县里的俄国民众也在心里模模糊糊地感到一种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尽管他们对社会公正的理解可能很狭隘，但他们毕竟是有理解的。

在如今可怕的日子里，良心已经死亡。<sup>②</sup>大家还都记得，当年全体俄国的知识分子不管怪诞的党派区别，都对贝利斯不讲良心的审判<sup>③</sup>、对卑鄙地枪杀连纳工厂的工人<sup>④</sup>、对蹂躏犹太人的暴行和所谓全体犹太人无一例外地背叛了俄国的污蔑<sup>⑤</sup>表示了愤怒。因审判波洛甫涅夫、拉利奇金等杀害约洛斯、格尔岑施泰因的凶手<sup>⑥</sup>而引起的良心激愤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但是现在申加辽夫、科科什金这些无辜而正派的人被杀死了，可我们的当局却没有足够的力量和良心将杀人凶手交给法庭审判。

枪杀毫无过错的六名大学生这件卑鄙的事<sup>⑦</sup>在被摧毁的文化人圈子中也没有引起良心的波动。

塞瓦斯托波尔和叶夫帕托利亚在几十名几十名地杀死“资产阶级分子”，但却没有一个人敢于问“社会”革命的制造者：他们是不是大规模屠杀的精神鼓舞者？



良心死了。正义感被引到了瓜分物质利益的事情上去了,而这种“瓜分”的意义在一位穷人把杉木样子包上一层薄薄的烤面糊当作面包卖给另一名穷人的地方特别容易理解。半饥饿状态的穷人互相欺骗和抢掠,在今天到处都是这种事。工人阶级的暗藏敌人到时候就会把这一切,把造成一切污秽、流血、卑鄙和庸俗的罪过恰恰推到工人阶级身上,推到无力战胜变得野蛮了的群众的道德崩溃的知识分子头上。哪里政治太多,哪里就没有文化的位置,而如果政治渗透了对群众的恐惧和对群众的谄媚——就像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具有的主要缺点一样——那么谈论良心、正义、对人的尊敬及其他的一切就完全是毫无益处的,因为政治上的厚颜无耻把这一切都叫作“感伤主义”,但是没有这一切却是无法生活的。

### 注释:

① 东正教历大斋节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在这一天教徒们互相请求对方的宽恕,这一天是斯拉夫民族谢肉节的最后一天。

② 高尔基的这句话被《消息报》(1918年3月23日)的一位撰稿人用作一篇政治短评的标题。短评说,不久前高尔基只“在肆无忌惮的商人和专制制度的拥护者身上”看到“这种已经死亡的良心”,现在他在讲什么“无产阶级‘冒着恶气’了。是的,良心已经死亡,但不是在高尔基所说的那些人身上。请他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吧。”

③ 指审讯被诬告杀害儿童安德烈·尤辛斯基的门德尔·贝利斯(1873—1934)一事。侦讯历时两年,庭审持续了一个多月(1913年)。尽管黑帮分子、反犹太主义者、反动报刊做了大量歪曲事实真相的宣传,贝利斯仍被判无罪。以高尔基和柯罗连科为首的俄国民主力量及非法的布尔什维克报刊做了大量揭露审判中的不公正现象、为贝利斯伸冤的工作。

④ 指1912年4月17日沙皇军队向西伯利亚连纳金矿进行和平示威的罢工工人开枪的惨案。惨案中死270人,伤250人。

⑤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西部地区的犹太人被指责从事叛卖与间谍活动并因此被强行迁出边境地区。柯罗连科在1915年8月30日的《俄国消息报》上揭露这些迫害犹太人的罪行。同年,安德烈耶夫、高尔基、费·索洛古勃编辑出版了许多作家与社会活动家撰稿的、描写俄国犹太人生活与文化的文集《盾牌》。

⑥ 格奥尔基·鲍利索维奇·约洛斯和米哈伊尔·雅科夫列夫·格尔岑施泰因是黑帮反动势力的牺牲品。两人命运相似:同年(1859)出生,中学时是同学,后同为经济学家、立宪民主党党员、国家杜马议员,杜马被解散后都在维堡呼吁书上签过名。1907年3月27日,身为《俄国消息报》编辑的约洛斯在莫斯科被连他的姓名都不知道的工人杀害。策划凶杀的是极右组织“俄罗斯人民联盟”成员杜勃罗文和卡赞采夫。格尔岑施泰因教授在杜马中猛烈抨击政府的土地政策。1906年6月18日,他在杰里奥基被杀害。凶杀组织者是“俄罗斯人民联盟”成员波洛甫涅夫、尤什凯维奇等人。凶手之一亚·拉利奇金受到芬兰法庭的审判。两起凶杀案激起了公众的愤怒。

⑦ 1918年3月2日夜,六名大学生(加伊格尔三兄弟、施特罗宾杰尔、勃拉戈维辛斯基和伊林)在告别聚会(三兄弟即将去法国)时被怀疑从事非法活动并被一起逮捕,押往斯莫尔尼宫。次日晨,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区发现了他们的尸体。革命法庭组织的专案组经侦讯后宣布,枪杀是在未经审判、侦讯,没有任何负责人批准的情况下实行的。

**《新生活报》，1918年3月公历26日  
(俄历13日)，第51期(总第266期)**

在近日某些报纸上公布的政府的指令和措施中，我极为惊奇地读到了“共和国红色舰队水兵特别会议”<sup>①</sup>的夸夸其谈的声明，在这一声明中水兵们宣称：

“我们水兵们决定：如果杀害我们的优秀同志的行为还将继续下去的话，那么我们就将手持武器，奋起行动，对被杀死的我们的每一个同志，我们都将以千百个富人的死作为回答，这些富人（现在还）生活在明亮、豪华的宫殿里，组织反革命匪帮，反对劳动群众，反对那些在十月的日子里用自己的肩膀支撑住革命的工人、士兵、农民。”

这是什么呢，是义愤的吼声吗？

如果是的话，我就像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公民一样，有权问水兵公民们：

他们有什么材料可以证明，米亚斯尼科夫和扎贝洛死于“暴君们之手”？如果有这样的材料，为什么不将它们公布于众？

为什么政府认为应当把俄国革命的“光荣和骄傲”的威严的吼声列为自己的“措施和指令”？

难道政府同意水兵们所说的措施？

或者他们无力阻止这一作法？

说到底，莫不是政府自己向水兵们灌输了如此野蛮的肉体报复的思想？

我想,对最后一个问题,政府应当凭良心来回答,承认自己的罪责。

大家也许还记得,在一个捣蛋鬼或百无聊赖的懒汉用铅笔刀抠划了列宁乘坐的轿车车厢后,《真理报》把损坏车厢一事当成了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生命的谋害,它严厉声明:

“为了抵偿我们人的一条命,我们要资产阶级的一百条命。”<sup>②</sup>

看来,这种极不理智的和怯懦的算术对水兵们产生了应有的影响,现在他们已经不是要求用一百条命,而是用一千条命来抵偿一条命了。

俄国人的自我评价提高了。政府可以把这说成是它的贡献。

但是对于我,大概像对于一切尚未彻底丧失理智的人一样,水兵们的严厉声明不是正义的呼声,而是肆无忌惮,却又极为胆小的野兽的野蛮咆哮。我有话要直接对水兵们,即凶恶的声明的作者们说。

先生们,毫无疑问,你们这些武装人员可以不受惩罚地想打死和杀死多少“资产者”,就打死和杀死多少。在这一点上是不容怀疑的,你们的同志已经尝试过组织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群众性屠杀。他们在塞瓦斯托波尔、叶夫帕托利亚杀死了数百名文化人,而且宣称:

“干了——就干了,对我们的审判是不可能的。”

这些话听起来半是忏悔,半是威胁。水兵先生们,在这些话中我们看到君主制度的血腥专制精神的存在和胜利,你们摧毁了君主制度的外部形式,但是它的灵魂你们却不能消灭,看吧,这灵魂活在你们的心中,迫使你们失去了人的形象,而像野兽似的咆哮。

先生们,你们应当牢牢地记住,你们是用暴力和凶杀培养起来的,当你们说“对我们的审判是不可能的”时,你们并不是意识到你们有掌权的权利,而是因为你们知道:在君主制时期,谁也没有因群众性的杀戮而受到审判、受到惩罚;谁也没有因 1905 年 1 月 9

日杀死成千上万人<sup>③</sup>受到审判,因枪杀连纳工厂和兹拉托乌索夫工厂的工人们<sup>④</sup>而受到审判,因毒打你们的“奥恰科夫”同志<sup>⑤</sup>而受到审判,因那些使君主制时代大量的群众遭到杀戮而受到审判。

看吧,你们就是在这种不受惩罚的罪行的氛围中培养起来的,你们的吼声中就带有这种古老的血腥的叫嚣。

君主制时代的政府在杀害数以千计的水兵、工人、农民、士兵时,只证明了自己道义上的无能,与这种情况完全一样的是,红色舰队的水兵们以他们措辞严厉的声明承认,除了刺刀和子弹外,他们再没有任何为社会正义而奋斗的手段了。当然,杀人要比说服人简单得多,正如人们所看见的一样,这一简单的手段对用屠杀培养起来并受过屠杀训练的人们是很容易理解了。

我要问你们,水兵先生们:君主制的野兽心理和你们的心理有什么区别吗?保皇党人们真诚地相信,只有在将所有异样思想的人斩尽杀绝的情况下,才可能有俄国的幸福,你们也正是这样想,这样干的。

我再重复一遍:杀人要比说服人简单得多,然而不正是对人民施行的暴力摧毁了君主制政权吗?就靠你们私下里瓜分俄国的物质财富,俄国是不会变得更富有、更幸福的,你们也不会变得更好、更人道。生活的新形式要求精神的新内容,你们有能力创造这种崭新的精神吗?从你们的言行看,你们还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你们这些野蛮的俄国人是被旧政权腐蚀和折磨的人,旧政权把自己的可怕疾病和自己的毫无意义的专制主义全都接种在你们的肌肉和血液之中了。

但是,在你们像现在这样行动的同时,你们给了未来的反动派以抓住你们的把柄的权利,以及当面对你们说这种话的权利:在社会主义政府管理时期,当政权在你们手里的时候,你们同我们革命前一模一样,也在大规模地屠杀人民。

这样你们也就给了我们以杀死你们的权利。

水兵先生们！应当清醒了。应当努力做人。这很困难，但是必须这样。

### 注释：

① 指1918年3月18日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红海军和军事部所属海岸部队水兵特别会议决议》，决议是针对军事部所属海岸部队两任队长米亚斯尼科夫和扎贝洛及红海军征兵委员会主席贝列泽罗夫“死于暴君们的叛卖之手”一事的。

② 此处引用《真理报》1918年1月15日《当心！》一文的话与原文有出入，原话为“……我们的一颗人头，要用你们的一百颗人头来换”。这是对反革命分子谋杀列宁行动的回答。据1918年1月16日《真理报》载，1918年1月14日晚，列宁在开完群众大会回家的路上，“他的汽车遭到一个坏蛋从后面来的枪击。”当时与列宁同车的有列宁的妹妹玛·乌里扬诺娃和瑞典社会民主党书记普拉腾。但无人受伤。

③ 1905年1月9日（史称“血腥的星期日”），沙皇军队开枪射击和平请愿的彼得堡工人。约千余人被打死，二千多人被打伤。这一天成了1905年革命的开端。

④ 1903年3月26日，沙皇军队向兹拉托乌索夫的国营兵工厂罢工工人开枪，打死69人，打伤250人。

⑤ 指里海舰队的“奥恰科夫”巡洋舰的官兵，该舰人员参加了1905年塞瓦斯托波尔起义。起义失败后，身为“奥恰科夫”巡洋舰的“革命舰队司令”施密特中尉和其他起义领导人被枪决。

**《新生活报》，1918年公历4月4日  
(俄历3月22日)，第59期(总第274期)**

我针对一群水兵关于他们准备对手无寸铁的无辜者进行大规模屠杀的声明所写的短文<sup>①</sup>引来了这群人的同伙的几封信，这些形形色色的恬不知耻的人和毫无理性的人在信中最可怕的惩罚恐吓我。

这是愚蠢的，因为用威胁迫使我沉默是不可能的，而且不管怎样威胁我，我始终会说，畜生就是畜生，白痴就是白痴，用凶杀、暴力及类似手段不可能获得社会正义的胜利。

但是，这里有一封信我认为必须公布的，这是对我的短文的唯一的合乎人性的反应。

“读了《新生活报》第51期(总第266期)上您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一文，我愿意相信，您远不认为所有的穿水兵大衣的人都是疯狂的野兽。但是请问，当我遇见您或随便那一位同意您关于水兵们的意见和看法的穿便服的人时，应该怎么办？这里说的不仅是我，而且还有千百名现在和我一起生活在愚昧的圈子里的人，我非常了解他们，我知道，他们的脑子和我的脑子一样，从来不曾想过杀人，甚至从来不曾想过胡闹。我们怎样才能问心无愧呢，我们也穿着水兵大衣呀。

“读着您的文章，我感到痛心，不只是因为自己，而且还因为我的那些无辜地被钉在社会舆论的耻辱柱上的同伴们。我和他们在一起生活，我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他们，我知道他们是一些不起眼

的、然而诚实的劳动者，他们的思想不会说出来让大众评论的，因此我请求您说出您的关于他们的响亮而亲切的话，因为我和他们本来是不应有这种痛苦的。

水兵：签名模糊不清  
克琅施塔德，今年3月27日”

显然，我根本不想指责所有的水兵，说他们都喜好兽性的凶杀。不，我指的只是那些因在塞瓦斯托波尔、叶夫帕托利亚杀人以及杀害申加辽夫和科科什金<sup>②</sup>而出名的人，我指的只是那群撰写并签署了那份公布在《政府命令和措施》中的著名的毫无理智的声明的人。

我不否认，在俄国甚至在职业窃贼和杀手中，有许多“有良心的”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人抢了或者杀了别人，可是后来他的“灵魂忧伤起来”，良心上过不去了。许许多多善良的俄国人常以这种“灵魂的忧伤”自慰，他们觉得，绵软的良心的自责是精神健康的标志，但是更确切地说，这只是一一些人病态的无意志力的标志，这些人在杀人前赞叹野花的朴素的美，他们一身能兼二职：真诚的革命者和同样真诚的奸细，这种事当年在我国太多了。<sup>③</sup>

我想，我们、水兵和文学家、“资产者”和无产者都同样无意志力和怯懦，这丝毫不妨碍我们成为极端残酷的肉体上和道德上的折磨者。为了证实这一悲惨的真理，我建议读者们把街头私刑的心理和报纸上的“论战”手法进行比较，读者们一定能看到，在这两种情况下，即在报纸上和在街头，人们都同样的盲目和疯狂，他们的主要目的和最高享受就是尽可能疼痛和残忍地给别人以“迎头”的或者触及灵魂的打击。

这是这样一种人的心理：这种人始终无法忘记，56年前他们是奴隶，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用树枝抽打，他们生活在一个大规模劫掠和凶杀可能发生而又不受惩罚的国家里，在这个国家里，



人一钱不值，一钱不值。

哪里没有对人的尊重，哪里就很少有能够尊重自己的人出生，出生了也活不长久。

而这种尊重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形形色色的小野兽在《真理报》上唆使无产阶级攻击知识分子。狡滑的小潮虫们在《我们的共同事业报》<sup>④</sup>上唆使知识分子攻击无产阶级。这就叫作“阶级斗争”，虽然知识分子已经被绝妙地无产阶级化了，并且准备和无产阶级一起饿死。不要怠工吗？但是知识分子的道德感情不能允许他同把一群水兵的著名的威胁及类似的丑恶行为列入自己的“措施和命令”的政府一起工作。不管布尔什维主义的哲人们关于知识分子们的怠工说些什么，说得多么雄辩，事实是，俄国革命正在因为缺少理智的力量而死亡。在这场革命中，病态的恼怒的感情太多了，文明而有教养的、有文化的理智却不足。

现在，布尔什维克们终于想起来了，而且在号召理智的力量和他们一起共同工作。这已经晚了，但毕竟不是坏事。<sup>⑤</sup>

不过，也许将要开始的是一种高利贷式的交易，在这种交易中，一些人要求得到的很多，另一些人则慢慢地退让，而国家将愈加厉害地被毁坏，人民将愈加严重地被腐化。

#### 注释：

① 见第 31 篇注①。

② 见第 29 篇注②。

③ 见第 4 篇及其注①、②、③。

④ 见第 27 篇注④。

⑤ 在高尔基写这篇文章前后，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转到苏维埃政权一边。但是布尔什维克想同知识分子合作的愿望在十月革命的最初日子里就

曾表达过,例如,1917年11月11日教育人民委员在题为《致俄国知识分子》的公开信中就号召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新生活报》，1918年公历5月3日  
(俄历4月20日)，第82期(总第297期)**

日前，一些该死的聪明人宣判一名17岁的青年人从事17年的社会劳动，仅仅是因为这位少年坦白而诚实地表示：“我不承认苏维埃政权！”

不用说，在俄国不承认委员政权的权威的人可以找出千百万个，要把这些人全都杀死是不可能的，我认为有益的是提醒严厉但不聪明的法官们想一想，这个被他们如此荒谬而严酷审判的诚实青年是从哪儿来的。

这位青年完完全全是一些正直、无畏的人的化身，这些正直、无畏的人几十年间生活在警察监视、特务横行、叛卖频繁的环境中，不知疲倦地摧毁着君主制阴暗的监狱，他们冒着对自身自由和生命的危险，把自由、权利、社会主义思想带到愚昧的工农群众当中。这位青年是那些被敌人逮住，关在监狱里时奄奄一息，但在受审问时却出于对胜利的敌人的蔑视而拒绝同宪兵谈话的人的精神后代。

这位青年是以那些优秀的俄国人为崇高榜样培养出来的，那些优秀的俄国人数以千计、数以万计地死于流放、监禁、苦役，现在我们就是要在他们的尸骨上建设一个新俄国。

这是一位罗曼蒂克的理想主义者，他从心里厌恶暴力和欺骗的“现实的政治”、教条的狂热信徒们的政治。这些教条的狂热信徒由于他们自己的觉悟程度而被滑头和骗子们包围着。

为了在俄国生活的卑劣条件下培养出英勇而诚实的青年，需要付出巨大的精神力量，需要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的紧张工作。

这种工作就是为那些审判诚实青年的人而做的，但是现在这些人不懂得，诚实的敌人要比卑鄙的朋友好得多，给英勇的青年判了刑，只是因为他如同应当做的那样，不能也不想承认践踏自由的政权。有一则非常有道理的关于百年老橡树下的猪的寓言<sup>①</sup>，可能聪明绝顶的法官们会抽出时间来读它一遍？他们必须了解这一则寓言的寓意。

伊·德·希金<sup>②</sup>，一个不久前庆祝了从事书籍出版事业 50 周年的人，在莫斯科被捕了。对于俄国农村，他是一个比德·托尔斯泰伯爵<sup>③</sup>及沙皇的其他大臣还要能干和有益得多的国民教育大臣。毋庸置疑，希金出版的数以亿计的年历和传单使俄国的文盲率起码减少了一半。他一生力图将俄国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力量吸引到自己的工作中来，至于他想要“提高”希金版图书的真诚愿望受到过知识分子的误解，那也不是他的过错。不管怎么说，他毕竟吸引了列·尼·托尔斯泰、安·帕·契诃夫、尼·亚·鲁巴金<sup>④</sup>、瓦赫捷罗夫<sup>⑤</sup>、克柳热夫、亚·米·卡尔梅科娃<sup>⑥</sup>这些人和另外几十个人来关心和帮助他的事业。他创办了“媒介”图书出版社，他为哈尔科夫识字委员会提出了出版颇有意义的多卷本《农业百科全书》的想法。自学成才的伊凡·希金在 50 年中完成了具有无可辩驳的文化意义的巨大工作。人们都清楚，如果是在法国、在英国、在“资产阶级的”国家，希金就会被承认为天才人物，在他死后，人们还会给他这位人民的朋友和启蒙家立一座纪念碑。

在“社会主义的”俄国，在“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希金被关进了监狱，而且在这之前就已毁坏了他那技术上组织得非常好的伟大事业，使老人家破了产。当然，对于苏维埃政权来说，如果把希金这位书籍出版活动的优秀组织者吸引来参加恢复瘫痪了的图书事业，那要聪明和有益得多，然而人们并没有想到这一点，反倒认

为必须用监禁来奖赏他的毕生劳动。极端的俄国式的愚蠢就是这样用古怪的想法和荒诞的事情遮盖着通向国家复兴的大道和小径；苏维埃政权就是这样把自己的精力耗费在煽动恶意、仇恨和幸灾乐祸的感情上，这种做法无论是对政权自身，还是对整个国家都是毫无意义和极端有害的，社会主义的死敌正是怀着幸灾乐祸的感情在庆祝苏维埃政权的每一个不正确的措施、每一个错误以及它的一切自觉的和不自觉的罪孽。

### 注释：

① 指俄国作家克雷洛夫的寓言《橡树下的猪》，寓言中讲一头猪在百年老橡树下饱餐了橡实后，开始大肆用嘴和蹄拱刨树根，当有人向它指出，橡树将因此枯死时，猪回答说：“即使永远没有这橡树，我也毫不感到遗憾，只要有橡实就行了，我只靠吃橡实长膘。”

② 伊凡·德米特里耶维奇·希金(1851—1934)——著名的俄国出版家，1876年起从事出版工作，为俄国文化教育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其出版社是本世纪初俄国最大的出版社。1917年1月，俄国社会各界曾隆重庆祝希金从事图书出版工作50年。1918年4月，希金无辜被捕。高尔基曾长期与希金合作，对他评价很高。希金被捕后曾写信向高尔基求救（“我寄希望于您的仁慈并相信，您不认为我是罪犯”），但此信被扣押。高尔基闻讯后立即著文为希金辩护。在这篇文章发表当日，希金获释并立即致函高尔基：“最亲爱的阿历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我流着眼泪给您写这些字，从彼得格勒传来的关于您为我的情况写文章的消息在我心中引起强烈的、刻骨铭心的喜悦。仅因同您的友谊，上帝就给了我多少幸福和欢乐呀。”后希金将其出版社与印刷厂交给了苏维埃政府，并一直忘我地工作到20年代中期。

③ 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托尔斯泰(1823—1889)——保守的俄国国务活动家，1865年起任东正教事务管理总局局长，1866—1880年间兼任国民教育大臣，1882年任内务大臣、宪兵司令和彼得堡科学院院长。

④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鲁巴金(1862—1946)——图书学家、作家。专门从读者心理角度研究图书宣传和阅读指导问题，曾长期参加希金及其他

人的出版机构的领导工作。

⑤ 瓦西里·波尔菲利耶维奇·瓦赫捷罗夫(1853—1924)——教育家、政论作家、小学教学法专家,他编写的多种课本在希金的出版社出版,并连续15年再版,印数甚大。著有《普通教学法》、《全民的学校和校外教育》等书。十月革命后曾先后在红军中从事扫盲工作和在莫斯科第二大学教育系任教。

⑥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卡尔梅科娃(1849—1926)——民粹派分子、女教师、社会活动家、出版家。19世纪70年代曾参加创办哈尔科夫女子星期日学校和出版《人民应当读什么》一书。1885年移居彼得堡后从事图书出版发行工作,与希金关系密切,参加编辑合法马克思主义杂志《新言论》和《开端》,主管小说栏,并与“劳动解放社”、“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成员,尤其与列宁有密切联系,曾为出版《火星报》、《曙光》杂志等提供经济援助。十月革命后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系统工作。

**《新生活报》，1918年5月公历14日  
(俄历1日)，第89期(总第304期)**

苏维埃政权又关闭了几家与它敌对的报纸。<sup>①</sup>

说这种同敌人斗争的方法是不光荣的，那毫无用处。提醒人们说，在君主制时期正派的人们一致认为查封报社是卑鄙的事，那也毫无用处。因为关于光荣和不光荣的概念显然在政权的管辖范围和兴趣之外，现政权毫不理智地相信，它能够在旧的基础上，即在专横和暴力之上建立新的国家制度。

但是委员们治国安邦的新行动引起了这样一些想法，而且是并不新鲜的想法。

消灭令人不快的公开性刊物不会产生政权所希望的现实后果，用这种胆怯的行动阻止不住敌视委员先生们和敌视革命的情绪的发展。

委员先生们在很有气魄地屠杀，并不区分谁只不过是他们的非理性行为的敌人，而谁是整个革命的原则上的敌人。他们在卡住前一类人的喉咙时，削弱了革命的民主派的声音、诚实和真理的声音；他们在堵住第二类人的嘴时，在敌人的圈子里造就出一些殉难者。

他们用殉难者的光环来装扮正在生长的反动派，他们用一股新的动力来加强这些反动派，同时为未来的卑鄙行径制造辩护，那种卑鄙行径不仅仅反对全体民主派，而且主要地反对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将首先为自己的领袖们的愚蠢行为和错误付出代价，而

且比任何人付出的都更加昂贵。

因此委员先生们在消灭言论自由的同时并不能以此来为自己获取好处,反倒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害处。

他们害怕什么,畏惧什么?这些现实的政治家看起来似乎有能力正确估量创造生活的力量的意义,难道他们以为言论的力量能够被他们机械地消灭吗?他们这些富有地下活动经验的人们不能不知道,被禁止的言论会获得特殊的说服力。

说到底,难道他们对自己的信心已经丧失到这种程度,以致公开地、放声讲话的敌人都使他们害怕,所以他们就企图堵住他的嘴,那怕稍稍堵住一点也好了吗?

被迫害的思想,即使是反动的思想,也会获得某种高尚的色彩,激起人们的同情。

给言论以自由吧,尽可能多的自由,因为当敌人说出很多话的时候,他们最终是会说出蠢话的,而这是非常有益的。

#### 注释:

① 1918年5月10日—13日,出版事务人民委员部关闭了莫斯科与彼得格勒的数家报纸——立宪民主党的《我们的世纪报》、《当代言论报》,社会革命党的《土地与自由报》,孟什维克的《新光报》,近十家报纸被罚款。除《真理报》和《红报》外,彼得格勒的所有晚报都被查封。革命法庭审查了每一家被查封的报纸。出版事务人员委员沃洛达斯基声称:“苏维埃政府将同报刊作斗争,直到它把报刊改造过来并迫使它们提供善意的消息时为止。”他还说:“我们现在还容忍资产阶级报刊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胜利。但是,当我们将来在《红报》上声明‘我们胜利了’的时候,那就连一家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准存在了。”



**《新生活报》，1917年11月俄历11日  
(公历24日)，第178期**

俄国著名的苏丹部落问题研究者雍克尔<sup>①</sup>说：

“可怜的野人们惊恐地避开人肉，而达到了较高文化水平的民族却堕落到吃人的地步。”

我们俄国人无疑达到了“较高文化水平”，关于这一点，我们力图吞噬掉政治上仇视我们的种族的贪欲就是最好的证明。

几乎从革命最初的日子起，一部分尽人皆知的报刊带着野蛮部族食人者的疯狂扑向民主派，开始日复一日地折磨士兵、农民、工人的头脑，拼命地表明他们热衷于“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们缺乏爱国的感情，缺乏对俄国命运负有个人责任的感觉，表现他们能干一切凡人的罪孽的能力。谁也不会否认，人民的懒惰、不识大体、社会迟钝感等等人们常指责他们的特性，是痛苦的真实，但是正确的是，“对是对，可话却不能这样说”。而且应该记住，一般说来，人民不能比他们实际上的样子更好，因为很少有人关心让人民变得更好这件事。

极端虚弱的、歇斯底里的火气取代了我们“神圣的愤怒”，使用了全部污辱人的词语，而且毫不顾忌这些词语不可避免地会在被谴责的人们心中激起的后果。

看起来，那些著名报刊的“有文化”的领导人应该懂得，对民主派的疯狂诋毁对冒险家们来说是多么好的帮助呀，这种诋毁给了那些竭力想把握群众心理的蛊惑家们以多么好的帮助呀。

英明的政治家们的头脑里并不曾有过如此简单的考虑，如果说如今我们在自己面前看见一些完全丧失了人的面目的人们，那么那些企图通过用语言攻击和鞭笞向人们灌输文明的感情和思想的可敬的公民们理应承担一半的罪责。

说这些话已经为时过晚了吗？不，不晚。报刊的喉咙不会被如此可耻地利用旧的扼杀言论自由的方法<sup>②</sup>的政权长久卡住的。报纸很快就又会说话的。当然，他们将应该说出我们大家必须知道并引以为耻、引以为训的全部情况。

但是如果我们穿着破旧的无能的愤怒和狠毒的复仇的法衣，互相装腔作势，还将继续做激起邪恶的因素和愚昧的感情的的工作，那么我们就应事先承认，我们在把对人民因投向他们的污辱所做出的一切反应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恼怒是必然的，但是把恼怒变得不这样可憎却是由我们决定的。甚至在拳击打架中也有它自己的礼节规矩。我知道，在神圣的罗斯谈论尊敬敌人的骑士风度是可笑的，但是我想，赋予我们极度虚弱的愤怒以较体面的话语形式将是非常有益的。

让每一个人都给自己的敌人以变得比他更坏的权力吧，那样我们的话语战斗就会获得更大的力量，更强的说服力，甚至更多的美。

坦率地讲，我想说的是：

“请你们在这些全面兽性化的日子里变得更人道一些吧！”

但是，我知道，没有一颗心能容得下这些话。既然这样，那就在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觉时做得有分寸一点，克制一点；不应该忘掉，归根结底人民在向我们学习凶狠和仇恨……

#### 注释：

①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雍克尔(1840—1892)——俄国旅行家，非洲学家。曾到过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埃及，并两次考察非洲中部地区。

② 见第27篇注③。

**《新生活报》，1918年3月公历16日  
(俄历3日)，第43期(总第258期)**

我们知识分子的相当一部分在按照德国人的指导研究俄国民间创作的同时，很快走到了斯拉夫主义<sup>①</sup>、泛斯拉夫主义、“救世主义”上，并用俄国独特的有害思想传染了另一部分思考的人，这些思考的人按欧洲的方式思考，按俄国的方式感觉，这导致了他们对用奴役、酗酒、教会的黑暗的迷信培养起来的、同知识分子的美好理想格格不入的“人民”的感伤的半崇拜态度。

俄国人民由于其历史发展条件的原由，是一个对国家建设丧失兴趣的巨大的虚弱的躯体，它几乎对能够使坚毅行动变得崇高的思想的影响无动于衷；俄国知识分子是一颗因大量的他人的思想而病态膨胀的头颅，将它同躯体联在一起的不是愿望和目的相统一的坚固的脊柱，而是一丝勉强可辨的纤细的神经纤维。

莫斯科人民被残酷的现实折磨得麻木了，他们嗜酒成性，具有令人厌恶的忍耐性，而且独特地狡猾，他们以前和现在一直都和极富书本知识但对俄国现实知之甚少的俄国知识分子在心理方面从根本上格格不入。躯体紧紧地靠在大地上，而头颅却高高地长向天空。众所周知，远处的一切看上去似乎都比近处要好。

当然，我们正在进行一次社会革命的试验，这是一项使美好的社会革命思想的狂热信徒很感欣慰、对骗子们非常有利的活动。大家知道，在我们独特的革命中喊得最响亮，被人们由衷地热烈接受的口号之一就是：“去抢那些抢来的东西！”<sup>②</sup>

人们在掠夺,而且令人吃惊,极其出色。毫无疑问,历史将怀着巨大的激情来讲述罗斯的这一自我掠夺过程。

人们在掠夺和出卖教堂、军事博物馆的东西,出卖大炮和步枪,肆意盗窃后勤贮备,掠夺过去的大公们的宫殿,偷盗一切可以窃走的东西,出卖一切可以卖的东西。在菲奥陀西亚,士兵们甚至在贩卖人口:他们从高加索运来土耳其女人、亚美尼亚女人、库尔德女人,将她们以 25 卢布一个人的价格卖掉。这是非常“独特的”,我们可以引为骄傲,因为类似的情况甚至在法国大革命时代也从未发生过。

诚实的人在我国一向是很少的,现在几乎完全绝迹了。不久前,我听到了这样一种邀请:

“同志,请到我们这儿来吧,不然,我们这里除了三名工人外,连一个诚实的人也没有!”

但是正是这些虚弱的、愚昧的、从骨子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人民现在被呼唤来充当世界的精神向导,充当欧洲的救主。

看起来,这一可笑而令人感伤的思想不应当搅乱人民委员们的可悲的表演。但是,“人民领袖们”并不掩饰他们的打算:用俄国潮湿的劈柴燃起一堆篝火,用其火花照亮西方世界,照亮那个社会创造之火正燃得比我们罗斯这儿更加明亮、更加理智的世界。

篝火燃着了,但是火却并不旺,弄得罗斯到处弥漫着肮脏、酗酒和残忍的乌烟瘴气。人们连推带拉地把这个不幸的罗斯带上各各他<sup>④</sup>,以便为拯救世界而将它钉死在十字架上。难道这不是一百马力的“本民族优胜论”吗?

但是西方世界严厉而毫不轻信,它毫无感伤主义。在这个世界里,对人评价的事非常简单:您爱工作吗,会工作吗?如果是这样,您就是世界所必需的人,您就是用自己的力量创造一切珍贵的和美好的东西的人。您不爱工作吗,不会工作吗?那么尽管您有一切别的品质,而且不管这些品质多么美好,您在世界工场中仍是

一个多余的人，这就是全部道理。

但是，因为俄国人不爱工作，又不会工作，而西欧世界非常了解他们的这一特点，所以我们将非常糟糕，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加糟糕……

我们的革命为以前在君主制的铅封顶盖下蓄积的恶劣的兽性的本能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同时，革命又把一切民主派的理性力量和我国的全部道德力量从自己身边扔到一旁。我们看见，在苏维埃的职员中常常会揪出一些受贿者、投机倒把者、骗子，而诚实的、善于工作的人们为了不饿死，就在街头卖报，从事体力劳动，扩大着失业人群的数量。

这真是一场噩梦，这是纯粹的俄国的荒诞，毫不为过地说，这是愚蠢的胡闹！

一切现实的条件都强烈地要求民主派必须团结起来，每一位有理智的人都明白，只有民主派的团结才能拯救革命，使它免于灭亡，帮助它压倒内部的敌人并同外部的敌人斗争。但是苏维埃政权不懂这一点，尽管它完全在忙于拯救自己的工作，以便躲过它的不可避免的灭亡。

它在把自己的目光投向遥远未来的时候，忘记了未来是用当前创建出来的。在当前，俄国的工人阶级被瓦解了，正在内讧的残杀中被屠杀；工业被彻底摧毁了；国家被损伤得体无完肤，交给兽性本能的人们，任凭他们去抢掠。

政权在同兽性本能的人们的斗争中是软弱的，不管它“无意中”杀死多少无辜的人。

只要政权不下决心把俄国民主派的全部理性力量吸引到建设生活的事业中来，它在同兽性本能的人们的斗争中就将一直是软弱的。

## 注释：

① 斯拉夫主义是 19 世纪中期形成的一种有重要影响的俄国社会思潮。其代表人物有基列耶夫兄弟、霍米亚科夫、小阿克萨科夫兄弟、科舍列夫、尤·萨马林等。他们反对西欧主义，主张不同于西欧的、俄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并认为这一道路表现为宗法制、村社农业和东正教。而“唯一真正的基督教”——东正教决定了俄国人民特别的历史使命。由此发展出俄罗斯民族的“救世主义”思想。作家老阿克萨科夫、达里、阿·奥斯特罗夫斯基、丘特切夫、亚齐科夫，历史学家费·布斯拉耶夫，语言学家分伊·斯列兹涅夫斯基等人都部分地赞同斯拉夫主义。19 世纪 60 年代，在斯拉夫主义影响下，形成了文学社会流派“根基派”（阿·格里高利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斯特拉霍夫等），其主要思想为：“民族根基”是俄国社会与精神发展的基础。

19 世纪 70—80 年代，斯拉夫主义中的保守成分被后期斯拉夫主义者达尼列夫斯基、康·列昂节夫等人按民族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即各斯拉夫民族团结到俄国沙皇的领导之下的思想）的精神加以发展。高尔基曾指出，后期斯拉夫主义者的目的是“踩灭俄国社会革命的所有火星”。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斯拉夫主义的思想对弗·索洛维耶夫、贝尔佳耶夫、谢·布尔加科夫、弗洛连斯基等人的宗教哲学观点产生了重大影响。

② 见第 10 篇注①。

③ 各各他——《圣经》传说中的耶稣殉难地。

**《新生活报》，1918年5月公历26日  
(俄历13日)，第100期(总第315期)**

在从各地寄给我的几十封信中，最有意义的是那些妇女们写的信。这些信谈的是对急风暴雨式的活动的印象，这些信充满了忧伤、气愤和愤怒；但是这些信中的无能为力和消极冷漠感却比男子们写的信中少，妇女们的每一封信都是被严酷的日子中形形色色的折磨摧残着的心灵的呼喊。

在读完这些信后，你会从心里觉得，这些信好像出自同一个女人的手笔，这女人就是生命之母，世界上的所有部落和民族都来自她的腹中，正是她生育了古往今来的所有天才，正是她帮助男子把动物粗野的兽性欲求改造成了温柔而崇高的缠绵爱情。这些信是赋予生活以诗意，一直在鼓动艺术，而且永远是对美、爱、欢乐的不倦地渴求而痛苦的人的愤怒呼喊。

女人在我的想象中首先是母亲，尽管她在生理上可能还是姑娘；她是母亲，这不仅是因为对自己子女的感情，而且还因为她对丈夫、恋人的感情，总之，是因对她生的人和她爱过的人的感情。女人是不断地弥补死亡和破坏给生活带来的损失的尤物，她对一切加强死亡和破坏的工作的东西应当比我这个男子怀有更加深刻、更加强烈的仇恨和厌恶。在我看来，女人的心理和生理应当如此。

“理想主义！”

也许是的。但是，如果这是理想主义，那它也是出于那些化入

我的内心的信念，显然，这些信念也是我的身心的基础。不管怎么说，这些想法我不是昨天才臆想出来的，从青年时代起我就有这些想法，但是即使这些想法对我来说是昨天才产生的，那我也并不感到难堪，因为我认为，正是在革命时代才最为需要社会理想主义。我这里指的当然是那种健康的、使感情变得崇高的理想主义，没有这样的社会理想主义，革命就会失去它那使人变得比革命前更具有社会觉悟的力量，它就会失去为自己辩护的道义的和审美的理由。由于没有这种社会理想主义的参与，革命乃至整个生活都在变成一道简单的分配物质利益的算术题。为解答这道题，需要的是盲目的残酷，是血流成河，是鼓动起兽性的本能，把人的社会精神消灭殆尽，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一样。

我说的那些信充满了母亲因人们的死亡而发出的悲号，因残忍在人间增长而发出的悲号，因人们变得越来越野蛮、卑鄙、无耻而发出的悲号，因神经以可怕的速度变得粗野而发出的悲号。这些信充满了对布尔什维克们、农民们、工人们的诅咒，女人呼唤所有的麻烦、灾难和恐怖都落到他们的头上。

“吊死他们，杀绝他们，消灭他们。”这就是女人兼母亲所要求的，这女人兼母亲是所有英雄和圣人、天才和罪犯、卑鄙之徒和诚实君子的母亲，是基督以及犹大的母亲和保姆，是伊凡雷帝和无耻的马基雅维利<sup>①</sup>的母亲，是温顺可爱的圣人方济各<sup>②</sup>的母亲，是忧郁的快乐之敌萨伏那洛拉<sup>③</sup>的母亲，是国王菲利浦二世<sup>④</sup>的母亲。菲利浦平生只快活地笑过一次，那就是在他听到有关圣巴托罗缪之夜的成就，即有关凯塞琳·美第奇<sup>⑤</sup>的最大的罪行的消息时。这位凯塞琳·美第奇也是女人所生，也是母亲，而且也按她自己的方式真诚地关心着许多人的幸福。

女人兼母亲是男子的优秀品质的召唤者，是男子赞赏的对象，是生命和诗的源泉，她在否定残忍，从心里仇恨死亡和破坏的同时，呼喊：



“杀死，吊死，枪毙……”

这里有一个可怕而令人悲观的矛盾，它能够从根本上消灭掉历史加在女子头上的光环。也许，这一矛盾的基础在于女子没有意识到自己伟大的文化作用？在于她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创造力量，而过分地受了革命日子的混乱在她那母亲的心灵中激起的绝望情绪的影响？

我不准备分析这一问题，但是我认为可以指出下面这一点：

你们妇女们非常清楚，分娩总是伴随着痛苦，新人是在血泊中诞生的。这是盲目的大自然的恶毒嘲弄。你们在分娩的时刻像野兽般地喊叫，而当把新生儿紧紧抱在胸前时却幸福地露出圣母般的微笑。

我不能因为你们那野兽般的喊叫而责备你们，我理解引起这种难以忍受的痛感的苦难，我自己也几乎因这种苦难而奄奄一息，尽管我并不是女人。

因此我全心全意地希望你们尽快地把俄国的新生的人紧紧地抱在自己胸前，露出圣母般的微笑！

你们妇女们能够加速痛苦的分娩过程，你们能够减少国家正在经受的可怕的痛苦，为此你们需要记起，你们是母亲，在你们的心中有取之不竭的强大的爱的力量。不要听从生活的恶毒唆使，要站得比现实更高。这需要有力量，你们会找到这种力量的，如今，在俄国你们比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更加自由。是什么在妨碍你们表现你们的优秀品质，表现你们的母亲的本性呢？

应该想到，革命不只是一系列残酷的事和罪行，它同时还是一系列英勇、光荣、忘我、无私的功勋。你们没看见这些吗？但是，也许你们只是因为被仇恨和敌意蒙住了眼睛才没有看见吧？

然而，如果你们仔细地观察一番之后，在如今的动乱和暴风雨中仍然找不到丝毫光明和令人振奋的东西，那么就请你们自己来创造光明和善的事物吧！你们是自由的，你们是有力的，因为你们

的爱是那样美好，你们能够迫使我们男子变得更像人，更像孩子。

19世纪的40年国内战争在法国引起了令人厌恶的道德的粗野化，使洋洋自得的残忍得到了发展，回想一下当年朱莉·列卡米叶<sup>④</sup>对整个国家的净化意义吧。这种妇女影响人类感情与观点的发展的例子你们可以想起数十个。你们，妇女们在爱人方面则应该没有节制，而在恨人方面应当有所克制。

你们说布尔什维克吗？请想一想吧，他们和我们大家一样都是人，他们也是女人所生，他们身上的兽性并不比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多。他们中的优秀分子是出类拔萃的人，将来俄国历史将以他们作为自己的骄傲，而你们的子孙们则将赞美他们的干劲。他们的作为应当受到毫不留情的批评，甚至尖刻的嘲笑，布尔什维克们将得到的这种批评和嘲笑会比他们所应得到的还多。包围他们的是令人窒息的敌人的仇恨氛围，而且，更糟糕的，对他们来说更加致命的是有些人的虚伪的、卑鄙的友谊，这些人像狐狸一样拼命地争夺政权，像狼一样使用政权，但愿他们会像狗一样死掉！

我在保护布尔什维克吗？不，我是在按我自己的理解程度反对他们。我是在保护这样一些人，我了解这些人信仰的真挚，他们个人的诚实我是非常清楚的，就像我了解他们真诚地希望人民幸福一样。我知道，他们正在拿活生生的俄国的躯体做残酷的科学试验，我会仇恨，但我更想做到处事公正。

噢，是的，他们犯了许多非常粗野的、可悲的错误。上帝把我们大家造得比应当的愚还愚，他也犯了错误。从我们的和大自然的目的性或和大自然的无目的性所相反的愿望的观点看，大自然在许多方面也犯了错误。不过，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关于布尔什维克也可以说一些好话。我想说，布尔什维克在不知道他们的政治活动从心理上将我们最终引向什么样结果的情况下，已经为俄国人民立了大功，他们推动人民群众脱离了僵死的静止状态，在人民群众中唤起了对现实的积极态度，没有这种态度我们的国家就灭

亡了。

现在它不会灭亡了，因为人民苏醒过来了，在人民之中新的力量正在成熟，对于新的力量来说，无论是过分地幻想化的政治革新家们的疯狂，还是过分地相信自己不可战胜的外国强盗们的贪婪都不可怕。<sup>①</sup>

罗斯不会灭亡，如果你们这些母亲们怀着牺牲精神把你们心灵中一切最美好的和温柔的东西注入到当今的血腥而肮脏的混乱之中去的话。

不要再仇恨和蔑视地喊叫，而要怀着爱心呼喊。难道你们这些忍受着痛苦生育子女的人不懂得对人的同情所具有的惊人的力量吗！你们拥有一切使人温和、使人具有人性的本领，在母亲的心中，太阳般的温暖永远要比男子的心中多。你们只记得这些可诅咒的男子——布尔什维克们在摧毁旧制度的腐朽宫殿的工作中变得野蛮、粗俗的样子，你们也想想他们还是新生婴儿时的样子，那时他们也像所有的婴儿一样，也需要有人给他们擦鼻涕，他们也像所有的婴儿一样是弱小无力的。可以说，难道会有什么人不因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而感激你们吗？

你们，母亲们，应当想到你们的爱给生活注入的一切，这必定会使你们摆脱掉仇恨的痛苦压迫，而仇恨是消灭母性这一最伟大的感情的东西。

难道你们尝试过——尝试一下吧——缓解尖锐的斗争的残忍性吗？难道你们尝试过重建道德，使唤起你们的义愤的那些关系变得高尚些吗？你们醉心于对成年人的毫无成果的仇恨，然而也许更加有益和更加值得做的是防止青少年受到当代腐蚀性的影响。你们把自己的注意力和感情用在搜集那些确实腐蚀人并引起对人的厌恶的事实上，如果你们去寻找，或者试着用自己的力量去创造那些使人在他的和你们的眼中变得高尚的现象不是更好吗？

你们在肉体上是人类的母亲，你们也能够成为人类的精神上

的母亲,因为,既然你们在批评别人,那就是说,你们正站在一个可以让你们看得比别人更多的高度上。请把其他人也提高到这一高度上来吧!

俄国正在可怕的分娩时的痛苦中抽搐、挣扎,你们是否希望一个新的、美好的、善良的、美丽的、人性的产儿快些诞生呀?

请允许我告诉你们,母亲们:恼怒和仇恨是两个坏接生婆。<sup>⑧</sup>

### 注释:

① 马基雅维利(1469—1527)——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著有《君主论》(1513)等学术著作,其文学作品《金驴记》、《曼陀罗花》(1518)等展示了当时意大利的社会生活和人物。他主张为了国家的巩固,可以不择手段。

② 方济各(1181或1182—1226)——又译“法兰西斯”。意大利传教士,方济各会的创始人,著有宗教诗歌作品。

③ 萨伏那洛拉(1452—1498)——佛罗伦萨多明我会隐修院院长。反对美第奇的暴政,揭露教廷;号召教会实行苦行主义,谴责人文主义文化(主张焚毁艺术作品)。为建立共和制作过贡献。1497年被革除教籍,并被隐修院院方处死。

④ 菲利浦二世(1527—1598)——西班牙国王(1559年即位),当时西欧天主教封建保守势力的领袖,拥护宗教裁判制度,曾进行反对英、法的战争,吞并葡萄牙。

⑤ 凯塞琳·美第奇(1519—1589)——1547年起为法国王后,亨利二世之妻,在其子查理九世执政时于巴黎策划被称作圣巴托罗缪之夜(1572年8月24日凌晨)的天主教徒对新教胡格诺派教徒的大屠杀。

⑥ 朱莉·列卡米叶(1777—1849)——法国复辟与七月王朝时代著名文学沙龙的女主人,该沙龙的常客有作家夏多布里昂、贡斯当、拉马丁、斯塔尔夫夫人等。

⑦ 即使在对革命前途极为忧虑的时候,高尔基也一直坚信生活的新原则必将胜利。1918年1月13日(俄历1917年12月31日),高尔基在《新生

活报》上向读者祝贺新年时写道：“在这些充满可怕的矛盾的日子里，一个新的俄罗斯正在诞生。在摧毁旧的生活形式的嘈杂声中，在肮脏军营的断墙颓壁之间，新的俄罗斯正在痛苦地娩出，而三百年来人民就是在这肮脏的军营中艰难喘息的，这军营把人民培养得委琐凶狠，毫无才能。我们积蓄在最可恶的王朝封盖下的全部下流与庸俗统统爆发出来，在这场肮脏火山的喷发中，旧式的俄国人、自爱自怜的懒汉和幻想家正在死去，勇敢而健康的劳动者、新生活的建设者应当来接替他的位置……新的人正由新的生存环境创造出来，新的环境正在创造新的人。”

⑧ 本文发表后高尔基收到了许多读者，尤其是妇女读者的来信。这里仅摘录三位女读者的来信，以供参考。

其一：“我个人看，这里有罪的不只是布尔什维克，原因要更深得多地到我们俄国的糟糕的教育中去找。”

其二：“我非常赞同您关于女人就是母亲的概念，我想对您说，我非常感谢您的理想主义，但是在读到妇女要求把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绞死、枪毙、消灭时，我就从心灵深处感到荒唐和痛苦。我不是布尔什维克，但这种要求毕竟同与其说喜爱仇恨，不如说喜爱宽恕的妇女的善良的心无缘……我不相信这种要求，我只是觉得，这是饱经生活折磨的母亲们的哀号……”

其三：“布尔什维克们、社会主义者们断送了、盗空了、毁坏了祖国，这就像母亲失去了婴儿一样。因此俄国妇女不能不恨布尔什维克。而您却说什么布尔什维克们也曾经是婴儿，他们也是人……”

**《新生活报》，1917年俄历11月19日  
(公历12月2日)，第185期**

《真理报》上印有这样一段话：

“高尔基在用工人阶级敌人的语言讲话。”<sup>①</sup>

这不是真的。我要对工人阶级的最有觉悟的代表们这样说：

狂热分子们和轻浮的幻想家们在工人群众中唤起了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实现的希望，把俄国无产阶级引向毁灭和死亡，而无产阶级的毁灭将在俄国引起长期的、黑暗的反动。

《真理报》接着写道：

“一切革命在其发展进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许多反面现象。这些反面现象不可避免地与旧的千年国家制度的瓦解连在一起。年轻的巨人在创造新生活时，用自己筋肉发达的双手触及了别人破旧的幸福，于是恰恰是高尔基写到的那些小市民们，就开始大叫俄罗斯国家和文化的灭亡了。”

我不能认为，像在冬宫<sup>②</sup>、加特契纳宫<sup>③</sup>及其他宫殿里盗窃国家财产的事实是“不可避免的”。我不明白，毁坏莫斯科小剧院和在我们的著名女演员玛·尼·叶尔莫洛娃<sup>④</sup>的化妆间里进行偷窃同“千年国家制度的瓦解”又有什么联系？

我不想列举众所周知的毫无意义的洗劫和抢掠的行动，我要说的是，对于这种流氓们所干的耻辱之事的責任正落在显然无力消灭自己圈子里的流氓行为的无产阶级身上。

《真理报》还说：“年轻的巨人们在创造新生活的时候”，把书籍

的印刷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因为排字工们只能完成出版者协会规定的很低的工作量的 38%。

无产阶级在有 1.5 亿文盲的乡村人口的俄国中从数量上讲，是一支很弱的力量，它应当明白，对于它来说，降低书价和扩大书籍印刷是多么重要的事。可悲的是它不明白这一点。

它还应该明白，它是坐在刺刀尖上的，而大家都知道，这可不是很牢固的宝座。

总的来说，“反面现象”很多，而正面现象又在哪儿呢？真看不见什么正面现象，如果不算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那些“法令”的话，不过我怀疑无产阶级曾自觉地参加了这些“法令”的创作。不，如果无产阶级充分自觉对待这种书面的创作，那它们就不可能是现在这种样子。

《真理报》的那篇文章是以下面这样一个抒情性问题结束的：

“当在各国人民光辉的节日里，昔日的奴役制度的敌人怀着共同的兄弟激情汇集在一起时，在这全世界的宴席上，当初如此匆忙地离开真正的革命民主派队伍的高尔基还将会是大家盼望的客人吗？”

当然，无论是文章作者，还是我，都活不到“光辉的节日”，我们离那节日太远了，为了缔造这一节日，需要做几十年的顽强而持久的文化工作。

但是在那半文盲群众的专制主义像有史以来一样欢庆自己轻而易举的胜利的节日里，人的个性仍像过去一样，将是受压制的，在这样的“节日”里我无事可做，而且对我来说，这也不是节日。

不管政权在谁的手中，我都保留我的批判地对待它的人的权利。

而且我特别怀疑地、特别不相信地对待俄国的执政者——这不久前的奴隶在他获得了充任别人的主宰的可能性之后，就变成了最肆无忌惮的专制者。

## 注释：

① 指《真理报》1917年11月30日发表的伊里亚·约诺夫的文章《致马克西姆·高尔基（敌方营垒的歌手）》。此文是对高尔基《请工人们注意》一文（《新生活报》1917年11月23日，见附录一第10篇）的答复。约诺夫在文章中简单化地批评高尔基反对十月革命的立场，他说：“在形形色色的革命掘墓人的大合唱中，又添了一条嗓子，大作家高尔基的嗓子……”

② 冬宫——位于彼得堡。俄国巴洛克建筑古迹，建造于1754—1764年，原为沙皇宫殿，宫殿内部与正面装饰极为豪华。1917年7月起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十月革命中被起义工人与士兵攻占，1918年起改作艾尔米塔日艺术博物馆。

③ 加特契纳宫——位于彼得堡附近的小城加特契纳的沙皇宫殿，建于18世纪。

④ 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叶尔莫洛娃（1853—1928）——俄国著名女演员，1871年起在莫斯科小剧院演出，是俄国杰出的悲剧演员。



《新生活报》，1917年12月俄历6日  
(公历19日)，第194期

工人阶级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才造就了自己的知识分子——小倍倍尔<sup>①</sup>们，他们扮演了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他们的物质和精神利益的真挚的表达者的角色。

即使在警察国家的艰难条件下，工人知识分子们都能奋不顾身，每日每时冒着失去自由的危险，光荣地、卓有成效地为自己的思想的胜利而奋斗，坚定地将光明的社会自我意识引进到愚昧的工人群众之中，为他们指出通向自由和文明的道路。

有朝一日，历史的准确公正的声音会向全世界说明，在90年代初到战争开始前的时间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是极其巨大，极其英勇，极其成功的。

该死的战争消灭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工人，用那些“为了卫国”和逃避兵役而来做工的人取代了他们在机床边的位置。这些人都是同无产阶级的心理格格不入的，他们政治上没有觉悟，没有无产阶级创造新文化的自然愿望，萦绕他们心头的是尽快地、不顾一切地构筑他们自己安乐窝的小市民的心愿。这是一些从本质上不能接受纯洁的社会主义思想，也不能将其体现在生活中的人。

就这样，未被战争和内讧残杀所消灭的幸存的工人知识分子处在了一群心理异己者的紧密包围之中，这些心理异己者说着无产阶级的语言，但是却不会像无产阶级一样感受事物，他们的情绪、愿望和行为使工人阶级优秀的上层注定承受耻辱，遭到消灭。

这些愚昧群众的极易受刺激的本能找到了他们动物性无政府主义的表达者。正如我们所看见的，这些造反的小市民的领袖们正在贯彻的是蒲鲁东的贫瘠的思想，而不是马克思的思想，他们发展的是布加乔夫习气，而不是社会主义，他们还宣传全面向道德和物质的贫困看齐。

说这些话令人感到难过和痛苦，但是又必须说，因为正是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将要为与他们格格不入的力量犯下的罪孽负责。

不久前，一个地方工厂委员会的代表们对厂长说到自己的工人：

“我们感到惊奇，您怎么能同这群疯狂的土匪搞好关系的！”

有一些工厂的工人已经开始拆卸和盗卖机器的铜部件，许多事实证明，在工人群众中存在着最野蛮的无政府状态。我知道，也有另外一种性质的现象。比如说，有一家工厂的工人们用自己的工资买了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但是这类事实屈指可数，而与此性质相反的事实却有成百上千个。

“新”工人是同工业格格不入的人，是不懂得工业对我们老百姓的文化意义的人。我相信，有觉悟的工人是不会赞同逮捕索菲娅·弗拉基米罗夫娜·帕尼娜<sup>②</sup>之类的事实的。在利戈夫卡她的“人民之家”里，正像在由她帮助建成的尼热哥罗德市的“人民之家”<sup>③</sup>里一样，千百名无产者曾学习过思考和感受。这位知识渊博的人的整个一生都献给了工人文化活动。可她这会儿正在坐牢。屠格涅夫早就指出过，感激之情从来不会同善事相逢，而我这里说的还不是感激之情，我是说，应当善于珍视有益的劳动。

工人的知识分子应当具有这种本领。

前部长亚·伊·科诺瓦洛夫是一位无可指责的诚实的人，他在他位于维丘格的工厂里建造的“人民之家”堪称同类建筑的样板。科诺瓦洛夫正被关在监狱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荒诞的逮捕的责任将使工人阶级良心有愧。

大量的形形色色的骗子、昔日保安部门的奴才和冒险家们被拉入到所谓的“表达革命的无产阶级意志的”人士之中。具有浪漫情绪、但头脑糊涂的卢纳察尔斯基把声名狼藉的作家亚辛斯基<sup>④</sup>当作诗人强加给无产阶级。这意味着玷污工人阶级的旗帜，腐蚀无产阶级。

有人想把立宪民主党人赶出立宪会议。且不说我国居民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正是希望由立宪民主党在立宪会议上表达他们的意见和他们的意志，所以驱逐立宪党人是强奸数以十万计的人的意志。且不说这一耻辱，我只想指出，立宪民主党团结着我国最有文化的人们，团结着脑力劳动的所有领域的最好的劳动者。有聪明而坚定的敌人和自己作对是最为有益的：好的敌人能培养自己的对手，使他变得更聪明、更强大。

工人知识分子们应该懂得这一点。而且——我再说一遍——他们应该记住，现在所干的一切都是以他们的名义干的，历史将对他们、对他们的理智和良心做出自己严厉的审判。不能总是只讲政治，还应当保留少许良心和别的人性的感情。

### 注释：

① 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始人及领导人之一，曾多次被选为国会议员，激烈反对帝国主义与战争，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积极争取妇女解放。曾因支持巴黎公社、抨击德国政府的殖民政策被指控犯有叛国罪。

② 索·弗·帕尼娜，见第7篇注②。

③ 人民之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俄国由地方自治会或市议会、扫盲团体、个人建造的，以文化教育为目的的大众俱乐部。在彼得堡的利戈夫卡的人民之家是帕尼娜出资修建的，1903年开始活动。尼热哥罗德市的人民之家是在高尔基的直接参加下由当地知识分子建造的，高尔基吸收了夏里亚宾、莫罗佐夫、帕尼娜、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人担任该人民之家的股东。

在这些人民之家里有图书馆、阅览室,经常组织面向大众的音乐会,举行群众集会,开展革命宣传。

④ 伊·伊·亚辛斯基(笔名为马克西姆·别林斯基,1850—1931)——俄国作家。19世纪70—80年代为民主派作家,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为保守派报刊撰稿,曾发表维护沙皇专制的长篇小说,编辑《每月文丛》(1901—1902)、《新言论》(1908—1914)等杂志。十月革命后支持苏维埃政权,参加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工作。所著回忆录《我的生平故事》(1926)被高尔基称作“文理不通”、“庸俗”、“夸夸其谈”、“卑鄙凶狠”“到惊人程度的书”。

**《新生活报》，1917年12月俄历10日  
(公历23日)，第198期**

不久前，有人指责我说，我“投靠了德国人”，“在出卖俄国”<sup>①</sup>，现在又有人指责我说，我“投靠了立宪民主党人”并且“正在背叛工人阶级的事业”<sup>②</sup>。

这些指责对我毫无触动，并不使我感到不安，但却使我对指责者的道德感情、对他们的社会自我意识产生了不愉快的和不太中听的想法。

请你们听着，先生们，你们是否以太轻易地互相抛掷这些肮脏的有关叛卖、变节、道德动摇的指责？要知道，如果相信你们的话，那么整个俄国住的就只是一些整日处心积虑要出卖它，只想着互相叛卖的人了！

我明白，革命运动中大量存在的奸细和冒险分子会在你们之中培养起互相不信任和干脆对人不信任的自然感情；我明白，就连非常健康的人也会被这一耻辱的事实用极端怀疑的疼痛加以伤害。

然而，当你们毫无顾忌地互相指责叛卖、变节、自私、虚伪的时候，你们显然把俄国想象成了一个住满不诚实和卑鄙的人的国家，可你们也是俄国人啊。

正如你们所看见的，这太可笑了，但是更重要的是，这太危险了，因为那些玩这一肮脏游戏的人会渐渐地、不知不觉地使自己相信，整个罗斯确实确实是一个不诚实的和卖身投靠的人们的国家，

所以“我们并不算太坏”！

请你们想一想吧，我们的革命一会儿是用日本人的钱，一会儿是用德国人的钱搞起来的，反革命是用立宪民主党和英国人的钱在搞，可我们俄国的无私精神在哪儿呢？我们光荣的良心、我们的理想主义、我们关于高尚的自由斗士的英雄传奇、我们的堂·吉珂德精神和俄国人民所有的其他优秀品质——被俄国口头的和书面的文学大加赞颂的这一切又在哪儿呢？

这一切都是谎言吗？

你们要明白，在互相指责卑鄙的同时，你们在指责你们自己，指责全民族。

当你读指责者的信函时，你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位奥廖尔农民的话：

“我们全村人都酗酒，只有一个正人君子，可他还是一个傻瓜。”

同时你还会想起黑帮分子的《俄罗斯旗帜报》<sup>④</sup>指责《话语报》同芬兰人或爱斯基摩人的金钱有关时，我在工人中看到过的那种表达得漂亮的合乎道理的愤怒：

“对恶棍没什么可说的，他们说的是他们所能想出来的最卑鄙的东西！”

我觉得，我写得相当通俗易懂，有头脑的工人不应该指责我“背叛无产阶级事业”。我认为，工人阶级是我们愚昧的农夫国家的一支强大的文化力量，所以我全心全意地希望俄国工人能得到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发展。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工业是文化的基础之一，为了拯救国家，并使它欧洲化，就必须发展工业，工厂的工人不仅是一支有形的力量，而且是一支精神的力量，不仅是他人意志的执行者，而且是将自己的意志、自己的理智体现于生活之中的人。他不太像农民那样受制于自然的自发力量，农民的艰苦劳动是看不见的，无法传世的。农民所生产出的一切都被他卖掉和吃

光，他的精力完全被土地所吞没，而工人的劳动却存留在大地上，美化着大地并且促使自然力进一步服从于人的利益。

这种劳动活动的区别从根本上决定了农民的心灵与工人的心灵间的差别，所以我把有觉悟的工人看作是民主派中的贵族。

民主派中的贵族——这就是工人在我们的农夫国家中的角色，这就是工人应当有的自我感觉。遗憾的是，他暂时没有这种感觉。很清楚，我对工人阶级在俄国文化发展中的作用评价是非常高的，而且我也没有根据改变这一评价。此外，我热爱工人，我感到我和工人血肉相联，我热爱并尊敬工人的伟大劳动。说到底吧，我热爱俄国。

人民委员们轻蔑地冷笑说，噢，当然！但是这并不能刺伤我。是的，我痛苦不安地爱着俄国，爱着俄国人民。

我们俄国人、我们的人民还没有自由地工作过，还没来得及发展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本领，所以当想到革命将给我们以自由工作、全面创造的可能性时，即使在那些可诅咒的鲜血和酒浆横流的日子，我的心中也充满了巨大的希望和喜悦。

我同人民委员们毫无理智的活动的分歧的界线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认为，思想的最高纲领主义对于俄国人不健康的心灵是非常有益的，它能够在俄国人的心灵中培养出伟大而勇敢的需求，唤起早就必需的行为能力、积极性，在这疲软的心灵中发展主动精神，总之，规范和激活这一心灵。

但是斯莫尔尼宫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和幻想家们的实践的最高纲领主义对俄国，首先对俄国工人阶级是极其有害的。

人民委员们对待俄国就像对待试验用的材料一样，在他们看来，俄国人民是一匹细菌学家们为使马的血液中产生抗伤寒血清而为之接种伤寒病菌的马。委员们拿俄国人民做的正是这样一个残酷的和事先注定要不成功的试验，他们没有想到，受尽折磨的、

处于半饥饿状态的马可能死掉。

斯莫尔尼宫的改革家们顾不上俄国，他们冷漠地要把它变成他们关于全世界的革命梦或欧洲革命梦的牺牲品。

在俄国生活的当代条件下没有社会革命的位置，因为不可能异想天开地把占国家人口 85% 的农民——其中还有几千万的异族游牧民——变成社会主义者。

由于这一极为疯狂的试验，首先受害的是工人阶级，因为他们是革命的先进队伍，所以他们将首先在内战中被杀死。而一旦工人阶级被粉碎、被消灭了，那就意味着国家的优秀力量和希望被消灭了。

所以我要向意识到自己在国家里的文化作用的工人们呼吁：有政治觉悟的无产者应该深刻反省自己对人民委员们的政府的态度，应该非常谨慎地对待他们的社会创造。

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人民委员们正在破坏和毁灭俄国的工人阶级，他们可怕而荒谬地在把工人运动复杂化。他们把工人运动引出了理智的界限，给无产阶级的全部未来工作和国家的整个进步事业制造了极其艰难的条件。

因为我这种关于试验家们和幻想家们的“政府”的意见，人们将怎样称呼我，我都无所谓，但是工人阶级和俄国的命运对我来说却不是无所谓的。

只要我还有可能，我就会对俄国无产者说：

“人家在把你们引向死亡，在把你们当作无人性的试验材料使用，在你们的领袖们的眼中你们仍然不是人！”<sup>①</sup>

#### 注释：

① 指布尔采夫对高尔基的攻击。见第 27 篇注④。

② 见第 38 篇注①。



③ 黑帮分子的周报,“俄罗斯人民联盟”的机关报,1905年起在彼得堡出版,1917年3月被彼得格勒苏维埃查禁。

④ 针对高尔基的这篇文章及这一时期写的其他文章,《真理报》于1918年1月20日发表署名“来自人民的知识分子”的文章说:“历史的客观发展对政治与社会革命可能性与适当性问题的看法同高尔基不一样。……社会革命首先意味着把十分之九的俄国人从十分之一人口的政治与经济压迫下解放出来。”

《新生活报》，1918年俄历1月13日  
(公历26日)，第9期(总第223期)

“毋需争论，战争在我们革命的发展中起了巨大作用。战争从物质上使专制政体解体了，引起了军队的瓦解，使大批市民变得大胆了。但是算我们有福气，战争并没有制造出革命，幸亏这样，因为战争制造的革命是无力的革命。它产生在特殊条件的基础上，依靠的是外部力量，所以归根结底是不能守住已占领的阵地的。”

这些聪明的、甚至预言式的话是托洛茨基<sup>①</sup>在1905年说的，我是从他的《我们的革命》一书中摘出来的，这些话赫然印在该书的第5页上。从那时起，已经过了不少时间，现在的托洛茨基大概是不这样想了，不管怎么说，他大概已不敢再讲什么“战争制造的革命是无力的革命”了。

但是这些话并没有失去其意义和正确性，当前事件的发展极为有力地证明了这些话中所包含的真理。

1914—1917年的战争把政权交到了无产阶级的手中，确实是交到了无产阶级的手中，谁也不能说，是无产阶级自己用自己的力量夺取了政权。政权之所以落在无产阶级的手中，是因为沙皇的捍卫者、被三年的战争所残酷折磨的士兵们拒绝保卫罗曼诺夫<sup>②</sup>的利益，而在1906年士兵们却杀戮革命的无产阶级，积极地捍卫罗曼诺夫的利益。必须记住，革命是由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士兵们开始的，而当这些士兵脱下军大衣，散到农村中去时，无产阶级就将陷入对他们来说很不舒服的孤立之中。

要求重新变成农民的士兵们把无产者的理想主义当作他们自己的宗教加以接受并要求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农村生活中推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幼稚而可笑的。

农夫在战争期间、士兵在革命期间都积攒了一些钱财，因为他们都知道，在罗斯最能保证人的自由的是金钱。要想摧毁这一信念，或者哪怕是动摇这一信念都是很困难的。

应当记住，在1905年无产阶级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比现在强大，而且那时工业还没有被从根本上毁坏掉。

如果无产阶级不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社会创造，而服从自己的领袖，去从根本上消灭“资本家的”技术组织——而他们本应掌握这些组织的机制并监督其工作的——那么战争制造的革命将不可避免地变成软弱无力的。<sup>③</sup>

如果无产阶级服从人民委员们狂热的不可调和性，去不断地加深它同民主派的分裂，那么革命将会因其内部的衰竭而死亡。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不是阶级利己主义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的优秀导师马克思、考茨基等人把将所有的人从社会和经济奴役中解放出来的任务寄托在无产阶级正直的力量身上。

社会理想主义这一所有的人都互相和睦相处的伟大理想在推动着全世界的生活。无产阶级在对自己的思想上的敌人施加暴力时，是否想到自己正是在实现这一理想呢？社会斗争并不像俄国工人的惊恐的领袖们教导他们的那样是血腥的斗殴。

革命是伟大的、诚实的事业，是我们的复兴所必需的事业，而不是毁坏民族财富的无意义的劫掠。如果我们不把我们心灵里最美好的东西倾注到革命中去，如果我们不消灭，或者甚至不减少那些使群众忘形并败坏俄国工人革命者的残酷、凶狠，那么革命将会是无力的并将会死亡。

## 注释：

① 列夫·托洛茨基(原姓为勃隆斯泰因,1879—1910)在1905年革命时任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高尔基引的这段话出自托洛茨基论俄国1905年革命的著作《我们的革命》(1906),在这段话后,托洛茨基接着说:“在战前(指日俄战争前)我们的革命就其所有组成部分而言已经是现成的了……战争把革命行动推迟了几乎半年,帮助了革命的聚集。战争加速了落后阶层的革命动员过程。但它决没有用人为了的压力加快积极的革命行动。相反……”

② 指尼古拉二世,他的家族姓罗曼诺夫,自1613年起成为统治俄国的王朝。

③ 指对待旧有的科技协会及学会,首先是对待“发展和传播精密科学自由协会”的态度。

**《新生活报》，俄历 1918 年 1 月 19 日  
(公历 2 月 1 日)，第 13 期(总第 227 期)**

任何一个政府，不管它怎样称呼自己，都力求不仅要“把握”人民群众的意志，而且要根据自己的原则和目的来培养这一意志。最蛊惑人心的和最机灵的政府通常都用“我们表达人民的意志”的话来掩饰自己把握人民意志和培养这一意志的企图。

当然，这不是真诚的话，因为归根结底政府的理智力量将压倒群众的本能，如果统治机关无法做到这一点，它们就将使用武力来压制与它们的目的相敌对的人民意志。

不管是用事先在办公室里想好的决议，还是用刺刀和子弹，反正政府总是必然力图控制群众的意志，使人民确信，政府正引导他们沿着最正确的道路走向幸福。

这一政策是任何一个政府不可避免地必须做的，因为既然它相信自己是人民的理智，它就需要用自己的立场向人民灌输这一信念：他们拥有一个最聪明、最诚实、最真诚地忠于人民利益的政府。

人民委员们追求的正是这一目标，他们毫不犹豫地，像任何一个政府一样毫不犹豫地枪毙、杀死和逮捕与它意见不同的人们，毫不犹豫地对敌人肆意诋毁和造谣。

但是从根本上很不理解“俄国的自发力量”的人民委员们在培养对自己的信任时，根本没有考虑到将近四年的战争的毫无结果的折磨造成了一种可怕的心理氛围，由于这一心理氛围，“俄国的自发势力”，即俄国群众的心理变得更加阴暗、尖刻和凶狠。

人民委员先生们根本不懂这一事实：当他们呼喊“社会”革命的口号时，身心备受折磨的人民用自己的语言把这些口号翻译成下面几个简单的词：

“攻击，抢夺，毁坏……”

于是，罕见的俄国农业文化的巢穴正在被毁坏，罗斯的城市、葡萄园、果园，甚至灌溉系统正在被毁坏，到处都在毁坏，一切都在毁坏。

当人民委员们在过分雄辩和惊慌失措地叫喊必须同“资产者”斗争时，愚昧的群众把这种叫喊理解成直截了当的杀人号召，而且他们也证明了这一点。

说到人民委员“不懂”他们歇斯底里的关于反革命正在积聚力量的嚎叫在人民中唤起了怎样的回音，我是有意识地在做假设，这种假设多少能够说明他们疯狂的行为方式，但我决不是为他们辩护。既然他们钻到了“政府”里，他们就应当知道，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指挥谁。

人民疲惫不堪，受尽折磨，苦不堪言，充满了复仇、凶狠、仇视的感情，这些感情仍在继续增长，并根据自己的力量在组织人民的意志。

人民委员先生们是否认为自己的使命是表达这种病态意志的破坏意图？或者他们认为自己能够使这一意志康复并加以组织呢？他们是否有力和自由到足以完成这第二种工作，迫切而必需的工作的程度？

他们理应以正直人的直截了当和斩钉截铁的态度把这一问题提到自己面前。但是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们能够把这一问题交给他们的理智和良心审查。

他们被澎湃汹涌的俄国自发势力所包围，成了理智上和道义上的瞎子，现在他们就已经是被过去折磨得精疲力竭的、被他们自己激怒的野兽利爪中的软弱无力的猎物了。

**《新生活报》，1918年3月公历21日  
(俄历8日)，第47期(总第262期)**

米·纳杰日金公民在《红报》<sup>①</sup>上质问我：

“请问，在农奴制时代，当成百上千的农夫被往死里鞭笞时，可曾有过良心？……又是谁的良心？”<sup>②</sup>

是的，在那令人诅咒的时代，在对人进行体罚的制度流行的同时，美丽的良心之火燃烧起来并照亮了俄国生活的窒闷的黑暗。米·纳杰日金大概记得拉季谢夫和普希金、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等一大批天才的俄国人的名字，这些人创造了他们的极其独特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之所以被称为极其独特的，是因为它们完完全全、彻里彻外是讲良心问题、社会正义问题的。正是这些文学作品培养了我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革命精神，俄国工人能有自己的社会理想主义应当归功于这些文学作品的影响。

因此“良心”并不只是像米·纳杰日金所说的那样，是“用棍棒和皮鞭”“打进去”的，而是存在于人民的心灵之中，就像托尔斯泰们、屠格涅夫们、格里高罗维奇<sup>③</sup>们及其他许多人说的一样，这些人是应该相信的，因为他们了解人民，而且以自己的方式热爱人民，甚至有些美化和夸大他们的优点。

显然，纳杰日金公民也爱自己的人民，那是一种所有俄国爱民者特有的带点感伤和讨好的爱。如今在我国这种爱更进一步被毫无顾忌的和令人讨厌的蛊惑宣传所败坏了。

纳杰日金指责我说：

“正是对于您这位来自民间的人民导师，阿历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把这样的指责堆压到自己的弟兄们身上是不可饶恕的。”

我有权利说出有关人民的令人生气和痛苦的真实情况，而且我坚信，如果第一个说出这些实情的是我，而不是人民的敌人，那对人民要好得多，现在人民的敌人在默默地积蓄着报复和凶恶的感情，以便在他们方便的时刻将这些恶意向人民的脸上，就像1905年和1906年后他们所做的那样。<sup>④</sup>

不要以为只因人民受过折磨，他们就是神圣和道德高尚的了，甚至在基督教传播的最初几百年里，就有过许多出于愚蠢而受折磨的大殉道者。同时，也不应闭眼不看这样的事实：当“人民”获得了对人身施行暴力的权利后，他们变成了不比他们昔日的折磨者逊色的兽性的和残酷的折磨者。

米·纳杰日金的推论方法把他引进了一个无出路的怪圈。因为人民受过折磨，所以现在他们也有权折磨别人。但是要知道，他们这样做就授人以用痛苦对付痛苦、用暴力对付暴力向他们报复的权利。怎样才能走出这一怪圈呢？

不，我们最好还是说实情，实情是有益健康的，只有实情才能治好我们的病。

那些看见自己同村的邻人挨饿，又不把粮食卖给他们，却因有利可图而用粮食酿酒的人不是好人民。不应当夸奖做出如下决议的人民：任何一个不在自己村里，而在邻村出卖某种食品的同村人都应被逮捕起来并被关押三个月。

不，我们要直截了当地说：布尔什维克的蛊惑宣传激化了农夫的自私本能，扼杀了他们的社会良心的萌芽。

我明白，《红报》、《真理报》和其他相同的货色听到这些话是不舒服的，现在，当布尔什维主义逐渐地向右打舵，力图依靠“乡村贫民”而忘掉工人阶级的利益时，尤其不舒服。



我要向米·纳杰日金提几句列宁在莫斯科的演讲中说的话<sup>⑤</sup>：

“在缔结和约的同时，我们出卖了埃斯梁德的工人、乌克兰的无产阶级等等。但是如果我们的同志在死亡，难道我们也应该和他们一起死亡吗？如果我们的同志们的队伍被相当力量的敌人所包围，而且无法反抗，那我们也应当斗争吗？不，决不！”

也许，米·纳杰日金会同意，这不是工人阶级的政策，而是古罗斯的、诸侯时代的、真正苏兹达尔式的政策。<sup>⑥</sup>

列宁说：

“马尔托夫用颤抖的、嘶哑的嗓子号召我们去斗争。不，他不是号召我们去斗争，而是号召我们去死，他号召我们去为俄国和革命而死。大会的多数代表是农民群众，1500人（大会上的工人代表数量不多）对马尔托夫的号召极为冷淡。他们不想为俄国和革命而死，他们想活着去缔结和约。”

在这些话里表现了全体“人民”的完全服从，说出了对工人阶级的死刑判决。

这是令人讨厌的、腐蚀“人民”的蛊惑宣传完全正常的结局。

### 注释：

① 《红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报纸，1918年1月至1939年2月间出版，后并入《列宁格勒真理报》。

② 引自米·纳杰日金1918年3月19日发表在《红报》上的文章《种瓜得瓜（对高尔基所说的良心的反应）》，该文是针对高尔基1918年3月17日发表在《新生活报》上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一文的。

③ 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格里高罗维奇（1822—1900）——俄国自然派作家，所著中篇小说《乡村》（1846）、《苦命人安东》（1847）描写农民生活，具有强烈的反农奴制倾向。

④ 第21篇中也说到这一问题。

⑤ 高尔基所说的“列宁在莫斯科的演讲”是指1918年3月15日列宁在

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批准和约的报告总结发言》的结束语。高尔基文章中所提到的两段话引自《新生活报》1918年3月17日刊登的大会材料，但是在苏联出版的几版《列宁全集》及当时《真理报》刊登的根据速记稿整理的列宁讲话中都没有这两段话。与之意义相近的是列宁报告中的两段话。这里只引其中的一段：

列宁在1918年3月8日俄国共产党(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肯定地说，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为了具体地说明问题，我举一个例子：两个人在一起走路，突然遭到十个人的袭击，一个人进行了抵抗，另一个人逃之夭夭，这是叛卖。但是，如果两支各为10万人的军队同5支敌军作战，其中一支军队被20万敌军包围了，另一支军队应该去援助……”但一支军队不给另一支军队以支援而只是等待友军的到来，以便会合起来，重新投入战斗。“这不是叛卖，不是怯懦，因为单是数字的增大已改变了所有的概念，每个军人都知道这个道理，我这样做，就可以保存自己的军队，即使另一支军队成为俘虏，但我将整顿好自己的军队，我有友军，我等待友军的到来。”

⑥ 即自私、封闭的政策。苏兹达尔是古罗斯诸侯国之一，蒙古统治罗斯时期苏兹达尔奉行与其他罗斯公国不合作的政策。

**《新生活报》，1918年3月公历22日  
(俄历9日)，第48期(总第263期)**

批评的权利要求人们不仅必须无情地批评敌人的行动，而且也必须无情地批评朋友们的缺点。对发展人的社会正义感来说，如果我们自己能在我们的敌人幸灾乐祸地指出我们的缺点、错误之前，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那么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策略上都要好得多。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敌人一定会得意洋洋地叫喊：

“好啊！”

但是得意洋洋的仇恨将会迟钝下来，仇恨的毒汁是无力的。

不应该忘记，敌人们在谴责我们的朋友时常常是正确的，而真实情况又会加强敌人的打击。比敌人更早地说出关于朋友们的可悲而又难过的真实情况，就意味着使敌人的进攻变得毫无力量。

布尔什维克中的小鸟们几乎每天都在对我说，我已经“脱离了人民”。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被“钉”在人民身上，以至于发现不了人民的缺点，而且因为我并不争着当首长，所以我没有对这些缺点保持沉默和为俄国人民中的愚昧群众大唱蛊惑人心的颂歌的愿望。

如果我看到我的人民具有追求卑微的平等的强烈愿望，一种出自糟糕的亚细亚之谜——因为做卑微的人要简单一些，轻松一些，责任小一些。如果我看到这一点，我就应当把它说出来。

既然我看到苏维埃政权的政策是“非常民族性的”，如同布尔

什维克的敌人不断地指出的那样；而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民族主义正表现为“向贫穷和卑微看齐”，那我就应当悲伤地承认：敌人是对的，布尔什维主义是民族的不幸，因为它可能在它激起的粗俗本能的混乱中危险地消灭俄国文化的柔弱幼芽。

我们都有点害怕批评，而自我批评则几乎使我们感到厌恶。

在我们这里对辩解的偏好并不亚于对谴责的偏好，但是在这种对辩解的偏好中，更多的是对自己的关心，而不是对别人的关心；在这种偏好中为自己个人的未来罪孽辩解的愿望总是很显眼的，这种愿望是颇有远见性的，但却是卑鄙的。

俄国生活和俄国文学中的可爱的主人公是不幸而可怜的失败者，英雄们在我国并不走运：人民在犯人被赶去做苦工时爱犯人，但却非常自愿地帮着给自己的环境中的强者穿上罪犯的长衣并戴上镣铐。

在罗斯，人们不爱强者，部分地因为这一原因，在我国强有力的人是没有活力的。

生活不爱他，文学不爱他，千方百计地放心大胆地用种种矛盾束缚意志坚强的人，把他赶到走投无路的阴暗角落里。总之，把他贬降到与耻辱的生活环境同等的水平上，贬低他并毁灭他。人们寻找和敬爱的不是斗士，不是生活的新形式的建设者，而是把平凡人的卑鄙罪孽揽到自己身上的德行端正的人。<sup>①</sup>

幻想家们和书呆子们想用这种材料，即用愚昧而萎靡软弱的农村人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不仅形式上，而且本质上、精神上的新国家。很清楚，建设者们应当根据材料的特点工作，而农村人的最主要的和最难消除的特点是疯狂的私有者的个人主义，它不可避免地将向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理想宣战，宣布残酷的战争。

巴黎公社是农民扼杀的，这一点工人阶级必须记住。

但是他们的领袖们却忘记了这一点。

### 注释：

① 这里指的首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主人公(如阿辽沙·卡拉玛佐夫)。类似的思想高尔基在他的《俄国文学史》一书(1909)及许多文章中做了较详尽的阐述。但是他一直极高地评价俄国古典文学的艺术性与思想性,正是在十月革命后的日子里,他写道,俄国古典文学“完完全全、彻里彻外是讲良心问题、社会正义问题的”(见第43篇)。

《新生活报》，1918年公历4月9日  
(俄历3月27日)，第62期(总第277期)

日前，我收到了下面这封信，很想推荐给那些坚信自己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同志们读一下：

“您在您的最近一篇文章中写道，当兵的把很多钱带回了农村，您奇怪他们从哪儿搞到了这些资本。<sup>①</sup>我现在给您讲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当兵的兄弟，没打过仗，只是在彼得格勒轻松地服兵役，可后来在铁路的护路队里找了份差事，铁路上常有载酒精的列车过往，他和别的一些人被派去保护这些载酒精的列车。他在那里干了两个月后就带回家来5000卢布。钱是他这样诚实地挣来的：当列车停在那里时，他们打开车厢，在酒桶上钻个洞(也可能是用另一种方法干)，只灌上几瓶酒精(他不只是一个人)，然后关上车厢，打铅封的人在车门上打上铅封，一切都符合规章。钱按照职务来分，就这样过了两三个月。一个礼拜前，他回到家里，把钱存进了银行，大家都非常满意，所有的邻居都争抢着请他到自己家里去，他给自己娶了一个阔新娘，要知道，有钱人疼有钱人呀。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好，只有我，他的姐姐，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子感到羞耻和难过：我的兄弟是一个贼，盗窃国库的贼。可像他这种人有几十万呢。

“N省N县的农家女子，村子我就不写了。”

“普通的农家女子”是一个诚实的人，村子“就不写了”，显然是因为她害怕邻居们会拧下她的脑袋。

罗斯的社会主义天堂的建设者同志们：“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sup>②</sup>你们看吧，凭良心地说吧，这是天堂的飞鸟吗？这不就是黑老鸱吗，它们往死里啄的不就是城市无产阶级吗？

我知道，“普通的农家女子”的一封信并不能动摇“不迟疑的社会主义者们”对他们的正确性的石头般的自信。几十种、几百种类似的关于“乡村贫民”的当前情绪的证明也无法动摇这种自信，甚至连像刊登在第12期《人民事业报》<sup>③</sup>上的伊·沃尔内依的场景描写一样的见证材料也无法动摇这种信心。

伊·沃尔内依自己就是农民，他是1905年至1906年事件的参加者，一个受过打击、吃过苦的人，他曾被他的小学同学押解到监狱里去。他饱经风霜，但仍保持着一颗充满生气、热烈仁爱的心，并善于毫无怨恨地、真实地写作描写1906年后农村中黑帮运动的忧郁的史诗。他是一位诚实的、好说实话的见证人，而且我知道说出关于自己人的痛苦的真情对他来说是多么沉重，他的心里燃烧着对自己人的真挚的爱。这是一个既可以相信，也应该相信的人。<sup>④</sup>

但是现实永远比所有的人，甚至比天才的作家更加真实，更加有天才，它更加残酷地描绘着当今俄国的农村。

我特别把这些有益于理解当今生活的资料来源推荐给《真理报》的果尔洛夫<sup>⑤</sup>，他是一个性子很急的人，也许，作为一个诚实的人，他应当很清楚，说些什么，捍卫什么。但是他却并不清楚。

他没有任何权利胡诌什么我“轻蔑地朝人民的脸上吐唾沫”。被他信口开河称为轻蔑的“唾沫”的东西，是几十年来形成的我的信念。既然果尔洛夫先生识字，他就应当知道，我从来没有赞赏过俄国农村，今天我也不能赞赏从骨子里敌视城市无产阶级的心理、思想和目的的“乡村贫民”。

当然，“毫不迟疑的社会主义者们”在将工人阶级从自己身边

推开的同时，应当依靠农村，他们将最早地因为受到农村的熊一般的拥抱而哭嚎起来，大量的本来自己必须学习，却过早地教导别人的果尔洛夫们将流着痛苦的眼泪哭嚎，这完全是很自然的。

格·季诺维耶夫<sup>⑥</sup>向我提出“挑战”，要进行公开的口头决斗。我不能满足季诺维耶夫先生的愿望，因为我不是演说家，不喜欢公开的演讲，也没有灵活到同职业蛊惑家们比赛雄辩的程度。

再说，为什么必须进行这种决斗呢？我在写作，每一个识字的人都有可能读我的文章，就像有权不理解它们或者佯装不理解一样。

格·季诺维耶夫断言，我在谴责人民做出的残忍、粗野的事情的同时，也在“为资产阶级搔脚后跟”。

这种乖张的做法太粗俗，太不聪明了，但是本来就不应期待季诺维耶夫先生们会有什么别的表现。但是他在工人们的面前只字未提那些我在谴责他们的某些行为时经常说的话：

与季诺维耶夫相类似的蛊惑家们在腐蚀工人们；

布尔什维主义肆无忌惮的蛊惑宣传在鼓动群众的愚昧本能时，把工人知识分子摆在了亲人中的异己人士的悲剧性位置上；

苏维埃的政策就对待工人阶级的态度而言是叛徒的政策。

这就是季诺维耶夫先生应该对工人们讲的话。

#### 注释：

① 指本书第 10 篇。

②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见《圣经·马太福音》第 6 章第 26 节。

③ 《人民事业报》——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1917 年 3 月起在彼得格勒出版，支持临时政府，对十月革命持敌对态度。1918 年 1 月后曾数次易名出版，最终于同年 6 月被查封。



④ 见第 21 篇注⑦。

⑤ 指在 1918 年 4 月 5 日《彼得格勒真理报》上发表《论失去的良心》一文的作者果尔洛夫。当时,指责高尔基的良心的文章在《消息报》、《真理报》等革命报刊上屡见刊出。

⑥ 格里高利·叶甫谢耶维奇·季诺维耶夫(原姓:拉多梅斯尔斯基,1883—1936)——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曾多次在书刊上著文反对《新生活报》及高尔基本人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表达的立场。在苏维埃政府迁往莫斯科,季诺维耶夫在彼得格勒拥有无限的权力后,他同高尔基的关系变得格外紧张了。《新生活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坚持才被查封的。俄国侨民作家霍达谢维奇在关于高尔基的回忆录中写道:“高尔基和季诺维耶夫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及怎样结仇的,我不知道。也许他们有可以追溯到革命前的老账;也许这是从 1917—1918 年间开始的,当时以高尔基为首的《新生活报》对列宁的党采取部分的反对派立场。不管怎么说,1920 年秋之前,情况还没闹到公开交战的地步,但季诺维耶夫一直在尽可能地对高尔基使坏。高尔基为之奔走的被逮捕者往往会遭到比他不为之奔走更坏的下场。高尔基辛辛苦苦为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们争取来的食品、燃料和衣物按照季诺维耶夫的命令被截留并不知分配到哪些机关去了。高尔基常常给列宁打电话、写信并亲自去莫斯科,寻求列宁的帮助。列宁也尽量帮助他,但他从未认真地限制季诺维耶夫,因为列宁虽然重视高尔基这位作家,但也重视季诺维耶夫这位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更需要季诺维耶夫……季诺维耶夫也从未善罢甘休过。也许,高尔基带给他的那些轻微的失败使他更加起劲……当时高尔基还获悉,季诺维耶夫威胁要逮捕‘某些与高尔基亲近的人’。”(霍达谢维奇:《高尔基》,见《当代笔记》,巴黎,1940 年第 40 期,第 136—137 页)

后来,季诺维耶夫组织搜查了高尔基在彼得堡的住所,这使高尔基大为震惊,这次搜查的起因当然不是高尔基,而是他的秘书马·伊·扎克列夫斯卡娅(布德伯格)。季诺维耶夫公开地认定她是英国间谍。高尔基怒不可遏,立即启程去了莫斯科,要求制止季诺维耶夫对他的迫害。列宁、捷尔任斯基、托洛茨基三人在高尔基夫人的莫斯科住宅里,“听取了高尔基的报告后决定要听听季诺维耶夫的说法。季诺维耶夫被召到莫斯科。在第一次开会时,他的心脏病发作,照高尔基的意见,这是假装的,尽管他确实患心脏病。事情的结

局是，季诺维耶夫被训了一顿后就平安无事地回家去了。毫无疑问，这以后季诺维耶夫将要报复高尔基了。”

**《新生活报》，1918年5月公历30日  
(俄历17日)，第103期(总第318期)**

家庭女仆的代表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请求我为准许在报纸上刊登招工和待聘广告而“奔走”。<sup>①</sup>

下面就是这类请求中的一条，它是写在一封信里的：

“请尽力向现政权说明，让它随便选一家报纸并允许刊登材料，使人们能根据这些材料像以前一样为自己找到活干。以前只要拿起一张报纸，你就能根据自己的职业找到用工的消息，可现在，你踏破所有工会的门槛，你只能遇到卑鄙的微笑和粗俗的玩笑，却找不到工作。让苏维埃政权选一张报纸来刊登用工消息。刊登这些消息将会给政权带来巨大的收入，所以这对政权也就重要了，要知道，苏维埃是没有钱的。”

我不知道，所谓找工作的人在各种工会的理事会里看到了“卑鄙的微笑”，是否是真的。但是由于抱怨信的内容大多相同，人们不由自主地必须相信，粗俗的玩笑和赤裸裸的粗俗已经成了新官僚们的习惯。关于这一点“资产者”已经写了不少，但是资产者是没人相信的，即使他们完全真诚地说，所有的黑发人都长着黑色的头发。可是工人们开始抱怨了。

有一个工人写道：“我在革命前的功绩不比豌豆街上那些现在像狗一样向我狂吠的小家伙们小。<sup>②</sup>我从1904年起，而不是从十月革命起就是布尔什维克，我在监狱里蹲了两年零七个月，还过了五年饥饿的流放生活。因为担任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我常和农

夫们一起去找上级，他们朝着我大喊大叫，弄得我羞于直对农民同志们目光，真怕他们突然会问我：‘这些人怎么咋咋呼呼的，就像沙皇时一样呀？’请您想办法影响这些人，让他们清醒过来！”

一位工人因为责备一名喝醉酒的赤卫队员粗鲁而被捕了，他被指控有“反革命情绪”，据他说，审问时“人家用手枪指着他的脸说：回答！我回答他们说：我们是不是同志？可他们却说：这样的同志应当掌嘴。请允许我声明一句，掌嘴在旧时代就够多的了，如果现在也这样干，那就不值得费劲了。”

这种指责听到得越来越多了，而我看不出那些引起如此令人感到耻辱的指责和抱怨的人有什么可以用来为自己辩护的东西。在旧制度下，对工人阶级中的人的蔑视是吞噬真理的猪的心理<sup>③</sup>，1905年后，猪猡叫得特别粗野和无耻，因为它感到自己胜利了，所以就洋洋得意起来。

但是在今天，却没有胜利者，尽管我们在不断打架，却没有谁能洋洋得意，再说，又能洋洋得意地嘲弄谁呢？难道我们能够仅仅按照习惯，仅仅因为以前我们被人嘲弄过而互相嘲弄吗？

“我不为军队负责！”一位士兵针对街头平民的人所共知的指责说。

那些政权的代表是些年轻人，昔日政治上的金发人，今天的深红发人，他们不能用那位士兵的话来为自己辩护。要知道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大概都认为自己是社会人道的、公正的新政权的体现者，每个人都应当既为自己个人，也为整个新生活建设大军负责。他们理想的使命不就是这样吗？要知道，不正是他们接替了老一代“理智、善良、永恒”的播种者吗？但是他们给生活、给日常饥饿的痛苦生活究竟直接带来了什么新东西，是否带来了许多理智和善良？

如果他们没有头脑，那么也许还能有一点良心，而良心将逼迫他们思考从工人阶级（他们据说是在为这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代

表方面提出的针对他们的指责。

《彼得格勒真理报》带着饥饿者的贪婪——这在心理上是很容易被理解的——提到对“布尔什维克们”说的每一句好话。不管说他们的是伊兹果耶夫(带着伪善者的嘲讽),还是克拉拉·蔡特金(带着许多绝对排斥夸奖的解释),《真理报》立即在自己的版面上转载了这些令人感到怀疑的夸奖<sup>①</sup>,它显然认为,这些夸奖也涉及到它。《真理报》也转载了我对妇女们来信的复信中的几句话并加上了这样一个问题:

“难道高尔基现在还不同意,他以前说出的‘思想’中确实有许多是‘不合时宜的’吗?”

不,我现在也不同意。我关于野蛮、粗鲁,关于布尔什维克们发展到虐待狂地步的残忍,关于他们的不文明,关于他们不了解俄国人民的心理,关于他们正在拿人民作一场令人厌恶的试验并正在消灭工人阶级的思想,所有这一切和我关于“布尔什维主义”所说的许多话至今仍然是完全有效的。

### 注释:

① 1917年11月,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关于实行广告国家垄断的法令》,根据这一法令,一切资产阶级的报纸都被禁止有偿刊登公民们的广告,包括家庭女工、厨工、保姆、家庭辅导教师、音乐教师等类人求职的广告。安排就业的职能转交给了工会与其他机构。

② 许多国家机关,包括契卡(肃反委员会),都坐落在彼得格勒的豌豆街上。

③ 指俄国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的讽刺小景《得意洋洋的猪,或猪同真理的谈话》中的猪,它自鸣得意,啗食真理,是民粹派被粉碎后更趋猖狂得意的政治反动派的形象。

④ 指贝斯特里扬斯基的《伊兹果耶夫谈布尔什维克》(载于1918年5月4日《彼得格勒真理报》)一文及克拉拉·蔡特金的文章《拥护布尔什维克》(载

于1918年5月12日、14—15日、17—18日《真理报》。《彼得格勒真理报》的编辑贝斯特里扬斯基不止一次高兴地引用伊兹果耶夫的著作《论布尔什维克的功绩》（《俄罗斯思想》，第一、二卷）中的话。伊兹果耶夫在他的著作中认为，布尔什维克在“用唯一可能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方面要比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彻底、诚实。但是伊兹果耶夫的著作是完全反社会主义、反布尔什维克的。他认为：“从本质上讲，俄国的社会主义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反国家的、毁灭性的学说，知识分子只是把它当作同专制作斗争的激进的手段。”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相反，俄国的社会联系从来没有像布尔什维克统治时期这样松散。在我们的生活中资产阶级利己主义谋取暴利、自私、投机精神，逃避一切遏制一个人剥削另一个人的法律的做法从来没有猖獗到这种地步……”

“1917年可怕的教训对于俄国，不能，也不应当无影无踪地过去。对于俄国，应当有一个民族复兴、民族荣誉感、良心与智慧的时代来临……俄国社会主义中一切带有反民族、反国家（也如革命所证明了的）、反文化痕迹的东西应当坚决地取缔……将有巨大的相当高水平的富有成果的文化工作要做。一切社会谎言和腐朽将被清除……布尔什维克们虽然是从反面，但毕竟也将促进这一健康化的过程。这就是他们的功劳。”

克拉拉·蔡特金的文章对俄国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间的社会政治局势做了细致的分析，高度评价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季诺维耶夫在为蔡特金的文章写的短评中赞扬了蔡特金对俄国革命与布尔什维克的态度，谴责了《新生活报》对革命的悲号、诅咒。

高尔基所说的蔡特金的“带着许多绝对排斥夸奖的说明”是指在蔡特金的文章开始发表的当天，奥索金在《新生活报》上作出的“反应”。奥索金指出，蔡特金在理所当然地批判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时，远没有用“共产主义的夸夸其谈”。当布尔什维克在大叫“采列捷利和切尔诺夫卖身投靠资产阶级时”，蔡特金却认为，“我坚信，他们是在诚实地争取按社会主义的方式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她还写道，“谁能否认，布尔什维克党是少数人的政权……”她还说，布尔什维克“缺少诚实的杰出人物，缺少对俄国解放斗争和国际社会主义立下不朽功绩的人”。根据蔡特金的这些话，奥索金认为：“总之，需要指出，只是绝望状态才能使《真理报》刊登类似的颂扬。”

《新生活报》，1917年俄历6月18日  
(公历7月1日)，第52期

犹太人享有与其他民族平等的权利，这是我们革命的美好的成就之一。<sup>①</sup>我们承认犹太人和俄罗斯人享有平等的权利，也就去掉了我们良心上的一个可耻的血腥而肮脏的污点。

在这一行动中，没有任何东西能给我们以为之骄傲的权利。与许多俄罗斯人相比，犹太人为俄国的政治自由斗争得要诚实得多，坚决得多；犹太人中出的叛徒和奸细要少得多；仅凭这些我们不应该，也不能自认是“犹太人的恩人”，就像某些“心地宽厚”和“软心肠的”俄罗斯人在给我的信中自称的那样。

顺便说一句：这些心地宽厚的、软心肠的人骂起街来出奇地不知羞耻！

我们把犹太人从“犹太人定居点”里、从对我们来说是可耻的“法规的俘虏”地位中解放出来后，也就给了我们的祖国以使用那些能比我们工作得更好的人的精力可能性，而大家都知道，我们非常需要热爱劳动的人。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但是我们能够感到高兴：人们终于想到做一件道义上和实践上的好事了。

但是我却感觉不到由此而生的喜悦，大概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高兴，我们大家都过分忙于“崇高的政治”了，一首讽刺食人者的小调最好不过地道出了这种政治的意义：

老虎喜欢果冻，  
人们吞食别人。  
啃啮别人的骨头，  
啊，是多么美好呀！

喜悦我感觉不到，但是反犹太主义依然活着，而且慢慢地、谨慎地又抬起了它那卑鄙的头，它发着嘶嘶的抱怨，诽谤着，飞溅着有毒的仇恨的唾液。

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不知你们看见没有，在有无政府主义情绪的布尔什维克中有两个犹太人。好像甚至有三个。有些人算出是七个，而且相信，这七个参孙<sup>②</sup>将把俄国的第 1.7 亿座建筑物破坏得粉碎。

这是非常可笑和愚蠢的，如果不说是卑鄙的话。

威严的犹太人的上帝救了全城的有罪者，只因为其中有一位德行很好的人<sup>③</sup>；而相信温顺的基督的人们却认为，因为两个或七个布尔什维克的罪孽，整个犹太民族都应当受痛苦。

这样想来，就应当承认，所有的辛比尔斯克省以及与之毗邻各省的人都应当对列宁这位纯俄罗斯血统的有罪者负责。

孟什维克中的犹太人要明显地多一些，但是给我写信的人却装作无知的人，说什么所有的犹太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

这是非常蹩脚的概括。我坚信，我知道，众多的犹太人——真令我感到惊奇——能表现出比许多俄罗斯人都更加明智的对俄国的爱。

人们却没有发现这种情况，虽然只要拿起犹太族记者的文章，这种情况就会立即跃入你的眼帘。

在《话语报》，一份可以不喜欢，但却不失为非常可敬的报纸的报社里就有不少犹太人在工作。而《新时代报》（它的撰稿人中也有犹太人）不久前还把《话语报》称作“犹太人的报纸”。



《话语报》的编辑们连一丝对布尔什维克的好感的影子也没有。

还有成千上万的证据可以说明，把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等同起来是愚蠢的做法，它是受到刺激的俄罗斯人的动物本能引起的。

当然，我不想列举这些证据，正直的人是不需要它们的，而对不正直的人来说，这些证据是没有说服力的。

白痴症是一种不可能用开导的方法治愈的病症，对于患这种不治之症的病人来说，情况是非常清楚的：因为犹太人中有七个半布尔什维克，那就意味着一切罪过都在于犹太人民。但因此……

但因此正直而健康的俄罗斯人又要因罗斯、因俄国的糊涂蛋感到惊恐和痛心的羞耻了，那些俄国的糊涂蛋在生活的困难日子里一定要在自己以外的某个地方，而不是在自己的极度愚蠢中寻找自己的敌人。

我希望我的为数众多的通信者们能对我就“犹太人问题”所作的这一答复感到满意。

我再补充一句：对我来说这种问题已不再存在了。

我不相信反犹太主义的诋毁宣传的成功。我相信俄国人民的理智，相信他们的良心，相信他们对排除任何对人的暴行的自由的真诚追求。我相信，“一切都将过去，只有真理将留存。”

#### 注释：

① 1917年3月22日临时政府颁布了取消民族和信仰限制的法令。在法令的简短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临时政府坚信，自由国家中的一切公民在法律面前应当是平等的，每一个人的良心不能容忍因为个别公民的信仰和出身而限制他们的权利，故决定：取消一切现行法规所规定的，因俄国公民属于某种宗教信仰、宗教派别或民族而定的对他们权利的限制。”接下去分九点

列举了被取消的限制和法典中从此失去效力的有关条文。社会的进步力量、原沙皇俄国的各族居民都非常拥护这一法令，原来受限制最多的犹太居民尤其高兴，但是保皇派和反动派却极为不满并策划了反革命的对犹太人的蹂躏暴行。

② 参孙——《圣经》传说中的大力士，古代犹太人的领袖之一。其力大无比的奥妙在于其头发。后被人剃去头发，受被捕、剜眼之辱，沦为奴隶。不久，头发长出，力量得以恢复，他摧毁囚禁他的房屋，与仇敌同归于尽。

③ 据《圣经·创世记》第 18 章称，耶和华因所多玛与蛾摩拉城居民罪恶深重，决定毁灭这两城及两城所在的平原地区，但为了保护德行很好的罗得及其妻女，耶和华没有触动当时他们所在的琐珥城。

《新生活报》，1918年公历6月2日  
(俄历5月20日)，第106期(总第321期)

有人给我寄来了一包反犹太人的传单，其中有一份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5月6日在莫斯科印制的。我不知道是否存在这样一个“联盟”，但是如果存在的话，那它的成员当然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那些变野蛮了的二流子和懒汉中的普通的俄罗斯人，他们的全部不幸都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但他们却因自己的无用和不善于生活而随意指责所有的人，只是不责怪自己。至于他们不是基督徒，更不是社会主义者这一点，有他们卑鄙的传单为证。

这就是传单开头的句子：

“‘所有国家、所有民族、所有党派的反犹太主义者，团结起来！’‘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联盟’呼吁所有的俄国公民起来清除那些渗透到我们整个祖国——从最上层直至下层人民——的犹太垃圾。这种垃圾尤其败坏了我国的知识分子、我们所谓的受过教育的社会。他们是用宣传虚伪的一切人民和种族平等、博爱的原则的犹太报刊培养起来的。但是每一个有理智的人都知道，既没有平等，也没有博爱，而且也不可能有，所以也不可能有对待所有人、所有民族的相同态度。”

这可真是充满爱心的基督的真正的追随者呀，因为对于基督来说“既没有希腊人，也没有犹太人”<sup>①</sup>，基督本人和最早的那些圣徒也是犹太人，也受过苦，他是为了所有的人、为了一切种族和部

落的人接受痛苦的死亡的。这些认为平等原则是“虚伪的”、是“犹太垃圾”的“社会主义者们”真是可爱呀！

愚蠢而可怜的人们，不幸的人们呀！传单的作者们说，俄国公民“从上至下”渗透着“犹太垃圾”，即“一切人民和种族平等、博爱的原则”，这是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的几乎所有宗教和最伟大的思想家们都宣扬的神圣原则。这样，传单的作者们也就表露了他们过分讨好的，但——唉——完全不正确的关于俄国公民的概念。作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联盟”成员的公民们自身就是例子，他们不仅没有“渗透着”崇高的平等原则，而且如同大多数俄国公民一样，对于这些原则的全球性的共同文化价值没有丝毫概念。

他们接下去写道：

“雅利安种族是身体上和道德上的正面典型，犹太人是处于人类发展低级阶段上的反面典型。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的‘俄罗斯大地的精华’懂得并明白这一点，那就会像抛掉一件不适用的破旧东西一样，抛弃那些关于犹太人同我们平等，关于必须对人类的这些贱民和其余的人一视同仁的陈词滥调。”

请你们想一想，除了对犹太人外，连对“其余的人”也不能一视同仁！这些其余的人又是谁呢？也许是日尔曼人，这些“雅利安种族”的代表是“道德上的正面典型”，而这又不妨碍这一“典型”大规模地枪杀手无寸铁的俄国农夫和犹太人？但也许是温顺的斯拉夫人，是那些现在正在毫无意义地和残酷地互相抢掠、互相残杀的俄罗斯人？

或者这些“其余的人”就是所有的能够这样或那样妨碍传单作者们的“豺狼爱国主义”平静发展的人？因为毫无疑问，这传单来自那个习惯于大肆聚敛财富、从他们热爱的人民身上往下剥皮抽筋的强盗们的圈子。

当然，“其余的人”是不由自主的失言，这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们”的社会粗野化以及道德上的和一切方面的无知促使他们说

出来的。但是在有些场合,这种无知却是非常可疑的,而且大概完全是虚伪的。

彼得格勒的那张传单是写给“工农兵”的,其内容显然是在利用工农兵的愚昧的思想和感情。

传单中问道:

“你们认识很多当铁匠、看院人、锻工、农夫、洗衣女工、厨娘、洗碗工的犹太人吗?你们看见过我们的犹太人在城市街道上讨小钱吗?不认识,没有。”

当然要这样回答,在彼得堡和莫斯科谁也没有看见过当看院人的犹太人,因为这种警察式的职务是无论如何不能被犹太人占据的,其原因不言自明。在敖德萨,大多数拉货的马车夫是犹太人,住在犹太人定居点的92%的犹太人是小手工业者和穷人。

完全正确,在犹太人定居点以外,谁也没有见过犹太乞丐,这是因为犹太人中的社会救助发展得很好,还因为警察不允许犹太人行乞,还因为东正教的和富有爱心的基督徒们往犹太乞丐手中塞的可能不是面包,而是石头,或者蛇。这一切是多么虚伪,这种懒惰无力的人的反犹太主义是多么可恶啊!

当你读这些由虚弱而卑鄙的仇恨促使俄罗斯的糊涂虫们写下的愚蠢的肮脏东西时,你会为列夫·托尔斯泰的创造了世界上最人道、最人性的文学的国家——罗斯感到耻辱和害怕。

第三张传单是挑拨性的捏造,而且更加具有欺诈性,更加愚蠢。

传单的开头是:

“机密。致‘全世界以色列联盟’各分部主席”。传单中建议“主席们”保持全面的“谨慎”。“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沿着摧毁他人的祭坛和皇位的道路前进”,“我们要迫使俄国屈膝”,“我们竭尽全力以推崇伟大的犹太人民”,但是要不慌不忙,要保持“谨慎”。

白痴们想用这些捏造的东西吓唬谁呢?他们竟然没有想到,

如此极端重要的、发给“全世界以色列联盟的主席们”的指令本该用犹太人的文字，而不是用俄文写成。他们竟然连添上“译自犹太文”几个字都没有想到。

这一切是多么低能，多么可耻呀！

其余的传单也并不比上面所引的写得聪明。

我已经向反犹太主义者指出过多次，如果说某些犹太人善于在生活中占据最有利和最富裕的地位，那是因为他们善于工作，因为他们在劳动过程中投入了执著精神，因为他们爱“做事情”和具有以事业为乐趣的本领。与俄罗斯人相比，犹太人几乎总是更好的工作人员，因这一特点而发狠是愚蠢的，应该学习这一特点。无论是在个人致富的事业中，还是在社会服务的舞台上，犹太人都投入了比擅长空谈的俄罗斯人更多的热情，因此，说到底，不管反犹太主义者怎样胡言乱语，他们不喜欢犹太人只是因为犹太人明显地比他们更优秀，更灵活，更能劳动。

现在，当我们已极为明显地认识到，君主制是怎样腐蚀我们，削弱我们的力量，从精神上阉割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特别珍惜有本领的工作人员，珍惜有主动精神的、热爱劳动的人们，但我们却在野蛮地喊叫：

“打他们，因为他们比我们好！”

只是因为这一点，反犹太主义者先生们，只是因为这一点，不管你们怎样花言巧语！

这些传单当然特别注意像季诺维耶夫、沃洛达斯基等这样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顽固地忘掉，他们的不知分寸和愚蠢正是起草控告全体犹太人的诉状的材料。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有道是“一家人不无丑八怪”，但也并不是全家人都是丑八怪呀，而且仇恨沃洛达斯基们的犹太人当然有成千上万，他们的仇恨大概同俄国的反犹太主义者一样深。这当然不能使反犹太主义者相信，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是一样的，犹太人中阶级敌对的尖锐程

度并不比其他民族中弱；这不能使反犹太主义者相信，因为他们必须确信与此相反的东西。

然而，也许当他们像唆使狗一样唆使一些人去攻击犹太人时，这些被唆使的人大概已经该被这组织蹂躏犹太人的暴行的新企图激怒了吧？也许，他们会认为，必须及时地对传单的作者们，对“人民特别法庭的匪帮团伙”和其他居心不良的冒险分子的组织说：

“滚开！国家的主人是我们，我们不掩盖自己的面孔，在为国家争得了自由后，我们决不允许某些居心阴险的人来控制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意志。滚开！”

#### **注释：**

① 此语为“一切人全都平等”之意，即“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见《圣经·加拉太书》，第3章第28节）

## 附录一 拟补入《不合时宜的思想》 一书的文章\*

---

\* 如本书“编辑的话”所说,1922年至1923年间,高尔基曾准备再版《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并拟补入13篇文章。本书的这一部分就是高尔基当年拟补入的13篇文章。在高尔基为再版《不合时宜的思想》准备的文稿中,保留了1918年彼得格勒版的原有48篇文章(即本书的《不合时宜的思想》,或称正文部分)的排列顺序,但将其中第6篇拆成3篇(计划再版书中的第9、10、14篇),第24篇拆成2篇(计划再版书中的第32、33篇),第32篇拆成2篇(计划再版书中的第46、47篇),又将第16、17篇合并为1篇(计划再版书中的第25篇)。补入的13篇文章依次插排为第1、2、3、11、12、13、24、36、37、38、41、43、50篇。这样,高尔基计划再版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应共有64篇文章。



1<sup>①</sup>

## 《年鉴》杂志, 1917 年 第 2、3、4 期合刊

俄国人民同自由举行了婚礼。让我们相信这一点吧：由于这一结合, 在我们这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备受折磨的国家里将诞生出新的强有力的人。

让我们相信, 在俄国人的身上, 他那理智和意志的力量, 那被生活的警察制度的数百年压迫所扼杀和压抑的力量将像明亮的火焰一样熊熊燃烧。

但是我们不应忘记, 我们大家都是昨天的人, 而国家复兴的伟大事业掌握在由过去的痛苦形象按互不信任、不尊重别人和丑恶的利己主义精神培养起来的人们的手中。

我们是在“地下”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我们称之为合法活动的事情, 就其本质而言, 或者是朝虚空中放光, 或者是集团和个人的卑微的政客勾当, 一些个人尊严感蜕变成病态自尊的人们的窝里斗。

生活在旧制度的毒害心灵的丑恶现象之中, 生活在旧制度所产生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之中, 眼看着那些统治我们的冒险主义者们的政权是何等威力无限, 我们很自然地, 而且也必然地被传染上那些蔑视我们、嘲弄我们的人们的所有的极有害的品质。

我们无处, 也无法发展自身的对于国家灾难、对于国家的令人感到耻辱的生活的个人责任感, 我们受到了已经死亡的君主制的尸毒的毒害。

报纸上所公布的暗探局“秘密工作人员”的名单<sup>②</sup>是控告我们的可耻品质的诉状,这是社会瓦解和国家腐败的征兆之一,是一个可怕的征兆。

还存在着许多污垢、锈迹和各式各样的毒物,这一切不会很快消失的;旧制度从形体上被摧毁了,但在精神上它却还活着,活在我们的周围,活在我们自身之中。无知、残忍、愚蠢、庸俗和无耻的多头怪还没有被杀死;它只是受到了惊吓,躲了起来,但却并没有丧失吞噬活的灵魂的能力。

不应忘记,我们生活在亿万政治上一无所知、没有受过社会教育的庸人群众之中。不知道自己想要些什么的人,是政治上和社会上很危险的人。庸人群众还不会很快按各自的阶级道路,按明确认识到的各自的利益而分道扬镳,他们还不会很快地组织起来,也不会很快达到善于进行自觉而具有创造性的社会斗争的水平。而只要他们不组织起来,他们就将用自己混浊而不健康的汁液喂养已经习惯了的庸人的警察制度所生出的昔日的魔怪。

还可以再指出一些对新制度的威胁,但是谈这些尚为时过早,而且也不符合报刊检查的要求。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最为复杂的时刻,这一时刻要求鼓起我们的全部力量,要求顽强地工作,要求在作出决定时极端谨慎。我们不应忘记 1905—1906 年的致命的错误,跟随着这些错误而来的兽性的镇压使我们在此后的整整十年中毫无力量,群龙无首。在那十年中,我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都被腐化了,而战争在消灭了数以十万计的青年人之后,更进一步毁坏了我们的力量,从根本上破坏了国家的经济生活。

最早接受新的生活制度的一代人廉价地获得了自由。这一代人不太了解那些在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不断地摧毁俄国君主制的阴森堡垒的人们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庸人们不知道别人为他们所做的地狱般艰巨的默默无闻的工作,而且不知道这种苦役般劳

动的不只是俄国 900 个县城里的庸人们。

我们打算，而且我们也必须按照我们早就设想的那些原则建设新的生活。我们用理智懂得了这些原则，我们在理论上知道了这些原则，但是在我们的本能中却没有这些原则，所以把这些原则引入生活实践，引入古老的俄国日常生活，对我们来说将是非常困难的。正是对我们来说会是困难的，因为我们，我再重复一遍，我们的人民根本没有受过社会生活方面的培养，而我们的现在正走向政权的资产阶级也同样很少受到这方面的培养。还应当记住，现在资产阶级接到手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堆国家的废墟，它是在比 1905—1906 年困难得难以令人置信的条件下接过这堆混乱的废墟的。它是否能明白，只有在与民主派结成牢固团结的条件下，它的工作才会成功，巩固从旧政权那里夺得的阵地的事业在别的条件下是不会可靠的。毫无疑问，资产阶级向右转，但是对此不要操之过急，以免重犯 1906 年的悲惨的错误。

革命民主派则应该领会和感觉到自己的全国性任务，领会和感觉到为自己而积极参加组织国家的经济力量、发展俄国的生产力、保护俄国的自由免受一切内外攻击的必要性。

取得的只有一个胜利——夺取了政权，还需要夺取许多困难得多的胜利，而我们首先应该夺取的是对自己的幻想的胜利。

我们推翻了旧政权，但是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力，而是因为腐蚀我们的政权本身已经腐朽不堪了，所以在它遭受第一次齐心协力的推打时就坍塌了。在这以前，我们眼看着国家被毁坏，感觉到暴力在压迫我们，但却久久不敢给它这样一记齐心协力的敲打，仅这一点，仅在这一点上表现出来的我们的长时间的忍耐就是我们虚弱无力的明证。

眼下的任务是，尽可能地、牢牢地巩固住我们已经攻占的阵地，这只有在理智地团结起一切善于从事俄国政治、经济和精神复兴的工作的人们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健康意志的最佳激活物和正确的自我评价的最可靠的办法是勇敢地认识自己的缺点。

战争年代触目惊心、明显地向我们表明，我们在文化上是多么虚弱，我们在组织上是多么松散。对我们来说，组织起国家的创造力量这件事，就像面包和空气一样必需。

对于自由，我们有一种极度的饥饿感，而由于我们所固有的对无政府主义的偏好，我们会很轻易地吞噬掉自由，这是可能的。

有不少危险在威胁着我们。消除和克服这些威胁只有在为巩固生活的新制度进行平静而齐心协力的工作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

最宝贵的创造力量是人，因为人精神上愈是发展，他用技术知识武装得愈好，他的劳动就愈可靠和宝贵，他就愈文明，愈具有历史感。在我们这里人们还不懂这一点。我们的资产阶级对提高劳动的效率并不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于资产阶级，人依然像马一样，只是粗笨的体力的来源。

所有的人们的利益有着共同的土壤，在这土壤上他们能够团结一致，尽管存在着不可消除的阶级磨擦的矛盾。这土壤就是发展和积累知识。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基于现代世界制度的，它是这一历史时期不可避免的一个方面，虽然也是悲惨的方面，它是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可消除的力量。而知识是阶级间斗争的必需的武器；知识是最终会引导人们战胜大自然的自发能力并将这些能力服从于人的、人类的泛文化利益的力量。

知识应该民主化，知识必须变成全民的，知识，也只有知识，才是卓有成效的工作的源泉、文化的基础。也只有知识才能用自我意识武装我们，只有知识才能帮助我们正确地评价我们的力量、即刻的任务，并为我们指出今后胜利的大路。

平静的工作是最富有成效的。

在我的一生中牢牢地支撑我立足于大地上的力量始终是我对

人的理智的信仰。一直到今天俄国革命在我的眼中都是一连串光明和愉快的理智的现象。尤其重大的镇静理智的现象是3月23日,在战神广场举行葬礼的那一天。<sup>①</sup>

在这数十万人的盛大游行中,人们第一次、而且是几乎可以触摸地感觉到:俄国人民确实完成了一场革命,他们从死亡中复活了,而现在正在投入全世界的伟大事业——建设崭新的并且更加自由的生活形式!

活到这一天是莫大的幸福!

所以我全心全意地祝愿俄国人民就这样平静而有力地不断走下去,不断前进,不断向上,迎接全世界自由,全人类平等、博爱的伟大节日!

#### 注释:

① 本篇是唯一一篇高尔基打算收入再版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但未曾在《新生活报》上发表过的文章。最初发表在《年鉴》杂志1917年第2、3、4期合刊上,当时的标题为《致读者书简》。曾被收为《革命与文化》一书的开篇。

② 参见本书正文第4篇注②及附录二中《噩梦》一文的注释。

③ 战神广场——彼得格勒的广场,19世纪初该广场成为阅兵地点,故名。1917年4月5日(俄历3月23日)在该广场中心为二月革命期间因同专制制度斗争而牺牲的烈士们举行了葬礼。高尔基出席了这一葬礼。

2<sup>①</sup>

**《新生活报》，1917年俄历4月18日  
(公历5月1日)，第1期**

如果回顾一下君主制在“内政”方面的从表面上看繁杂多样的活动，那么这一活动的意义就在我们面前展示出来了，那就是官僚们千方百计地扼制思考者的质与量的发展。

旧政权是毫无才能的，但是自我保护的本能却正确地提示它，它的最危险的敌人是人的大脑，所以它用它所可能掌握的一切手段竭力刁难和扭曲国家理智力量的成长。在这一犯罪的活动中给过它有力帮助的是受官吏们奴役的教会，同样有力地帮助过它的还有心理上摇摆不定的社会，这社会在近几年里对待加于自己的暴力采取了完全消极的态度。

战争明显地、触目惊心地暴露了长期压抑精神的结果：俄国在有文化的并且组织得很出色的敌人面前显得弱小和毫无武装。一度夸夸其谈和讨厌地叫喊什么罗斯要奋起“用真正的文明精神把欧洲从假文明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人们，这大概是些真诚的，因此也更加不幸的人们，很快不好意思地闭上了过于雄辩的嘴巴。“真正的文化的精神”原来是形形色色的愚昧、令人讨厌的利己主义、腐朽的懒惰和无责任心的恶臭。

在这个被造物慷慨地赐予自然财富和天才的国家里，作为它的精神贫困的结果的全面无政府状态在文化的一切方面都表现了出来。工业、技术处于萌芽状态并且没有同科学的牢固联系；科学被抛在后院的阴暗角落里，处于官吏的敌意的监视之下；艺术受到

检查部门的限制和歪曲,脱离了社会,沉浸于新形式的探索之中而失去了富有生机的、令人激动并使人变得高尚的内容。

到处——不管是人的外部还是内心——都是破坏、动摇、混乱和某种旷日持久的马迈式的战争<sup>②</sup>的痕迹。君主制留给革命的遗产是很可怕的。

不管人们怎样热切地想要说一些善意安慰的话,严峻现实的真相不允许安慰,需要的倒是开诚布公地说出:君主制政权在力图使罗斯精神上群龙无首方面几乎已经取得了全面的成功。

但是革命毕竟推翻了君主制!然而,也许这意味着革命只是把表面的病症赶到了躯体的内里。决不应该由此而认为,革命在精神上治愈了或丰富了俄国。有一句古老的并不愚蠢的话:“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国家在理智上变得富有的过程是一个极端缓慢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更是我们所必需的,所以革命应该通过它的领导力量,现在就立即负起创造那些能够顽强而毫不拖延地致力于国家的理智力量发展的条件、机构、组织的责任。

智力,从质量上讲,是第一位的生产力,因此所有的阶级都应该热切地关心智力的最迅速的发展。

我们应该齐心协力地着手做全面发展文化的工作,革命摧毁了通往自由创造的道路上的障碍,现在我们可以按我们的意志向我们自己,也向世界展示我们的天赋、才能,展示我们的天才。拯救我们的办法就是劳动,而且我们会在劳动中找到自己的乐趣的。

“世界不是靠话语,而是靠事业创造的。”这话说得太好了,而且这是不可辩驳的真理。

#### 注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时的标题为《革命与文化》,曾被收入《革命与文化》一书。

② 马迈式的战争——指对和平居民的残酷的、具有扫荡性的攻击,因14世纪经常率军队进攻俄国的金帐汗国统治者马迈(?—1380)而得名。

3<sup>①</sup>

《新生活报》，1917年俄历4月23日  
(公历5月6日)，第5期

我们年轻的自由的纯洁的翅膀溅满了无辜的鲜血。

我不知道前天是谁在涅瓦大街上向人们开枪，但是不管这些人是谁，这些人都是凶狠而愚蠢的人，是中了腐朽的旧制度的毒的人。<sup>②</sup>

现在，当我们大家都有了诚实地争论、诚实地互相不同意的美好的权利的时候，互相残杀是罪恶的和卑鄙的。那些不这样想的人们不能感到和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人。凶杀和暴力是专制主义的论据，这是卑鄙的论据，也是软弱无力的论据，因为强奸别人的意志、杀人，并不等于，永远也不等于杀死了思想，证明了想法的不正确和意见的错误。

自由的伟大幸福不应该被反对个性的罪行所玷污，否则我们将用自己的手扼杀自由。

应该明白，自由和权利的最可怕的敌人就在我们内心；那就是我们的愚蠢、我们的残酷和那所有的混乱的、阴暗的、无政府主义的感情，这些感情是君主制的无耻压迫及其下流的残酷在我们的的心灵中培养起来的。是该明白这些的时候了。

我们能明白这些吗？

如果不能明白这些，如果不能抛弃对人施加的粗鲁的暴力，那我们就没有自由。自由就是我们无力用应有的内容加以充实的空话。所以我说：我们根本的敌人是愚蠢和残忍。



我们能够同它们作斗争吗？我们想同它们作斗争吗？

这不是修辞性疑问，这是关于我们对政治生活的新条件、对人的意义的新评价及其在世界上的作用的理解的深度和真诚度的问题。

是在我们自己身上培养对凶杀的嫌恶感、对凶杀的讨厌感的时候了。

是的，我没有忘记，我们也许还将不止一次地不得不用武器保卫我们的自由和权利，也许吧！

但是4月21日，手枪是那样可笑地握在那些伸出的吓人的手中的，而且在那姿势中有一种儿戏的成分，遗憾的是，这种儿戏的成分后来变成了罪行。

是的，这是反对自由的人的罪行。

难道关于我们卑鄙的过去的记忆，关于当年怎样在街头成百成千地射杀我们的记忆，把刽子手对暴力致人死命的平静态度也接种给了我们？

我找不到足够尖锐的否定的话来说那些试图用子弹、刺刀、对着人脸的拳击证明什么的人们。

当年我们不是抗议过这些做法吗？当年不就是用这些影响我们意志的手段把我们控制在可耻的被奴役状态中的吗？

可现在，在摆脱了外在的奴役状态之后，我们内心中仍然充满了奴隶的感情。

我再说一遍，我们的最无情的敌人是我们的过去。

公民们！难道我们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摆脱它的感染、从自己身上洗掉它的污垢、忘掉它的血腥的无耻行径的力量吗？在对待我们自己方面更成熟一些，更深刻一些，更谨慎一些——我们必须这样做！

斗争没有结束。应当珍惜力量，把精力团结在一起，而不要因屈从眼前的情绪分散精力。

### 注释：

① 本篇在《新生活报》上发表时的标题是《论杀人》，曾被收入《革命与文化》一书。

② 指俄历4月21日(公历5月4日)事件。1917年俄历4月21日，工人与革命士兵在彼得格勒举行群众示威游行，反对临时政府继续参加世界大战的反人民政策。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发动，大约10万人参加了示威游行，并提出了实现和平与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里的左倾冒险主义分子的鼓动下，游行群众和反革命势力发生冲突，导致了人员伤亡(3人死亡，6人受伤)。这是二月革命后俄国的第一次政治危机。结果外交部长米留科夫和军事部长古奇科夫退出内阁，维·米·切尔诺夫、亚·费·克伦斯基、伊·格·采列捷利等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袖进入临时政府。

4<sup>①</sup>

**《新生活报》，1917年俄历7月19日  
(公历8月1日)，第78期**

这是残酷的、毫无意义的大屠杀的三年，在这三年中人间最优秀的民族的鲜血在日复一日地流淌，欧洲有文化的民族的最宝贵的头脑在遭到消灭。

“人类的领袖”法兰西元气大伤，“上帝给予我们忧伤的大地的最好的礼物”意大利精疲力竭，“平静教导世界创造劳动奇迹的”英吉利强撑着调动自己的全部力量，“勤劳的日耳曼民族”在战争的铁钳中忧愁地喘息。

比利时、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波兰等被消灭了；精神上富于幻想的、意志薄弱的罗斯经济上破产了，精神上腐化堕落了，而这个国家还不曾生活过，还没有来得及向世界展示自己潜在的力量呢。

19世纪，欧洲在它现在用大炮摧毁的教堂里，在现在被士兵们当作劈柴烧的书籍中，大力宣传人道；而在此后的20世纪里，人道主义被遗忘了，遭到了嘲笑，由科学界的无私工作创造出的一切都按无耻的杀人凶手们的意志，被搜罗起来，用于杀人了。

同这场噩梦般的为时三年的大屠杀相比，以往的三十年战争和百年战争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怎么能找到为这种空前的反对全球文化的罪行辩护的理由呢？

对于这种令人厌恶的自我消灭是无法辩解的。不管伪君子们在战争的“伟大的”目的上撒了多少谎，他们的谎言也掩盖不住这一可怕而耻辱的真相：产生战争的是利润，这“现实的政治家们”，

即以人的生命作交易的杀人凶手们所信仰和祈祷的唯一的**神**。

那些坚信世界大同的理想将会胜利的人被全世界的混蛋们宣布为不爱祖国的有害的**疯人**、没有心肝的**幻想家**。

人们忘记了在这些幻想家中，有**基督**、**约安·达马斯金**<sup>②</sup>、**方济各**<sup>③</sup>、**列夫·托尔斯泰**等数十位人类引为骄傲的半神半人者。对于那些为了把数百俄里方圆他人土地掠到自己手里的人来说，对他们来说，既没有上帝，也没有魔鬼。对于他们来说，人民比石头还廉价，对祖国的爱只是一种习惯。他们喜欢像他们现在这样生活，即使整个地球都化成灰烬散落在宇宙里，他们也不想不像他们习惯了的那样生活。

这不，现在他们已经在齐喉深的血泊中生活了三年，那血是千百万人按他们的意志洒下的。

但是当人民群众的力量消耗殆尽的时候，或者当他们“向往纯洁的、人道的**生活**”的意志一下子点燃起来并结束血腥的噩梦的时候，那些屠杀欧洲人民的人们，就将胆怯地叫喊：

“这不是我们的过错！不是我们把世界搞得面目全非，不是我们摧毁了并抢光了欧洲！”

但是我们希望，到那时“人民的声音”将真正成为威严而公正的“上帝的声音”，那它就将压倒谎言的号叫。

相信无耻和疯狂必将被战胜的人们应该争取把自己的力量团结在一起。

理智将最终取得胜利。

#### 注释：

① 本篇系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三周年而作，在《新生活报》上发表时标题是《三年》。曾被收入《革命与文化》一书。

② 约安·达马斯金(约 675—753)——拜占庭神学家、哲学家兼诗人。

③ 见本书正文第 37 篇注②。

5<sup>①</sup>

**《新生活报》，1917年俄历7月20日  
(公历8月2日)，第79期**

在旧制度时期，有一些人曾经冷静地冒着失去人身自由的危险，不顾自己的前程，在政治审判中勇敢地充当辩护人，给了专制制度以不少打击。有一位律师就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对君主制下无权和无耻状况有出色的深刻了解的人，日前他对我说：

“我还是像在尼古拉·罗曼诺夫<sup>②</sup>时期一样在匆忙组织的政治审讯中充当辩护人；囚犯们的母亲、妻子、姐妹还是像那时一样到我这里哭诉和诉说；当局‘鬼使神差’地捕人，被捕的人被关在令人厌恶的环境中，全都像过去一样；‘新制度’的官吏们仍然像以前那样官僚主义地、毫无心肝地对待被审讯者。我觉得，在我这行业里，没有好的变化。”

但是我想，在这一方面应该预料到一些可能的坏变化。在君主制时代，罗曼诺夫的驯顺的奴仆们有时也不拒绝这种快乐：闹一闹自由主义，批判一下制度，就人道主义的话题发发牢骚并且泛泛地、稍微卖弄一下自己的好心肠，向不自由的伙伴表示一下，在铁杆官吏的心中，善良的本质还没有被保卫腐物和垃圾的勤勉工作消灭干净。

最聪明的人们大概懂得，“政治家”从实质上讲对他们来说不是有害的人，“政治家”在为俄国的解放工作的同时，也在为把官吏从有点蛮横无礼的“上层政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而工作。

现在，专制制度没有了，可以充分地展示从严厉的命令的俘虏

中解放出来的“心灵的美”了。

现在,旧制度的官吏,立宪民主党人或十月党人,作为被逮捕的民主主义者的死敌站在他的面前,自由主义的马尼洛夫精神对任何人都是不需要的和不合适的。

从党派和政治斗争的观点看,这一切都是极为自然的,但是“从人类的观点看”,却是卑鄙的,而且随着民主派和他们的敌人之间关系的不可避免的尖锐化,还将变得更加卑鄙。

**注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专栏中,曾被收入《革命与文化》一书。

② 尼古拉·罗曼诺夫——即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 6<sup>①</sup>

有人在一张肮脏的街头小报<sup>②</sup>上写了他的皇村之行的印象。在那篇供街头消遣的，讲述尼古拉·罗曼诺夫怎样锯木柴，他的女儿们<sup>③</sup>怎样在菜园里干活的文理粗糙的短文中，有这样一段：

一位水兵用轮椅推着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sup>④</sup>。她人变瘦了，脸也变瘦了，穿着一身黑衣服。她在女儿们的帮助下从轮椅上走下来，左腿很厉害地跛着……

“瞧，病人”，人群中有人说道：“腿都断了……”

“该让格利沙<sup>⑤</sup>到她这儿来，”人群中有人在嬉笑着说：“那就立刻好了。”

一阵响亮的哄笑。

放肆地嘲笑病人和不幸的人——不管他是什么人，是一件卑鄙而下流的事。放肆嘲笑的是一些五个月前诚惶诚恐地对待罗曼诺夫家族的人，虽然当时他们也模模糊糊地懂得他们在俄国的作用。

但是问题并不在于快乐的人们放肆地嘲笑一名女子的不幸，而在于那篇短文署着犹太人的名字约·海辛。

我认为应该提醒海辛先生读一读博杜安·德·库尔特奈<sup>⑥</sup>发表在文集《盾牌》<sup>⑦</sup>中的一篇文章<sup>⑧</sup>里的几行话：

“手提箱在车厢里被人拎走了。小偷是一名波兰人。但是人们却不说是‘波兰人’偷的，而只是说‘小偷’偷的。”

“另外一次偷东西的是俄罗斯人。不过这一次也没有说是俄罗斯人偷的，而只说是‘小偷’。

“但是如果箱子落在犹太人手里，那就不是简单说‘小偷’，而要说‘犹太人’偷的了。”

我想，海辛先生与同他相类似的“风习作家”——例如达维德·艾兹曼<sup>①</sup>等人——应该明白这一道理。要知道，对于他们的这些文章，人们也会说，写这些东西的不只是被激怒到愚蠢程度的人，而是“犹太人”。

未必能找出一个糊涂到能根据我说的这些话而怀疑我是反犹太主义分子的人。

我认为，根据现时的环境，应该指出，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俄罗斯人对犹太人的态度和犹太人对俄罗斯人的生活现象的态度问题那样需要很强的分寸感和道德的灵敏感。

这决不是说，在罗斯存在着一些鞑靼人或犹太人不应该用批评触及的事实，但是一定要记住，即使一个无意的错误——更不要说有意识的卑劣行径，即使这一行为是出于讨好街头本能的真诚愿望而作的——也可能被说得不仅对一个凶恶的或愚蠢的犹太人，而且对全体犹太人有害。

### 注释：

① 本篇原为上一篇的一部分，高尔基在准备再版《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时将其分出单列为一篇（即计划再版的第13篇）。

② 本篇在《新生活报》上刊出时曾对此加了脚注：“《鲜活的词语报》。”

③ 尼古拉二世夫妇除生有一子阿列克赛（1901—1918）外，还生有四女：奥尔迦（1895—1918）、塔吉雅娜（1897—1918）、玛丽娅（1899—1918）和阿纳斯塔茜娅（1901—1918）。

④ 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1872—1918）——沙皇尼古拉二世之后。详见本书正文第14篇注①。



⑤ 格利沙——即格·拉斯普京。见本书正文第14篇注②。

⑥ 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博杜安·德·库尔特奈(1845—1929)——俄国和波兰语言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1897起)。第一个提出音位和语音交替理论,区分了历时性和共时性。对普通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写有斯拉夫语言学、俄语和波兰语方面的著作。校订并补充了达里词典。

⑦ 文集《盾牌》——1915—1916年间由高尔基创办的“俄罗斯研究犹太人生活协会”出版。许多俄国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为文集撰稿。文集编辑为列·安德烈耶夫、高尔基、费·索洛古勃。参见本书正文第30篇注⑤。

⑧ 指博杜安·德·库尔特奈在文集《盾牌》(第三版,莫斯科,1916)中发表的文章:《独特的“连环保”》。

⑨ 达维德·艾兹曼(1869—1922)——俄国作家。1905年革命时期靠拢以高尔基为首的“知识”出版社的现实主义作家群。反动时期曾著名噪一时的中篇小说《血泊》、剧本《荆棘丛》,用对人民的血腥场面的描写排斥对人物的心理刻画。

7<sup>①</sup>

**《新生活报》，1917年俄历6月29日  
(公历7月12日)，第61期**

口头上大家都同意，俄罗斯国家已经千疮百孔，像一条洪水中的旧驳船那样正在解体。

好像对于进行文化建设的必要性没有人表示过反对。而且大概谁也不会出来反对这一观点：我们大家都必须极端审慎地对待人，非常细心地对待事实。我们还从来不曾如此残酷地需要对激愤到最底层的生活中的现象，对那些以我国的中国式的崩溃威胁我们大家的现象作出准确而勇敢、真实的评价。

但是我们的评价、结论、计划从来不曾像在这些悲剧式的日子一样具有如此严重的可悲的匆忙性。

我当然完全赞同一本关于乔治·桑的好书的作者弗·卡列宁的讽刺的话：

“政治家——保守派或自由派——是一些坚信自己知道真理并有权惩罚别人的迷误的人……”<sup>②</sup>只是为了公正起见，我想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之后再加上激进的革命者和社会主义的新信徒们。

“夺权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胜利者的周围只剩下一些朽木和过火木块时，他们又将对什么东西行使权力呢？

对政治的迷醉好像完全排斥了对文化事业的健全兴趣，这对于一个患病的国家及它的居民——这居民的大多数的头脑是稀里糊涂的——未必是有益的。我谨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发展和传播精密科学自由协会”<sup>③</sup>在民主派群众中唤起了对它的任务的极度

关注。

请看这些例子：尼热哥罗德龙骑兵团的“辎重兵们”在把自己的一笔捐款寄给“科学研究所”<sup>④</sup>的基金会的同时写道，“协会是伟大的民族的事业。”波尔塔瓦职员联合会把科研所称作“全民的事业”，等等。可以举出数十条士兵、工人、农民们的反应，而所有这些反应都证明他们渴望教育，深深明白必须立即进行文化建设。

首都的报刊对这件事却是另一种态度：当“协会”把关于它的目的和困难的呼吁书<sup>⑤</sup>寄给彼得格勒的各大报纸后，除了《新生活报》外，这些报纸中没有一家刊登过这份呼吁书。目前，正在筹建一座“纪念自由斗士陈列馆”<sup>⑥</sup>，这是一个类似社会科学和公民教育研究所的机构，对于这件事只有《话语报》一家写过几行同情的话。

一个叫“社会教育联盟”<sup>⑦</sup>的组织也正在筹建之中，其任务包括关心街头学龄前儿童的教育。这是同流氓行为作斗争的好方法，这也提供了向儿童的心中播撒公民精神的种子的可能。

首都报刊的“自由言论”对此一言不发。它对已经团结起上万名年龄为13到20岁的青少年的“党外青年联盟”也缄口不语。文化建设正在外省开展起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数十个村镇和县城里都在筹建“人民之家”<sup>⑧</sup>，人们表现出对科学、对知识的强烈追求。

首都的报刊对这一具有拯救性的现象沉默不言，它们一个劲儿地带着某种荒唐的无激情的热烈劲儿用无政府主义恐吓庸人，这样它们也就加剧了无政府状态。

彼得格勒的报纸给人以杂乱无章的“可怕的审判”的印象，在这一审判中所有的参加者都是法官，同时他们又都被无情地指控有罪。

如果相信我们的那些有影响的报纸的话，那么在“神圣的罗斯”就根本没有诚实和聪明的人了。如果同意记者们的描写的话，

那么革命就是我们的不幸，它既腐蚀了我们大家，又使我们大家丧失了理智。那就太可怕了。如果不是太愚蠢的话，这不是由“急躁和激动”引起的。有人说，街头已经形成了一种对人的令人厌恶的粗暴态度。不，这不是真的！

在夜间的街头集会上，人们热烈地讨论着当前最尖锐的问题，但是几乎听不到人身污辱、激烈的言辞、谩骂。

报纸上却很糟糕。

“混蛋。”一家报纸在谈到某些和自己观点不同的人们时这样写道。窃贼、骗子、笨蛋这些词成了完全通行的词；“叛徒”一词使用得极为频繁，就像在旧时的酒店里经常使用的喊人的词“人”一样。

这种肆无忌惮的作法、这些空洞无物的词语使人们忧郁而不安地怀疑报纸关于文化的死亡、拯救文化的必要性的呼号的真诚。这不是心灵的呼喊，而是策略性的口号。但是尽管如此，文化确实处于危难之中，应该真诚地感觉到这一危难，必须勇敢地与之斗争。

我们有能力这样做吗？

顺便写一条可以说明报刊对事实的态度的消息。这是同一天的两家报纸上的事。

一家报纸写道：

“星期日晚上，在鲍戈斯洛夫斯科耶公墓，哥萨克少尉费奥多罗夫用军刀劈烂了无政府主义者阿斯宁墓前的花环盒和几面旗帜。当时在公墓里的第三维堡分区的民警们扣留了这名少尉并把他带到了委员部，在那儿将费奥多罗夫破坏公共场所秩序的事作了笔录。一小时后，为数 15 人的一群无政府主义者来到了委员部，提出了将被扣留的人交给他们的要求。委员拒绝将费奥多罗夫交给无政府主义者，而将他送到了波柳斯特罗夫斯基分区的

卫戍司令部,从那儿这位少尉在一小队哥萨克骑兵的保护下被送回了家中。”<sup>⑨</sup>

另一家报纸写道:

“据传,在为被杀于杜尔诺沃<sup>⑩</sup>的别墅的‘无政府主义者’阿斯宁举行的葬礼上发生了一起险些酿成流血冲突的事件。

“无政府主义者不知为什么选择了东正教的鲍戈斯洛夫斯科耶公墓作为埋葬阿斯宁的地方,还在坟上竖了十字架。

“当时偶然也在公墓里的一些哥萨克抗议将阿斯宁葬于鲍戈斯洛夫斯科耶公墓,然后又拆除了坟上的十字架。

“无政府主义者想要保卫坟墓,但是哥萨克们拔出军刀,制止了他们。”<sup>⑪</sup>

这是不同的事实吗?

不,这只是对同一事实的不同描写。

如果一个习惯于思考的人读了第二篇报道,他就当然要有些怀疑,例如怀疑无政府主义者立十字架一事。而拆除坟上的十字架一事又将使信教的人感到受了污辱。庸人在读到“拔出军刀”时又会再一次地颤抖。

在对比两篇短文的同时,人们自然要问: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子?

更加自然的是,人们将怀疑“自由言论”这“上帝的奇迹中的奇迹”<sup>⑫</sup>的教育意义。

但是我们会不会在我们如此热心制造的污泥浊水中被呛坏呢?

#### 注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专栏中,曾被收入《革命与文化》一书。

② 引自弗·卡列宁(瓦尔瓦拉·科马罗娃的笔名,1862—1942)的著作《乔治·桑——她的生平与著作(1804—1838)》(圣彼得堡,第1卷,1899)。

③ 参见本书正文第24篇及其注⑤。

④ “自由协会”成立后不久就提出了组建“科学研究所”的设想,该所的任务是集中生物学、医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等多种学科的力量,开展增强人的生命力和健康的研究工作。“自由协会”曾发表过请求帮助这一“科学研究所”的呼吁书。高尔基曾在公共演讲及私人通信中号召人们为“科研所”的基金捐款。

⑤ 即附录二中的《精密科学自由协会》一文。

⑥ “纪念自由斗士陈列馆协会”成立于1917年6月4日(俄历5月22日),高尔基是协会领导人之一。协会负责搜集有关俄国解放运动的材料、有关争取自由斗士的生平及社会活动的文献,以供将来成立的陈列馆陈列,同时在公民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⑦ “社会教育联盟”成立于1917年6月17日(俄历4日),其宗旨为保护儿童和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向他们提供社会与医疗帮助。高尔基曾积极参加联盟的活动。

⑧ 见本书正文第39篇注③。

⑨ 引自1917年7月10日(俄历6月27日)的《新时代报》,但文字多有出入。无政府主义者阿斯宁是在其同伙无政府主义者们的盘踞的杜尔诺沃的别墅拒捕时被打死的。盘踞在杜尔诺沃的的别墅中的无政府主义者中就有本书正文第29篇中提到的热列兹尼亚科夫。

⑩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杜尔诺沃(1845—1915)——沙皇的反动官僚分子,1905—1906年间曾任内务大臣,以残酷手段镇压1905年革命。

⑪ 引自当天的《话语报》。

⑫ 不准确地引自康·谢·阿克萨科夫(1817—1860)的诗《自由言论》。

8<sup>①</sup>

**《新生活报》，1917年俄历10月18日  
(公历31日)，第156期**

这样一种传闻的势头越来越强劲：10月20日，将要有一次“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换言之，7月3日至5日的令人厌恶的场面<sup>②</sup>将要重现。又将有一些人用因为害怕而颤抖的手握着步枪和手枪，紧紧地挤在运货的汽车里，那些步枪又将要随意地向商店的玻璃、向人们射击！这些步枪之所以要射击，只是因为用它们武装起来的人们想要消除自己的恐惧感。被混乱的生活、谎言和政治的污物所激怒的人群的所有的阴暗本能都将爆发起来，散发出臭气，用怨忿、仇恨、报复来毒害人们；而人们则将互相残杀，而无法根除他们自身的野兽般的愚蠢。

爬到街上去的是一些弄不懂自己想要些什么的人群，而冒险家、窃贼、职业杀手们则将以他们作掩护，开始“创造俄国革命的历史”了。

一句话，那场我们已经见过的，在全国范围内毁坏了革命的道德意义并动摇了革命的文化内涵的毫无意义的血腥大屠杀又将重演了。

非常可能，这一次，事件将带上更强的血腥气，更大的破坏性，将给革命带来更加沉重的打击。

到底是谁，到底为什么需要这一切呢？社会民主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们的中央委员会显然没有参与这场估计中的冒险活动，因为直到今天为止，它还没有作出任何肯定关于眼前这次行动的传

言的表示,虽然它也没有否定这些传言。<sup>①</sup>

提出下面的问题是很恰当的:难道有这样的冒险家,他们看到无产阶级中有觉悟的那一部分的革命干劲低落了,于是就想用大量流血的办法来激发这种干劲?或者这些冒险家想要加快打击反革命,所以为了这一目的在力图瓦解很困难地组织起来的力量?

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有责任驳斥有关 20 日行动的传闻<sup>②</sup>,它应当这样做,如果它真的是一个有力的和自由行动的、能够指挥群众的政治机关,而不是厚颜无耻的冒险家们或丧失理智的狂热分子们手中的工具的话。<sup>③</sup>

#### 注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时的标题是《不能沉默!》,曾被收入《革命与文化》一书。本篇及其后的几篇反映了高尔基后来多次公开承认的“迷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同列宁既互相尊重、又不无冲突的平等友好关系及列宁对高尔基的宽容态度。

② 指 1917 年 7 月的俄国政治危险。参见本书正文第 5 篇注①。

③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1917 年 10 月 23 日、29 日(俄历 10 月、16 日)的两次会议上都讨论过武装起义问题;在 29 日的会议上通过了立即行动的决议。高尔基显然知道这一情况。而且在和本文同日发表于《新生活报》上的党中央委员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的声明中,加氏与季氏批评了立即举行武装起义的主张。中央委员会在武装起义问题上的分歧(中央委员会里有 6 人支持加氏和季氏的主张)给了高尔基以希望,他认为党的领导不会加剧事态的发展,因此他要求批驳传闻。

④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在决定举行武装起义时并未确定起义日期。但报刊和舆论普遍认为起义将在 11 月 2 日(俄历 10 月 20 日)举行,因为这一天是苏维埃代表大会预定开幕的日子(会议日期曾多次变动)。

⑤ 《新生活报》在刊登本文后的第二天发表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的声明,声明否认已确定武装起义的准确日



期,但坚决表示:“当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认为必须采取这一行动时,全体工人阶级、全体革命的卫戍部队都将在苏维埃的革命旗帜下行动的。”

9<sup>①</sup>

**《新生活报》，1917年俄历11月7日  
(公历20日)，第174期**

被列宁和托洛茨基从彼得保罗要塞放出来的社会主义者部长们<sup>②</sup>分头回到了各自的家里，而把他们的同志米·弗·贝尔纳茨基<sup>③</sup>、亚·伊·科诺瓦洛夫<sup>④</sup>、米·德·捷列宪科<sup>⑤</sup>和其他人留在那些对于个性自由、人权毫无概念的人的掌握之中。

列宁、托洛茨基和他们的同道已经中了权力的腐毒，他们耻辱的对待言论自由、人格和那种种权利——民主派就是为这些权利的胜利而斗争的——的态度就说明了这一点。

盲目的狂热分子们和没有良心的冒险家们在拼命奔跑，好像是踏着通向“社会革命”的道路，但是实际上这却是一条通向无政府主义状态、通向无产阶级和革命的死亡的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列宁和他的战友们认为可以犯一切类似彼得堡城郊的屠杀<sup>⑥</sup>、毁坏莫斯科<sup>⑦</sup>、消灭言论自由<sup>⑧</sup>、毫无意义地逮捕人的罪行，干普列维<sup>⑨</sup>和斯托雷平<sup>⑩</sup>干过的所有卑鄙的事情。

当然，斯托雷平和普列维是反对民主派的，是反对俄国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正直的事物的，而跟着列宁走的是工人中的相当大的(暂时)一部分，但是我相信，工人阶级的理智、工人阶级对自己历史任务的意识将很快打开无产阶级的眼界，使他们看到列宁许诺的全部不可实现性，看到他的不理智的全部严重性和他的涅恰耶夫—巴枯宁式的无政府主义。

工人阶级不会不明白，列宁只是在用他们的皮、用他们的血做

一场试验，他力图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情绪发展到最极端的程度，以便看一看结果到底会怎么样？

当然，他们并不相信俄国现有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可能胜利，不过，也许他们在希望发生奇迹。

俄国工人阶级应该知道，现实中是没有奇迹的，等待他们的是饥饿、工业的全面瓦解、交通运输的毁灭、长时期的血腥的无政府状态，而在这之后则是血腥气毫不消减的黑暗的反动。

这就是无产阶级今日的领袖引导他们所奔的方向，所以应该明白，列宁并不是万能的术士，而是既不怜惜无产阶级的名誉，也不怜惜他们的生命的冷静的魔术师。

工人们不应该允许冒险家和疯子们把可耻的、毫无意义的和血腥的罪行推到无产阶级的头上，为这些罪行付出代价的将不是列宁，而是无产阶级自己。

我要问：

俄国民主派是否还记得，他们过去是为什么样的思想的胜利而同专制主义进行斗争的？

他们是否认为自己现在还有能力继续这一斗争？

他们是否还记得，当罗曼诺夫家族的宪兵们把他们的思想领袖投入监狱和苦役场时，他们称这种斗争手法是卑鄙的手法？

列宁对言论自由的态度同斯托雷平、普列维和别的野人们的态度有什么不同呢？

列宁的政权捕捉一切不用同一种方式思考的人并把他们关进监狱的做法不也是和罗曼诺夫王朝政权做这些事时的一样吗？

为什么贝尔纳茨基、科诺瓦洛夫和联合政府的其他成员还被关在要塞里，难道他们有什么比他们的那些被列宁释放了的社会主义者同志们更严重的罪行吗？

对于这些问题的唯一诚实的回答应该是立即要求释放那几名部长和其他无罪被捕的人，另外还要完完全全地恢复言论自由。

然后，民主派中的明智分子应该作出进一步的结论，即应该弄清，他们和涅恰耶夫类型的阴谋家及无政府主义者是否同路？

### 注释：

① 本篇发表时的标题是《致民主派》，曾被收入《革命与文化》一书。

②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夜，在彼得堡爆发了十月革命，即十月武装起义。次日凌晨2时10分，起义者在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的主要成员，但临时政府总理兼最高总司令克伦斯基已在起义前逃离彼得堡。除克氏外，政府部长中的社会主义者有：内务部长尼基金（孟什维克）、劳动部长格沃兹捷夫（孟什维克）、司法部长马梁托维奇（孟什维克）、粮食部长普罗科波维奇（无党派社会民主党人）和土地部长马斯洛夫（社会革命党人）等。不久，他们被苏维埃政权释放。其中几人获释后在地下继续行使临时政府的职能：下达反革命指令，从国家银行提取近4千万卢布资金，部分用于支付息工官员的薪金。地下临时政府只存在到1917年11月29日（俄历16日）。

③ 见本书正文第7篇注⑤。

④ 见本书正文第7篇注④。

⑤ 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捷列宪科（1886—1956）——俄国资本家、糖厂主。1917年曾先后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在米留科夫之后）。1917年11月7日夜被起义者逮捕。获释后逃往国外。曾参与组织反对苏维埃俄国的外国军事干涉。

⑥ 指1917年11月12日（俄历10月30日）克拉斯诺夫将军率领的哥萨克骑兵部队和彼得格勒革命武装之间在普尔科沃和皇村一带进行的战斗。克拉斯诺夫军队的唆使者和组织者是逃匿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克伦斯基，其目的是夺取彼得堡，推翻苏维埃政权。经过数小时激战，哥萨克骑兵被击溃，克拉斯诺夫率部退守加特契纳。两天后革命军队攻占加特契纳。克伦斯基逃跑，克拉斯诺夫被逮捕。

⑦ 指1917年11月10日至16日（俄历10月28日至11月3日）在莫斯科武装起义期间，莫斯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指挥的武装同士官生及其他反革命武装之间的战斗。战斗以起义武装攻占克里姆林宫及政权转到苏维埃手

里而告终。

⑧ 1917年11月8日(俄历10月26日),即十月革命爆发的第二天,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查封了多家被认为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右翼报纸和自由派报纸。11月9日,列宁签署的《出版法令》肯定了这一作法,但该法令同时指出:“现在的状况具有临时的性质,俟社会生活的正常条件出现,这一状况就将特令改变。”托洛茨基对查封报纸的作法做了如下解释:“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们是怎样理解这几个字的呢?在他们看来,就是贸易自由。”对他们来说,出版自由就是从他们为出版报纸而投入流通的资本中取得利润的自由。但是“千百万工人、农民、士兵和所有的穷人”既没有出版社,也没有印刷厂和资金,而像《新时代报》的出版人苏沃林这样的资产者却有各种向伟大的革命“倾泻谎言和中伤的激流”的可能。他们关于“言论自由”的叫喊“软化了所谓民主派知识分子,即浮浅的小市民的心”。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连“像高尔基或柯罗连科这样无疑是正派的,没有被小市民环境猥琐而庸俗的成见浸染的人,也准备为对《新时代报》的出版自由采取的强制措施而流泪。”托洛茨基的这些话颇为通俗地表达了当时俄国无产阶级对出版自由问题的立场。

⑨ 维亚切斯拉夫·康斯坦丁诺维奇·普列维(1846—1904)——俄国内务大臣兼宪兵司令(1902—1904),极端反动分子,后在彼得堡被社会革命党人索佐诺夫刺杀身亡。

⑩ 见本书正文第16篇注⑤。

10<sup>①</sup>

**《新生活报》，1917年俄历11月10日  
(公历23日)，第177期**

弗拉基米尔·列宁用涅恰耶夫<sup>②</sup>的“开足马力冲过沼地”<sup>③</sup>的方法在俄国推行社会主义制度。

无论是列宁、托洛茨基，还是所有其他陪同他们在现实的泥沼中走向死亡的人们，他们显然和涅恰耶夫一起坚信：“用败坏名誉的权利能够最为轻易地吸引俄国人跟在自己后面。”<sup>④</sup>所以他们现在就冷静地玷污革命，玷污工人阶级，迫使他们制造血腥的屠杀，唆使他们去掠夺，去逮捕像安·弗·卡尔塔舍夫、米·弗·贝尔纳茨基、亚·伊·科诺瓦洛夫等人一样的无辜的人。

列宁和他的追随者们在迫使无产阶级消灭出版自由之后，也就以此为民主派的敌人把堵住民主派的嘴的权利变成合法的了。在对所有不同意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专制主义的人用饥饿和抄家相威胁的同时，这些“领袖们”竭力为政权的专制主义辩护，而国家的最优秀的力量长期进行艰苦的斗争所反对的就是这种专制主义。

一起跟在列宁和托洛茨基后面的“小学生和傻瓜们”<sup>⑤</sup>的听话程度“达到了极点”。这些小学生和傻瓜们背地里骂着自己的领袖，时而离开他们，时而又靠向他们，最后还是驯顺地在为教条主义者们的意志服务，因此就越来越强烈地在最愚昧的士兵和工人群众中激起不可能实现的过无忧无虑的日子的希望。

列宁主义者把自己想象成社会主义的拿破仑，他们撕打掷抛，在把俄国最后彻底摧毁，而俄国人民将为此付出血流成河的代价。

列宁本人当然是一个具有超凡力量的人；25年来，他一直站在为社会主义胜利而奋斗的第一流斗士的行列中，他是国际社会民主派的最伟大和卓越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天才的人，他具有“领袖”的所有品质，还具有这一角色所必需的无道德和对待人民群众的生命的老爷式的无情态度。

列宁是“领袖”，也是俄国贵族，这个已经消失的阶层的心理品质列宁并非没有，而正是因此他认为自己有权拿俄国人民做一次预先注定要失败的残酷的试验。

被战争折磨得疲惫不堪并且破了产的人民已经为这一试验付出了数以万计的人的生命，而且还将被迫付出数以万计的人的生命，这将使他们在很长时间里群龙无首。

这一不可避免的悲剧并不能使列宁感到难为情，他是教条的奴隶，而他的追随者们则是他的奴隶。列宁并不熟悉极其复杂的生活，他不了解人民群众，没有同他们一起生活过，但是他——从书本上——得知，用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些群众鼓动起来，用什么办法可以——最轻松地——激起他们的本能。工人阶级对于列宁，就像矿石对于冶金者一样。是否可能——在目前的所有条件下——用这种矿石炼铸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呢？看来，不可能；但是为什么不试一试呢？即使试验不成功，列宁又冒什么险呢？

他的工作就像实验室里的化学家一样，差别在于化学家用的是死的物质，但他的工作却产生对生活来说很珍贵的结果，但是列宁却在用活的材料进行工作并且在将革命引向死亡。跟着列宁的工人们应该明白，俄国工人阶级正在被用来做一次无情的试验，这一试验将消灭掉工人的最优秀的力量并长期中断俄国革命的正常发展。

## 注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时的标题是《请工人们注意》，曾被收入《革命与文化》一书。

② 谢尔盖·根纳季耶维奇·涅恰耶夫(1847—1882)——俄国革命运动中的极端分子。曾组织秘密团体“人民惩治会”。著有《革命者的基本信念》。主张采取愚弄和挑拨的斗争方法。1869年在莫斯科杀害有脱离其组织嫌疑的大学生伊·伊·伊凡诺夫后逃亡国外。1872年被引渡回俄国。1873年被判处20年苦役刑。死于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涅恰耶夫的主张受到第一国际的谴责和俄国革命者的批驳。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涅恰耶夫式的人物维尔霍文斯基的话。小说中，维氏曾在一次小组集会上向与会者指出了改革社会的两种道路——缓慢的道路(用撰写社会小说的方法影响人)和快捷的道路(彻底放开人们的手脚)，然后他要求与会者：“直截了当地表明，你们怎么样会感到快乐一些：是像乌龟一样在沼地里爬行，还是开足马力冲过沼地？”(陀思妥耶夫斯基30卷集，第10卷，莫斯科，1974，第315—316页)。

④ 此处高尔基讲的是涅恰耶夫，引的却是小说《群魔》中人物的话。在小说中，维尔霍文斯基对斯塔夫罗京说：

“‘您知道，卡尔马津诺夫是怎么说的吗，他说，我们的学说实际上是否定名誉，还说，用公开的败坏名誉的权利能够最为轻易地吸引俄国人跟在自己后面。’

“‘说得好极了！金玉良言！’斯塔夫罗京叫了起来。‘一下子说到点子上了！败坏名誉的权利——这样所有的人都将跑到我们这边来，那边就一个人也剩不下了！’”(同上，第300页)。

⑤ 此处似指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卢纳察尔斯基等不久前还和列宁在一系列策略和理论问题上有过分歧的人。



11<sup>①</sup>

**《新生活报》，俄历 1917 年 12 月 22 日  
(公历 1918 年 1 月 4 日)，第 208 期**

《新生活报》编辑部收到了下面这封信<sup>②</sup>：

“普梯洛夫工厂炮械部。

决议对你们，《新生活报》的作家们表示谴责，对斯特罗耶夫<sup>③</sup>，曾经是作家，还对巴扎罗夫<sup>④</sup>、吉梅尔-苏哈诺夫<sup>⑤</sup>、高尔基和《新生活报》的全部编写者你们的机关报不符合我们共同的生活，你们跟在护国分子后面。但是请记住我们工人的生活无产者不要去碰，用星期天发生的示威游行，不是你们搞的那场游行也不该你们来批评它。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的大多数党和我们支持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使人民摆脱资产阶级和资本家们的压迫的救星们的领袖们，而且今后如果还将写出这种反革命的文章的话那我们工人们发誓请牢牢地记在心上我们将关掉你们的报纸，而如果很想去问你们的社会主义者所谓的中立主义者他在我们的普梯洛夫工厂讲他那些落后的话请你们问他让没让他讲话，而且很快将禁止你们和你们的机关报它开始同立宪民主党人的看齐了。所以如果你们这些苦相的<sup>⑥</sup>、落后的作家们还将继续同政权的机关报《真理报》争论的话那就请知道我们将停止在我们的纳尔瓦-彼得高夫区出售。地址

普梯洛夫工厂炮械部请回信不然将有惩罚。”

写得多么猖狂!

孩子们读古斯塔夫·艾马尔<sup>①</sup>的可怕的书读入了迷并且把自己想象成恐怖的印第安人时才会这样猖狂地说话。

当然,小孩子是应该教育的。为了教育那封怒气冲冲的信的作者或作者们,我要说:

不能像你们这样说话:“不是你们搞的那场游行,也不该你们来批评它。”

对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压迫也“不是我们搞的”,但是我们过去和将来都永远要批评一切压迫人的制度,不管这一制度是谁“搞的”。

信中被点名的那些人曾经同骗子和卑鄙之徒们的专制制度作过斗争,这斗争不是为了用政治上的野蛮人的专制代替原先的专制。

信的作者威胁我们说,如果我们将“继续同政权的机关报《真理报》争论的话,那就……”

是的,我们将继续同那个断送工人阶级的政府争论;我们认为这种争论是我们的职责,即诚实的公民和独立的社会主义者们的职责。

#### 注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时的标题是《蛊惑的果实》,曾被收入《革命与文化》一书。

② 信的译文中保留了原文的文理不通之处。

③ 瓦·斯特罗耶夫(瓦西里·阿列克赛耶维奇·捷斯尼茨基的笔名;1875—1958)——1897年起参加革命运动,在尼日尼诺夫哥罗德、莫斯科及其他城市从事地下工作,高尔基之友,曾协助吸收高尔基参加社会民主运动,1903—1909年为布尔什维克,1905年革命期间曾参与安排高尔基和列宁的第一次会面。曾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6年起),积极为布尔什维克的报刊撰稿。1909年参加高尔基参与创办的卡普里党校的工作。《新

生活报》的主要编辑和政论作家之一。1919年起脱离政治生活,专事教育和研究工作,任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教授。写有关于高尔基生平与创作的研究著作及关于高尔基的回忆录。

④ 弗·巴扎罗夫(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鲁德涅夫的笔名;1876—1939)——哲学家兼经济学家,1896年起参加社会民主运动,1905年革命时期接近布尔什维克,在其后的反动时期曾与鲍格丹诺夫、卢纳察尔斯基等人一起宣传哲学唯心主义和造神论,对高尔基产生过重要影响。1917—1918年间取孟什维克国际主义立场,积极为《新生活报》撰稿。1921年起在苏维埃的计划机构工作。

⑤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苏哈诺夫(真姓:吉梅尔;1882—1940)——早年参加俄国革命运动,1903年起为社会革命党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二月革命期间是与马尔托夫同道的孟什维克,《新生活报》的编辑与主要政论作家,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武装起义路线,认为俄国尚未达到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水平。十月革命后在苏维埃政府的经济部门工作,1931年被判刑。所著《革命札记》(共七卷,柏林,1922—1923)记述翔实,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⑥ 此处影射高尔基,因高尔基这一笔名俄文(Горький)意为“痛苦的”。十月革命后一些思想极端的文人常以此嘲笑高尔基。例如杰米扬·别德内1918年1月13日就在《真理报》上发表嘲讽高尔基的诗作《痛苦的真理》,其最后一节为:“没有鼓舞人的话,只有恶毒的评论和谩骂,/看到痛苦的东西,就变得又恨又怕,/于是我们间的隔膜也就越来越大,/他讲的越来越多的痛苦的抱怨话,/唉!原先他们作品中非常亲切的人物/现在已经再也不会出现啦……/亲爱的人民,你们爱你们的作家,/可是你们被他们骗得多痛苦啊!”

⑦ 古斯塔夫·艾马尔(真名奥利维耶·格鲁;1818—1883)——法国作家,惊险小说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探踪者》(1858)等。

12<sup>①</sup>

**《新生活报》，俄历 1917 年 12 月 24 日  
(公历 1918 年 1 月 6 日)，第 210 期**

大地上一切卑鄙和可恶的东西都是我们已经和正在做的，而我们所向往的一切美好的、理智的东西都生活在我们的内心。

昔日的奴隶今天看到自己的主人无力地、畏惧地被化成了尸骸，这对于暂时还不知有更加符合人的尊严的喜悦——做一名与敌视别人的感情无缘的人的喜悦——的奴隶来说，是一幅极为令人喜悦的景观。

但是人们将体验到做一名与敌视别人的感情无缘的人的喜悦，如果不能相信人间的博爱，那就不值得生活，如果对爱的胜利没有信心，那生活就没有意义。

不错，我们生活在齐咽喉深的鲜血和污物之中，令人厌恶的庸俗的密云包围着我们并使许多人双目失明；不错，有时会觉得，这庸俗毒化了、熄灭了我们在劳动和苦难中产生的所有美好的理想、我们在通往新生的道路上点燃的所有的火炬。

但是人毕竟是人，而且归根到底获得胜利的还是人性，这就是全世界的生活的伟大意义，生活再没有别的意义了。

也许，我们将要灭亡？

与其像我们在二月前那样待在君主制的脏水坑里缓慢地腐烂，不如在革命的烈火中燃烧掉。

我们罗斯显然已经来到了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所有的从心灵深处已被唤醒的人们应该从自己身上洗清和抛掉千百年来积累的

我们生活的污物，消除我们斯拉夫的怠惰，重新审视我们所有的技能和习惯、所有的对生活现象的评价、所有的对思想和对人的评价，我们应该调动起自身的所有力量和本领并且最终以新的勇敢而富有才气的工作者的姿态参加到全人类的建设我们星球的工作中去。

是的，我们的状况带有深刻的悲剧性，但是在悲剧中人是高于一切的。

是的，生活很困难，过多的猥琐而邪恶的东西泛到了生活的表面上，而又没有神圣的义愤用以反对那对生活有致命害处的庸俗、狂暴。

但是，正像普托列马伊达的主教希涅齐<sup>②</sup>所说的那样：

“心灵的安宁对哲学家来说是必需的，高超的舵手只有暴风雨才能培养出来。”

让我们相信，那些在混乱和暴风雨中没有死掉的人将会更加坚强并在自己身上培养出抵御古老的、兽性生活原则的不可动摇的力量。

今天是基督诞辰日<sup>③</sup>，基督是人对于正义和美的向往创造出来的两个伟大的象征之一。

基督是不朽的仁慈和人性的思想，普罗米修斯是群神的敌人，第一个反抗命运的暴动者。人类再没有创造出什么比这两个自己的意愿的化身更伟大的事物了。

总有一天，在人们的心中骄傲、慈善、温顺和争取达到目的时的疯狂、勇敢这两个象征将融成一种伟大的感情，而所有的人都将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意义、自己追求的美好和所有的人之间一致的血肉联系。

在这些对许多人来说可怕的暴乱、流血和敌意的日子里不应该忘记，我们正在沿着伟大苦难的、难以承受的考验的道路走向人的复兴，我们正在成就使生活从过去沉重、生锈的锁链中解放出来

的和平事业。

让我们自己相信自己,让我们顽强地工作吧,一切都在我们的意志之中,除了我们的理性的意志外,宇宙间再没有别的立法者了。

向所有的在事件的暴风雨中感到自己孤独的、心被恶毒的怀疑所折磨的、精神被沉重的痛苦所压抑的人们致以衷心的问候!

也向所有的无罪被囚于监狱的人们致以衷心的问候。

### 注释:

① 本篇曾被收入《革命与文化》一书。最初发表时与收入《革命与文化》一书时,文章开头有这样一段话:

“是的,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阴暗的情欲的暴风雨:过去在我们面前揭开了它自己的深层的内核并让我们看到人被可恶地扭曲到了何等程度;贪婪、仇恨、报复的狂风裹着大雪在我们的周围肆虐,被长时期的奴役激怒的、受尽千百年痛苦折磨的野兽张大了复仇的血口,得意洋洋地,记仇地,幸灾乐祸地嗥叫着。

“但是……”

接下去就是本篇的开头。高尔基在计划再版《不合时宜的思想》时删掉了前面这段话。

② 希涅齐(379—412 或 431)——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生于北非古城基连纳,曾在亚历山大城师从著名女学者希帕蒂亚学习哲学。约在 401 年接受基督教,十年后成为北非普托列马伊达地方的主教。其著作优雅优雅的语体阐述柏拉图关于理念的学说,提倡探究事物内在的哲理意义。

③ 基督诞辰日(即圣诞节)——基督教主要节日之一,俄国东正教会将其定在俄历 12 月 25 日,即公历 1 月 7 日。

13<sup>①</sup>

**《新生活报》，俄历 1917 年 12 月 31 日  
(公历 1918 年 1 月 13 日)，第 214 期**

新年将给我们带来什么？带来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但是为了成为有责任能力的人，必须相信，这些被污秽和鲜血弄脏了的日子是新俄国诞生的伟大的日子。

是的，正是现在，当被关于平等和博爱的说教声震聋了耳朵的人们在大街上抢劫别人，把他剥得精光的时候，当反对私有制的斗争并不妨碍人们野兽般地折磨和杀死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的小破坏者的时候，当“自由的公民们”在做生意中无情且无耻地互相剥皮的时候——在这异常可怕的矛盾的日子里，新的俄国正在诞生。

痛苦的分娩是在旧的生活形式毁坏的喧闹声中，在肮脏军营的腐朽的废墟间进行的。三百年来，人民就在那军营里沉重地喘息，而那军营也把人民培养成卑微而凶狠的和非常无能的了。

在这场我们在最可恶的君主制的铅盖下积累起来的全部下流和庸俗的爆发中，在这场污物火山的喷发中，旧式的俄国人、自爱自怜的懒汉和幻想家正在死亡，勇敢而健康的工作者、新生活的建设者应该来占据他们的位置。

现在的俄国人并不好，比任何时候都不好。他们对自己的胜利果实的牢固性没有信心，并没有体验到自由的喜悦感，他们表现出卑劣的凶狠并且仍然在试验：他们真的自由了吗？这些试验对他们和他们的实验对象来说代价非常昂贵。

但是生活，我们的严峻而无情的教师很快将用必然性的链条将他们捆起来，这些必然性将强迫他们工作，强迫他们在和睦的劳动中忘却一切现在压抑他们的猥琐的、奴性的和可耻的东西。

新人正在被新的存在条件创造出来，新的条件正在创造新人。

没有经历过奴隶制的折磨、没有被压迫扭曲的人在走向世界，这是不会压迫人的人。

让我们相信，这种人将会感觉到劳动的文化意义并将热爱劳动。怀着热爱进行的劳动会成为创造。

只要人学会热爱自己的工作，其余的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了。

#### **注释：**

- ① 本篇曾被收入《革命与文化》一书。



## 附录二 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 发表的其他文章

### 《不合时宜的思想》第 1 篇结尾部分<sup>①</sup>

《新生活报》，1917 年俄历 4 月 21 日  
(公历 5 月 4 日)，第 3 期

在前线，德国士兵正在和俄国士兵进行联欢，我想，引起联欢的不只是身体的疲惫，而且还有人们心中已经苏醒了的对毫无意义的杀戮的厌恶之情。我不想说什么俄国革命的火光不能不在德国士兵的心中点燃起强烈的希望。

也许，敌人们联欢这类事实从数量上说还微不足道，但这决不能贬低联欢的道德和文化意义。是的，很显然，由发号施令的阶级的贪欲发起的可恶的战争将要由士兵们的健康思想的力量，即民主派的力量来结束。

如果是这样，这将是空前的、伟大的，甚至几乎是奇迹般的事

情，它将给人以因自己而骄傲的权利。人的意志战胜了最令人厌恶的和最血腥的怪物——战争的怪物。

勃鲁希洛夫将军<sup>②</sup>指出，“俄国士兵过分的轻信”，他不相信向我们伸出和解之手的德国士兵的真诚，将军在他的命令中说：“对于敌人想要同我们的部队交流的一切企图，永远只应当有一种回答——刺刀和子弹。”

看来，这一命令正在得到执行：昨天，一位从前线回来的士兵告诉我说，当我们和德国人聚集在战壕之间准备谈谈时事时，俄国的炮兵对他们开火了，德国的炮兵也开了火。

有一次，当德国人走到我们的障碍跟前时，俄国人真的用子弹迎接了他们，而当他们回过头往自己那边跑时，他们的人也开始用机枪扫射他们。我竭力心平气和地讲话，我知道，将军们也是在为一种自己职业的“真理”服务，在不久前这种“真理”还是唯一的拥有言论自由的“真理”。

今天，另一种真理也能同样自由地讲话了，这是纯洁的、与罪行无缘的真理，是由人们的团结愿望产生的，不能为可耻的煽动仇恨和敌意的事业以及消灭人的事业服务的真理。

想一想吧，读者们，如果疯狂的野兽的真理战胜了人的理智的真理的话，那你们将会怎么样？

### 注释：

① 本篇是本书正文第 1 篇的结尾部分，高尔基初版《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时未收入。

② 阿历克赛·阿历克赛耶维奇·勃鲁希洛夫(1853—1926)——骑兵将军(1912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初任俄军第八军司令。1916年3月起任西南方面军总司令；1917年6月4日至8月1日任最高总司令，积极支持继续战争的政策。曾根据克伦斯基的要求签署了在作战部队实行死刑的命令。勃

氏是最早承认苏维埃政权的沙皇将军之一，他呼吁旧俄军官保卫祖国。曾任红军骑兵督察员。

## 关于论战

《新生活报》，1917年俄历4月25日  
(公历5月8日)，第6期

某些办报刊的人依照沙皇专制时代创造的传统，在论战时继续使用老办法，竭力“打击”他们不喜欢的人，“对着要害”，“朝着弱点”，“向着心口”。

当然，报纸不是进行平静的学院式争论的地方，但我还是认为，自由报刊应当在自己的版面上发展尊重人格的感情，即使必须刺激别人，那也应当在他给了人们以使用挤压、踢打、扇耳光及其他社会教育方法的充分理由之后。

在思想的斗争中完全没有必要打击人，即使这人体现和持有某一种思想。我千方百计地和坚决地抗议论战中的人身攻击，但我也决没有忘记我自己也曾犯过类似的攻击错误。

《言论报》似乎对我从《光辉报》跳到《新生活报》表示不解<sup>①</sup>——我权称之为不解吧。我认为必须解释一下。

是的，我曾和米·弗·贝尔纳茨基、帕·加·维诺格拉多夫<sup>②</sup>及其他一些我很早就习惯于尊敬的人们一起试着筹办过《光辉报》。<sup>③</sup>

《光辉报》本应是激进民主主义的机关报。我参加过这个党的筹建委员会的一些工作，我相信俄国必须有这个党，它应当把处在右边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左边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人群——尽可能地——全部吸收到自己当中来。我还是在1910年开始考虑筹建这样一个党的，后来我同盖·弗·普列汉诺夫谈过这件事，我记得，

他肯定了这一想法，认为应当组建这样一个有用的党。

在筹办《光辉报》时，我有意识地作了明显的自我限制，对自己实行了某种强制，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sup>④</sup>我并不认为这种强制是犯罪性的，因为由此而受苦的只有一个人，即强制者自己。

《光辉报》里的我的某些可敬的朋友也认为自我限制对他们自己是必须的。

由于某些复杂而阴暗的障碍，《光辉报》没有问世。在此刻，当我们的立宪党人——“沙皇陛下的反对派”<sup>⑤</sup>——都已经脱胎为共和党人，而广大的民主大众在跟着工人阶级走时，我认为激进民主党已经是多余的了。<sup>⑥</sup>

大概会有一些正人君子一定要因为这种“灵活性”（他们对这当然有另一种叫法）而斥责我。我从天性上说是一个并不吝啬的人，我再给这些正人君子一些材料，以便他们将我放在炽烈言辞的篝火上焚烧。在我看来，人应当做他所应当做的一切善良的和有用的事情，哪怕“事业”与他的基本信念并不完全和谐。我从很久以前起就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居民的大多数喜欢空谈和游手好闲的国家里，所以我一生的全部工作就其意义而言，乃是要唤起人们的活动能力。

我认为自己是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有 17 年了，我尽我的能力为这个党的伟大的任务服务，也不拒绝为其他的党效劳，不耻于干任何具体的事情。那些在自己宣传的信仰的压力下变得发木和僵硬的人从来不曾得到过我的同情。我能够从理论上欣赏他们严峻的冷静，但我不会爱他们的。

我还要说：我在各种场合都认为自己是异教徒。在我的政治观点中大概能找到不少矛盾，但我不能，也不想调和这些矛盾，因为我觉得为了我心灵中的和谐，为了我的精神安宁和舒适，我应当用死亡消灭的正是我心灵中最热烈、最痛切地爱活生生的、凡间的

和——请原谅——可怜的俄国人的那一部分。我认为，我说的足够让那些正人君子骂我个“狗血喷头”了。

《人民事业报》的伊凡诺夫·拉祖穆尼克先生指责我在给德国科学家的呼吁书上签字。<sup>①</sup>这份呼吁书的内容我不记得了，我甚至拿不准我读过呼吁书没有。我在上面签字这件事，只是俄国生活中非常多的那种偶然事件里的一件，那些偶然事件的原因是对人的草率态度。但是我并不为自己辩解，也不想指责任何人。我还准备在新的呼吁书上签名，只要它能谴责科学界人士参加兄弟间互相残害的无意义的屠杀这件事。当科学闯入或被强力拉入政治的血腥泥潭时，受害的不只是科学本身的纯洁和自由，受害的还有人类所有的最好的理想和希望，全世界的理智都会受到损害。

在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要对那些从来不犯错误，不醉心于任何事情，行为总是堪称楷模的人表达我的敬意和欣喜。

愿他们英名长存！

#### 注释：

① 指1917年5月3日（俄历4月20日）《言论报》的《报刊》栏中的短评。

② 帕·加·维诺格拉多夫（1854—1925）——历史学家，主张俄英亲善，曾任教于牛津大学并受英王褒奖。

③ 1916年秋至1917年2月，高尔基曾紧张筹办《光辉报》并写信给柯罗连科、勃留索夫、魏列萨耶夫为筹办中的报纸约稿。2月中旬起，高尔基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光辉报》的事暂时告吹。这不是因为我的过错（……）但是我很顽固，会有一份报纸的。”（见《高尔基全集》，第29卷，莫斯科，1955年，第381页）

④ 高尔基在这里所说的“自我限制”是指他作为革命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同科诺瓦洛夫、贝尔纳茨基、维诺格拉多夫等温和自由主义者共同筹办《光辉报》时所作的妥协。

⑤ 立宪民主党党魁帕·尼·米留可夫曾于 1909 年夏声明：“当在俄国存在一个控制预算的立法院时，俄国的反对派就是陛下的反对派，而不是反对陛下的反对派。”这一声明受到 1909 年 11 月立宪民主党大会的赞同。

⑥ 1917 年 3 月 30 日（俄历 17 日），高尔基曾就这一问题给《俄国言论报》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报刊上传说，似乎我在组织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党。请允许我借贵报声明，我仍然像过去一样是社会民主主义者。”

⑦ 这里说的呼吁书指《（俄国）作家、画家和演员的呼吁》，该呼吁书由作家伊凡·蒲宁起草，发表于 1914 年 9 月 28 日的《俄国消息报》上。呼吁书抗议德国人的兽行、德国军队对文化的野蛮破坏，同时指责德国科学家和艺术活动家帮助德军进行无意义的屠杀。高尔基在这一呼吁书上签过名，但随后就感到不安。高尔基在这份呼吁书上签名一事曾受到列宁的批评。

## 噩 梦

(选自日记)

《新生活报》，1917年5月俄历3日  
(公历16日)，第13期

一天早晨，当太阳照进我房间的窗户时，她来到我家，她体态娇小、苗条，穿得很雅致；她进了屋，坐了下来，阳光撒在她的脖颈上、肩膀上，把她的浅色头发染成了一片金黄。她很年轻，看那举止，她受过良好的教育。

她那褐色的眼睛微笑时就像一个有点害羞，又有点因无法克服羞怯而生气的小孩子在神经质地微笑。

她从一只纤细的手上拉下一只手套，皱着眉头看着我，小声地说了起来：

“我知道，我贸然而来有些失礼，您这么忙，您是很忙吧？”

“是的。”

“当然”，她说着点点头，皱起美丽的眉毛。“现在好像大家都准备往新房子里搬一样……”

她叹了一口气，看了看自己的一只穿着昂贵的小皮鞋的脚，接着说：

“我不会耽误您的事的，我总共只需要五分钟。我想请您救救我。”

我微笑着说：

“如果一个人认为，只要五分钟就可以拯救他，那他离死亡还很远呢……”

可是那女人用一双明亮的眼睛直视着我的脸，很认真地说道：



“您知道吗，我当过暗探局的特务……唉，您多么……您那眼睛多么……”

我没有做声，愚蠢地微笑着，我并不相信她，我极力克服某种忧郁的不安的愿望。我相信，她带来了诗、小说。

“这很卑鄙，对吗？”她低声问。

“您开玩笑吧。”

“不，我不开玩笑。这很卑鄙吗？”

我很压抑地嘟囔着说：

“您自己已经作出了评价。”

“是的，那当然，这我知道。”她说着叹了一口气，挪了一下，在扶手椅里坐得更舒服一些。她的脸上显出失望的表情。娇嫩小手的细手指慢慢地摆弄着颈饰的细链。阳光把她的一只耳朵染成了珊瑚的颜色。她整个人都充满着春天的气息、节日的情绪。她匆忙地、杂乱无章地，好像是讲一件淘气事一样说了起来：

“这事发生在三年前……稍微不到一点。我有过一段恋情，我爱上了一个军官，他后来成了宪兵队的副官，就是在那时……我刚刚从学院毕业，进了讲习班。我的家里经常聚集着各种严肃的人们、政治家们……我不喜欢政治，搞不清楚。他向我打听，为了爱情，一切都是可能的，这您同意吗？如果你爱的话，应当什么都干。我非常爱他。而这些人很不讨人喜欢，总是批判。班里的女友们我也不喜欢。除了其中的一个。”

她那孩子般的喃喃话语越来越使我相信，她不明白自己的罪责，对她来说，罪行只是她想起来时不太愉快的胡闹。

我问道：

“他们给您钱吗？”

“噢，没有。不过……”

她想了几秒钟，同时仔细察看着她手上的一只戒指。

“他送给我各种东西——这不，这个戒指和颈饰，还有……也

许,这就是报酬,对吗?”

她的眼睛里冒出了泪珠。

“他是个不幸的人,这我知道。请听我说,”她轻声叫了起来,“如果我的名字被公布出来,那我该怎么办呢?您应当救救我,我还很年轻,我非常热爱生活,热爱人、书……”

我看了看这个女人,我觉得,春天的太阳对我、对她都好像是多余的。阴暗的天气,窗外一片雾霭,街上遍地泥泞,人们个个无言、沮丧,那和她的讲述在一起才显得更加和谐,而春天明朗的天空和人们善良的事业却不行。

对这样的人能说些什么呢?我想不出什么话能打动这位穿着浅色开胸短衫的女子的心灵和头脑。镶着一颗血色红宝石的金戒指紧紧地箍在她的手指上,她赏玩着宝石棱间闪动的阳光,漫不经心地把词语一个接一个地穿在她的感觉的任性的线索上。

“因为爱常常会干出蠢事。”她低细的声音好像在重复电影银幕上庸俗的话语。后来她朝我探过身子,两眼很怪诞地看着我。

“我没法帮助您。”

“是吗?”她低声地问。

“我确信我没办法。”

“不过,也许会有有的。”

她亲切地说着关于人的善良、人的敏感的心说的话,说到基督和另外什么人教导要原谅有罪孽的人——全是些出奇地不得体的和令人厌恶的话。

透过短上衣的开胸,我看到了她的乳房,我不由得闭上了眼睛:那个卑鄙的家伙腐蚀了这个尤物,那个拿诚实人作买卖的坏蛋在抚弄这对乳房时也体会到了诚实人抚爱心爱的女人时的那种兴奋。这太愚蠢了,但是我很想问人,难道这公正吗?

“您看看,我还很年轻,但是这些日子来,我觉得自己是老太婆了。大家都很快活,很高兴,可我却不行。这是为什么呀?”

她这一问题问得很真诚。她缩起身，两只手拄在膝盖上，咬着嘴唇，她的脸色变得苍白，眼里的光也暗了下来。她就像一朵被什么人的沉重的鞋底蹂躏了的小花。

“您出卖过很多人吗？”

“我当然没数过。但是我告诉他的只是我特别不喜欢的那些人的情况。”

“您知道宪兵是怎样对待他们的吗？”

“不知道，我对这不感兴趣。当然，我听说，有些人被关进了监狱，流放到外地了，但是我不问政治……”

她冷漠地说着，就像在讲遥远而枯燥的往事。她很平静，没有一声歇斯底里的喊叫，没有出自痛苦心灵的哭嚎，没有任何说明痛苦的表现。也许，在同自己心爱的人吵了一小架之后，她觉得自己太坏了，更加激动了。

她又说了两三分钟，然后站起来，对我和善地点了点头，迈着喜爱跳舞的女人的轻盈步伐朝门口走去，一边走一边说道：

“想起来，人也太残酷了。”

我真想对她说：

“您想到这些已经有点晚了。”

但是我没有做声，努力克制着掩饰住忧郁而狂暴的心情。

她走到门口，停下来，身子不动，优雅地转过脖颈，说道：

“可当我的名字被公开之后<sup>①</sup>，我的亲人们、朋友们会怎么样呢？您想想看！”

“您自己为什么早不想这些事呢？”

“可谁能想到会发生革命呢？”她叫道。“这么说，您没什么要对我讲的了？”

我不太大声地说：

“对您没什么讲的。”

她就走了。

我认识古罗维奇<sup>②</sup>、阿泽夫<sup>③</sup>、谢列勃里亚科娃<sup>④</sup>以及其他许多叛徒：在不久前公布的他们的名单中，有十几个人是我的熟人，他们称我“同志”，我当然也相信他们。当他们的名字一个接一个被曝光时，我感到好像有人在无情而恶毒地、嘲讽地往我的心中吐唾沫。这是对我相信人的信念的一次最卑劣的嘲笑。

但是最可怕的罪行是孩子的罪行。

当这女人走了之后，我怀着迟钝而平静的绝望之情想了想：

“现在难道不是我该自杀的时候吗？”

两三天以后，她又来了，穿着一身黑衣服，显得更加韵味十足。穿着丧服的她看上去要老成一些，她那可爱的、洋溢着朝气的脸变得庄重了，严肃了。看得出她喜欢彩色宝石，她的短上衣上别着钻石胸针，挂着一枚红宝石。

“我知道，我让您讨厌”，她说，“但是除了您之外，我没有人可以商量。我习惯了相信您，我觉得，您爱人们，甚至有罪的人们，但是您是这么冷酷无情，铁石心肠……真怪！”

“是的，是很怪。”我接过她的话，笑着说，我心里想，生活是多么不知羞耻地在强奸着人们啊。因此我感到自己在这位女子面前是有罪的。有什么罪？我弄不清楚。

她说，有一个人准备和她结婚。

“他上了点年纪，甚至可以说是个老头儿，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要知道，如果我改名的话，我就要不存在了。”

接着她微笑着，几乎很快活地又说了一遍：

“像现在这样的我就要不存在了，不是吗？”

我真想说：

“小姐！即使大地开始毁灭，天空尘土飞扬，所有的人都因为恐怖而发疯，我也认为，您还将是您现在的这种样子。如果我们意志的奇迹、和平、爱情、我们未曾体验过的幸福将降临大地，我想，您也仍将是您自己。”

但是同她谈话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她过于坚信，对美丽的女人一切都可以原谅。

我说道：

“如果您认为这对您有帮助……”

“唉，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想。我只是害怕。”

她说话的样子很任性，那腔调仍然像淘气够了，现在想叫人们忘掉她的胡闹的孩子。

我没有做声。

于是她说道：

“您能在婚礼上当我的主婚人吗？我没有父亲，也就是说，他和我妈妈离婚了。我不爱他，不理他。请您当吧。”

我否定地摇摇头。于是她跪了下来，说道：

“但是您听我说呀，听呀。”

在她的动作中，有一种表演性的东西，而且她明显地想提醒别人，她是一个女人，她想让我想到自己是一个男人。她很美地扬着头，挺起胸，她就像一朵有毒的小花，她那美丽的小脑袋就像一根雌蕊竖立在上衣花边构成的黑色花瓣之中。

“您如果愿意，我就当您的情人，给您取乐的姑娘，行吗？”她不知为什么用法语问。

我避开她。她轻柔地站起来，说道：

“您关于爱情、关于同情的话都是谎言。一切都是谎言。一切！您写妇女写得真好……在您的笔下她们总是对的，可这也是谎言！再见！”

接着，在临走时，她坚定而凶狠地说：

“您毁了我。”

她消失了，但在我的心中牢牢地留下了一个黑影。也许，这样说不太合适，不太漂亮，但是她把我抛进了关于她、关于我自己的痛苦思考的荆棘丛中。我不会言不由衷地讲我所感觉到的东西。

一个沉重的黑影贴在了我的心上。大概,这也是些蠢话。就像所有的话一样。

难道不是我在为我周围沸腾的生活的全部卑鄙负责,难道不是我在为这于黎明前被叛卖的龌龊玷污了的生活负责?

被释放出来的人民的自发力量在大街上喧闹,千百人的声音像蜂群的嗡嗡声一样透过窗玻璃传了进来。整个城市就像蜂群已经醒来的春天的蜂窝;我觉得,我感到了新词语的清新、强烈的气息,我发现,到处都在酿造新思想的蜜和蜡。

这让我高兴,确实如此。

但是我感到自己让关于一个被强奸的人的紧张思考钉在了一堵颓墙上,而我却不能,不能帮助他,怎么也不能,永远不能……

#### 注释:

① 二月革命后,原沙皇警察厅的秘密档案被发现,暗探局特务的名单曾在报纸上被披露。

② 米·伊·古罗维奇(1861—1914)——中学时代参加革命运动,19世纪80年代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894年起为警察厅当奸细,曾出版合法马克思主义杂志《开端》,为沙皇政府搜集有关青年知识分子革命情绪的材料。高尔基曾因他的告密而于1901年春被捕并遭监禁。1902年古罗维奇的特务活动被揭露,后任警察厅高官。1906年退休。死于雅尔塔。

③ 叶·费·阿泽夫(1869—1918)——社会革命党领导人之一,警察厅秘密特务,其奸细叛卖行为耸人听闻,例如1905年他出卖了准备彼得堡武装起义的战斗委员会的几乎全部委员(17人)。1908年出卖了社会革命党的整个战斗组织和“飞行战斗队”(七人被处死)。他破坏了社会革命党的多次重大活动,包括暗杀内务部长杜尔诺沃及沙皇的行动,同时他又积极参加策划多起恐怖活动并亲自领导了刺杀内务部长普列维和莫斯科总督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行动。

④ 安·叶·谢列勃里亚科娃(1857—?)——奸细,沙皇密探局特务,莫斯

科著名社会活动家,常在家里举办沙龙,并通过救助政治犯红十字会的工作广泛结交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包括高尔基在内的激进作家,深得革命党人的信任。由于她的出卖,190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的全体委员被逮捕,此后她还出卖过许多重要的革命者。她因此得到沙皇政府的多次奖赏。1907—1909年间其奸细身份被披露,1924年被苏维埃法庭判处极刑,后因其年迈改判为七年监禁。

## 精密科学自由协会

《新生活报》，1917年俄历5月30日  
(公历6月12日)，第35期

公民们!

在彼得格勒成立了“发展和传播精密科学自由协会”<sup>①</sup>。

加入协会的是一些成绩卓著的天才的俄国科学界的代表。这些尊敬的人们提出在俄国建立“纪念2月27日科学研究所”，以纪念我国的政治自由诞生的日子。

研究所的目的是扩大和深化科学家们在人、社会、人民、人类利益的一切分支上的工作。

这些利益中最首要的是，反对那些损害我们健康的致病的根源，为生命而斗争。

生物学研究生命现象，细菌学研究传染病的根源，医学努力消灭这些疾病，卫生学研究并指出使人在抵抗疾病中变得更加坚强的条件。

生物学家、医学家、卫生学家应当懂化学，会运用物理学的成果，研究植物生命的植物学家，依靠生物学家和地质土壤学家的工作；关心提高土壤的肥力、提高土地的产量的农学家同样也应当懂得这些科学。

这些科学互相之间紧密相连，他们都是人类理智和意志对战胜我们生活中的悲伤、不幸、痛苦的追求。

公民们!

我们的农民生活在可怕的环境中，没有正确组织的医疗救助。



50% 农民的子女在长到 5 岁前就死于各种疾病。几乎农村的所有妇女都患有妇科病。农村人在梅毒病中腐烂,农村人深陷于贫穷、愚昧和野蛮之中。俄国农民没有能力成功地耕种土地,使土地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食物。十年前俄国的科学家指出,从四分之三俄亩面积的土地上,我们的农民收获 20 普特的粮食和马铃薯,而日本同样面积的土地能提供 82 普特,英国是 84 普特,在比利时是 88 普特。在十年间这方面的数字并没有变得对我们有利。

俄国的农业技术根本没有得到发展,农民不识字,他们在文化上处于无助状态,这是我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也是形成我国对工业利益有害的、拖延工业的正确发展的外交政策的悲惨条件之一。

城市居民所处的条件略好于农村的条件。在城市中没有排水系统,在工厂的烟囱里没有烟排出,城里的土地被腐烂的废弃物所污染,空气则被烟和灰尘所污染。

这一切早早地耗尽了我们的精力,缩短着我们的生命。城市的孩子们身体不健康,长得瘦弱,神经近于病态的容易激动。

这就是流氓行为的原因之所在,这就是犯罪和精神不健康的根源。

请想想看吧,我们受伏特加的毒害有多么久了,酗酒是不会不留下痕迹的:它削弱人的机体,它使机体变得易于接受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疾病。

为了使我们变得健康,必须有一个“生物学研究所”及其附属机构,用以开展细菌学、医学、卫生学及其它方面的研究。

我们的国家辽阔广大,自然财富丰厚,但是我们的生活却像叫花子一样肮脏而不幸。苦役般的、不得要领的劳动消耗着我们的精力,折磨着我们。我们不得要领地工作,工作得不好,因为我们愚昧。我们简直是把劳动当作可诅咒的生活对待的,因为我们不懂得劳动的伟大意义,不能够爱劳动。改善劳动条件,减少劳动量,把劳动变得轻松而愉快,这只有在科学的帮助下才有可能,科

学是能使大自然的自发能量——水的落差等等——服从于人的目的、减少人的体力消耗的唯一的力量。我们要唤醒以沼泽泥炭、油母页岩、廉价煤的形式沉睡着的大自然的力量。这种力量一旦唤醒就将给我们以大量的动力、温暖、光照，并将把文化送到我们愚昧的沉睡的国家的各个角落。

只有热爱劳动，我们才能达到生活的伟大目的，即在力求将大自然的力量受制于人的理智和意志的基础上使世界各国人民融合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

俄罗斯辽阔而富饶，但是它的工业却还处在萌芽状态。尽管在我国地下和地上有无数的自然财富，但我们却不能靠我国的、我们自己劳动得来的食品生活。工业文明国家把俄国当作非洲一样看待，把俄国看作是殖民地，在这里可以高价倾销任何商品，廉价运走原材料，而我们由于自身的愚昧和懒惰又不善于对原材料进行加工。正因为如此，在欧洲人的眼里，我们是野人，是糊涂人，掠夺我们就像掠夺黑人一样，并且不被认为是可耻的事。

技术发达的工业是社会和国家兴盛的基础。

现在，想着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因为现在我们薄弱的被战争摧毁了的工业正在继续受到革命的自发力量、人民群众可悲的愚昧和工厂主本人（他们常常是一些根本丧失自己对国家的责任意识的人）的利己主义的摧毁。

在贫穷和愚昧的土壤上，我们的美好理想永远不会实现；在这腐朽的土壤上，不可能引进新的文化；在腐朽的沼泽上不可能培育出天堂的花木。必须使沼泽变干，变得健康。

社会主义文化的理想的充分实现只有在具备了技术全面发展的、组织严谨的工业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

为了使工业得到应有的和必须的发展，就需要有技术，而技术只有科学能够创造。我们不会制造机器。我们俄罗斯必须有“应用机械研究所”，在这个所里我们的科学家将发明出新型的最好的

织布机、发动机、农业机械等等。

我们不会加工原材料。我们需要成立“化学研究所”，在这个所里科学家们将探索对原料进行加工的最佳而又廉价的方法。

我们还需要做很多东西，而这一切我们都应当加以创造，只要我们不是死人，只要我们想过健康的理智的生活。

科学是人类理智对创造自由，对全世界的所有人的幸福的追求的最准确和最坚定的表现。

科学课题愈是广阔、深入，它的研究的实际成果就愈是丰富。

我们俄国人特别必须组织起我们的最高理智——科学，只有科学的创造力才能把我们的国家变得富有，才能把我们肮脏的、凶恶的、耻辱的生活变得井井有条。

科学使人高尚的意义应当为社会的一切阶级所理解。

人们之间为争夺面包、争夺一方控制另一方的权力的斗争，是可耻的和正常的现象，虽然它与我们身体的疾病一样是自然的。人们应当和睦地同大自然作斗争，以便获取它的财富为自己服务，将它的力量服从于自己的利益。

当社会科学——历史学、法学、政治经济学——无法摆脱时代、国家、阶级的影响并屈从于政治生活的这样或那样的暗示的时候，精密科学却不可收买地和一致地在为全人类的利益服务。

化学家、生物学家可以积极参加维护自己社会思想的斗争，但是化学、生物学、机械学却既不能成为自由主义的，也不能成为保守的。科学从最广义上讲是社会的，科学真正是国际的、全人类的。

我深信俄国人民的理智，深信俄国人民追求文化繁荣的真诚，我向工人、农民、工业家、知识分子，向所有的俄国人呼吁，建议他们帮助组织国家的科学力量，组织科学创造的伟大事业。

为了使这一重要的全民的事业取得成功，需要有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是会有有的，是很容易筹到的，如果所有的能够理解科学家自由协会给自己提出的伟大目标的人们、所有识字的人们为这一

事业哪怕每人捐出一卢布的话。

这一号召是对俄国文明程度的一次检验,是对我们公民觉悟的一次考试,是对我们追求祖国幸福的真诚的一次考验。

公民们!

你们面临着一次成就最伟大的全民事业的机会,在成就了这一事业之后,你们将组织起一个优秀的国家的头脑,你们将把一个理智的、天才的头脑安放在国家那宽阔的肩膀上。这只需要你们作出不多的努力,但是用这不多的努力你们将成就一件前所未有的事业,创建一个地球上任何地方都还没有的科学机构。

公民们!

有一种被称作对祖国之爱的感情。这种感情权威地要求每一个人为了使他亲爱的人民成为理智、善良、健康和正义的人民,为了使他的才能不至于死亡,而为全世界所有的人们的幸福而发展和燃烧。

所有的真诚地爱人民的人,痛切地忧民的人都懂得,组织起全国的科学力量其意义多么伟大,我们的科学家的自由协会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多么伟大。

我们必须毫不拖延地着手创造一个新的俄国,让我们和睦而平静地开始这一工作吧,让我们从基础上开始这一工作吧,我们将发展和传播知识的拯救力量。

着手工作吧,公民们。

自由协会委员会成员 马·高尔基

注释:

① 见本书正文第 24 篇注⑤。

## 2000 万美元

《新生活报》，1917 年 6 月俄历 8 日  
(公历 21 日)，第 43 期

《新时代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说，一个匿名的美国协会拿出 2000 万美元用来在俄国收购古老的金银制作的艺术品，以及图画、铜器、陶瓷和各种艺术品。<sup>①</sup>

2000 万美元好像是 7500 多万卢布。你们看，这事情做得很气派，有“美国风格”。这一创举的组织者看来考虑到了这类现象的严重性：窃贼们洗劫雷赫腾伯格斯基<sup>②</sup>大公的宫殿，农民们可能抢掠古老的贵族庄园及其他的类似情况。

他们还考虑到了我国所有阶层普遍的不文明性，我们大家对艺术意义的普遍的很低的评价，俄国的钱不值钱，还考虑到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全部力量。

滚滚而来的美元不仅将给亚历山大市场上的愚昧的人们带来诱惑，而且也将给比较有文化的、比较文明的人们带来诱惑。如果形形色色的冒险家将要组织专门抢劫私人和国家收藏的艺术品的窃贼团伙，那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如果被狡猾的政客们出于“策略”考虑而竭力煽动的“惊慌”所吓怕了的艺术收藏品的主人们自己也将把俄国的国宝，把俄国艺术创作最优秀的精品卖往美国的话，那就更没有什么值得奇怪和愤怒的了。

尽管我们竭力呼喊爱国，对祖国的爱却很少压倒虚荣心，压倒很卑鄙的利己主义。

美国的事情,它当然将带着美国的干劲去干。这件事使我国面临着被掏空的威胁,它将从俄国捞去大批极美好的东西,而这些东西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超过了千百万美元。<sup>③</sup>

这件事将激起阴暗的贪婪本能,可能我们将成为许多事件的见证人,在这些事件面前奇幻般的从卢浮宫里盗取达·芬奇的不朽之作的<sup>④</sup>事件<sup>④</sup>将黯然失色。

我觉得,为了避免一定会被美元潮带进俄国生活中的腐化,为了避免国宝被盗窃以及它们的拥有者惊慌失措地抛售国宝,政府应当立即颁布命令暂时禁止将艺术品运出俄国,禁止在政府授权的人士对国家级艺术收藏品作出估价以前出卖私人的藏品。

#### 注释:

① 这一消息是1917年6月21日(俄历8日)在《新时代报》上以广告形式刊出的。

② 尼·尼·雷赫腾伯格斯基(1868—?)——俄国大公,近卫军上校,尼古拉二世之外孙。

③ 对于高尔基的这一观点,他在“绘画委员会”中的密友画家兼艺术学家亚·尼·伯努瓦后来发表《冻结绘画珍品》一文(《新生活报》1917年6月29日(俄历16日))表示支持。

④ 指1911年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被意大利裔油漆工文钦佐·佩鲁齐奥从卢浮宫盗出一事。两年后罪犯在向佛罗伦萨一古玩店出售该画时被捕。

## 帮帮忙呀

《新生活报》，1917年6月俄历16日  
(公历29日)，第50期

三年血腥的梦魇杀灭了欧洲居民中的精华；三年来，整个欧洲一直在血腥的醉酒状态中消灭自己最健康的、最有力的儿子们。

历史把祖国未来的问题推到了前面，并要求立即解决这一问题。如果现在不立即开始为未来工作的话，完全的贫穷、野蛮的兽性化就在威胁着我们。如果说所有的国家都将很难从这艰难、长久、耗空一切的灾难中恢复过来的话，那么这对于俄国就将是特别困难的。几百年来被沙皇的酒店用酒精浸透了的、被梅毒毒害了的农村，50%的儿童在5岁前死去，几乎人人不识字和愚昧。如果现在不立即竭尽全力拯救俄国的未来——俄国的孩子们的话，那么这个伟大的国家即将死亡，他的伟大的人民即将死亡。

烟厂和弹壳厂工人联合会将对儿童们施以社会关怀方面作了第一个小小的尝试——一千多名孩子被送到室外，送到大自然中，送到阳光下。尽管人们对教育家、对社会教育部门、对知识分子发出了呼吁，但是却没有人响应，谁也不想对我们的工人们发起的事进行文化上的指导。

教育家们、幼儿教师们、知识分子们，请响应吧，来帮忙吧！  
拖延就等于死亡。

联合会主席 卡普兰

难道这一理智而热烈的号召就不会得到知识分子同情的响

应？难道卡普兰用心血策划的、意义深远而重要的创举就不会被那些心灵还没有让政治斗争的喧嚣淹没的人们所理解？

全世界的人们和我们一直在企盼着诚实、健康的人，我们爱我们理想中的这种人。难道这只是文学的企盼，只是柏拉图式的、没有血肉的爱？

似乎烟厂和弹壳厂工人联合会的经验应当引起知识分子的积极关注。因为在他们的面前出现了在社会教育的土壤上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的最佳机会，出现了广泛了解工人们的文化需要和追求的最佳机会。我相信这种了解将改变近几个月来在知识分子中形成的那种感情和想法，也就是说，将会动摇报纸的造谣中伤所激起和煽动的那种怀疑主义、那些沉重的想法。那些极端聪明的政客们只是出于斗争策略的考虑，在推动这种造谣中伤活动。

但是这还是次要的事，我们大家首先应当关心的是——我认为这是可能的——把孩子们从毒害他们的城市环境中解救出来。关于这件事人们已谈了很多，但是现在，当工人们自己开始做这件事时，他们却没有得到帮助。<sup>①</sup>怎么说呢，这又是：

我们满怀着美好的激情，  
但是却做不了任何事情。<sup>②</sup>

### 注释：

① 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发表烟厂和弹壳厂工人联合会的呼吁书，旨在引起知识分子对工人们的需求和困难的关注。“社会教育同盟”积极参加了为彼得格勒的几家烟厂的工人子女组织夏季休息的事。高尔基作为该同盟的负责人之一也直接参加了这一活动。

② 引自尼·涅克拉索夫的诗作《一时的骑士》(1863)。



## 致工人同志们

《新生活报》，1917年7月俄历2日

(公历15日)，第64期

人的最可怕的敌人之一是结核病，几乎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患这种疾病。这种病在工人当中流行得特别残酷，而彼得格勒腐霉的气候、污染和你们不得不在其中生活的环境更是加剧了这种传染病的致命流行。

你们自己知道，在你们当中有很多肺结核病人，你们生下了很多患病的孩子，你们被迫耗掉了很多血汗钱，用以哪怕不太长久地保住自己的和你们家人的健康。但是在居家治疗的情况下，同结核病的斗争几乎是毫无希望的。

为了同肺结核进行胜利的斗争，必须开办城外的疗养院，必须要有清新的空气、良好的饮食和长期的治疗。

你们是一支创造了神话般的资本、创造了强大的组织的力量，你们最终应当开展为你们自己创造一个对于保护你们的健康和你们子女的健康所必需的环境的工作。你们知道，“健康的心灵寓于健康的身体。”

健康之必需不仅是为了使你们为整个国家的幸福所从事的体力劳动变得更加富有成效，健康对于精神生活、对于坚定地从事社会斗争、对于捍卫和扩大你们的公民权利也都是必需的。不要忘记，你们生活在一个居民中85%的人是农民的国家里，在他们当中你们只是大洋中的一个孤岛。俄国的工业发展缓慢，工人阶级数量的增长也很困难。你们非常孤单，你们面临着长期而顽强的

斗争,这一斗争要求你们极大地鼓足自己的全部力量。

你们自己也应当关心自己,而且你们也有可能按照你们所需要的那样安排你们的生活。

现在,为了自我保存、自我保护,你们——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应当为你们的肺结核患者开设一批自己的疗养院:城外的一处皇家公园可以当作院址。

你们能够像童话里的魔术师建造神奇的城堡那样一下子建成这一你们所必需的机构。

让首都所有的工人都为这件事捐出一天的工资吧,那样疗养院就建成了。

有关疗养院的技术组织事宜,发展和传播精密科学自由协会会帮助你们的。

创建一个你们的子孙将把它当作你们的自由创造的第一个举动而引以自豪的模范机构吧。如果你们做了这件高尚的事情,那俄国的全体工人都将跟你们走的,俄国将被无产阶级的机构——医疗的、科学的、教育的等等——之网所覆盖。我再重复一遍:你们有力量,你们现在应当明白,你们能够为你们自己,也为我们整个国家的文化做许许多多事。

你们就想一想吧,你们可以在一天里设立开办疗养院的基金,一个月以后你们又可以用同样的捐献一天工资的方法在彼得格勒为你们的学龄前儿童开设“家庭学校”,再过一个月,当你们在乡间修建了度夏营地后,你们又可以让你们所有的子女有可能在城外度过闷热的夏天了。

涅瓦区的工厂委员会会议已经准备为自己区的病人们开办一个不太大的疗养院了。委员会会议让发展和传播精密科学自由协会的一个成员伊·伊·马努欣博士当了疗养院的头儿,马努欣在最成功地运用他自己的治疗结核病的方法:他用能促进脾脏活动的伦琴射线照射病人的脾脏。<sup>①</sup>

但是这一小小的创举对彼得格勒工人的需求海洋来说只是一滴水,对于他们来说必需的是一批疗养院,是整整一个病人的小城。

工人同志们,当人们认识到、感觉到自己的集体的力量时,对他们来说,即使实现乌托邦都是可能的。

这里所说的不是乌托邦,而是你们既应该,也可能做成的普通而实际的事。

请显示一下你们善于关心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生活吧。

#### 注释:

① 伊·伊·马努欣(1882—?)——为高尔基治病的医生。他采用对脾脏施行伦琴射线照射的方法治疗结核病。高尔基认为这一方法是有效的并多次在报刊上为他辩解。1920年,高尔基曾为他去巴黎帕斯特研究所从事临床研究而出面向列宁说情。后来,马努欣没有回国。

## 不合时宜的思想

《新生活报》，1917年8月俄历4日  
(公历17日)，第92期

《言论报》对我非常注意，在它那淡蓝色的版面上几乎每天我都能看到几行讲我的文字。<sup>①</sup>

《言论报》已经不止十次地指出，“高尔基又一次地忏悔了”，尽管我从来没有就任何事，在任何人面前——更不用说在《言论报》的面前——忏悔过，因为对这类俄罗斯人特别喜欢的事情我怀着一种本能的厌恶，再说，我也没有什么可忏悔的，我并不觉得自己比别的同胞有更多的罪孽。

《言论报》还同样多次地重复过我说的这些话：我一度参加过《光辉报》的筹办工作，当时我有意识地 and 办这件事的其他同志一起，采取了在旧制度的环境中每一个想为民主派的利益诚实工作并讨厌迎合那些从经济和道德上毁坏国家的当局的卑鄙势力的人所不可避免的“自我限制”<sup>②</sup>。

昨天，《言论报》又这样写道：

“我们从自认负有捍卫文化价值的作家的嘴里听说，现在他看不到有任何自我限制的理由。”<sup>③</sup>

这当然不对。我没有说过什么现在，即革命后，“我看不到有任何自我限制的理由”，因为理智而不带成见的人们都清楚地看到，《新生活报》——我有幸并欣然为其写作——在尽自己的力量千方百计地让人们知道，“自我限制”对左的冒险主义者和右的冒险主义者都是必须的。我说这些不是为了同《言论报》论战，“让黄

鼠狼不拖鸡是不可能的”。但我还是认为，需要提醒《言论报》的可敬的先生们：有时“自我限制”就等于道德自杀或完全丧失面目的自我歪曲。

例如，当立宪民主党的一个头目宣布该党是“陛下的反对派”时，这难道不是“自我限制”吗？

当“人民自由党”<sup>④</sup>同“十月党人”<sup>⑤</sup>（他们曾为绞刑手斯托雷平鼓掌）结成一伙时，这难道不也是“自我限制”吗？

当人民自由党因为雄辩的罗季切夫<sup>⑥</sup>不讲策略地提到斯托雷平对他用以窒息人民自由的“绞索领带”过分热心而向斯托雷平道歉时，这难道不也是“自我限制”？

还可以让《言论报》的编辑们重新记起几十个类似的“自我限制”的行动；“人民自由党”极不平和地——可以说，无节制地——进行自我限制。这是大家都知道，都记得的，当然，《言论报》除外。

但是我相信，即使这家机关报的可敬的编辑们也将会非常吃惊的，如果他们读到《立宪民主党党纲》，并清楚地知道这个党“自我限制”到了何等程度的话。

由此可以明白，《言论报》为什么如此经常地、如此顽固地宣扬“自我限制”的必要性——它是按照习惯这样做的。<sup>⑦</sup>

相信《言论报》的真诚的人们权且可以抱这样的奢望：《言论报》和它的党在从左边把自己限制到极限之后，很快就将开始从右边限制自己的。我不相信这一点。

但是我看到，立宪民主党在“自我限制”事业上的榜样正在其他的党的组织中寻找效仿者，而这一过程从其本质上讲已正在成为革命的自杀过程、限制合法的民主权利的过程。

#### 注释：

① 《言论报》确实对高尔基“非常注意”。仅在此前两周的时间里，该报

就有七天在报刊综述栏中提及高尔基的活动。该报指责高尔基和《新生活报》同情德国,把国际利益置于俄国利益之上,甚至谴责“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报纸的叛徒行径”,同高尔基就他说的在旧制度下不可避免地要“自我限制”进行争论。攻击《新生活报》用了“流氓腔调”,还带有讥讽地预言,高尔基将“再次忏悔”。

② 参见附录二《关于论战》一文及其注释。

③ 引自《言论报》俄历 1917 年 8 月 3 日(公历 16 日)发表的谈选举立宪会议代表的短评《彼得格勒,8 月 3 日》。《言论报》在短评中反驳社会主义报刊对资产阶级拖延选举的批评。

④ “人民自由党”——立宪民主党的正式名称。

⑤ “十月党人”(即“十月十七日联盟”)——1905 年由大地主和工商资本家组织的俄国政党,领袖是亚·伊·古奇科夫和米·弗·罗江科。党名取自尼古拉二世 1905 年的《十月十七日宣言》。该宣言宣布给人民以公民自由,设立国家杜马。这是沙皇对起义人民的被迫让步,其思想完全符合十月党人的政治要求。十月党人在国家杜马中曾先后与立宪民主党及保皇分子结盟,二月革命后加入临时政府,后反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

⑥ 费·伊·罗季切夫(1853—1933)——尼古拉二世时代四届国家杜马议员,立宪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兼该党中央委员。19 世纪 70—80 年代是特维尔省某县的贵族长,1898 年在圣彼得堡地区法院任律师。1901—1904 年被放逐。1907 年 11 月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会议上,他抨击 1905 年革命失败后政府推行的恐怖政策,指出政府在“用斯托雷平领带”(指纹索)扼杀争取自由的斗士。因此被罚禁止参加杜马的十五次会议。二月革命后曾短期担任临时政府芬兰事务部长。十月革命后侨居国外。

⑦ 在高尔基发表这篇文章的第二天(1917 年 8 月 5 日(俄历 18 日)),《言论报》就发表了彼得·雷斯的文章《小说式的政论》,断言高尔基的观点难以让人信服。雷斯说,为同旧制度斗争需要的不是“自我限制”,而是对专制的无情批判。而革命消灭了旧制度,创造了新的生活形式,正需要高尔基和《新生活报》所缺乏的严格的“自我限制”和纪律。

## 在莫斯科

《新生活报》，1917年11月俄历8日  
(公历21日)，第175期

26日的白天，在莫斯科<sup>①</sup>，人们开始谈论彼得格勒街道上的战斗：7.5万人被打死，冬宫被夷为平地，抢劫流行，大火成灾。

就像孩子喜爱童话一样，俄国人喜爱恐怖的消息并善于制造这种消息，俄国人已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这种本领并还将不止一次地被证明。不过即使是俄国人，他们也对有关彼得格勒的可怕的传闻不太相信：

“7.5万？胡说八道！”

因为感觉到夸张得近于荒唐，所以并不表现出特别的惊慌。

在26日晚上将近半夜时，在剧院街的什么地方响起了最初的射击声。有人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剧院旁抬过一位伤兵。传出消息说，有人扫射了到克里姆林宫去站岗的士官生。未能查清是谁朝他们开的枪，但这肯定是那些“杀人的猎手”，混乱时代和俄罗斯的“剽悍”生发出了数以千计的这种“杀人的猎手”。几分钟之后，这种剽悍的壮士从角落里朝福尔卡索夫胡同的两名马车夫射了七发手枪子弹。人们把这一情况报告了苏维埃，结果苏维埃派出的士兵逮捕了几个“自由射手”。

一整夜都有人在开枪；民警<sup>②</sup>是出于害怕，流氓是出于开心。早上，整个莫斯科到处是枪响，在步枪的单响中又加进了讨厌的机枪的连发声。惊恐的寒鸦疯狂地叫着，好像有人在撕破布似的……

但是这一切还没有破坏生活的平常进程：男女中学生仍然去上学，居民们仍然在散步，商店旁边排着一条条“尾巴”，好奇的观众悠闲地几十人一群地聚集在街上，猜测着这是哪儿在开枪。

世界真的是为了让无所事事的人开心而创造的！在第一位印刷家的纪念像旁边站着密密麻麻的一群人，大约有五百人吧，他们一面倾听着剧院广场那边激烈的枪声，一面议论：

“从斯特拉斯奇大街那边打过来了。”

“照着大都会饭店打哩。”

什么东西对这些人人都毫无关系，不管所发生的事件多么悲惨，对这些人来说也只是一场景观。

一颗子弹打在他们中的一个人的腿上，大约一百五十来人一下子把他围了起来，人们把他往普罗洛姆门那边送，他们望着他的脸，问道：

“痛吗？”

“还行，就是说骨头还囫囵！”

自然，就连这些人渣也表现出了自己的积极性，当然，他们是在最不需要抵抗的方面表现自己的积极性的，他们所受的教养就是这样，整个俄国历史就是沿着这一方向发展的。

有一个士兵看样子是被吓疯了，他突然跑到人群面前，单膝跪下，瞄准一位不带武器的士官生，开了枪，那群人来不及阻止他开枪，就扑到士兵身上，把他压倒，折磨了一顿。我相信，如果有三个士兵的话，人群就会离开他们跑散的。

对射的枪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密，越来越激烈，街上出现了巡逻队，他们非常耐心地劝说看热闹的人们：

“公民同志们，请散开！看见怎么回事了吧？现在不安全，会打死人，伤到人的。子弹可不长眼睛。请……”

看热闹的人不慌不忙地散开了，有几个人问巡逻队员：



“你们是哪一边的？杜马的还是苏维埃的？”

“我们哪一边也不是。应当要有秩序，散开吧，我请……”

后来，这些“哪一边也不是”的士兵们却从角落里向什么人开枪，他们开枪时不很情愿，好像违背自己的意志似的在尽革命的义务，造出尽可能多的死人。

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情况变得越来越清楚了：起义没有明确的“战略”计划，起义者在凭着自己的“大概”理解和“上帝对心灵的指示”行动。一些部队在朝士官生盘踞的克里姆林宫方向进攻，另一些部队从市中心沿着米亚斯尼茨卡娅街朝阿尔巴特街、亚历山大街、花园街前进。

在米亚斯尼茨卡娅街上，士兵们从角落里朝一条胡同射击，一位平民想穿过那条胡同，士兵们不放他过去，劝道：

“他们会打死你的，同志！那里有人埋伏着……”

“但是，这个街区不都在你们的手里吗？”

“您怎么知道呢？”

那个老百姓必须穿过胡同，士兵们在劝说了很久之后决定放他过去，他们天真地微笑着请求道：

“同志，请您用手指告诉我们他们有多少人？”

那个老百姓没有理会他们交给的任务，朝胡同走去，他看见，在一个院子的铁栅栏大门里，有九个士兵正忙着用箱子和木桶修建街垒，另一个士兵靠着墙坐着，阴着脸在包扎自己的一条血淋淋的腿。

“你们在和谁打仗？”

“就是那边，拐角上的那些人。”

“可那大概就是你们苏维埃的人吧？”

“怎么，我们的人？他们刚才还打坏了一个人……”

那个老百姓劝军人们同敌人谈判，他自己则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并在一名军人的陪同下回到了米亚斯尼茨卡娅街。闹了半天，

打来打去的竟是同一个团的士兵，于是在他们之间有了一场典型的俄国式的对话：

“你们怎么啦，鬼东西，瞎了眼了吗？”

“那你们呢？”

“我们以为是士官生呢！”

“我们也是。”

战斗结束了，双方都很高兴，他们向那个老百姓要烟抽，送他走时还友好地叮嘱道：

“您别往那边走，同志，你看，那儿的枪声多密呀！”

毫无疑问，这样的“错误”很多，大概不止十个士兵为此付出了生命。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全市就好像是一个多层的面团——这一层是“我们的”，接下去是“他们的”，然后又又是“我们的”、“他们的”。在莫斯科错综复杂的胡同里，人们毫无意义地互相开枪射击，从脑后，从身旁。到了夜里，当在黑暗的、路灯熄灭了的街道上笼罩着死亡的恐怖时，经常发生自己人互相对射的情况。

在克里姆林宫的周围是苏维埃的部队，而在特卢勃那亚广场，一队人数不太多的士官生俘获了一辆装载步枪的卡车和一队赤卫队员。据说，有 110 名突击队员来到起义者们的司令部，说道：

“你们这儿什么地方有士官生？给我们一些步枪，我们把他们打出去！”

有人把步枪发给了他们，但他们却与士官生合到了一起，而这一“错误”当然加剧了互相残杀。

士兵们对跑到街上“观察情况”的居民的熱情态度令人惊奇。

看到下面的情况真使人觉得奇怪到了极点：一位无产者穿着灰色军大衣，一脸饥饿的样子，浑身沾满了污泥，每时每刻都冒着生命的危险，却关切地劝说一位衣着干净、好奇心十足的“资产阶级”：

“公民，您到哪儿去？那儿在开枪呢！会打到您的，上帝保佑，我们可没法为您负责！”

“我都三天三夜没出门了！”

“那有什么！现在可不是溜达的时候……”

真想问这些人：

“你们这样关心爱护你们的‘阶级敌人’的生命，你们到底是在跟谁打仗呀？”

你要问的话，他们就会回答：

“跟士官生。他们反对人民……”

这些宽厚的、备受折磨、饱经风霜的人们却野兽般地殴打负了伤的士官生，用枪托打破他们的脑袋，就是这些士兵看见一条胡同里有一帮人正在抢商店，就朝他们开了三排枪，撂倒了近二十个强盗，死的死，伤的伤。后来，他们又帮助店主用木板钉上被撬开的门和被打破的窗户。

这些人非常可怕，他们能成就自我牺牲和毫不利己的功绩，也同样能犯无耻的罪行和卑鄙的强暴勾当。你会仇恨他们，也会全心全意地怜悯他们，你会觉得你无力理解你的人民的阴暗心灵的腐烂和闪光。

大炮在轰鸣，这是有人在从麻雀山那边朝克里姆林宫射击。一个好像化了装的军人轻蔑地说：

“用霰弹射击，这帮白痴！这也好，不然他们就把整个克里姆林宫打个稀巴烂了。”

他对认真听他说话的人们讲了很久，讲到在什么情况下必须用霰弹消灭人，什么时候应当“采用高炸弹”。

“可是他们这些笨蛋却用霰弹当高炸弹打！真是无目标，真是愚蠢……”

有人不太有把握地问：

“也许，他们是故意这样射击，只是为了吓唬人，而不是要把人打死？”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人道主义？”

“你说，我们有什么人道主义？”屠杀技术的老手平静地反驳说。

寒鸦在潮湿的屋顶上一边飞，一边令人厌恶地叫着；机枪在哒哒直响；一辆装甲车在附近什么地方一边行进，一边射击；步枪、手枪不停地乒乒乓乓地作响。那印象仿佛是人们聚成一大堆，正在进行一场面对面的扭成一团的肉搏混战。但这时一辆货车飞驰而过，上面挤满了荷枪实弹的人们，你可以看到，他们在朝天开枪。这大概是为了“提高自己的革命士气”，为了不去想他们在做些什么。

圆圆的、可恶的霰弹冰雹般地打在屋顶的铁皮上，落在马路的石块上，看热闹的人们赶忙在烂泥中搜寻着把它们捡起来“留作纪念”。

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一些房屋的墙壁被炮弹打穿了，在这些房子里大概死了几十个无辜的人。炮弹毫无意义地飞来飞去，莫斯科这六天血腥屠杀和抢掠的过程也同样是毫无意义的。

实际上，莫斯科的这场屠杀是对婴儿们的噩梦般的血腥虐杀。一方面是连武器都不会拿的赤卫队的年轻人和几乎不清楚自己是在为谁卖命、为谁杀人的士兵们；另一方面是为数很少的一小群按照所受的教育英勇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的士官生。

所谓士官生都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子女”，因此应当被消灭的说法自然是赤裸裸的谎言，这是冒险主义者和疯狂的教条主义者的谎言。如果阶级出身决定人的行为的话，那么乌里扬诺夫—列宁就应该站在俄国大地主的行列里，应该和普里什凯维奇<sup>①</sup>肩并肩地站在一起，而勃隆什泰因—托洛茨基<sup>②</sup>则应去干商品推销了。

青年人在这个可诅咒的国家里的情况是可怕的！从60年代起，我们就试图用青年们的头颅去撞穿专制的高墙。50年来俄国青年被消灭在监狱里、流放地、苦役场。看吧，现在，我们面对着这一“政策”的悲惨结果：俄国没有了有才能的人，甚至简直没有了会工作的人。专制耗尽了国家的精神实力，战争从肉体上消灭了千百万青年人，毫无积极精神发展着的革命显然也不可能培养出精神强健的人，并将把消灭青年人的过程继续下去。

我知道，疯狂的教条主义者对人民的未来麻木不仁，他们把人民看作是进行社会实验的材料；我知道，他们根本无法理解那些使每一个真诚的民主主义者痛苦和不安的思想和感情。我不是对他们说的。

但是，难道整个民主派都失去理智了吗？难道就没有人在感到正发生的一切的可怕性后，要将那些丧失理智的宗派主义者从自己的圈子里扔出去吗？

#### 注释：

① 1917年俄历10月下旬与11月初高尔基是在莫斯科度过的。

② 1917年3月，临时政府决定组建民警机关以取代原来的警察机关。原来的警察遂改称民警。

③ 弗·米·普里什凯维奇(1870—1920)——大地主、激烈的保皇党人，1900—1906年间任内务部官员。第二、三、四届国家杜马议员，常发表反犹太主义言论。曾任黑帮的“俄国人民同盟”副主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军中红十字会里任职。1916年12月17日直接组织并参与杀死拉斯普京一事。十月革命后曾随邓尼金部反对苏维埃政权。

④ 列·达·勃隆什泰因-托洛茨基(勃隆什泰因为原姓，1879—1940)——生于赫尔松省一德裔地主家庭，曾在敖德萨、尼古拉耶夫等地读书，中学时代起参加革命活动，1898年1月被捕，遭监禁，后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两年后持伪造的护照逃离流放地，后一直使用假护照上的姓托洛茨基。

## 蛊惑的果实

**《新生活报》，1918年1月俄历5日  
(公历18日)，第3期(总第217期)**

一群彼得格勒社会机构的职员给我写来了下面这些文字：

“读着您先前的文学作品，就会想到您这个人对于眼下的迫切要求最为敏感，您的心对被压迫的人民最为善良。我们还知道您的意见在人民中有何等的权威，所以我们现在也还在等待您的能使全体劳动者团结起来的有力的话语，而决不是您在您的《蛊惑的果实》（《新生活报》，第208期）中所写的那些话。读着那些话，简直弄不懂您这是想向普梯洛夫工厂的‘孩子们’说些什么，我们觉得，在这一重要问题上您很多东西都没有讲到，或者您是有意识这样做的，为的是不让中等水平的人一下子懂得您的意思，或者您就是不想清楚而详尽地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想，既然您想教育这些孩子们，既然孩子发问，那么老师就应该回答他们所有的问题，回答得清晰、准确，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公正。但您好像没有这样做，您只是在论战。”

我不明白这“一群职员”的困惑，因为我觉得，我对普梯洛夫工厂那封信的作者们回答得非常明白而清楚了。

他们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如果您要批评人民委员的政府的话，那我们就封掉《新生活报》。”

我回答：“《新生活报》将要像批评其他任何一个政府那样批评人民委员的政府。”为了更好地教育他们，我又补充说：“在《新生活报》工作的人们同卑鄙之徒及骗子们的专制制度作斗争并不是为

了用野蛮人的专制代替他们的专制。”

因为用外在的强暴进行威胁是野蛮人的威胁，自由的公民们不应当在思想斗争中采取这种手段。

一切都再明白不过了，那“一群职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接下去这“一群职员”写道：

“我们还不明白，按您的说法，苏维埃的政府——工人阶级在其中占优势——会用什么方法，怎样‘毁掉工人阶级’。

“这就像揪着头发想让自己离开地面一样。”

只是因为“工人阶级在政府里占优势”，还不能得出结论，认为工人阶级懂得政府所做的一切。“苏维埃政府”告诉工人，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是可能的。

《新生活报》用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没有遇到政府的那些机关刊物方面的实质性反驳——声明并还将继续声明：我国没有引进社会主义所应当有的条件，斯莫尔尼宫政府对待俄国工人就像对待树枝一样——它点燃这树枝是为了试一试，用俄国的篝火能燃起全欧革命的烈火吗？

这就是按“撞大运”的方式行动，不怜惜工人阶级，不考虑他们的未来和俄国的命运——让俄国毫无意义地燃烧吧，让它化成灰烬吧，只要能作试验就行。

狂热分子们和乌托邦主义者就是这样干的，但是工人阶级的明智而文明的部分却不能这样干。

所以我断言：有人在拿俄国无产阶级作试验，而无产阶级将为此付出自己的鲜血、生命并长久地对社会主义理想本身感到失望。这是最糟糕的。

应当记住，如果“沙皇的轻率能够消灭几代人”，那么被权力的毒汁所陶醉的人都不乏这种“轻率”。

那“一群职员”的信带着恶意，而且还点缀着各种类似指责我有“私人的别墅”<sup>①</sup>等等的双关语。

我想一劳永逸地向这“一群”人和其他的双关语的爱好者声明，我并没有“私人的别墅”，我靠我的生活经验和我的知识的资本生活，我既衷心希望那群职员，也衷心希望所有其他在没有拥有“私产”之前真诚地憎恨“私产”的人拥有这一资本。不过，即使我有私人的别墅，我也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

我真想问一问这“一群”人和所有其他的寄给我的恶毒的信函的作者：公民们，为什么你们总是发狠；为什么你们的信充满如此大的火气，如此尖刻的挑剔和讽刺？

要知道你们现在已经不是“被压迫的人民”，而是胜利者，你们应当感到一种自己的神圣希望正在实现的人们的平静的自信。你们曾如此长久而耐心地等待别人能公正地对待你们。现在你们有责任公正地对待所有的人，有责任关心所盼望的公正在全世界的胜利。

可你们却总是发狠，总是又喊又骂。为什么呢？

不改变你们的感情，不改变你们对你们自己和别人的态度，你们就无法改变令人讨厌的生活环境。

#### 注释：

① 当时俄国及欧美其他国家的报纸上曾刊登过关于高尔基购置了私人别墅的谣传。



从一月九日到一月五日

《新生活报》，1918年1月俄历9日  
(公历22日)，第6期(总第220期)

1905年1月9日，当受压抑的、受屈辱的士兵们按照沙皇政权的命令，朝手无寸铁的、和平的工人群众开枪的时候，知识分子和工人跑到士兵跟前，正对着他们的脸，向他们喊道：

“你们在干什么呀，该死的？你们在杀谁呀？这可都是你们的弟兄啊，他们手无寸铁，他们和你们无冤无仇，他们是去请求沙皇关心他们的疾苦的呀。他们甚至不是去要求，而是去请求的呀，他们不带威胁，没有怨恨，而且很恭顺！好好清醒一下吧，你们在干什么呀，白痴！”

这些因无辜被杀的工人而产生的郁愤和痛苦油然涌出的质朴而明晰的话，好像应当能进入到穿着灰色军大衣的“恭顺的”俄国农夫的心田的。

但是那些恭顺的小农夫却或者用枪托打那些有良心的人们，或者用刺刀捅他们，或者因为发狠而哆嗦着喊叫道：

“散开，要开枪了！”

人们没有散开，于是他们就准确地开起枪来，把数以百计的尸体撂在了马路上。

沙皇的大多数士兵则用沮丧的、奴才般的话语回答人们的指责和规劝：

“奉命行事。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奉命……”

于是他们像机器一样朝人群开了枪。也许，不是情愿的，铁着

心肠，但是到底是开枪了。

1918年1月5日，手无寸铁的彼得格勒的民主派——工人、职员——为纪念立宪会议举行了和平游行。

俄国的优秀人士为立宪会议的思想所鼓舞已经几乎有一百年了，立宪会议，这是一个将给全体俄国民众以自由表达自己意志的可能性的政治机构。数以千计的知识分子、数以万计的工人、农民在为立宪会议的思想斗争的过程中，死于监狱、流放地和苦役场，死于绞架上和士兵们的枪弹下。在这一神圣思想的祭坛上早已血流成河，而现在“人民委员们”又下令向民主派开枪，可他们是为纪念这一思想而游行的。我要提醒一下，“人民委员们”中的许多人在他们整个政治活动的过程中，自己也曾教导工人群众，必须为立宪会议的召开而斗争。《真理报》写道，1月5日的游行是资产者、银行家等等组织的，向塔夫里切斯基宫行进的正是“资产者”和“卡列金分子”<sup>①</sup>，这是在撒谎。

《真理报》是在撒谎，因为它非常清楚，“资产者们”在立宪会议开幕这件事上没有什么可高兴的，他们在246名社会党人和140名布尔什维克的环境中无事可做<sup>②</sup>。

《真理报》知道，参加游行的有奥布霍夫工厂、帕特隆工厂和其他工厂的工人；它知道，瓦西里岛区、维堡区和其他区的工人是举着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红旗走向塔夫里切斯基宫的。

正是这些工人遭到了枪杀，不管《真理报》撒多少谎，它也掩盖不了可耻的事实。

也许，当看到士兵和赤卫队员从工人们的手中夺过革命的红旗，用脚践踏它们，把它们放到篝火上烧时，“资产者们”才高兴不已呢。不过，也许就连这赏心悦目的景观也已经不能使所有的“资产者们”高兴了，因为在他们当中也有一些真诚地爱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国家的诚实的人。

被某些野兽卑鄙杀害的安德列·伊凡诺维奇·申加辽夫就是其

中之一。

就这样,1月5日,彼得格勒的工人、手无寸铁的工人遭到了枪杀。开枪时没有要开枪的警告,而且是埋伏在暗处,从篱障的缝隙中,像真正的杀手那样开的枪。

没有丧失良心和理智的人们就像1905年1月5日一模一样地向开枪的人:

“你们在干什么呀,白痴?这不是自己人吗?你们看啊,到处是红旗,而且没有一张和工人阶级敌对的标语,没有一声和你们敌对的口号呀!”

他们就像沙皇士兵——奉命杀人的凶手一样,回答道:

“奉命!我们奉命开枪。”

对一切都无所谓并总是只当生活悲剧的旁观者的居民惊叹道:

“打得真够意思!”

而且还猜测道:

“这样,他们很快就要互相干起来了!”

是的,很快。工人中传说:艾利克松工厂的赤卫队朝木材厂的工人们开火了,而艾利克松工厂的工人又遭到了另外一个厂的赤卫队的扫射。

这类流言很多。也许,它们并不可靠,但是这并不妨碍它们对工人群众的心理产生完全确定的影响。

我要问“人民委员们”,他们当中也应当有正派和理智的人:

“他们是否明白,在往自己的脖颈上套绞索的同时,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扼杀全部的俄国民主派,断送全部革命成果?”

“他们明白这一点吗?或者他们是这样想的:要不就是我们当权,要不就让所有的东西和所有的人都完蛋!”

## 注释：

① 1918年1月19日、20日、22日(俄历6日、7日、9日)的《真理报》报道过这些游行。立宪会议是1918年1月18日(俄历5日)于原国家杜马所在地塔夫里切斯基宫开幕的。次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解散立宪会议。

② 根据最新发现的历史资料,在举行立宪会议代表选举的54个选区中(共有79个选区),62%的选民支持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及与其相似的党派,25%的人支持布尔什维克,13%的人支持立宪民主党和其他地主资产阶级政党。从保存下来的名单看,共选出715名立宪会议代表。根据不完全统计,席位分配情况如下:布尔什维克175席,其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40席,社会革命党370席,孟什维克15席,人民社会党2席,立宪民主党17席,无党派人士1席,民族团体代表86席(见《十月革命百科全书》,第三版,莫斯科,1987年,第549页)。

## 致来自人民的知识分子

《新生活报》，1918年1月俄历11日  
(公历24日)，第7期(总第221期)

您在《真理报》上的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

“我很愿意相信，高尔基背离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革命只是因为他在革命最初的混乱日子里没有看到她那真正美好的面孔，但是他已经开始看到那面孔了，而且他很快就要和所有的与我们的十月革命休戚与共的人们一起欢乐，一起悲伤了。”<sup>①</sup>

不，尊敬的同志，我不会和您一起欢乐的，而且我相信，您也并不欢乐。有什么可欢乐的呢？难道是因为真正革命的但数量很少的俄国无产阶级正在南方的内讧屠杀中被消灭？难道是因为在彼得格勒的大街上已开始枪杀无产阶级？<sup>②</sup>难道是无产阶级的与之血肉相连的劳动知识分子被愚昧群众的恐怖行动所要挟，并陷入其中，无力对这些群众施加影响？难道是因为国家的被彻底摧毁的工业把今后工人阶级的增长变得不可能了？

没有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荒诞不经的，是毫无意义的乌托邦，而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在内讧中受到严重打击的、被你们说的那些无知的人们所腐化的无产阶级将会消失。脱离了民主派的无产阶级是毫无根基的，你们正在把民主派从无产阶级身边推开。

你们将和谁一起进行社会革命呢？和农民？和士兵？用刺刀和子弹？你们要明白，现在并不是在进行社会革命，而是在摧毁那将来可以在其上进行这一革命的土壤。无产阶级的领袖，如同我不止一次说过的那样，把它们当作点燃全欧革命的燃料。

还在我们做到这一点之前，俄国工人就将会被欧洲的大兵们打垮的。难道您相信德国、英国、法国、日本会让你们这些虚弱的、手无寸铁的人煽起那将要吞噬他们的烈火吗？

别相信这些，亲爱的同志。

我们是孤立的，而且一直到我们的疯狂不再使我们互相杀戮为止都将是这样的。

那么国外的朋友们呢？

在国外，那些纪律严明并带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士兵们，有的认为我们是叛徒和变节者，另一些认为我们是根本不善于进行国家创造的无力的人民。

不，没什么可高兴的，同志，不过，是觉醒的时候了！如果还不算迟的话。

#### 注释：

① 引自《真理报》1918年1月20日（俄历7日）发表的《社会革命和马·高尔基》一文，作者署名为“来自人民的知识分子”（伊·克尼日尼克—维特罗夫的笔名）。

② 指立宪会议开幕的1918年1月18日（俄历5日）那天革命军队与游行群众的武装冲突。参见附录二中的《从一月九日到一月五日》一文。

## “快乐的事”

《新生活报》，1918年俄历1月21日  
(公历2月3日)，第15期(总第229期)

一个从莫斯科来的人笑了笑，讲述道：

“夜里，一个工人在街上走着，突然从拐角后面迎着他，走过来两名穿士兵大衣、带着步枪的英雄：

“‘站住，’他们喊道：‘有武器吗？’

“他从衣袋里拔出手枪，毫不惊慌，瞄准了他们。

“‘有’，那工人说：‘举起手来！’

“两位英雄害怕了。看来，他们的步枪没有上子弹，而他则命令道：

“‘把枪放在地上。把大衣脱下来。现在脱靴子。现在脱掉裤子。好了，现在沿着街跑吧，同时大声喊‘救命’。

“两位英雄顺从地做了这一切，光着脚，没穿裤子，在雪地上跑着，还心甘情愿地喊叫着：

“‘救命呀！’

“那工人把他们的衣服放在人行道上，而把步枪拿到了委员部里并在那儿讲了这一快乐的事。

“……另一起事和这一起相类似，发生在普希金纪念像<sup>①</sup>旁边。两个贼袭击一位正从工厂往车站走的劳动组合的成员，他们冲上去，命令道：

“‘把武器交出来！’

“他把一支没有上子弹的手枪给了他们，但裤子后面的口袋里

还有一支上了子弹的枪。两个贼剥下了他的皮大衣，抢走了 5.2 万卢布的钱，想要走路了，就对他说了一句：

“‘感谢上帝吧，你还囫圇着。’

“要是换了个人的话，事情也就这样了结了，但是劳动组合成员这小子可不是傻瓜，他央求他们说：

“‘弟兄们。我是给人家办事的，这钱不是我的，而是工厂的，老板的，是给工人发工资的，他们不会相信我说什么我被抢了的话的，他们会说是我自己把钱给昧下了。我身上一点儿痕迹也没有。我求你们了：我这儿还有我自己的两千卢布，我把它都给你们，你们就给我的上衣来上两枪，让人们能看出来：有人袭击过我。’

“那两个贼也是好心人，他们明白了他的意思，甚至开心起来，就来照他的上衣开两枪吧，他撑起了一边衣襟，而他们就顶着上衣砰砰地开了两枪，结果连衣料都着火了。

“‘行了，’他们说，‘够了。’

“可他还求他们道：

“‘再来一枪吧。’

“‘再没有子弹了。’两个贼回答。

“‘没有了？’

“‘连一颗也没有了。’

“‘好吧，既然这样，’劳动组合成员说着拿出那支上了子弹的手枪，‘把钱、皮大衣都还给我，不然我就叫你们……’

“有什么办法呢？两个贼害怕了，把抢的东西都还给了他，而他看见旁边有这么一辆雪橇，就对他们说：

“‘拖着雪橇，把我拉到火车站去。’

“他们就拉了起来。如果你脑袋后面有一颗子弹随时会射出来，你就只好拉了。”

诸如此类的笑话变得越来越多；人们讲这些笑话时几乎并不



气愤,用的是快乐的语调。人们是想以此掩盖笑话的可怕的内涵呢,还是想以此掩盖朦胧地感觉到的自己的野蛮?

这我搞不明白,但是对我来说,非常清楚的是:那些在街头横行霸道的强盗是些最平常的俄国人,也许甚至是些可爱的人,是那些习惯于靠“撞大运”生活的人。正因为这些人是“平常的人”,所以这种情况才是最可怕的。

我想,街头的功勋是这样产生的:两个平常的人蹲在一个小角落里,不慌不忙地谈论着:

“总算活到了完全自由的日子了。”

“是啊,警察没有了,法院也没有……”

“真妙呀。”

在谈论了一会儿这一新的不习惯的生活之后,这些对法律和文化、对生命的价值毫无概念的人们,这些在部长像职业盗贼一样行事的国家里培养起来的人又议论道:

“咱们到街上去为一个资产者减轻点儿负担怎么样?”

“剥掉他的皮袄?”

“怎么样?”

“好吧,我在报纸上看到过——可以剥他们的衣服!”

“走吧?”

“走。但愿能搞到东西。”

于是他们就出动了,干了起来。有时他们也杀死不顺从的资产者,而有时人们却抓住他们,用“私刑”把他们往死里打。

凶杀和私刑这两种事实都以它们的“平常”使人们感到吃惊。

生活就是这样往前奔驰:有的人在抢掠、杀人,有的人在把抢掠者溺死、枪毙,还有的人谈论这些事,写这些事。而且一切都很“平常”。有时甚至很快活。

但是当你想到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人的生活廉价得可笑,对人及其劳动毫不尊重的国家里,当你想到凶杀的“平常”正在成为

“习惯”，成为“日常现象”时，你就会为俄国感到害怕。<sup>②</sup> 这些情况就变得极为清楚了。有这么三个人到一位朋友那儿去作客，主人的一件东西让客人喜欢上了，于是他们就把主人卸成了12块，把这些肉块装进袋子，扔到了奥勃沃德水渠。就这么平常。

还有杀死申加辽夫和科科什金呢？在这起杀害饱受监狱之苦的病人的事件中有一种不可言传的卑鄙的东西。

尽管他们对祖国幸福的理解比其他人狭隘，但是谁也不敢说，他们没有为人民工作过，没有为人民受过苦。他们是诚实的俄国人，而我们所积攒的诚实人并不多。

但是他们却被杀死了，卑鄙而“平常”地杀死了。

我问自己：如果我是法官的话，我能审判这些“平常人”吗？

我觉得，不能。那为他们辩护呢？也不能。

对于这些由该死的俄国历史创造的、让我们感到耻辱、对全世界是一种嘲弄的人，我既没有力量审判他们，也没有力量为之辩护。

#### 注释：

① 指莫斯科特维尔街心公园(现普希金广场)的普希金纪念像。

② 高尔基在转述这些“快乐的事”时，表现了对当时俄国犯罪潮的深切忧虑。他不带丝毫夸张地指出，凶杀和抢劫已成为平常事和日常现象。实际上，任何人都不能获得不受街头罪犯攻击的保险：强盗袭击过列宁乘坐的轿车；苏维埃政府的两名要员乌里茨基(1873—1918，时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斯图奇卡(1865—1932，时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司法副人民委员)被强盗剥去了衣服。

## 不合时宜的思想

**《新生活报》，1918年公历4月7日  
(俄历3月25日)，第61期(总第276期)**

“不打倒地的人。”这是一条很好的规矩，如果我们大家诚实地执行这一规矩，那我们大家自己和互相都将舒服得多。

但是，当倒地的人抬起头，悄悄地在我们背后爬行并怀着照我们的后脑勺打击的凶残的打算时，必须用与他们伪善的意图理应得到的语调来谈一谈倒地的人。这件事就像引我做这件事的原因一样令人厌恶。

在社会斗争中，倒地的人所受的苦不仅仅是他们所应该受的，而是超过了所应该受的——这是毋须争论的。有什么办法呢？如同兵营在培养士兵一样，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受着历史把他置于其上的阶级立场的培养。我们无意识地服从事实的教导，却总是过少地关心自我教育、我们意志和我们感情的文明的事。我们大家都比可能的要更坏、更粗鲁，有些人则特别想要表现出尽可能多的粗鲁和残忍，他们想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无能和自己的虚弱。

就这样，倒地的人抬起头，爬行着，发出吱吱的声音，这种声音不仅在伊兹果耶夫论《悲剧和罪责》的文章<sup>①</sup>中可以听到，而且在《新世纪》<sup>②</sup>、《当代言论》<sup>③</sup>和其他与它们一伙的所有文章中可以听到。这种凶狠的带报复性的吱吱声在“立宪党人”的圈子里正变得越来越响。“立宪党人”是俄国最优秀的政治家，他们深信这一点，他们还深信，他们是能够拯救俄国，使之免于面临的死亡的唯一力量。在争取自由的艰苦斗争中，他们起过克雷洛夫寓言里那只众

所周知的有点过高估计自己的劳动的苍蝇<sup>④</sup>的作用。立宪民主党人是些很聪明的人，他们不仅避免激烈地批评苏维埃政权的行动，而且甚至有点怂恿它，为此他们不止一次地得到过苏维埃的报刊方面的讨好的赞扬。他们清楚地知道，苏维埃的“共产主义”越来越严重地玷污的不只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还有所有的激进民主主义的希望，所以他们已经不想掩盖自己对民主俄罗斯的由衷的仇恨了。

一个好的立宪民主党人，首先是一名政治家，更准确地说，是一位政客；他也像布尔什维克式的“共产主义者”一样，是自己的思想的狂热分子，他也同样以宗派主义的盲目相信全面消灭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像布尔什维克相信必须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一样。

立宪民主党的领袖帕·米·米留科夫在1905年曾经自豪地对保加利亚文学家彼特科·托多罗夫<sup>⑤</sup>说：

“我在俄国组织了第一个与社会主义根本无缘的政党。”

立宪民主党人至今仍以其“与社会主义无缘”而自豪，但是因为民主不可能不是社会主义的，所以很自然，立宪主义和民主是从骨子里互相敌对的。

在1906年以后，立宪民主党是国家的一个精神痼疽，它在十年间用自己的伪善的政客手腕、机会主义和对被战胜的工人们的无耻的攻击腐蚀了它的知识分子。作为“陛下的反对派”<sup>⑥</sup>，它却不择手段地想接近政权。当时没有做到，所以立宪民主党人希望现在能实现这一点。他们现在又从攻击民主派开始自己的工作。1907年他们也是从这一点开始其工作的，而且现在他们又像当年一样力图把所有的叛徒和胆小鬼、所有的人民之敌和社会主义的仇敌组织到一起。他们渐渐地放纵自己的嘴巴，又想要重新发出那种在第一次革命后他们用以喊遍俄国的令人讨厌的复仇和屈辱的嗥叫。这种“被污辱和被损害的人”的哭号已经开始了，而

且很快就将会有一份炮制得冗长、细致和幸灾乐祸的起诉书摆到民主派的面前，在这份起诉书里所有的罪行都将被夸大，所有的错误都将经过谎言的渲染。这些人清楚地知道，诬蔑是一枚放大镜，用它可以把昆虫看成庞然怪物，可以把蚊虫的叮痕看成碗大的伤口。

“立宪民主党人”把自己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库及其喉舌，但是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一群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自己在国内的意义并完全丧失蓬勃的民主主义精神的分子。

为资产阶级“效劳”的人比资产阶级本身更危险，他们更加贪权，更缺乏务实精神。商人和政客活动之间的区别在于：商人把可以买卖的一切，包括良心都投入他的周转之中，而政客则是在拿人们和自己的良心作买卖。他们有文化，擅长政治诡诈，在斗争中不择手段，能够让文化较少但却比较真诚的并能做积极的工作的人们裹缠在伪善的雄辩之网中。他们完全能够重新制造那种压抑心灵的情绪，那种相当坚定地支持 1908 年至 1916 年间令人可怕的反动的情绪。

这些人之所以危险是因为他们不可能明白对他们来说宝贵的到底是什么，他们的爱、他们的心向着谁？

民主派有两个敌人：从肉体上粉碎了他们的“共产主义者”先生们和已经正在开始扼杀民主派的精神的工作的立宪民主党人。

### 注释：

① 伊兹果耶夫在文章中说，知识分子的悲剧和罪责在于，他们努力宣传反国家和反民族的社会主义的抽象原则，不负责任地毁坏了俄国国家的基础。现在，在革命完成之后，布尔什维克要实现社会主义就将把俄国引向死亡。伊兹果耶夫认为，出路就是保留私有制这一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② 此处大概是笔误。

③ 《当代言论》——1907—1918 年间立宪民主党在彼得堡出版的日报。

④ 指克雷洛夫寓言《苍蝇和旅人》中的苍蝇。当马努力拉车上坡时，它只知在马的身前身后嗡嗡乱叫，但是事后却吹嘘，因了它的忙碌，马才得以把车拉到坡上。

⑤ 彼特科·托多罗夫(1879—1916)——保加利亚作家，曾在法国、瑞士、德国研究法学、文学、哲学，19 世纪 90 年代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其早期作品同情保加利亚无产者。托多罗夫曾同高尔基和其他外国作家、社会活动家有过联系。

⑥ 见附录二《关于论战》的注释。

## 不合时宜的思想

《新生活报》，1918年公历5月10日  
(俄历4月27日)，第86期(总第301期)

在5月3日的《我们的世纪报》上，菲洛索弗夫公民发表了一篇讲高尔基的小文章，说他“努力吸引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来为工兵代表苏维埃服务”<sup>①</sup>。

这件事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篇短文写得非常荒唐，所以我不得不给短文的作者提几个问题并给读者作一些说明。

首先要说一下引起菲洛索弗夫下列说法的原因：

“很难同高尔基争论。他忍受不了别人同他‘顶嘴’。但是不能把‘文明的妥协’这类可怕而复杂的问题摆在个人的土壤上。难道我们经历革命竟是要回到禁止有自己的议论的旧时代的专制的派头上去？高尔基在公开地演讲和行动。难道应当同他在各方面妥协，以免使他感到‘委屈’？该扔掉这些派头了。一切意见、一切行为都应当受到自由的批评。”

菲洛索弗夫公民凭什么说我“忍受不了”别人同我“顶嘴”？

既然我常公开演讲，那我就没有给任何人以权利让他来说什么我“受不了”对我的意见的诚实的批评，不管这批评多么尖锐。我喜欢学习，而同敌人争论常常要比同朋友谈话还要有益。

为什么菲洛索弗夫公民认为可以断言我是“在个人的土壤上提出社会问题”呢？

但是，如果菲洛索弗夫公民认为我过去和现在一直抱有的，对出于原则的怠工者那种病态膨胀的虚荣，对那些“样子不好，骄气

很高”的人的本能的厌恶感是“个人的”感情的话，那么菲洛索弗夫公民是对的，我无法忍受那些“出于原则的二流子”。那些无才能的不成功的人们的怨忿的抱怨总使我感到敌意，他们没有力量和宽容用以忘却和原谅不小心的或变野蛮了的别人在日常忙碌中给他们带来的碰撞和擦伤。

菲洛索弗夫说到“高尔基要把科学院变成沙尼亚夫斯基大学<sup>②</sup>的计划”。

这是撒谎。我没有说过任何类似的话，尽管我坚定地主张必须将科学民主化。但是不言自明的是，科学的自由发展应当先于科学的自由传播，所以重要的是必须让国家的最高学术机构在其创造活动中是完全独立的。

菲洛索弗夫指出，克拉夫科夫教授<sup>③</sup>和巴甫洛夫教授<sup>④</sup>退出了协会，但他没有说他们是什么时候退出的，因为这对他不。他需要让读者们以为两位教授是在高尔基开始为自由协会同委员会会议“作媒”<sup>⑤</sup>之后退出协会的，菲洛索弗夫缄口不谈尊敬的伊凡·巴甫洛夫在几个月前就退出了，而克拉夫科夫在协会成立前就从筹委会中退出去了。

比如，他说：高尔基关于“强迫科学院出版类似《自学导报》的东西的方案非常可爱，它证明高尔基要教‘同志们’学识字的善良愿望。但是在贫穷情况下，我们能这样浪费地对待真正的科学家吗？”

“巴甫洛夫院士用自己的著作赢得了整个欧洲科学界的感激和惊奇，为全人类作出了贡献。而高尔基却想强迫他去讲‘生理学简明教程’，而这种事每一个大学生都能够胜任。结果是，高尔基尽管关心科学的传播，但却表现出对科学本身及其忠实的工作者们很不尊敬。”

这种做法可太巧妙了。菲洛索弗夫公民两次使用了不恰当的动词“强迫”，他似乎在对自由、纯洁的科学的尊敬的代表们耳语



说：

“你们想一想——高尔基在‘强迫’你们，对吧？他怎么样？他在强迫你们！”

我并不“强迫”科学院出版“某种类似《自学导报》的东西”，我只是说，如果科学院能做一件工作——向广大群众介绍科学院在“发展科学”方面工作的进展情况，那么它就做了一件对民族和社会都非常重要的事。建议并不意味着强迫。

菲洛索弗夫凭什么说我想“强迫”伊·彼·巴甫洛夫去讲生理学简明教程？他给这些话加上了引号，似乎我真的说过这些话。

他故意强调，我只关心“科学的传播”，他缄口不谈科学的发展，这种缄默对他来说是必需的，借此他可以说，高尔基“准备为人民大学的”红豆汤而出卖自由和文化，还可以说什么我在“号召俄国知识分子进行叛卖”。

瞧，说到哪儿去了！号召为国家和人民工作就是号召叛卖。这不是被仇恨蒙住了眼睛或庸人的愚蠢吗？

但是菲洛索弗夫以前是怎样看的呢？要知道，多年来我早就号召知识分子无论如何，不管在什么条件下都要进行工作。勇敢的人们的疯狂，这是那种不管现实的种种反抗，不管现实的一切痛苦折磨，只是力图在现实的条件下——不管现实多么艰难——肯定自己的意志，实现自己的思想的人们的疯狂。这不仅是加里波第的疯狂，而且也是布鲁诺和其他思想的伟大的殉难者们的疯狂。科学是人类所有的疯狂中最浩大和最令人惊奇的疯狂，是人类最崇高的疯狂！

尽管这听起来非常荒谬，但是只要菲洛索弗夫公民在想一想纯科学发展的条件后，我希望，他就将明白，这些话中包含着许多真理，也许是可悲的真理。

关于菲洛索弗夫的狂妄做法不值得一谈，他的臆想也并不值得一驳。

但是要知道,他的文章不是因为编辑的“不慎”——而实际上大概是因为观点相投吧——而刊登在《我们的世纪报》上的。

这些观点的实质是什么呢?

其实质是对民主派的怨恨,而且从菲洛索弗夫公民的短文中可以看出,这种怨恨变得越来越厚颜无耻。我已经指出过,社会主义民主没有比那每天都在《我们的世纪报》的字里行间发出啾啾的叫声的人更加恶毒的敌人了。<sup>⑥</sup>这一机关报的编者们越来越公开地随意表达他们对革命的态度,越来越坚定地站到反对派的土壤上,无疑,他们又在准备扮演他们在1905年之后得以扮演的那种政治反动和精神反动的组织者的叛卖的、腐蚀人的角色了。

一个烂脓包又在饱经苦难的俄国的机体上膨胀起来。

革命的民主派应当知道,对于他们来说最富敌意的是《我们的世纪报》纠合的政治流派。这是不可调和的敌人,因为这是精神上的敌人。<sup>⑦</sup>

### 注释:

① 指1918年5月3日(俄历4月20日)《我们的世纪报》上发表的非洛索弗夫的短文《可恶的趣闻》。该文是对高尔基和卢纳察尔斯基的通信和会面的反应,也是对高尔基在《新生活报》(1918年5月1日(俄历4月18日))上呼吁俄国知识分子重新“承担起从精神上医治人民的伟大劳动”的反应。高尔基号召俄国的所有知识分子摒弃党派和宗派的成见在现在的“更为自由的条件下工作”。菲洛索弗夫是高尔基思想与文学上的宿敌,早在1905年他就宣称“高尔基已经完了”,现在他反对高尔基的号召,认为知识分子不应、也不能同苏维埃政权合作,因为布尔什维克像在专制制度下时一样不相信他们,剥夺他们的自由,用政治上是否可靠的标准对待他们。

② 沙尼亚夫斯基大学——1908年用自由派国民教育家、退役将军沙尼亚夫斯基(1837—1905)的资金在莫斯科开办的大学,该校招收不同性别、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与政治观点的学生,施以中等与高等教育。该校师资力量

雄厚,许多著名学者曾在该校任教。1918年该校被关闭。

③ 尼·帕·克拉夫科夫(1865—1924)——药理学家,教授,1920年起为俄国科学院通信院士。

④ 伊·彼·巴甫洛夫(1849—1936)——生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07年起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

⑤ 为了扩大“自由协会”的活动,加强其影响和物质基础,高尔基努力吸引苏维埃政权和工会组织关注“自由协会”。1918年4月16日他致信教育人民委员卢纳察尔斯基,建议卢纳察尔斯基同他及“自由协会”和“艺术家协会”的负责人们会谈。会谈于当月19日举行。《人民事业报》(当月21日)和《新生活报》(当月26日)分别对高尔基的信及双方的会谈做了报道。接着,高尔基又起草了给政府的论述“自由协会”的任务的报告书并向协会的负责人提议由他将报告书的内容改写成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同时寄给工厂管理部门,以争取对“自由协会”的私人资助,扩大协会的影响,促进国家的精神生活。关于“自由协会”的命运,高尔基在1925年柏林版的《回忆列宁》中指出:“这一创举后来被十月革命消灭了,‘协会’的资金被没收了。”

⑥ 见高尔基1918年4月7日发表在《新生活报》上的文章(见本书附录二)。

⑦ 《我们的世纪报》对高尔基的这段话立即作出了反应。第二天,该报在报刊综述栏中引用了高尔基的这段话并指责他为向政权表示忠诚而陷害立宪民主党人及其机关报《我们的世纪报》。凑巧,次日《我们的世纪报》被查封。立宪民主党的报刊,如《俄国消息报》遂力图将高尔基对《我们的世纪报》的批评和该报的被查封一事联系在一起。1918年6月16日(俄历3日),《我们的世纪报》复刊,两天后它就重新指责高尔基“用政论进行诬陷”。

## 不合时宜的思想

**《新生活报》，1918年5月公历19日  
(俄历6日)，第94期(总第309期)**

在某些圈子里，在关于是谁毁坏了军队这一问题上，有一种确定无疑的答案：是社会主义者们毁坏了军队。这是那首无限冗长的关于俄国已经死亡(但俄国并没有死亡，而且看来也不想死亡)的歌曲的一段基本的副歌，这是那些以饿狼之爱在爱着俄国的爱国者们对社会主义者们提出的一条根本的指责，这是一条最不真诚、最虚伪的指责。

还是在国防委员会1916年给沙皇的一份报告书中就曾说到军队将不可避免地瓦解，但是这一点被忘记了，因为记住这一点对控告社会主义者的起诉书的热心起草人不利。

不久前我又翻到了1916年和1917年间我收到的一捆前线来信：其中有一些信应该公布于众，因为它们非常明确地讲了军队瓦解的原因。

比如这封1916年3月的士兵来信吧：

“我把这封信交给一个去休短假的战友秘密带走，不然在普通的信中可什么都不能写，因为军事邮检部门要审查那些信的，如果在里面找到讲什么的只言片语，那他们马上就会追查：是谁写的，哪一连的，哪一排的，然后就打上25鞭子，再不就是用枪把人押到战壕上，让德国人来开枪打他，这种情况很多，但是应当谢谢德国人，他们并不开枪，而是喊叫道：‘别害怕，俄国佬，我们不开枪，因为是长官把你摆到那儿的。’”

“我们就在离德国人一百步远的地方，所以根本不能爬出战壕，火力非常猛；我们这儿40天里一个团的非战斗减员就有112人。烂泥有齐膝深，天又冷，还下着雪，还有疾病……而吃的只有倒霉的粥，有时有点肉，更多的情况是没有肉的，你要是说饿的话，他们就回答你说：是来不及给你们送面包。说什么面包呢——48个人每天只给发7个每个11磅的面包。可是要知道你整夜都得工作啊——我们要挖战壕呀。不错，面包可以在辎重队里买到，但是一个黑面包值20戈比，而白面包要45戈比，你就吃吃看吧。”

在同年6月，一位志愿兵出身、得过三次乔治勋章的军曹在另一封信中抱怨说：

“我是一名普通的士兵，我打仗不是为了利己主义，而是出于对祖国的爱，出于对敌人的恨，我总算开始明白：事情不妙，我们挺不住的。现在我从医院，从俄国回来了，我看到了混乱之所在，因为前线的人都精疲力竭了，而且人力也不足，可后方却有数万人白待在那里，无所事事地逛来逛去，只是大吃大喝，要把俄国吃光。这是谁指挥得这么不像话？”

指挥的不是社会主义者。

一位青年炮兵告诉我：

“军长A对他喜欢的那些军官们说：

“‘随便带上多少这些畜牲——行动吧。等什么呀？’

“他的亲信们就带上一两个连，领着这些士兵在没有炮火准备的条件下朝德国人的战壕进攻，士兵们挨了打击，军官们却得了勋章。一位受伤的步兵对我说：

“‘他们把我们当虱子打，真倒霉！一会儿放出霍乱病，一会儿想出战争，唉，主啊，真想跑呀！’”

这关社会主义者的什么事呢？

我问一位负伤的乔治勋章的获得者：

“在战壕里很困难吗？”

他回答说：

“士兵们很困难，我不懂他们是怎样忍受的！比方说我吧，我是被子，而不是褥子，但士兵是褥子。你们见过吗，在坏天气里，当战壕里积了水时，在战壕底部，在泥泞里躺着的是普通士兵，而我们军官们却睡在他们的上面。他们得了风湿症，而我们只是受点冻伤。”

著名作家盖-夫在1916年写道：“从早到晚都鞭打那些逃避在战壕中作业的人，打那些士兵、难民、犹太人。但他们没法干活——已经精疲力竭了。”

后方的士兵们了解前线的情况，伤员、残废人、被冻伤的和患结核病的军人们对他们讲过前线的情况。所以在后方形成了一种明确的无望情绪，怀着这种情绪是不会打胜仗的。

所有后方的人们都在唱与下面的顺口溜类似的歌谣：

新兵仔，别发愁，  
德国人早晚会打碎你的头！

白嫩的沙皇，你干了些什么——  
你搞了一场战争，真不是时候！  
真不是时候，真不是时候——  
把我们带到屠场去挨刀。

唉，我真不想给沙皇  
去当长工，因为沙皇  
总是把长工们往  
雪亮的刺刀尖上穿。

而少女们在把倒运的小伙子们送去接受死亡时，就忿然喊出：  
乌云、雷电啊，快找到官家的房子，  
快炸毁这座官家的房子！

快打死房子里的那个人——

是他夺走了我的心上人。

从后方补充来的兵员武装得不好，训练得不好，而且已经被他们所知道的前线的情况压抑住了。

在所有的这一切中都没有社会主义者们的一点罪过。

这里还有一位情绪总起来说相当饱满的知识分子军官写的一段信：

“这帮人非常愚昧，其中的许多人根本就不明白周围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谁也不相信——无论是克伦斯基，还是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临时政府。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空的。我就亲耳听到过一些议论，那可真让你瞠目结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类议论：‘天知道这个克伦斯基是个什么人，也许，他还想再打上三年仗。’

“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在他们看来是一些后方的士兵，他们不想上前线，但却在喊叫：‘把战争打到胜利！’”

另一位军官写道：

“不管怎么说，在这些盲目的大殉难者身上有一种类似国家本能的东西，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们不把刺刀插到地里，一跑了之。”

可是他们到底跑掉了，因为耐心不足，因为军队知道和记得这样的事：不拿枪，而拿着大棒子去进攻；不是用霰弹，而是用石块去打退敌人的进攻。

在1914年和1915年，所有的报刊每天都在大声地为英勇的俄国士兵唱肉麻的颂歌。1916年，当社会主义者还在沉默时，颂歌的调门明显地降低了，到年底时有些杂志开始非常勇敢地怀疑起战无不胜的俄国军队的战斗素质了——这种怀疑在军队的基干部分几乎被战斗、疾病和对士兵的可恶的态度全部消灭后是很不合适的。

我写出这些话并不是为社会主义者辩护，我并不认为他们需要辩护，但是看着谎言被上千次地重复并在许多人眼里正在获得真理的面目，真是太让人感到恶心了。

但真正的严峻而公允的真理是，整个俄国，而不只是它的军队，早在社会主义者在俄国取得发言权以前很久，就开始毁坏了；现在历史将治愈和复兴俄国的巨大工作交给社会主义者负责了。



## 不合时宜的思想

**《新生活报》，1918年5月公历23日  
(俄历10日)，第97期(总第312期)**

维拉·阿历克赛耶夫娜·彼得罗娃快要饿死了，她是女子医学高等讲习班第一届毕业生，是一位医生。有人在给我写信时说到她：

“我不知道为了一个实际上即将饿死的老病人该去求谁，这病人是一位医生，她把自己的一生全都献给了地方人民，献给了地方自治会的工作。现在她浑身是污物，无助地躺在一间落满灰尘的可怕的房间里，奄奄一息。您就听她说的那话吧，那是阴间人说的话。——“饿得真难受呀！”她的死将是缓慢而确定的，她连一个给她端杯开水或拿片面包的人都没有。人们曾大谈温和与爱心……可都在哪儿呢？没有善良的原则和激情的冷漠野兽、贪吃的魔鬼——我们被变成了这种东西……”

必须帮助她。维·阿·彼得罗娃的地址：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六号街八号四十六室。捐款可寄到《新生活报》编辑部。

## 不合时宜的思想

《新生活报》，1918年公历6月1日  
(俄历5月19日)，第105期(总第320期)

工艺学院的物理学家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盖泽胡斯教授“因营养不良导致的极度衰竭的症状”住进了奥布霍夫男子医院。盖泽胡斯教授当年是一位非常有名气的科学家，那些有才干的物理学教师常常被称作“盖泽胡斯们”，这也是对他的一种肯定。现在他已经72岁了，他躺在奥布霍夫医院里，饿得浑身浮肿，两条腿也肿了起来。

我想，这一事实不需要说明和抱怨，我只想提醒一下，法国大革命在砍掉化学家拉瓦锡<sup>①</sup>的头之后并没有用饥饿折磨过自己的科学家。因为在我们这儿，由于普遍的道德上的退化，所以一切都是可能的，很可能会有一个无耻之徒跑出来说：

“教授已经72岁了……”

但是即使最卑鄙的无耻之徒也会无话可说的，如果他知道下面的情况的话：仅在一个奥布霍夫医院的男子部就住着134个“患饥饿病”的人，“他们生病是由于营养不足或不正常”，而其中59人不足30岁，30人不足20岁。这都是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这些人为了过正常的生活必须要获得能给机体以3000卡路里热量的营养，但这些人当前的食品配份制度下却只能获得500至600卡的热量，即比人必需的能量的四分之一还要少。在这种情况下还应当记住，远不是填入胃中的所有东西都可以被机体吸收，掺有一半稻草的面包、鲱鱼头、油渣饼及类似的东西与其说对人有

益,不如说对人有害。

彼得格勒的饥荒已经开始并正在以可怕的势头恶化。几乎每天在大街上都要扶起一些因为虚弱倒地的人。你会听到,一会儿是运货马车夫跌倒了,一会儿是一位少将跌倒了。这儿扶起了一位卖报纸的军官,那儿扶起了一位女裁缝。

但是,也许,比饥饿导致的肉体死亡更可能的是越来越明显的精神的衰竭。不久前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中一些人体重急剧下降的事实引起了医生们的关注。这类人的营养不管怎么说也比工人们好,而他们所需的热量也比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少 1000 卡路里,但是他们的消瘦还是在加剧。医学研究表明,这些人要消耗大量的磷,这就是说,他们的神经组织在不正常地损耗,这种损耗最终将使人们处于精神的创造力的枯竭,而这种精神的创造力对我们的国家来说,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必需。

彼得格勒作为一个城市正在死亡,作为一个精神生活的中心也正在死亡。在这一死亡的过程中,可以感觉到令人厌恶的对命运的驯顺,感觉到对生命的俄国式的消极态度。

我被不同阶级的人在救助一度被大家遗忘并因饥饿和肮脏而奄奄一息的女医生维·阿·彼得罗娃时表现出的团结一致精神所深深感动。但是维登斯卡娅女士和贝连斯告诉我,彼得罗娃“在这种可怕的环境中生活了好多年”。我们的帮助有点晚了。而维·阿·彼得罗娃的生活曾到了何等地步呢——关于这一点叶·普果夫科告诉我说:

“昨天,我的眼前又一次出现了噩梦般的可怕景象:一具备受饥饿和虱子折磨的老人的躯体,那虱子一群群地在老人身上的痂疤上爬来爬去。

“当时呆在彼得罗娃的浴缸旁的医生们以及那些甚至见过世面的女侍们的眼里所流露出来的神情是根本无法传达的。

“一位女侍问我:‘您在哪儿找到她的?’”

“我告诉了她在哪儿。

“‘她是谁呀?’

“我回答说,这是一位女医生,听了我的回答后,那女侍睁大眼睛看了看我,并用手指指坐在浴缸里的彼得罗娃,不相信地几乎喊叫着说道:

“‘谁?她是医生?’

“当时在场的一位医生说了一句,那话中带着苦涩的责备:

“‘很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医生生活得都很富有。’”

应当做点事情,必须同知识分子体力和精神衰竭的过程作斗争,应当体会到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头脑,而且这一头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宝贵。

为了自我保护,为了不受饥饿和神经衰竭之苦,彼得格勒的理智的力量应当立即组织起来。可以从小事做起,例如办食堂,然后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上再寻找干更重要的事情的方法和途径。

不能这样冷漠而消极地对待自己和互相对待,要知道,如果饥荒引起冷漠的话,那么冷漠又反过来能加剧饥荒,使之达到自发的毁灭的程度。

在走向自由的时候,不可能把对人的爱和关心抛到一旁。

### 注释:

①拉瓦锡(1743—1794)——法国化学家,现代化学奠基人之一。1768—1791年,任总包税商,聚敛大量钱财,一部分用于科学实验。1894年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

## 不合时宜的思想

**《新生活报》，1918年公历6月4日  
(俄历5月22日)，第107期(总第322期)**

在争得了政治权利之后，人民取得了自由创造社会生活的新形式的可能，但是他们仍然处于——从外在方面和内心方面说——旧风习的霉斑和锈迹的影响之下。在人民群众之中，没有迹象说明他们想有意识地力求从根本上改变过时的，对自己、对别人、对生活的总的态度。

生活充满了许多对人民来说是全新的珍贵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落在那些从品质上讲是粗鲁的、从数量上讲是有限的本能和感情的范围里，而在这一范围里掌握这些思想是颇为困难的——如果能掌握这些思想的话，很遗憾，对此既可以，也应该加以怀疑。

由最有干劲的人们力量制造的革命正在非常迅速地消耗和吞噬着这些最宝贵的力量，但是积累和组织新的力量的过程进行得却具有威胁性地缓慢。

必须加快这些力量的成长和发展，必须立即创造培养新人，迅速积累能够有信心和文明地继续改造俄国的工作的积极潜力的条件。

显然，要创造新人只靠政治宣传是不够的，只是组织思想也是不够的，必须组织起意志，培养、发展和深化感情。

我们应当关心的是，让对人民的道德与审美的教育同对他们的政治教育同时不断地得到发展——只有在这一条件下，我们的人民才能完全从自己的最不幸的历史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这

样，他们才能从旧风习的俘虏状态中走出来，只有具备了新的感情、新的思想，他们才会懂得并有意识地给自己的意志提出明确的、理智的、可以实现的目标。

应当想到，千百年来人民一直受着压抑意志的、严厉而忧郁的教会学说的教育，这一学说认为，人在任意而不负责任地支配他的命运的神秘力量面前是微不足道的，这一学说是由俄国君主制的毫无意义的压迫创造的社会存在的全部条件所极为明确、极为牢固地肯定的。

这一学说断定人的理智和意志是无力的，它向人的理智和意志提出成就美德的功勋的最高要求，它用放在地狱之火上炙烤的永恒的判决来威胁人，它永远不能鼓动起积极的力量，使之用于按照人的意志和理智建设人间生活，创造幸福和欢乐。这一学说使人陷入他自认在上帝面前非常渺小的意识的黑暗深渊之中，它把以沙皇为首的社会政治生活的整个环境看作其形式逻辑的最佳图解。这一学说贬低了人，它不仅束缚了人民的积极性、首创精神和主动性，它还深深地渗透到知识分子的心灵之中，填塞到俄国文学的优秀佳作之中，并用无望的、沉默哀伤的、对命运的哀歌式的驯顺的黑纱裹住了我们的全部生活。

我们的知识分子勇敢地、英雄般地进行着反对过时的生活和思想的理论暴动和实际斗争，他们进行这一斗争不是遵从君主制教会的似乎人道的思想的教诲，而是很自然地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也即创造了文艺复兴的那种多神教的本能，这种本能永远鼓动人反抗他自己的，也就是人类的关于命运不可战胜性的概念。

继续这一反抗，加强和深化这一反抗，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神圣而英勇的任务。唯一能够解放人并把人变得崇高的革命应当在人的内心进行，只有通过使人消除陈腐思想的霉斑和灰尘的途径，才能完成这一革命。

一旦人民接受了某些思想，这些思想也就变成了奴役他们的

思想自由和意志的情感。为了克服这些情感，必须唤起另外一些更加积极的情感。

我们生活在一个大灾难的时代、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所以我们应当给人民以能够在群众中培养感受斗争激情的本领的景观、书籍、图画、音乐。悲剧最能激起感情，悲剧的激情最容易把人从肮脏的风习罗网中拉出来，说到底，悲剧宣传人道主义。

观看悲剧性的东西不能不把敏感的观众提高到日常的、普通的混乱之上，悲剧主人公们的功勋是特殊的场面，是人的伟大力量的游戏或反对人的命运的战斗的场面。

出于这些想法（但愿这些想法的提纲性不至于影响其明晰性），我打算就如今各种组织与团体正在开展的文化教育活动的实践说几句话。我就从事实开始吧。

彼得格勒的一个工人区开办了一个剧场，舞台的框架是一位非常有才能的画家绘制的，上层绘有卷起袖子的肌肉发达的工人、工厂和工厂的烟囱，这一切都是立体主义的。

工人们看了看这种艺术，坚决地声明：

“把这些东西拿掉，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我们需要人来支持和发展我们对大自然，对田野、森林，对充满生动活泼的色彩和阳光的广阔空间的爱。支持我们对美的爱吧，我们不需要单调枯燥的东西，不需要司空见惯的东西！”

原话就是这样说的，而且这是工人们说出来的。在这些话中明确地表达出在艺术中寻找与令心灵感到疲惫和折磨的现实相反的东西的健康人合理而自然的要求。对日常的令人厌恶的现象他知道得比画家清楚，所以如果艺术家不是善于用自己亲切而明亮的心灵之火照亮工人昏暗生活的抒情诗人的话；如果他不是具有巨大的描绘日常生活的肮脏地狱的力量，使他的画、诗或小说能唤起对日常生活的积极厌恶、对节日的本能追求的讽刺家的话；如果

他不能够在普通而平常的事物中揭示英勇而重大的东西——如果艺术家不能给人以这种东西的话，那么工人，即习惯于将无定形的原材料制成精细的物品、复杂的仪器、巨大的机器的人，就不需要他的艺术。工人也是艺术家，因为他赋予无定形的东西以固定的形式。

他不会喜欢立体主义和所谓的“线条画”，而它们也不会告诉他一点新东西。很可能，新的画派是有前途的，不过它们暂时还是技巧的厨房，对这一厨房只有口味极为精细的人，即美术评论家和艺术史家才会感兴趣。把这种厨房里的工作全部展现给渴求成品美的人们看，那就是叫他们去读列夫·托尔斯泰那被他涂改过上百次的《战争与和平》的校样。

现在，我要从绘画转到舞台艺术上了，我要提一个貌似荒诞的问题——哪一出剧对群众的社会审美教育更为有益：是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还是罗斯丹<sup>①</sup>的《西哈诺·德·贝热拉克》；是狄更斯的《炉边蟋蟀》，还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的随便哪一个剧本？

我肯定罗斯丹、狄更斯、莎士比亚、希腊的悲剧作家们的作品和法国戏剧中的机智、欢乐的喜剧。我支持演出这些剧作，因为，我敢说，我了解工人群众的精神需求。在工人群众中，阶级仇恨和社会差别的意识得到了深刻的发展，他们想看到和理解全人类性的和团结的现象，他们已经感觉到，对感情、思想的团结的意识，是人的文明的基础，是全人类向往喜悦、幸福，向往缔造人间节日的征兆。

工人群众希望人的感情和思想创造的最优秀的东西能够触及到他们的心灵，他们希望能欣赏人的天才，理解并喜爱人的天才。

被因一块面包而产生的不间断的敌意所败坏了的日常生活恶毒迷雾，在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民族那里，都是由科学、艺术的创造而得以减轻和淡化的，因为只有科学和艺术才能使我们野兽



般的风习变得高尚。现在,最适时和最必须的是,向我们离奇野蛮的当今生活引进科学、艺术创造者的最高成就,引进世界的一切珍贵的东西,引进世界的精神的一切瑰宝,引进一切有改造人,提高人,即事实的创造者,并使之驾于事实之上的力量的东西。

人类创造了许多美好的东西,人们每天都在制造大量的渣滓和污物,而在这成堆的不可避免的不值钱东西的掩盖之下,美好的东西变得看不见了。

应当这样活着——让美好的东西永远呈现在我们的眼前,那样美好的东西就会唤起无愧于人的尊严的感情、思想和行为。

而如果把人放到猪圈里,却要求他成为天使,那就太愚蠢了。

#### 注释:

① 罗斯丹(1868—1918)——法国浪漫主义诗人兼剧作家。高尔基非常赞赏他的英雄剧《西哈诺·德·贝热拉克》,曾在给契诃夫的信中和报刊的剧评中称赞过这出剧。

## 不合时宜的思想

《新生活报》，1918年公历6月11日  
(俄历5月29日)，第113期(总第328期)

具有歇斯底里情绪的人们给我写来一些野蛮的信——威胁要杀死我。<sup>①</sup>

我想，这种想法是不严肃的，而且与其说是罪恶的，倒不如说是没有文化的。除了证明凶手是傻瓜以外，凶杀什么也证明不了。用死亡来惩罚人并不能使人们变得比他们实际上的情况好。不管你杀死多少人，活下来的人不管怎么样也要走历史所指出的道路，死亡无权停止历史的力量发展。

难道在我们罗斯，在所有的城市，在千万个村庄，杀的人，为了阻止革命情绪的增长而杀的人还少吗？但革命毕竟成长壮大起来并取得了胜利。因此在今天，当杀的人并不比以前杀的要少时，最有理智、最健康的成分最终反正是要胜利的。肉体上的暴力将永远只是道德软弱的不可辩驳的明证——这也是早就清楚，而且早该理解的道理。

而因为一个人是他自己的样子就用死亡来威胁他，那就是无知和愚蠢的了。

有人指责我“卖身投靠犹太人”<sup>②</sup>，这也是愚蠢的说法。当然，我明白，在一个长期以来所有的人都习惯于收买和叛卖的国家里，一个捍卫无望的事业的人应该被认作叛卖的人。大多数人的心理要求每一个人都这样或那样地受到玷污，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应当

有一个黑点。这是职业骗子们的特别心理，因为他们不能想象人是诚实的，但是人就是喜欢诚实的，因为他的心灵的爱好就是诚实。不过，也许他们应当感到嫉妒：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准备着出卖自己，而且卖得不很贵，有一些甚至可以不花什么钱就被买下来。他们非常恼火：怎么能这样呢？我们处在迫使我们拿自己的良心作交易的条件下，可他们不知怎样却不出卖自己。

所以尽管他们自己并不相信这些“不知怎样”的人的叛卖性，但还是喊叫着：

“他叛卖了！他们叛卖了！”

唉，不幸的人们！你们最好试试自己去做诚实的人，其中是有愉快的东西的。

后来，有人又在信中对我提出了疯狂的指责：我似乎“憎恨人民”<sup>③</sup>。这是要求解释的。我坦率地说吧，那些奢谈自己对人民的爱的人总是引起我的不信任和怀疑的感情。我问自己——也问他们——难道他们爱那些大口喝伏特加后变得像野兽一样，用脚猛踢自己怀孕妻子的腹部的农夫吗？难道他们爱那些消耗千百万普特粮食，用粮食酿“私酒”而使爱他们的人们饿得奄奄一息的农夫吗？难道他们爱那些把数以万计普特的粮食埋到地下，让它们腐烂，却不愿意把它们交给饥饿者们的人们吗？难道他们爱那些甚至活埋同类的农夫、那些在街头制造血腥的私刑的人和那些带着喜悦欣赏怎样将人往死里打或往水里溺的人吗？难道他们爱那些以每磅10卢布的价格出售偷来的面包的人吗？

我相信，那些责备我仇恨人民的富有爱心的公民们，在他们的心底也同样不爱这些变得野蛮了的、自私的人民，就像我不爱他们一样。如果我说错了，而他们还是爱这样的人民的话，那我请求原谅我说错了，但是我依然保留我的意见：我不爱这样的人民。

不仅如此，我还相信，不应当爱人民现在的样子，就像不应当

指责人民是现在这样子而不是另一种样子一样。我想，如果爱人民的人忘我地将所有的知识、自己心灵的所有财富都献给人民，让人民人道主义化，那无论对恨人民还是对爱人民的人们来说，都会更好的。而爱人民的人在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献给人民的时候，就不要指望自己无私的劳动将会得到重视和人民之爱的回报，因为这是不会发生的。

人们怎样对待我们，这并不重要，而且没有多少意思；我们怎样对待人们，这倒是需要弄清楚的！

### 注释：

① 高尔基曾不止一次收到扬言对他进行迫害和肉体伤害的恐吓信。对此，作家总是耐心讲解“自己的真理”并坚定地回答：“这样做是愚蠢的，因为威胁不可能使我变成哑巴，不管用什么威胁我，我都要说，……用凶杀、暴力及类似手段不可能取得社会正义的胜利。”

② 指高尔基发表的许多揭露反犹太主义和黑帮宣传的言论（参见本书正文第30、47、48篇）。

③ 由于高尔基在撰写本书中的文章时，一直痛切地指出并批评人民在革命前后表现出来的缺点，因此受到了许多类似他“脱离了人民”、“仇恨人民”、“已经背叛了自己的人民”的指责。但是高尔基坚信并向人们解释说，爱人民决不等于对人民的错误视而不见；正是因为他热爱人民，他才“有权利说出关于人民的令人难堪而苦涩的真情”，而这样“对人民要好一些”。

## 不合时宜的思想

《新生活报》，1918年6月公历15日  
(俄历2日)，第12期(莫斯科版)

被严峻的日子的无情拷打所残酷折磨的人正在发出越来越响的呻吟声；你听着他的呻吟，毫无结果地受着折磨，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他。

呻吟的已不是那种以前也总爱抱怨，除此之外就什么也不会干的俄国人；那种俄国人现在正在歇斯底里地和幸灾乐祸地欢呼，因为他们那动物的悲观主义的最悲惨、最阴暗的预感得到了证实，他们洋洋得意，每日每时都在喊叫：

“好啊，怎么样——我说的不是真理吗？好啊，难道我没有预见到这些情况吗？”

这种人在任何条件下都将生活得很糟糕，因为他自己对好的事物没有兴趣，在他自己的身上没有探索或创造更好的事物的追求。

但是现在开始呻吟的是那些不久前还拥有足够的力量反抗古老的恶毒的生活原则，同它们进行顽强斗争的人们，而且这种人正变得越来越多。下面就是这种人中的一位写来的信，这封信最为准确地表达了这些人的情绪：

“我一直是极端左倾的，我同情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就是我的宗教。但是现在……您在著作中写道：应当相信未来，应当相信人。在我的心中，信仰正在死亡。社会主义的敌人们总是说，生活就是斗争，胜利的是最强者，不是这些人，那就是另一些人将占

上风——只不过角色互换一下，结果还将一样。而现在我常常觉得，情况就是这样。难道现在还有一点平等的影子吗？仍然是那种功名心的游戏，那种从社会的大糕饼上捞一块的贪欲和那种……不平等……”

“现在仍像过去一样，有一些居民集团享有各种各样的特权，只不过现在重心转移了。现在也有一些处于特殊地位并牢牢抓住自己的优势的幸运儿……难道在旧时代，在带引号的‘社会主义’之前不也是这样子吗？……”

有什么可说的呢？生活是令人痛苦的，但是你不可能避开它藏匿起来，然而应当为往日的罪孽付出代价，应当解开或消灭掉人的内心的或外部的乱麻。毫无疑问，俄国人民和俄国现在所经历的悲剧，是全世界进程的不可避免的现象，是俄国历史发展的全部努力所决定的。长期以来我们曾一直向西欧世界演示不该怎样生活，现在我们想演示应该怎样生活了。

我们演示得不成功，不过在我们这儿所发生的一切之中，有一点我们前所未知的从客观上讲颇珍贵的东西：整个俄罗斯，一直到它的最底层，都被自发的推动力所震撼了，甚至作为国家，它已经被——临时地——摧毁了，但是应当相信，这种推动力、这一暴露出我们的全部疾病和丑恶的大灾难，将医好我们，使我们康复、新生，以迎接劳动和创造。

我知道，这些想法、这种信念不可能安慰很多人，但是这是唯一能赋予生活以明确的意义信念。

## 在“文化与自由”协会的 莫斯科公众大会上的讲话

《新生活报》，1918年6月公历30日  
(俄历17日)，第126期(总第341期)

证明文化教育工作的必要性是多余的，这一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马路上的肮脏的石块和人们心灵及大脑中千百年的污垢，都在雄辩地强调这一必要性。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看到，俄国人民所沾染的愚昧是何等的深重，自己国家的利益与他们格格不入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在公民义务方面他们是何等野蛮、落后，他们的历史感、对自己在历史过程中的位置的理解发展得何等幼稚。

说到“俄国人民”，我指的决不只是工农劳动群众，不，我说的是所有的人民、人民的所有阶级，因为愚昧和不文明是整个俄罗斯民族的特点。在这上亿的被剥夺了关于生命价值的概念的愚昧群众中，只能挑出为数不多的几万所谓的知识分子，即意识到理智因素在历史过程中的意义的人。这些人尽管有其各种缺点，但却是罗斯在其漫长的艰难而畸形的历史上创造的最伟大的群体，这些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国家真正的头脑和心脏。产生他们的缺点的原因是俄国那不适宜理智性天才发展的土壤。我们都敏锐地感到我们天才的善良，天才的残酷，天才的不幸。在我们之中有不少英雄，但却很少有能够勇敢地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在俄国条件下很沉重的义务——的聪明而强有力的人。我们热爱英雄，如果他们不反对我们的话；但是我们却不清楚：英雄主义只求一小时或一天的情感紧张，而勇敢则要求毕生的情感紧张。

在俄国生活环境中的文化工作要求的不是英雄主义，而正是勇敢——长时间地和不动摇地鼓足全部的心灵的力量。在俄国的不稳定的沼泽上播种“理智、善良、永恒”，是一件极不寻常的艰难的事。而且我们已经知道，在俄国的平原上播种我们最好的鲜血、我们最好的神经汁液，也只能得到不太茂盛的、可悲的幼苗。但是尽管如此，也还是应当播种，而且这是知识分子的事业，然而他们现在被强制脱离了生活，甚至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但是正是他们应当继续他们早已开始了的国家的精神净化和复兴的工作，因为除了他们之外我们没有别的理智的力量。

有人会问：那无产阶级这先进的革命阶级呢？那农民呢？

我想，不能认真地把全体无产阶级群众当作一种文明的、理智的力量来谈。也许，这样做对同资产阶级论战，对吓唬他们以及对自我鼓劲是方便的，但是在这儿，即在聚集着真诚而深切地关心国家未来的人们之中这样做却是多余的。作为群众的无产阶级只是一股体力，仅此而已；农民的情况也是如此。从历史上说尚年轻的工农知识分子就是另一回事了，他们当然是一股具有创造力的精神力量，作为这样一股力量，他们脱离了自己的群众，在自己的群众中是孤立的，就像我们旧式的苦役知识分子在全体劳动群众中是孤立的并脱离了他们的情况一样。我们称旧式知识分子为苦役知识分子不只是根据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做过官家苦役的事实，还根据他们在俄国的全部生存条件，根据他们的全部生活与工作。

我觉得，应当做的第一件事是必须把旧式的有经验的知识分子的理智力量同年轻的工农知识分子的力量联合起来。全俄文化教育工作的蓝图在我的眼前大致是这样勾画的：

全体知识分子自己要组织起来，现在他们已经懂得和感觉到，仅仅靠政治纲领，靠政治宣传是不可能培养出新人的，加深敌意和仇恨只能导致人的全面兽性化和野蛮化，为使国家复兴，必须立即进行紧张的文化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摆脱内部的和外部的



敌人而获得自由。

集中力量,这是今天首要的任务,而在集中起国家的理智力量的同时,还应当把所有的后备的工农知识分子,即所有的现在正在原来从出身上说很亲切的,而如今从精神上说已经陌生了的,被真诚的狂热分子或伪装的冒险分子的无耻蛊惑所败坏了的环境中无力地和孤立地挣扎着的工人与农民吸引到精神工作者的群体中来。工农知识分子这股力量具有铁环的重要意义,通过这一环节,旧知识分子将牢牢地同群众团结在一起并将对他们产生直接的重要影响。

在集中力量时,在把旧有的力量同工农知识分子的新鲜力量团结到一起之后,文化活动家们应当关心自己工作的协调。这对于节省我们本来就不多的精力是必需的,这对于消除工作中的平行重复现象是必需的。

我们在用文化教育协会的会网覆盖全国之后,在把国家的全部精神力量团结到协会中之后,我们将在各地燃起篝火,这火将给国家以光和热,将帮助国家康复并站起来,变得精力充沛、强大有力和善于建设及创造。这里说的不是不同思想的人们外在的和机械的联合,而是感觉一致的人们的内心的、生机勃勃的融合。只有这样,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我们才能实现真正的文明和自由。

我预见到会有人反驳说:那政治呢?

应当站在政治之上,应当学会限制并善于限制自己的政治情感。在有愿望的条件下这是可能的。政治是一种类似于低级的生理需求的东西,并带有这样一种令人不快的区别,即政治的需求不可避免地是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的。

政治——不管是谁搞的政治——永远是令人厌恶的,因为与之相伴的不可避免地会有谎言、污蔑和暴力。而且因为这是真理,所以大家都应当知道这一真理,而知道这一真理又应当使人意识到文化工作要高于政治工作。

文化工作的更为严重的障碍是在饥饿和失望的土壤上显而易见的知识分子生活能力的降低以及越来越压抑他们的冷漠态度。

应当用发展脑力劳动者之间的互助来同饥饿作斗争，至于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对俄国的“失望”，我想，对此我什么也说不出来。

当然，最好不要产生失望情绪，因为在俄国人民身上，实在是从来不曾有过任何令人迷醉的东西，但是既然曾经着迷过，后来又失望了，那就什么也别讲了。迷醉是信仰的事，失望是对盲目信仰的报复。知识非常有助于摆脱失望，这是唯一能够向失望者们推荐的东西。我个人一生在感情方面、思想方面、事业方面，都是从人出发的，我永远毫不动摇地坚信，存在着的只有人，剩下的都是他的意见和他的行为。

在这些对所有的人、对整个国家（这国家是许多代人创造的，这许多代人把我们培养成了我们现在的这种样子）都是可怕的日子里，在这些疯狂、恐怖的日子和愚蠢及庸俗胜利的日子里，我还记得这一点：这一切都是从人来的，这一切都是人造成的……

也正是人创造了大地上一切美好的东西，大地上的全部诗歌，一切辉煌的勇敢和尊严的功勋，生活的全部欢乐和节日，生活的美，生活中的可笑的东西和伟大的东西，生活的美好的理想和神奇的科学，人创造了自己大胆的理智和对幸福的不屈意志。

## 致《真理报》、《北方公社报》的 编辑及其他人

《新生活报》，1918年公历7月2日  
(俄历6月19日)，第127期(总第342期)

你们对“《新生活报》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这一问题很感兴趣。<sup>①</sup>

《新生活报》是我筹办的，用的是从艾·卡·格卢贝<sup>②</sup>那里用借债的形式拿来的钱，总数为27.5万卢布，其中已还给贷款人5万卢布了，余款我早就能还清了，如果我知道艾·卡·格卢贝现在住在哪里的话。

除了这笔钱外，我把从“田地”出版社领取的出版我的书的稿酬的一部分也用到了报纸上。所有这些钱都是由我交给《新生活报》的实际出版人亚·尼·吉洪诺夫。

我不认为我借来办报的那笔钱有丝毫玷污报纸的作用，我还认为，指责这份报纸有叛卖性，那只是论战中的卑鄙手段。

不过，我要告诉你们，从1901年到1917年间，有数十万卢布的钱经我之手用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事业，在这些钱中有我的工资数万卢布，而其余的都是取自“资产阶级”的口袋。《火星报》是靠萨瓦·莫罗佐夫<sup>③</sup>的钱出版的，莫罗佐夫当然不是放债，而是把钱捐了出去。我能叫出十几个可敬的人——“资产者”——的名字，他们从物质上帮助过社会民主党的成长。<sup>④</sup>这些弗·伊·列宁和党的其他老工作人员都非常清楚。

在《新生活报》的财务中，没有“捐款”，只有我的借债。你们污蔑性的反对《新生活报》的肮脏的做法不能使它，而只能使你们蒙

受耻辱。<sup>⑤</sup>

### 注释：

① 1918年6月中旬，布尔什维克的报刊对高尔基的批评变得格外尖锐，它们甚至直接指责高尔基及其办报同仁和资产阶级、银行家们互相勾结，指责《新生活报》靠他们的金钱生存并表达反革命的思想。1918年6月13日（俄历5月31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机关报《彼得格勒真理报》发表题为《一家卑鄙的报纸》的编辑部文章，莫须有地指责前一天的《新生活报》上拉·格利高里耶夫提及西伯利亚高尔察克运动的文章是“在为反革命服务”，而《新生活报》“实际上不仅是右翼社会革命党人的黑帮党的，而且直接是普梯洛夫之流银行家、匪帮的专用机关报。”《彼得格勒真理报》当天还刊登了署名库兹明的文章，把《新生活报》维护立宪会议的主张说成是对打算召开立宪会议的高尔察克的支持。实际上，拉·格利高里耶夫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同西伯利亚的战争》，载《新生活报》1918年6月12日（俄历5月30日），第114期）中坚决反对那些“战争阴谋家”。尽管如此，《新生活报》还是在发表了这篇文章后被查封了。四天后，《新生活报》在恢复出版后的第一期上就坚决谴责它的批评者们和迫害者们：“从一个害怕光明和公开性的、胆小的、反民主的、践踏起码的公民权利的、迫害工人的、向农民派遣征讨队的政权那里不可能等到别的什么东西。”《真理报》紧随《彼得格勒真理报》之后也向《新生活报》提出指责。例如，一位叫阿·阿历克赛耶夫的在《真理报》（1918年6月26日）上发表《让他们把牌摊开》一文，以威胁的口吻说：“我们彼得格勒的同志们……坚决，然而无结果地要求《新生活报》的领导人们回答这一问题：‘银行家格卢贝通过西伯利亚银行向你们报社捐了50万卢布，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6月28日《真理报》又发表了批评《新生活报》的一篇匿名文章和一篇由编辑部成员鲍·沃林（1886—1957，后曾任苏联出版总局局长等职）署名的短评。匿名文章的标题是《靠银行家豢养》，文章用污辱人的口气说：“高尔基的那家报纸”的“谦恭的小姐们”非常“喜欢肥胖的银行家们那要付出代价的亲热”。文章还说：“现在，《新生活报》激烈反对银行国有化的作法全都清楚了。”

② 艾·卡·格卢贝(生卒年月不详)——西伯利亚银行行长。1916年起开始同高尔基交往。曾为高尔基筹办的《光辉报》捐款,参加筹建“发展和传播精密科学自由协会”,并被选为协会司库。十月革命后侨居国外。关于向格卢贝借款一事,《新生活报》是这样说的:“这一行为是纯粹事务性的借贷行为,无论是道义上还是政治上对报纸都无束缚,否则报纸是不可能出版的。”(原载《三点多》报,见1918年6月28日《真理报》)

③ 萨·季·莫罗佐夫(1862—1905)——大纺织厂主,莫斯科艺术剧院股东,高尔基及其第二个妻子安德列耶娃的朋友,曾帮助过革命者,1900—1905年间每年拨出2.4万卢布资助列宁出版《火星报》。他在自己的家中收留、掩护过列·克拉辛、尼·鲍曼等革命领袖,为他们保管、隐藏革命书籍。他自杀前将10万卢布遗赠安德列耶娃,安德列耶娃将其中的一大部分用来支持布尔什维克的事业。高尔基曾写过莫罗佐夫的“文学肖像”,并在《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中描写过他。

④ 关于这一事实高尔基后来也曾多次谈到。例如,1932年,他在给康·费定的信中写道:“投身艺术、慈善事业并不能使所有的商人满意。萨瓦·莫罗佐夫、卡卢加人果尔布诺夫、彼尔姆人蔑什科夫和另外许多人都曾真诚地,对他们来说不无冒险地帮助过革命者。”(《高尔基全集》,第30卷,1955年,第267页)高尔基的特写《尼古拉·施米特的事业》(《高尔基全集》,第23卷,1953年,第400—405页)中的纪实主人公尼·施米特(1883—1907)也是这样一个人。他是普列斯尼亚的一家家具厂厂主,又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他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和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905年,他曾借款1.5万卢布给高尔基用于出版《新生活报》。此外,他还出钱武装了他的工厂中参加巷战的工人。他通过高尔基将5000卢布交给莫斯科委员会用于为战斗队员购置武器。1905年12月17日,施米特被捕,未经审讯被监禁14个月,后死于狱中。死前他将部分财产赠给布尔什维克党。

⑤ 当日,《新生活报》在刊登高尔基这封公开信的同时还刊登了编辑部的一篇短评,对《真理报》和其他布尔什维克报纸关于《新生活报》与资产阶级关系的不实之辞作了激烈的辩解。

这已经不是《新生活报》与《真理报》的第一次冲突了。《新生活报》的命运已不容它辩解了。两星期后,即1918年7月16日,彼得格勒出版事务人民委员部的代表来到《新生活报》编辑部,出示了查封该报的命令。高尔基签

署了编辑部的抗议书，同时立即写信向列宁反映：

“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新生活报》的问题变得非常尖锐，工人和职员们要求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新生活报》还办不办？拉脱维亚人（指执行查封命令的拉脱维亚籍革命士兵们——译者注）把伊·拉迪日尼科夫、格尔热宾、巴扎罗夫赶出了编辑部的房间。

“我恳求您，请回答，尽可能地快些，您让不让办报？一天我们要付1万卢布。

“这封短信将由我儿子交给您。

“我迫切地求您说一句——办还是不办？”（《弗·伊·列宁和阿·马·高尔基》，莫斯科，1969年，第133页）

伊·拉迪日尼科夫（1874—1945）、格尔热宾（1869—1929）、巴扎罗夫——《新生活报》的三位工作人员，前两位又是与高尔基有紧密联系的出版社的创始人。

当时参加处理《新生活报》问题的苏维埃工作人员马尔金回忆说：“为了最后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找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的面前站着的是工人国家的思想上无情的领袖。他没有丝毫犹豫，抛弃了一切个人的同情和好感。

“当然，应当关掉《新生活报》。在现在的必须动员全国保卫革命的条件下，一切知识分子的悲观主义都是极端有害的。阿·高尔基是我们的人……他与工人阶级及工人运动联系太紧密了，他自己就是来自‘下层’的。他会无条件地回到我们这边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有把握地重复了几遍说，高尔基很快会无条件地回到我们这边的。”（《弗·伊·列宁和阿·马·高尔基》，第423页）